

访问历史

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
李怀宇

云基 潘中光 苗子 郁风
倬耀之 匡中 黄杨 先益
许金 陈罗 倪李 周
沙博理 中玉 文武 黛云
吴冠永 昌文 乐资 中筠
黄丁 沈何 高汤 介民 芳融 玉子
陈贾 钱谷 徐中 满平 婴西 年河
方草 鲲辛 流沙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北京贝特

ISBN 978-7-5633-6657-6



9 787563 366576 >

定价：29.00 元

访问历史

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

李怀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李怀宇采写.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2007.12重印)
ISBN 978-7-5633-6657-6

I. 访… II. 李… III. 文化—名人—访问记—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23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7 字数:298千字 图片 27 幅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8 001~13 000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

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

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个好奇

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

回忆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苾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

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

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目 录

-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 / 3
- 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学 / 23
- 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 / 37
- 罗 孚：我行我素我罗孚 / 53
- 倪 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 / 69
- 李育中：泛舟书海纵横论 / 85
-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 / 99
- 黄苗子 郁 风：一流人物一世情 / 117
- 杨宪益：是真名士自风流 / 135
- 沙博理：不辞长做中国人 / 149
- 吴冠中：东西艺术高处相逢 / 165
- 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 / 185
- 丁 聪：笔底才情敌万夫 / 203
-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 / 217

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 /	233
高 莽：在翻译和绘画之间 /	247
汤一介 乐黛云：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 /	263
陈乐民 资中筠：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 /	283
贾植芳：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 /	303
钱谷融：漫谈中教出高徒 /	317
徐中玉：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 /	331
何满子：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 /	343
方 平：搞翻译要像袭人一样一心一意 /	357
草 婴：一个人的翻译 一个人的遭遇 /	369
鯤 西：一去不回唯少年 /	383
辛丰年：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	397
流沙河：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 /	411
后 记 /	421



许倬云

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

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

1970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讲座教授。

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求古编》、《寻路集》、《万古江河》等。



许倬云

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

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到五十岁，我理解到多少罪恶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

初秋，在香港采访金耀基先生，我问：“同辈的学者谁最值得关注？”
“余英时、许倬云。”

深秋，在南京采访许倬云先生，我问了相同的问题，先生说：“余英时、金耀基。”

这一次，许倬云只在南京逗留了几天。此前，他到西安的工地上看考古。如果身体允许，他每年会走一次十四天的考古。此后，他要去台北。他是“中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主持学术研究。他笑道：“等于是长老。”近来每隔一段时间到南京，是应老朋友余纪忠生前之托，帮助南京大学推动高等研究院。台湾《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是中央大学校友，创办“华英基金会”，资助母校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培养人才，请许倬云任董事。余纪忠去世后，许倬云依然不负老朋友嘱托。

这位为学术而奔波的长者手脚并不健全，行走时需靠拐杖。我颇感兴趣：“身体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他答：“当然有关系了。譬如我打键盘不能像一般人一样什么词都打，我的字写得很糟糕，也写得很慢。我不能随便想到图书馆就去，要累积一定的问题，被人推到图书馆去。但也有好处，杂务很少，只坐在房间里做事情。”

许倬云的兴趣广泛，读书博杂，他称为“乱撒网”：“我这种撒网去读书的办法实在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不过我到现在写出来的文章还是乱七八糟、无法归类。但是，如果今天要我重新走一次这样的路程，我盼望还有机会能再扩大到其他的学科之中。”我问：“在您的研究里，哪个学科是学术支撑的重点？”他说：“史学。我是跑野马跑惯了。我是李欧梵讲的‘狐狸型’的学者，他比我还狐狸。张光直是刺猬。”又对我说：“你们作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

听许倬云谈学问，是一种享受，他会把问题讲得深入浅出。听他品评人物也有快意，闲谈中，我几乎问遍了视野所及的学人。对同年的余英时，他说：“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了不起的学者，会抓题目，文章做得细致，写得滴水不漏。比如他写《朱熹的历史世界》，写思想史的人从来不写的，他考证朱子的交游来往，写得那么细密严谨，这我赶不上他。”又说比他们都年长的黄仁宇经历很特别：“他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是余英时的学生。”

许倬云的太太是他在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我们不像一般谈恋爱，是心灵上的来往。”他笑道，“生活上她照顾我，没有她我不能过日子。”他们的儿子现在英国。夫妇俩喜欢昆曲，在南京，常常携手到朝天宫看昆曲。

1930年，许倬云生于厦门鼓浪屿，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孪生弟弟许翼云则身体健全。许倬云在抗战中无法上学，靠自学和家人教导，1945年进无锡辅仁中学读高中前，根本没有英语、数学的基础。读到高三上学期时，许倬云离开故乡无锡。后随家人到台湾。

李怀宇 你在高中以前都没有接受正式的教育？

许倬云 没有，因为抗战逃来逃去。

李怀宇 我非常感兴趣在进学校之前你读书的情况。

许倬云 我家里是一个高教育的家庭。任何人都可以帮我忙，兄姐假期回家就会点拨我。我父亲的学问很好，他兴致来时可以解释古文的笔法，写文章的起承转合。无线电的战报，他会解释给我听，欧洲战争也讲给我听。

李怀宇 你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

许倬云 我父亲在武昌起义时是一个小炮艇的副艇长，艇长是一个清朝军官，他们就筹集了一笔钱，送给艇长作路费，请他回家。我父亲带头，好几只炮艇成为中华民国海军第一支部队。

李怀宇 你的兄弟姐妹总共有八个？

许倬云 是的。我孪生兄弟学化工。我们在沙市，他就上小学，流亡学校是放在庙里。我出生两三年，我父亲就调到湖北沙市。沙市受日本人的攻击，我们就后退一点，日本退了，我们就进一点。

李怀宇 抗战改变了中国百年的历史。

许倬云 对。我认为抗战是中国重要的转变。一方面是中国苦得要死，很多的改变到了无可避免的局面。要不是抗战，国民党不一定会输。假如没有抗战，全国民心不会那么凝聚。即使是195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工作，假如没有那么强烈的凝聚的民族主义，也不容易做到。

李怀宇 有学者认为，从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战，中国有良好发展的势头。

许倬云 好是很好，那十年是“黄金十年”。但是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的长久意义。国民党在各省都建立大学教育，而且现代的大学在主要的城市建立起来。一些民间工业都在资源委员会和经济部的策划之下普遍地建立，研究单位成立，也做了一些事情。那时候的缺陷就是比较偏枯，而且整体刚开始，规模、人数都很小，大学规模比现在小很多。偏枯的情形跟今天的偏枯有类似。沿海跟内陆距离很大，农村跟城市距离很大。再一个，那时候许多军阀并没有结束他们的权力。蒋介石要到抗战以后，才真正可以说军阀无可作为了；之前蒋介石号令所及，大概只有长江流域沿海地区。

李怀宇 抗战胜利时你才回到无锡老家，读的是辅仁中学？

许倬云 对。旁边是东林书院。无锡今天不如以前，衰败下去了。当年出了很多学术界人物。吴稚晖很有名，钱锺书是到了后来才出名。

李怀宇 你跟钱穆先生有没有渊源？

许倬云 他搬到台湾去，我常跟他来往。凡是回台湾，我一定会去跟他谈话，语言相通。他第一次到美国去，他的讲演是我翻译的，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讲国语有很重的口音，他老家在苏州和无锡交界的地方，一般人真听不懂。

李怀宇 在无锡辅仁中学怎么把课补上来呢？

许倬云 辅仁中学是了不起的，我进去以后，学校就派我到小班，我最差，让我跟最好的学生在一起，他们帮我忙，哪个学校有这种考虑？我们这个小班是没有下课的，人家回家，我们留到六七点，彼此教数学、英文、国文、化学、物理，我们走的速度比班上一般的课快。要不是这个班把我拉上来，我上来不那么容易。

李怀宇 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之前有没有英文、数学的基础？

许倬云 几乎是没有。辅仁的英文老师、数学老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李怀宇 后来你考台湾大学时数学考了满分？

许倬云 一百分。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

李怀宇 在辅仁中学有没有读完高中？

许倬云 没有，读到高三上，然后到台湾读了高三下。

李怀宇 什么时候从上海到台湾？

许倬云 先到上海，1948年年底从上海到台湾。我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律师，奉调到台湾，二姐和二姐夫就带了我和小弟弟到台湾去了。以流亡学生的身份，编到台南二中，在那读了一个学期。

李怀宇 你的父母呢？

许倬云 父母当时还在上海没走，到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才去台湾。

李怀宇 当时对国内的形势了解吗？

许倬云 我父亲很清楚国内形势，他知道留在无锡他要完蛋的。他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在无锡，他是所谓老官僚，一定会完蛋的。而且我们在抗战

前线进进出出，跟八路也不是没有打过交道的……那时候整个时代都在左倾。我同班同学七个里面有四五个是地下党，因为对国民党失望，觉得建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在这个潮流之下就左倾。所以，全班四十八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台湾。

1949年，许倬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在台大，许倬云兴趣广泛，所学跨了四个系，包括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从大二开始，他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的课都是一人班的课。在台湾大学读完硕士后，他入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五年期间，前三年也有四五门课是上一人班。他回忆：“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的累，因为上一人班你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

李怀宇 1949年为什么去考台湾大学外文系呢？

许倬云 报名的时候我们在台南，就托一个朋友的妈妈——方东美的太太，方伯母，替我们报名，方伯母就讲：“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不做事情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出自好意。

李怀宇 在外文系读了一年后，怎么转系？我看过两个版本的说法：一个是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看了你的成绩单，说你应该去读历史系；另外一个版本是说你受了几位老师的影响。

许倬云 都有的。因为我入校的数学成绩很好，国文、历史也很好。阅卷的教授拿我的卷子给校长看，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李怀宇 转到历史系以后，还旁听其他系的课程？

许倬云 我在外文系主要的课照旧上，像散文、英国文学史。那时候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是姐妹系，共同课程很多，所以我在历史系选课程，也可以在考古人类学系选课程，照旧旁听别的课。

李怀宇 当时上课经常是老师一带一地教你？

许倬云 我常常一个人一班，那时候老师多，学生少，都是一流的老师。

李怀宇 现在看起来很幸福，相当于读研究生。

许倬云 后来我读三年研究所更舒服了，四个学生，很多老师。我到芝加哥大学也很幸福。

李怀宇 现在回想，当年的台湾大学学风如何？

许倬云 第一点，学生的基础好。第二点，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我们关系很密切，晃悠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怀宇 傅斯年先生当时想把台湾大学建成台湾的北京大学？

许倬云 对。他对我们非常好，我们一直怀念他。

李怀宇 你和傅斯年先生交往多吗？

许倬云 他找过我两次。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下去，司机在门口等他，我们围着看。他五十四岁就死了，真可惜！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王兴永告诉我，当年在昆明警报响的时候，楼上的人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个人往楼上跑，为什么呢？他去扶陈寅恪先生。

许倬云 傅先生跟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我们还有很多他的信，在档案里面，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笑）。傅先生是高血压、心脏病，被政府追问：“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盖学生宿舍？”他被气死了。

李怀宇 你在台湾大学时已经对上古史很感兴趣了？

许倬云 对，我几乎一进去就对上古史有兴趣。你想我第一本文言文的书读的是《史记》，我父亲受的是海军军官的教育，可是他的古文底子非常好，教我读很多古文的东西。进大学以后，当时台湾大学最强的是上古史，上古史是史语所的强项，史语所跟台湾大学等于是一个班子，两个招牌。因为名师多，所以我读上古史多。李宗侗先生对我启发非常多，还有李济之先生、凌纯声先生、劳贞一先生。董彦堂先生希望我跟他读文字，我说，

李宗侗

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十七岁时，随五叔李石曾到法国留学，1923年返国，受聘于北京大学，曾出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委员等职。1948年，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兴趣不在这里，后来他教我历法学。

李怀宇 那时候常泡图书馆？

许倬云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写我们要的书的名字，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李怀宇 是什么样的机缘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许倬云 说来话长。我在研究生的第二年，学校里有李氏基金会提供奖学金，是全校最好的学生去考，我运气很好，就考上第一名。但是基金会的要求是健全青年，我不健全，所以就算了。钱思亮校长很不高兴，就找胡适先生帮忙，努力了两年，找到了华侨徐铭信先生，由他捐出一千五美金。这钱不够，我就申请学校，芝加哥大学愿意补上一些钱，这样我就去了。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东方研究所做这方面工作，远东的部分就附在旁边。所以我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另外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的学科，有三分之一跟顾立雅做独立研究。

李怀宇 在芝加哥大学你还成了医学研究病人？

许倬云 他们还开刀诊治我的脚。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是学校对我的手脚很感兴趣。医生说很难得见，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每年住三个月到半年，吃他的，住他的，用他的（笑）。

李怀宇 这五年里，你主要的学术兴趣在哪里？

许倬云 很广泛。埃及史、两河流域的考古学、社会学、欧洲中古经济，什么都有。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耳濡目染，就对神学有兴趣，也选课。我跟神学院的学生一起淋浴，有几十个龙头，中间有个大桌子，淋浴完大家就围着中间的大桌子讨论问题。温度很高，所以不用擦，身体都会干。

李怀宇 当时正是社会学如日中天的时候？

许倬云 对。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韦伯跟马克思是两大宗派，马克思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

顾立雅

1905—1996，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等职，是美国著名的老一辈汉学家、孔子研究专家，其孔子观对现代欧美人士影响颇大。

革命家看，他是社会学者。韦伯是反驳他的，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韦伯一生的第一个课题是德国的土地制度。

李怀宇 你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麼？

许倬云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左传》里的人物，找出每个人的来龙去脉，年代、家世作统计，战争作统计。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任何人可以去考你，这是欧洲的规矩。

李怀宇 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对你后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倬云 有极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全美学术气氛最浓厚的一个，不出阔人家的子弟，不出总统，不出财主，但出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念书就像在僧院里一样，坐下来吃饭，另外一个人过来：“对不起，能不能跟你一起坐。”一侃，关于什么问题，你的想法如何？无时无刻不在讨论问题，没有别处学校有这种气氛。

1962年，许倬云从芝加哥回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1964年，许倬云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积极参与民主自由活动。

李怀宇 1962年回台湾以后做什么？

许倬云 回到台湾，基本回到“中央研究院”，但是台湾大学是母校，台大让我去做兼任，马上就从兼任变成合聘。

李怀宇 1964年怎么当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的主任？

许倬云 偶然的因素。那时候系主任余又荪先生遇车祸身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教育部去开会，要接系主任。

李怀宇 当时系主任的工作很忙？

许倬云 非常忙。研究和教书两边工作。校长钱思亮先生让我去做大大小小的委员会的委员，他的目的是训练我。当年我出去留学，他帮了忙，所以他吩咐，我一定做。

李怀宇 三十四岁做系主任时，主要研究什么？

许倬云 西周史。一篇篇做文章。

李怀宇 你从1962年回台湾到1970年去美国这段时间，目睹的台湾政局是什么样的？

许倬云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紧缩它的掌握，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们都是被他们打击的。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人当作自由分子，不过不用自由分子这个名称，叫“歧异分子”。从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钱校长到沈刚伯到许倬云，都是歧异分子，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先生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我们都受打击。

李怀宇 1966年，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出来后，你给他写书评，还指出书中的不足？

许倬云 我很认真而客气地写，但是殷海光已经自命为大师，人家都捧他，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批评我。我讲了他几个有问题的地方。殷海光其实跟我私交很好的。殷海光是有骨气的人，但是学问并不怎么样，他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被大家当作一个指标。

李怀宇 当时自由主义在台湾很受打击？

许倬云 非常受打击……

李怀宇 你跟胡适先生有没有交往？

许倬云 我出去，胡先生回来了。我跟他的交往只有一次。1960年他带了台湾一个访问团到美国学术界开双边会议，我的老师李济之先生是人文部分的领队，李先生是史语所的所长，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做这个会人文部分的秘书，这时候跟胡适先生有接触。等我回台湾时，正是胡先生出殡的日子，我在院里悼念他。他是很温和的长者，很有风度。

李怀宇 你对胡适先生的思想研究得多吗？

许倬云 平心而论，我并不赞成胡先生的科学主义，他的“德先生”也并不清楚。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不能苛求他。他贡献非常大。

李怀宇 现在大陆在谈“鲁迅还是胡适”，这个问题很妙。

许倬云 鲁迅差太远了。我在抗战时就看他的文章，他最有趣的是《故事新编》。这是历史的东西。

李怀宇 胡适先生去世后，王世杰先生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的风度如何？

许倬云 他的风度非常好。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是不肯屈服的。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王先生不肯跟蒋介石见面，更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但是“中研院”还是必须与总统府打交道，他就派我去见蒋经国（笑）。这样因祸得福，蒋经国跟我打了好几次交道，了解我，所以后来在1967年、1968年特务整我的时候，他不相信。

李怀宇 整你的理由是什么？

许倬云 理由很多。我们自由分子长期跟他们对着干，他们找我们自由分子麻烦。

李怀宇 当时你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多吗？

许倬云 在报纸杂志都有发表文章，关于民权、自由。

李怀宇 至少还可以在报刊上讨论。

许倬云 你讨论两次以后就不让你讨论了。所以《文星》了不起，可以接受这些文章。萧孟能的爸爸是国民党宣传部的重要人员，所以他可以过

萧孟能

1920—2004，湖南常宁人。

1957年，萧孟能夫妇创办《文星》杂志，1961年李敖加盟后，《文星》影响日巨，成为60年代台湾“中西文化论战”的主要阵地。其父萧同兹为国民党高官。

关。那时候我一到台湾，就找三四十个三十来岁的大学教授，组织一个“思言社”，我在《文星》稿费透支，借两千块“青苗钱”（笑），发行第一期的《思言》杂志。后来变成我的罪证：你为什么组织“思言社”？我说我想搞“费边社”啊（大笑）！“费边社”是英国的一批主张社会主义的学者搞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罪名之一。

1970年，许倬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在匹兹堡大学，许倬云与王小波、李银河结下深厚的师生之缘。

李怀宇 1970年怎么去了匹兹堡大学？

许倬云 匹兹堡大学邀请我去当访问教授，本来是要回来的。我们带了两个箱子、一个娃娃，没有想到留在美国几十年。去了匹兹堡大学以后，台湾的长辈陈雪屏先生告诉王世杰先生说：倬云啊，回来环境不好。他们就让我待在匹兹堡大学，留下来。

李怀宇 陈雪屏先生是余英时先生的丈人？

许倬云 是的，当时是国民党的秘书长。

李怀宇 此后一直就在匹兹堡大学？

许倬云 一直到现在，我的房子还在匹兹堡大学。我有历史系和社会系两份聘书，我教东亚史、社会变动、中国古代史、历史研究法，等等。

李怀宇 匹兹堡大学的社会系很强，杨庆堃先生与金耀基先生都是匹兹堡大学社会系的？

许倬云 是的。我到匹兹堡大学主要是杨庆堃先生要我去的，他还一直帮香港中文大学建立社会系，由中大借去的。所以匹兹堡大学和中文大学有特殊的渊源，等我后来到中文大学去了七年，每次半年，也是由中大借去的。

李怀宇 杨庆堃在社会学的建树如何？

许倬云 他回来帮助社科院重建社会学，国内的社会学是他跟费孝通先生一起重振起来的。那时候他把中国美化，我跟他意见不一样。那是1973、1974年，中国并没有那么好。我说：中国不是你讲的那样。我俩意见不一样，但是到他死，我们感情还是很好。他是爱国主义。

李怀宇 那时候王浩、杨振宁也曾经回来过，经历相似。

许倬云 你现在跟杨先生谈话，他会回忆当时他被懵的事情。他是非常爱国。

李怀宇 爱国应该是海外学者共同的感情。

许倬云 但是，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到五十岁，我理解到多少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

李怀宇 你去美国时四十岁，从此在美国扎了根？

许倬云 但是到1972年以后，我就每年回台湾。我母亲还在，每年暑假回来看老太太。所以，我跟史语所的关系一直不断。我现在还是史语所的特聘研究员，不退休的，因为我不拿薪水。

李怀宇 你的研究是很多学科的交叉，不单单是历史学、社会学。

许倬云 对，兴趣问题。我对很多课题都有兴趣。

李怀宇 后来你在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位在国内非常有名。

许倬云 王小波！我跟他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李怀宇 人家写文章讲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非常散漫的一个人。

许倬云 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翘在桌子上，我的脚也翘在桌子上。

李怀宇 你们在一起聊些什么？

许倬云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要不要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反正他进来问问题，我都跟他讨论，我提出三五不同的方向：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李怀宇 你也曾经对他的文字提出建议？

许倬云 我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炼字炼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帖了。文章要干干净净。

李怀宇 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他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

许倬云 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

李怀宇 更重要的方面是，他在美国时对一些现代观念有了新的认识，这样在写文章时有一个好的思想框架。

许倬云 理清楚头绪了，他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我是帮了他忙的。

李怀宇 当时是李银河在读学位，他却没有？

许倬云 对，他是跟着李银河去陪读的，他在中文系选课，那里的课都是教洋娃娃说“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之类（笑），他就找我，我就说聊天好了，个别指导。

李怀宇 现在国内有很多“王小波门下走狗”。

许倬云（笑）现在他的书有很多人读，银河现在也很有名啊。她当时读的是社会学，杨庆堃先生和我是指导委员，她有选我的课。她那时已经注意到性的问题。

李怀宇 当时她的学习成绩如何？

许倬云 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一起从大陆去的学生有十来位，就她一个人读出来了。

李怀宇 李银河最近很红，你有注意她的一些言论吗？

许倬云 我有注意，她最近有一个同性朋友，对不对？也无所谓，人有做事情的自由。小波走了以后她也很寂寞，这也是应该的事情。这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许倬云在美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任教过，近年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讲学和主持学术研究。他关注两岸三地，用多民族和全球视角思考中国历史。历时三年完成著作《万古江河》，阐述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李怀宇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来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在哪里？

许倬云 最大的转变是把欧洲的史学研究方法拿进来了。寅恪先生写的文体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期刊的文体，规格、体裁、讨论问题的角度都是德国史学的，是傅孟真先生带回来的。史语所建立以后，就成了全中国史学的指标。

李怀宇 在70年代，台湾正在转型，而大陆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当时你在美国关注得多吗？

许倬云 在70年代，我主要关注台湾，希望台湾能够逐渐走向开放民主，花了很大力气。我想这么大一个中国，“文革”是天翻地覆，谁也没有办法措手。当时我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从地上堆起到肩膀这么高的字画，唉，看了伤心：有的泼了墨，有的刺刀刺穿，有的剪刀剪开，好字画呀！国内拿去卖的，五块港币一张，等于废品。要是我把这么一堆买了，花不了几百块钱。我心里不忍心。多少好的艺术品在里面，后来下落怎么样我不知道了。

李怀宇 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许倬云 八年抗战没有摧残，而是凝聚、吃苦、一穷二白。人家问我：抗战对你们经历怎么样？我说：bleeding to white——血都流白了。但“文革”不是，“文革”是摧残，摧残文化，摧残人格。抗战时穷归穷，苦归苦，危险归危险，人格都在。钱宾四是在抗战的炸弹声中写了《国史大纲》，陈寅恪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是在逃难中写的。

李怀宇 中国台湾、香港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没有断？

许倬云 现在也差了。台湾本土化的运动以后，也差了。他们不要中国，要本土，也是跟“文革”一样荒谬。台湾就是中国嘛，你怎么可以说：我只要手指头，不要身体呢？

李怀宇 你最近几年在台湾多吗？

许倬云 差不多半年在美国，半年在台湾，在台湾的半年还扣掉在大陆的一个月时间。

李怀宇 我们身处大陆很难理解，在台湾“去中国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市场？

许倬云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1895年割台，台湾人的情绪是，你有十八个儿子，为什么独独挑我一个？Why me——为什么是我？割台以后恩断义绝，这点很重要。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心里投降了。1895年到1905年十年之间，台湾的抗争此起彼伏，伤亡大概二十多万人，这个数字很庞大。但是等到1905年以后改变政策了，让台

湾人心服了。这是一。

第二，现在讲台独运动，很多要角都是当年“皇民”——天皇的子民——的后代，正如香港也有一批专门说英文的华人。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人把本来地方上的领导阶层赶走了，把他们庞大的产业让二手地主接下来了，二手地主原来是大地主的租户，现在变成产业所有者。租户成了地方领袖，把子弟送到日本去留学，大半是读医，一回台湾，不能做大官，不能开大公司，医生是最好的职业，这叫做皇民，皇民要全家讲日本话。到1940年时，大概全台湾百分之四到五的人是皇民。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兵源不足了，皇民的人口提升到百分之七到八。仗打完了，皇民的人口大概不到百分之十。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受中国教育，基本上是完整的、彻底的日本教育。到1945年，国民政府在打内战，到台湾搞接收的是最差的福建纪律不好的部队，福建公务人员也不好。军队的纪律不好，公务员的操守不好，台湾人很失望，他们看惯了日本军队非常有纪律……这些人是对中国看不起的，像李登辉，他说中国是“清国奴”，他们脑子里，中国不现代，日本是现代的。蒋介石带了九十万人到台湾以后，台湾的政权基本上在外省人的手里，本省人只有跟蒋家比较合作一点，才去沾一点边边上的位置。这也是他们心里摆不平的地方，到今天以民主程序的话，要把这个倒过来。

另外一个理由，这个中国我们能回去吗？……我解释这么详细给你听，你就了解这中间的前因后果，累积起来，而且中间有一批人从来没有受过中国的教育。要把中国的成分拿走，才有独立的可能。但是紧箍咒就是“一中”原则：美国只能接受的“一中”原则，变成紧箍咒，怎么都去不掉。只要美国不肯去掉“一中”，台湾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李怀宇 你的《万古江河》就是把“台湾百年的变化”作为最后一节。

许倬云 因为这本书本来是写给台湾人看的，本来在台湾发行，在大陆发行是蹦出来的。在大陆发行时改了一些，但是不太伤元气。写《万古江河》时我有原则，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写老百姓。

李怀宇 为什么没有写同时期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历史？

许倬云 我无法写，因为1949年以后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这一段不能靠史料，就像我写台湾后面那一段不是靠史料。

李怀宇 《万古江河》的写法跟以前中国通史类的著作有些不一样，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世界眼光。

许倬云 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做系主任时，第一个事情是修改课程：中国是一圈；东亚各国——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越南、蒙古是一圈；再外一圈是美、俄、英、法、德。我教学生理解，你读历史不能光读中国史而已。你看了《万古江河》之后会理解：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从新石器时代就给人家文化，拿人家文化。从新石器时代逐渐并合，并合中原，并合中国，并合到大中国。它的视野、它的领域都在跟外面接触，准备走向大世界共有的大人类，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准备这条路，将来中国必定是全世界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外。

李怀宇 你在五十岁以后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许倬云 那时候我就拿最大的“全人类”、最小的“个人”这两个当作真实不虚的东西。余外，国也罢，族也罢，姓也罢，都是空的，经常变化。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哪个族是永远这么大的？哪个姓没有中间变化而来？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哪个村永远是同一批人？都是变化的，只有全人类全体跟一个个人是真实的。

李怀宇 在你之前，像寅恪、钱穆先生这些前辈有没有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历史？

许倬云 寅恪先生为什么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要指出唐朝是一个混杂的东西。为什么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因为他的家里经历了同光年间的清流与浊流之间的党争，写牛李党争是同光党争投影过去的。他写的关怀基本上不在历史本身，自己摆在历史里。他写柳如是，是讲一个无可奈何接受了革命的人，留下来没有走，后来是很懊悔的。但是当时为什么不走呢？世家子弟吃不起苦，逃了一次难已经苦死了，不想再逃第二次难。他写陈端生，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特别表彰孟丽君这种男人里没有的女子，来看不起世间一般冠冕堂皇的人物。他早期写印度神话，是探索中古以后中国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尤其是佛教。他跟寅四先生很不一样，寅四先生是爱国主义，但是寅恪先生一辈子没有写出一个类似通史的东西。

李怀宇 为什么这么多史学家里，陈寅恪先生不写通史？

许倬云 他有能力写的，晚年眼睛瞎了，环境又不好，于是人间少了一部好书。

李怀宇 你是不是把《万古江河》当作晚年对中国历史考察的一个总结？

许倬云 对。我另外还在写一本《万古江河》的姐妹篇，那是投射到未来的。写中国面对未来的世界，每一章讲一个问题，中国的演变过程，加上平行的在其他文化系统里演变的过程，然后未来是变成什么样子。历史学和未来的预测合在一起。



金耀基

1935年生，浙江天台人。

台湾大学法学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2002年至200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民主之困局与发展》、《中国的现代转向》、《剑桥语丝》、《海德堡语丝》等。



金耀基

中国的现代转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学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五十到一百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这有关系。美国的大学也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我相信中国好的大学以后会越来越多，这也跟中国的现代转向有很大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依山傍水，美得让人心醉。位于社会学系的金耀基办公室宽敞雅致，到处都是书。金耀基先生说：“抱歉，书太乱了。”我说：“陈之藩先生那里更乱。”他笑了。

这位大学校长在2004年荣休后，最快乐的事是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书法也成了他近来的修为之一，以前很少有机会写毛笔字，如今重新提笔，顿感亲切。写字台上放着几个精致的烟斗，多年来，金耀基的形象就与烟斗结合在一起，这个上午倒没见他抽烟。

自从步入大学之后，金耀基就没有离开过。在大学生涯中，他有一半是学术，一半是行政。他在《海德堡语丝》中说：“韦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他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

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的呼吁。”我想，金耀基的世界也可作如是观。

“我一生很幸运，年轻时看书，非常喜欢梁启超的东西，他文字带有感情。我自己早期写《中国民本思想史》，假如会看的话，差不多是‘梁体’。到后来我是有意识地走开了，学术性的论文更冷静，就算是散文的话，也不是‘梁体’了。”回望自己的成长历程，金耀基悠悠地说，“梁启超之外，我对胡适之先生也是非常欣赏的，我看过他好几次演讲，他的风采非常好。至少在我中学之后，就很欣赏这两个人。以后就多了。”

王云五先生是不得不提的师长。金耀基从书架上取下《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其中多处提到师生二人的交往。在金耀基看来：“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很多人值得佩服。有些人可能是古人，可能是现代人，但是都可能通过一些现象来影响你自己，你自己可能不知道，有时是自觉，有时是不自觉。大学问家可以影响你，某一种政治人物的特别的東西也可以影响你，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也可能影响你。”在《明报月刊》的“人生小语”中，他写道：“西谚：‘（站）在巨人的肩上。’站在巨人的肩上，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都能使我们看得远。要晓得，它不是说站在巨人的脚下，也不是说站在巨人的头上。”

即使是荣休了，金耀基还是时时关注两岸三地的时事，而思考的视野是放在全球化的大势之中。他对香港情有独钟，有趣的是，他的四个孩子都在美国读大学，1997年左右有三个孩子回到香港。他也常常去台湾开会，为台湾大学的发展献策。在谈话中，我惊诧他对大陆的事没有一点隔膜。即使是当年远游海外，他总不知不觉会联想起万里外的故国神州，最难忘情是山水。

金耀基的童年在动荡的抗战岁月中度过。在他的记忆里，往往是这个月在一个地方上学，下个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学。抗战胜利后，金耀基在上海，1949年随父母到了台湾。金耀基在成功中学读书，后考取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到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转念政治，师从王云五等名师，硕士论文是《中国民本思想史》。随后，以公费生资格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

李怀宇 到了台湾，你在成功中学的老师有纪弦先生，后来他在美国还写信惋惜你当年不跟他学诗？

金耀基 成功中学是台湾最好的中学之一。那时候成功中学里有一些老师是可以教大学的。纪弦先生是我的国文老师，我的国文成绩很高，但我不写新诗的（笑）。

纪弦

原名路逾，1913年生于河北清苑，1934年创办《火山》诗刊，1936年东渡日本，回国后与戴望舒等创办《新诗》月刊。1948年赴台，1976年移居美国，是台湾诗坛元老。

李怀宇 那时候在台湾是如何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金耀基 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在家里就开始的，在学校里当然要读。就算到了台湾大学以后，也要念《孟子》，台大校长傅斯年说，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要念《孟子》，养浩然之气。有人讲，1949年，蒋介石把黄金带过去了，更重要的是把国宝带过去了，而相当规模的学者文人南下到香港、台湾。我事后想起来，这时候台湾的大学、中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时台湾也开始有民主的苗头。

李怀宇 怎么会到台湾大学读法律？

金耀基 我父亲是读法律的。我一直觉得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是受我父亲影响，要公正、公平。到后来有点失望，我发现我父亲的朋友里面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并不是很多。台湾的法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尽管有个别好的发展，但是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我到了大学之后要背东西，可是我喜欢自己看书，上课都不大去，因为法律系的几位老师是照讲义来念，这样发了讲义我就不必去听课了。我把讲义看得很熟，答起来就非常有把握。后来还是把法律念完。

李怀宇 在台湾大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泡图书馆？

金耀基 我差不多把台湾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里的书看完。那时候我们重视运动，另外就是自己看书。看书不是满足于上课。今天我告诉学生，中学里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比，差不了太多，到了大学以后，假如你自己不好好读书，四年以后就会相差很多，不是拿第几名的问题，而是你自己有没有完善自己。台湾大学的好学生太多，到现在为止，还是中国人办的大学中最好的之一，这毫无问题。今天全世界用英语教学的第一流大学里，几乎都有台湾大学的毕业生在教书。

李怀宇 读完台湾大学，怎么去读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的研究生？

金耀基 在台湾大学时我对法理哲学很感兴趣，不是一般的法律，读深了之后很自然地跟政治、哲学有关系。那时候政治大学刚刚成立政治研究所，可以说最好的老师都在那里，王云五、浦薛凤、邹文海这些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人物，台湾大学没有。

王云五

1888—1979，广东中山人。自学成才，一生未进过大学。辛亥革命后曾应孙中山邀请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1921年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1946年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64年起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直到逝世。对中国出版事业贡献巨大。

李怀宇 在这里，你师从王云五先生，结下了终生的情谊。

金耀基 王云五先生是一代奇人。我始终不是纯粹把他看作一位学者，出版家是没有问题了，他是一位有现代意识的大文化人。我跟他很有缘。他九十岁生日时，人家送一座铜像，他写封信，要我写一段话，刻在铜像上面。我写了，他非常开心。他去世之后，墓志

铭是我写的。他没有读过大学，但是把大英百科全书看完了。他的知识面不局限于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也非常了解。他居然可以教胡适英文。这么一位自学成才的人，跟孙中山先生不认识，就是在一次聚会里发表了演讲，孙中山先生就请他做秘书。他跟蔡元培也没什么交往，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建言，蔡元培先生就请他到教育部做事。

李怀宇 王云五先生上课的风度如何？

金耀基 他上课从来不是随随便便的，总是准时到，讲课很投入，很热情。他讲课时给人的感觉非常亲切。他是一个非常会管理时间的人，人的时间除了必要的吃饭睡觉，其他的时间就要看你怎么用。

李怀宇 读研究生期间，你对中国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金耀基 我跟王云五先生写的硕士论文就是《中国民本思想史》，后来出版了。我感觉到中国有民主的根苗，以民为贵的思想在中国社会是很重要的。我写了重要时期对民本思想的想法，最后中国是要由民本到民主。民本是民本，民主是民主，彼此差别很大。用黄遵宪的话：“太平世必在民主。”他看到世界真正到了大同时需要民主，但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可能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

李怀宇 这时如何关注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

金耀基 政治系跟搞政治是两回事。很坦白讲，当时的政治还是一个威权政治的范围。基本上能够做到最好的话，也只是民本，不是民主。那时候我真正关心的还是文化，原因是台湾在进行中西文化论战，当时是在重复大陆时期的论战。我认为水准并没有高到哪里去，都谈不出中国文化到底应该怎样解决。我在《狮子吼》杂志上写过一篇四万多字的文章。之后我就出国了，出国之后就研究中国的现代化。

李怀宇 是什么样的机缘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

金耀基 在匹兹堡大学读了两次，是生命里的偶然。第一次是在台湾大学里选拔老师考试，我考上了。不过那时候出国很难，同时我也没有钱。如果一年要读一个硕士学位的话就是匹兹堡大学，一年三个学期。回来以后教书，同时写了《从传统到现代》。过几年之后，我又考取了一个奖学金，钱是美国国会出的，全岛只有一个人。结果王云五先生不希望我走，希望我留下来帮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后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没有口头讲，因为口头对长辈讲不好。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在商务印书馆不能像他那样，他是吐丝，我年轻，没有东西吐，正是像蜜蜂一样酿蜜的时候。这封信他一直保留，后来在他的年谱里都有，我每封信他都保留。我第一次去匹兹堡大学拿了一个硕士学位，第二次就拿了博士学位。很妙的，香港这个地方，有三位大学校长都是匹兹堡大学毕业，都是在那边拿博士的：我、徐立之（香港大学校长）、谢志伟（香港浸会大学校长）。

李怀宇 到匹兹堡大学留学对你在学术上有什么样的影响？

金耀基 我很喜欢匹兹堡大学。我主要读国际政治，偏重于社会学。60年代是社会学的黄金时期，那时候真是如日中天。我很多方面都是从社会学里面得到知识的沃源。我念书的知识面是多元的，所以看问题不是纯粹地从—个观点来看，当然最后还是社会学影响我最大，我几十年都搞社会学。

李怀宇 留学对中国学生来讲，是不是很重要？

金耀基 我觉得很重要，尤其是当我们自己的大学制度还不是非常强的时候。19世纪时欧洲的大学是全世界最好的，二战以后美国的大学得天独厚。我想到21世纪有所谓的亚洲兴起，首先是日本崛起，然后是“四小龙”，然后是中国。亚洲的兴起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大学的兴起，没有大学的兴起，

亚洲就兴不起来。今天的学生如果有机会到欧美第一流的大学去留学，我还是很赞成的。

从美国回来后，金耀基在政治大学教书，又在商务印书馆兼任编辑工作，开始有系统地在他主编的《出版月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文章。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的同学陆续请他去演讲，他不只乐意，还很兴奋，希望把自己的看法介绍给大学生。1966年，金耀基出版《从传统到现代》。

李怀宇 回到台湾后，你一边在政治大学教书，一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和王云五先生共事？

金耀基 对。那时候王云五先生做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我是副总编辑。我在楼上，他在楼下。

李怀宇 你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在写文章和演讲当中也日见成熟了？

金耀基 那时候我在台大、政大演讲，在政大演讲就构成一个书的意思。我认为现代化是台湾应有也是唯一的出路。多年后，我读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大诗人帕斯论墨西哥前途的文字，他认为墨西哥是“命定的现代化”。墨西哥伟大的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虽会遭到损坏，但他坚信现代化是墨西哥非走不可的一条路。这正是我当时对中国的想法。

李怀宇 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出版之前，你跟殷海光先生有一段特别的交往？

金耀基 我记得书里的文章大概是在杂志里发表了。有一天，陈鼓应和陈平景来找我，他们两人一直跟着殷海光先生的，他们说：“殷先生想请你喝咖啡。”那时候殷先生在某种意义上是被人家避讳的人，可以说是有一些监视吧，我自己是不怕这些事情的，我没有做坏事情。殷先生虽然没有教过我，但他是台大的教授，基本上是师友的关系。我去了殷先生家，看到殷先生把我的文章做了很多圈点，他说：“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想法呢？我搞了这么久才想到这些问题。”他后来发表《中国文化的展望》，差不多跟我的《从传统到现代》同时。殷先生的咖啡都是他器重的学生像林毓生、张灏这些在国

外很有成就的学者送给他的，他请我喝咖啡是不容易的。我也很感动，他对事情那么认真。最后到殷先生得癌症的时候，他的文章的论敌徐复观托我把三千块钱送给他。

李怀宇 1966年，《从传统到现代》出版，在台湾影响很大。

金耀基 当时只要是大学以上甚至是聪明的高中学生，假如要谈文化的事情，没有看这本书是不可能的。这本书为什么影响那么大？我想是因为这是第一本有系统地谈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书。

李怀宇 这本书的出版到现在正好是四十年。

金耀基 四十年来，到2004年我从中文大学校长退下来以后，出版了《中国的现代转向》，当然对中国现代化本身反省很多了，但是认为中国基本上必须现代化的观点没有变。就算是我写的学术性的论文，也是谈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转变的事情。中国社会这一百年是一个大的转变，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1905年废科举，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改变，中国废科举之后才有现代的大学，大学里讲的学问已经不是经学，不是为了科举考试。这个变化是根本性的，中国的士大夫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知识阶层已经不是士大夫——当然说今天要有士的精神，是另一种说法——这是文化宇宙的改变。1911年，辛亥革命是政治宇宙的改变。孙中山说：四万万同胞，每个人都是皇帝。主权在民，这种观念今天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但是主权在民的观念基本在政治意识里存在，不管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讲的都是这些东西。中国以前是天子的统治，老百姓哪里去做皇帝？没有可能的。政治跟文化的改变，然后就是社会的改变，20年代家庭革命，特别是妇女地位提高，妇女摆脱了夫权。今天我们见到中国大学有一半是女学生，当年北大进几个女学生已经不得了，这个变化对中国来说是太大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改变，这是现代化的转向。

今天香港之所以在很多方面是中国所有城市里最现代化的，是因为很重要的制度层面是最现代的，法制、商业行为都有一套制度，香港的跑马也是制度化的。当然我们还远远没有完成，就算是民主，在台湾也没有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全球化。全球化的问题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是因为全世界都在现代化，不管你的古老文明是怎么样的情形，不同的国家都在现

代化,才可能出现全球化。但是全球化也必须从现代化里分开来看,我们过去一百年是在东西观念的冲突与结合之中,今天的观念是全球性。今天的香港是一个local,广州是一个local,北京是一个local,纽约也是一个local,巴黎也是一个local,但是有一些local里有很强大的现代性和全球性。从这样一个观念看,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进入的世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中国的现代化转向一直下来,我希望到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成型。

李怀宇 唐德刚提出中国走出历史三峡,也是在21世纪中叶之前。

金耀基 整个中国现代化是在清末开始,已经跨越了三个世纪。中国的文明秩序在19世纪最后见到现代文明秩序,然而文化输入太多,文化输出太少,完全不平衡。现在的中国知识人,不可能只局限在过去的传统,一定要受世界的影响。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各种层面如何现代化,仍然是大问题。当然,我相信中国的现代化是多元的。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

1970年,金耀基到香港中文大学执教。1975年,金耀基到剑桥大学访问研究一年,写了散文集《剑桥语丝》。他写道:“由于她的不寻常的美,她的不寻常的迷人,我虽然无诗心文胆,也不能了无所动,也不由得不提笔写下我的所见所思。”1985年,金耀基到海德堡大学作访问教授半年,写了散文集《海德堡语丝》。他觉得:“海德堡与剑桥是二种不同的美,二种不同的灵韵。”剑桥与海德堡这两个大学城原是一对姐妹城,而《剑桥语丝》与《海德堡语丝》也成了姐妹篇。

李怀宇 《剑桥语丝》写得真是迷人,让人读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金耀基 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么愉快啊!这样就没有那么多烦的事情。我可以在剑桥的书院里住,做了一些研究,自己对自己有一些交代。我天生就很喜欢文学,就开始写《剑桥语丝》,想不到影响很大。你看看徐志摩的剑桥,再看看我的剑桥,我完全是从历史层、知识层里去看剑桥。我是非常欣赏徐志摩这个人的,但是他的文章太浓了(笑)。后来陈之藩也写剑桥,

也写得非常好。我心中觉得他们俩都写得好。我自己不知不觉有那么多感觉，就写出来了。我的文章一种是学术性论文，一种是文化性与政治性评论，一种是散文。最能说自己话的是写散文。还有一个原因，写了以后，人家的反应影响我。十年以后，我去海德堡，那时候为什么写《海德堡语丝》呢？跟董桥有关系。董桥是写散文的高手，他眼高，手也高。他很有本事，不断写信约我写，我就一直写。

李怀宇 《剑桥语丝》是你四十岁时写的，《海德堡语丝》是你五十岁时写的，两者就像一对姐妹，各有各的美。

金耀基 海德堡是山水之城。那时我对德国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看德国文化就要看大学。到了海德堡之后，我就很重视大学。海德堡太漂亮了，我喝德国白酒是在那时候开始的，到现在我还喜欢，德国白酒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海德堡语丝》其实比《剑桥语丝》写得好，里面更有一些微言大义，但是我用很平淡、很自信的方式写出来。

李怀宇 《海德堡语丝》里的灵魂人物是韦伯。

金耀基 我到海德堡去，跟韦伯有点关系。我到德国开会、做访问教授前前后后四五次，前年他们请我去做韦伯讲座，我没有去。但是，韦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韦伯提出的几个重要的问题，到现在还是社会学重要的问题。像他写的《中国的宗教》这本书，其实是讲中国社会文化，对中国问题能够讲得这么有深度。我想，恐怕几十年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很多很多都是对他这本书作进一步的发挥，或者是跟他对话，跟他辩论。所以我对海德堡的感情有这么一种关系在里面。

基本上你要研究重要问题时，差不多都是建立在跟韦伯的对话、辩论、批评上。韦伯在谈到宗教时说：在一个自信膨胀的时代，往往一种道德的判断已经被对一种品位的判断所取代，重要的是品位，而不是好与坏。这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美学的观点。你看蔡元培后来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第一层次很简单，他不希望西方的基督教来影响，也不希望孔教来影响。以前的宗教包括美育、德育、智育，现在只剩下美育，但是美育留在宗教里也不能发挥作用，美育应该独立出来。这些看法跟韦伯谈的美学的伦理问题相似，他们差不多同一个时代，是不是受韦伯的影响，我不敢讲，不过这些地方真是讲得很相契。

1977年，金耀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1989年任中文大学副校长，2002年任中文大学校长，2004年荣休。金耀基参与中文大学三十多年来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他的研究、教学、行政都与大学有关。金耀基对“大学之为大学”深有研究，1983年出版《大学之理念》，在台湾引起回响与共鸣，并对台湾的大学改革运动产生了影响。此后，金耀基对“大学”这个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希望能够继续引起关心中国大学前景者的一些思考。

李怀宇 《大学之理念》源于你到剑桥大学之后的思考和研究？

金耀基 那时候我对大学开始研究，念大学，学士、硕士、博士毕业出来以后做教授、做院长，可是突然反应：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这个我以前并没有想。从剑桥开始，那时候在剑桥百年以上古典的书，我都借来看，了解大学是什么。后来我回到中文大学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时，就想怎么样让书院在大学里发挥作用。我找了很多关于大学的资料，形成了《大学之理念》。

今天的知识创造基本来自大学。工业革命时期，很多东西都是在剑桥、牛津的门口发生的，但是以后的知识创造很少不是来自大学。以前欧洲的大学是以《圣经》为主要来源，中国是四书五经，这些东西都是教你做人，现在的大学基本上是创造知识。这是很不同的。我去年在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讲座上，就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蔡元培先生就受欧洲影响，他当时提出以美育来代替宗教，这是现代型大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李怀宇 说起来很妙，你是从剑桥大学回来以后当了新亚书院的院长，从海德堡大学回来之后当了中文大学的副校长。

金耀基 做了行政工作，对研究工作会有影响，因此我从海德堡回来以后，希望不要有太多行政的工作。那时候是高锟先生做校长，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到我办公室来坐了几次，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做了副校长。因为我们是研究型大学，除了教学之外，还要研究。这里对每一位老师都有要求，我自己如果不写、不做，怎么可以讲话呢？至少要发表几篇文章，对不对？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自己为什么进大学？就希望做点学问，希望写点东

西，希望教书。我做研究不可以找一些人帮我找资料堆积起来，我做不到。做理工的可能不同，人文的东西一点一滴都要自己搞才能出来的。在中文大学这个地方，我做副校长，可能做点学问，但是做校长就不可能。退下来以后，我看书的时间比两三年前多得太多了。

我自己很幸运，到了香港。现在是可以回头看的时候了，1971年麦理浩来到香港当港督，从那时候起，香港开始由一个普通的殖民地走向国际性的城市，脱离了殖民地的轨道。中文大学这三十多年正是跟香港的转型同步的。唯一不同的是，创校时，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就讲：中文大学必须是一个中国人的国际性大学，是中文大学，但不是自己关起门来做到第一。中文大学的毕业生也可以说是在香港整个国际转轨中作出了贡献。同样原理，也是因为香港在国际转轨中格调越来越高，反过来支援了中文大学。

李卓敏

1912—1991，广东番禺人。193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高校和政府任职。1951年移居美国，1963年到香港筹办香港中文大学，并任首任校长。

李怀宇 中国的现代转向与大学之理念，是你研究的两个重要课题，从深处来看，两者密不可分。

金耀基 我认为中国的现代转向最主要就是新的学术起来。我们现在大学里的知识谱系不是中国过去的，蔡元培开始把经学驱逐出境了，当然这里面可以辩论。这跟全球化有关系。中国过去有科举制，这是中国文明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今天的大学重要性慢慢地要取代这些东西。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我认为，如果没有五十到一百间第一流大学的话，这是痴人说梦。欧洲成为欧洲世纪，美国成为美国世纪，都跟这有关系。美国的大学也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我相信中国好的大学以后会越来越多，这也跟中国的现代转向有很大关系。



陈之藩

1925年生，河北霸县人。

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敦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

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及《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散文集有《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等。



陈之藩

秋水文章不染尘

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有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

陈之藩先生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的像，爱因斯坦的对面是一大一小两张梦露的裸体艺术照。我一见就好奇地问为什么，陈先生说：“好看。”我又问：“童教授没意见吗？”陈先生笑答：“童教授有什么意见？童教授每天都来。”

童教授是陈之藩的太太童元方，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任教，陈先生是电子工程系的荣誉教授。中文大学依山而建，童元方女士的办公室在山上，陈先生的办公室在半山。有一年春节前我到香港，所见的是经济萧索与人心浮躁，心情坏透了。陈先生夫妇招待了我一顿可口的午餐和悦耳的聊天。下午童女士有课，陈先生带我 from 山上走到半山他的办公室再坐一会，这一坐竟不知不觉到了日落。陈先生又带我到沙田吃了一顿丰盛的上海菜，这才握手言别。他的岁数比我爷爷小几岁，我却把他当哥们，事后才自责这一天一定

把他累得够呛。第二天童女士在电话里埋怨我，又说陈先生聊得很开心。

在作品中，陈之藩时常提起的科学家就是和梦露“朝夕相对”的爱因斯坦。他讲的两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故事，让人一听难忘。一个是：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事人问他一年要多少薪俸，他说五千差不多了。一年五千元是物理系刚毕业的学生的水准，主事人说：“给你年俸五千，给别人就不好给了，请为我们着想一下，还是勉强订年俸一万五千元吧。”另一个是：爱因斯坦的谈话总给听众一个印象，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他本人倒不太相干似的。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

在生活中，曾和陈之藩时相讨论的朋友是杨振宁，杨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之藩说，杨振宁长得真漂亮，第一次见杨时，他的一个外国同学就问：“杨为什么不到好莱坞去当演员？”我提起杨的太太杜致礼在诺贝尔颁奖会上的一张照片真漂亮，陈先生说，他先发现了，还专门找来送给杨。

每次打电话给陈先生，他总说：“你赶紧来，我喜欢听你聊天。”陈先生是喜欢聊天，不喜欢采访的；录音，他更不喜欢。他对唐德刚用录音整理胡适口述自传是有保留的。但是他容忍我这个晚辈工作的需要，他曾以胡适晚年爱讲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写过一文，写得真好。

在我看来，陈先生的每一篇文章都好。每遇言语投机的朋友，我总会推荐陈先生的文章，几乎是“到处逢人说陈文”了。可惜大陆只出过一本陈先生的《剑河倒影》。有一次我听他说，胡适不止一次对他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便找周作人的东西来看，看不出其中的人生况味。我问他周作人的东西好在哪里，他好像说“老实可靠”，我倒觉得他的文章是这样的。

每次去陈先生的办公室，会发现书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乱。科学和外语的书尤其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书种像他这样杂。谈书，他要发觉你“老实可靠”地用过功才会深谈，有一次谈起我只是瞥过的当红书籍，他不知从哪摸出一本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一本北岛的《失败之书》，都是简体本。我脸红，问他书从哪来的，他说，学生在学校里摆摊卖书，他怕卖

不出去，随手买的。他总是心疼后辈。

陈先生喜欢写信。和他通信颇勤的前辈有胡适和沈从文，后辈则有董桥。董桥记述这种书信因缘：“陈之藩是大学问家，满腹经纶，平时惜墨如金，聊天写信却往往畅所欲言，教人如坐春风。”

陈先生的字清雅。我曾经请教过他对沈从文和台静农的书法的看法，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对艺术，他总有一些出人意表的妙句。

陈先生喜欢念诗。他翻译过许多英文诗，集成《蔚蓝的天》。第一次见面时，我念了一对古句：“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笑了，说下句比上句好。

※ ※ ※ ※ ※

读陈之藩的《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欲哭无泪。中国文化此后的苦难，他不幸言中了，那时他只有二十岁出头，何以如此先知先觉呢？信里面谈到的那些前辈教授，一个个后来都走进苦难里了，怎不让人心疼？陈之藩生平最佩服爱因斯坦和胡适，这两人却都从苦难里走出来了。

童元方喜欢爱因斯坦的情书，写过一本《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也译过《爱因斯坦的梦》。她写过一篇谈爱因斯坦家人的文章，叫《在阴影里》，我们都拿她开玩笑，说她显然是受《在春风里》的影响。

陈先生的书，我最喜欢写胡适的那本《在春风里》。每次都听他聊胡适，他说跟胡适常不太谈得来，两人又一次次地爱谈。第一次见他，我就问他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在春风里》什么时候出，他说，想写一个序，但是想了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我不喜欢台湾版《在春风里》的设计，还是买了，拿去请他签名。童元方借这个由头埋怨陈先生“不乖”。又过了两年，序终于写出来了，真好。

聊胡适，免不了要聊鲁迅，百年来的文化绕不开这两个人。我同意陈先生关于鲁迅的大部分看法，有时又忍不住跟他顶嘴。我说：“鲁迅的《朝花夕拾》和《野草》何其优美，《中国小说史略》何其凝练。”他不说话。我说：

“至少鲁迅的旧体诗和字是好的。”他笑了。

胡适在哈佛大学时发现了周一良和杨联陞这两个读书的好种子，后来只留下杨联陞陪他论学唱和。我在《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的附录中看到赵俪生访美时与杨联陞在电话里吵架的事，周一良的解释是杨联陞患有精神病，便向陈先生求证。“在美国待上十年以上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吃牛肉恨不得吃生的，”陈先生边吃菜边说，“另一个是有精神病。”

有一次我问他：“胡适的新诗好吗？”他笑着把问题递给童元方：“她是学文学的，你问她。”大家笑了。《在春风里》陈先生说：“我总觉得，胡先生是个诗人，而作不出诗来，这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有一次打电话给陈先生，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访问了杨宪益，他有两句诗真好，你怎么没引出来？”电话里听到他跑去找了出来：“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演讲《眼前文化的动向》，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封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日后这些信集成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1948年6月13日，陈之藩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见地独到，为胡适的朋友圈击赏。

李怀宇 和胡适通信之后，你曾到北平东厂胡同和胡适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是夏天，你是穿短裤去的？

陈之藩 我穿着短裤，聊了一会儿，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他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我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

李怀宇 第一次和胡适见面，他的风度如何？

陈之藩 我见过的教授多了，胡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大派。

李怀宇 现在收到《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里作代序的那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写得真好，思想、文笔，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写的。

陈之藩 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议论，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李怀宇 你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你们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你为了改专业的决定还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陈之藩 金岳霖真厉害，我真服他。那时候我很悲观，他说，你知道什么叫悲观吗？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要设法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他给我解释半天，我心里很舒服，他并没解答我的问题呀。他说胡先生的思想跟汽车一样（笑），是后来居上，汽车越新的越好。他每一句话都像格言似的，你真受不了。

李怀宇 就是那一次见面，他把你从清华给打回来了。

陈之藩 他又不给你作决定，但是听他这么一说，就又回到北洋大学了。

李怀宇 有没有给他写信？

陈之藩 写信以后才能见到他嘛。写信有好多种，比如说，“怀宇吾兄大鉴”，中国式这么写（从右到左竖着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着写，现在大陆也横着写。金岳霖他这样（从左到右竖着写），他怕他手粘墨（笑）。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儿。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鼓掌，大笑）。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最舒服。

李怀宇 你和冯友兰有没有见过面？

陈之藩 我对他的书很熟，但没见过，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容易见到还是怎样，我忘了。我喜欢冯友兰，而胡适不喜欢他，我还在胡适那儿吹冯友兰，胡适太忙，冯友兰的书他大概没看过多少。他不喜欢冯友兰是因为

冯友兰是当代同行而出毛病，还是因为冯友兰跟他宗派不一样，那时候我搞不清楚。现在我觉得冯友兰不像他自己书中写的那么好，但是胡适始终倒是一致的，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老实可靠的。但是那时我不觉得，我觉得冯友兰很尖锐。

李怀宇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上半部，冯友兰后来写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呢？

陈之藩 胡适用科学方法来解释哲学，完全走到另一条路，写到魏晋根本写不下去了。但是冯友兰写了，“贞元六书”是好。

李怀宇 你和沈从文是又通信，又见过面？

陈之藩 沈从文非常有意思。他住在中老胡同，是北大的宿舍。我到中老胡同去看他，大概是看完胡适的第二天。他们都是同事，整天聊天。你不知道那时候他们说话，国语都很差。沈从文算是很努力的了，因为他吃教国文这行饭的，还是有些我不懂，但是大致懂。跟他谈些什么，问我什么我都忘了。我也很会出题目给他谈，如：在联大教什么课啦？我熟悉他的小说啦。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很小，跑来跑去。沈从文就作了介绍，怎么介绍不记得了。

李怀宇 她漂亮吗？

陈之藩 我们那时候全校两千人，女同学只有三四个，漂亮女人没见过，就是看过电影里的白杨之类的。大概她也化了妆，完全在我想像之外，觉得是挺漂亮的。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我就说没有什么了，我傻傻地也不会答，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我想到从前沈从文怎么追她，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她怎么要他怎么不要他。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台阶下，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镇静下来以后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以后，学校分配我到台湾去，那时找事很难的，我在北平自个也找不到事。你看沈从文很奇怪，他就给我找到事了，那时我已去台湾了，坐船到台湾以后接到他的信，他说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章，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的信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李怀宇 沈从文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你当时觉得

他的文章怎样？

陈之藩 沈从文的文章我跟童教授研究过，童教授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说他这篇写得最好。我喜欢《边城》，大概是电影明星选得漂亮（笑）。我是先看的电影，后看的《边城》。那时候我觉得他的散文不如我写得好（笑），更不用说后来了。因为他联想太丰富，一说出来就是两百个，他联想到什么，联想到什么。这是文学天才，我没那么多联想，我最多十个八个，我已比普通人多了。

李怀宇 我挺喜欢他年轻时的文学评论。他的《论郭沫若》论得多好啊，他说郭沫若的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后来郭沫若对沈从文致命一击的《斥反动文艺》，说他是粉红色文人，估计是那时候埋下了伏笔。沈从文论郭沫若的时候才二十八岁。

陈之藩 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批郭沫若抄钱穆文章，他那时也是最多二十八岁。他到美国以前在新亚书院读书，写得好。

李怀宇 余英时写胡适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引发了汪荣祖跟他论战，汪荣祖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胡适历程的曲直》，大意说胡适成名太早，一开始就视日记为迟早将公之于世的作品，日记不一定能反映胡适一些真实的东西。

陈之藩 日记很难讲，我觉得胡适的日记百分之九十八可靠，有一点，比方他跟人恋爱，有些那就不说了，最多是如此。

1948年，陈之藩从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后进入国立编译馆工作。此间，杨家骆等人对陈之藩有知遇之恩。有一次，胡适从美国回台湾时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陈之藩经济拮据，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1955年，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李怀宇 你刚开始在台湾工作是怎么样的？

陈之藩 学校派到那个公司做工，我修过好多马达，修马达很有意思。我所有的部下，二十多个都是女孩子，在工厂做工。因为高雄非常热，女孩子一晒就黑了，所有女孩子的脸都包上，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没有一个我知道的。她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是她们长官，以我为荣，请我吃一顿，我得给她们红包，也很严重，挣的钱太少，结婚的太多。结婚时新娘打扮得真是漂亮，你就是阿花啦，我说我怎么不认识，我认识我就追你啦（大笑）。还有一个阿苏，每个都好漂亮，但是我都不知道。我教她们修马达，阿苏坐在这，我搂着她，我只看见她眼睛，别的都看不见，但是手一摸，我说这么细。我按着她的手，那是非拿着手告诉她怎么修不行，没别的办法，手就这么点，手很软。我一握就知道这是阿苏的手，这是阿花的手，别的我就知道了

（笑）。一见到阿苏我就想起薛宝钗，所以我就叫她“薛宝钗”。我们言语不通嘛，她会闽南话，我不会，她国语就说那么一点，但是我是 boss，她就慢慢听懂那几句话，什么“上来”、“下去”等。教她修马达，很快乐！那时候假如女工们没有捂着一块布，我一定追一个，story 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会去台北，更不会去国立编译馆了。

李书田

1900—1988，字耕砚，生于河北昌黎。1923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随后赴美留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曾任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对中国水利事业贡献尤大。1949年去台湾，不久赴美。

李怀宇 怎么去的国立编译馆？

陈之藩 得诺贝尔奖的朱棣文的外祖父李书田让我去的。李书田是我们北洋大学的院长，他在编译馆，我是他得意的学生。我说我整天修马达干什么，实在无聊，他就叫我去。

李怀宇 在国立编译馆就认识了梁实秋？

陈之藩 那时候李书田跟梁实秋是同事，他是自然科学组的，梁实秋是人文科学组的。李书田写书，也让我写，梁实秋看书然后决定印不印。梁实秋一看就说好啊，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笑）。好戏还在后头呢。梁实秋后来变成馆长，不是组长了，有权了。他是文人，活宝一个。他说我提拔天才，我不知道啦，他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他老兄一批就加一倍，也不告诉我。他说以写出那书的能力，就应该加一倍。我那时接到钱袋，我说这回怎么这么厚，那时我也不知道。我找到会计，说你不是不

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他说你们梁馆长批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因为那会计主任他也不行，他觉得我跟梁实秋都是从北京来的，他误会了梁实秋，梁是提拔人才，他解释成是因为同乡。

李怀宇 后来胡适借钱让你去美国留学是怎么回事呢？

陈之藩 梁实秋当馆长以后，胡适从美国回来了，他跟胡适说借钱的事，说你帮帮他。还不是我跟他说的。

李怀宇 那就考到美国去读硕士了？

陈之藩 还没这么简单，这时候我大学毕业已经五年了，我就到领事馆里考试。考试也很有意思，我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跟我说你得看Time杂志，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我的英文也不那么好，在编译馆算不错的了，考试前真看了Time杂志，还就考那一段，真是怪事，我就译过那一段。笔试我刚预备好就考，真巧一个生词也没有，笔试算通过了。口试那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着一大堆人，他从屋里出来，宣布现在该谁了。他要练练他的中文，他一看“陈之藩”，发音稍微差一点，他大声说“陈——吃——饭”（大笑），大家都笑了，他不好意思，他说：我说得不对吗？我说：你说的全不对。他说应该怎么说？我说“陈之藩”，他就跟着我说，口试就这么通过了（大笑）。

李怀宇 考试通过后就去了美国读书？

陈之藩 没去，怎么去？胡适先生给你存了两千四，你还能跟人家要路费吗？你上飞机要给机票钱。胡适借的是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李怀宇 那怎么办呢？

陈之藩 你说怎么办？我延迟了一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胡适最欣赏的我的作品，是物理书。我写物理教科书是因为没有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挣稿费，又遇见一个贵人，杨家骆，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杨家骆是世界书局的老板。人家跟我说你是在编译馆做事的人，你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把他名字

杨家骆

1912—1991，江苏南京人。1928年开始系统研究目录学，1930年正式从事出版工作，创办中国辞典馆。1948年去台湾，先后在世界书局和鼎文书局任职，主编出版多种大型工具书。

写在前头，把我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一个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我这本书，他就这么一看，说好啊，显得非常惊讶，说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自己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书我也就拿到去美国的路费了，大概五千块台币，美金大概一千块左右，就这么去了。

李怀宇 到了美国就在那里写《旅美小简》，寄回台湾发表。

陈之藩 《旅美小简》那是另外的 story。聂华苓在编《自由中国》文艺版，我给她发现了。聂华苓为什么发现了我呢？余英时的太太(陈淑平)是陈雪屏的女儿，陈雪屏在台大当教授，拿钱办《学生》杂志。有一帮师大附中的教员请我去编科学栏，编科学栏时我看他们编的文艺实在不像样，就随便写些，结果哪来那么多东西可写，所以就翻译英国的诗，那就是《蔚蓝的天》。聂华苓知道我能写文章，所以就约我在《自由中国》写稿。我在美国无聊嘛，写完后寄给聂华苓，她就登了。大家都看《自由中国》，因为《自由中国》比较开明一点。

从1955年陈之藩赴美到1960年胡适返台，正值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在美国任教的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

李怀宇 你到美国时，胡适已在纽约了。

陈之藩 他已经在纽约了，偶尔回台湾一趟。

李怀宇 那时是他最寂寞又最清闲的日子。

陈之藩 清闲倒不清闲，但是他很寂寞，大家都不理他。他喜欢整天跟客人聊，他也有可聊的，也喜欢听大家的意见，他外国朋友比中国朋友还多。那时候暑假他常找我，他没得聊。我那房东老太太，她说他的英文比你好了，我说他是当大使的，她不信，说：你会有当大使的朋友？因为他很客气，我不在时他就留 message。

李怀宇 那时候都聊了些什么？

陈之藩 比如说，西南联大四个教授，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吴晗，他们写给马歇尔的信，四个人写的都好，都在水准以上。胡适蛮喜欢闻一多的。我就不问吴晗了，我不问，他也不会说，他的意思是吴晗跟他的关系太近了，因为是他推荐吴晗到清华教书的，吴晗搞明史的，后来怎么会变成那样呢，失望到家。那时吴晗是北京副市长，正红着呢，后来“文化大革命”吴晗才下去。我问他潘光旦怎么样，他说潘光旦很有个性，他就这么一句，不多不少。我说费孝通，他就说“油腔滑调”。我很佩服费孝通，很受他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念的差不多就是费孝通在英国写的那些，我的文章很受他的影响，没想过胡适会说他油腔滑调。

李怀宇 有一次你说胡适因病请人暂代职务常出问题，胡适的两个好朋友傅斯年和陈诚气度不够，是不是因为一位是胃溃疡，一位是高血压的关系。胡适用左手摸着自己右手的腕子让你看，说：“瘦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求你原谅他找人暂代的理由。那天他送你到电梯口，电梯一关你就哭了，怪自己这样粗暴地对软心肠的胡先生。

陈之藩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两个人都是很能办事的。前清有五大臣出洋，这五大臣跟北大的学生毫无关系，我没研究过这个。五大臣有人自杀，还有人去杀五大臣。傅斯年他们出洋，也叫“五大臣”，借这个典故叫“五大臣出洋”。胡适说我见了傅斯年千万不能说这个（笑）。

李怀宇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说胡先生那时候挺可怜的。

陈之藩 也不像他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东西从前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轻佻，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他本人是很能写，他刚大学毕业就写过关于中东之类的，我问过他，那篇文章怎么不见了。

李怀宇 你跟唐德刚是怎么认识的？

陈之藩 是我在香港的时候，他和宋淇、夏志清因为《红楼梦》争起来了，让我断。唐德刚研究《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大脚就是

宋淇

1919—1996，翻译家、红学家，原名宋奇，笔名林以亮，浙江吴兴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移居香港。与夏志清、张爱玲等人有深交，张爱玲去世时，遗物交由宋淇夫妇保管。

旗人，小脚就是汉人。他们就为《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步是大脚还是小脚吵起来，我也不知道，就给卷进去了（大笑），谁知道？！

李怀宇 这考据也太烦琐了吧。

陈之藩 你说这是什么问题？《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那时宋淇和唐德刚打得一塌糊涂，还把我卷进去。唐德刚骂夏志清，他说：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两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

李怀宇 宋淇和你交往多不多？

陈之藩 宋淇问我英文“打擂台”怎么翻译。我说你是红学专家我又不是，你问我什么叫“打擂台”？我也不知道，你见杨宪益可以问他怎么翻，外国没有这个词（大笑），我没看也没查，我说不知道。

1969年，在美国任大学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陈之藩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无所谓。”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八十一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已还高兴的。”（《在春风里》序）

李怀宇 你到剑桥读哲学博士的情况是怎样的？

陈之藩 我读的那个是哲学博士，是最低的。还有一个是科学博士，剑桥我没仔细研究过，比如说你在伦敦某所大学毕业，十年后你没有犯罪记录，

你提交三篇论文，审查通过后，他们给你一个博士，这就叫科学博士，根本不念书，你自个愿意解决什么问题在杂志上发表。最高的叫神学博士Divinity Doctor。哲学博士是最低的，在学校里念得最辛苦。在一百里地某一个塔尖，画一个圆心，你这一年不许离开这儿。至于上课不上课没关系，你就在塔尖，礼拜四你要到学校吃一顿饭，要交五镑钱。

李怀宇 当时你已经是教授了，他们就在你的门牌上写着“陈教授”。

陈之藩 那是他们客气。

李怀宇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过奖学金。杜威写了一封推荐信，信相当长，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后来冯友兰谈留学的经验说，欧洲的大学有一个特点，学期短，假期长，特别是暑假。加起来，一个学年上课的时间大概不多于半年。课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当时有一个笑话，说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有人说，中国学生本科所读的课程在国外可以读博士了。

陈之藩 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有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我老想写一篇关于什么是博士的文章，我带过好多博士，在香港带过，在休斯敦也带过，在台湾也带过。博士就是所研究的都是小问题，就我而言，老师带博士最多是三个月，三个月后你就自个上路。科学研究到什么情形，请你继续研究，或者你研究别的问题，也没关系。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一定不如你，你得跟我讲，一年以后你understand到什么程度。博士就是对这一个问题，当你发表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这是最低的标准。不是抄别人书，抄别人书你给我看什么？你也不用骗我，你骗不了，你骗我可以，你骗不了全世界的人。你发表出来就得给大家看，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这个问题，你骗不了人，你可以骗一个人，骗一个时代，但你骗所有人forever，不可能的。解决一个问题你是第一，这就是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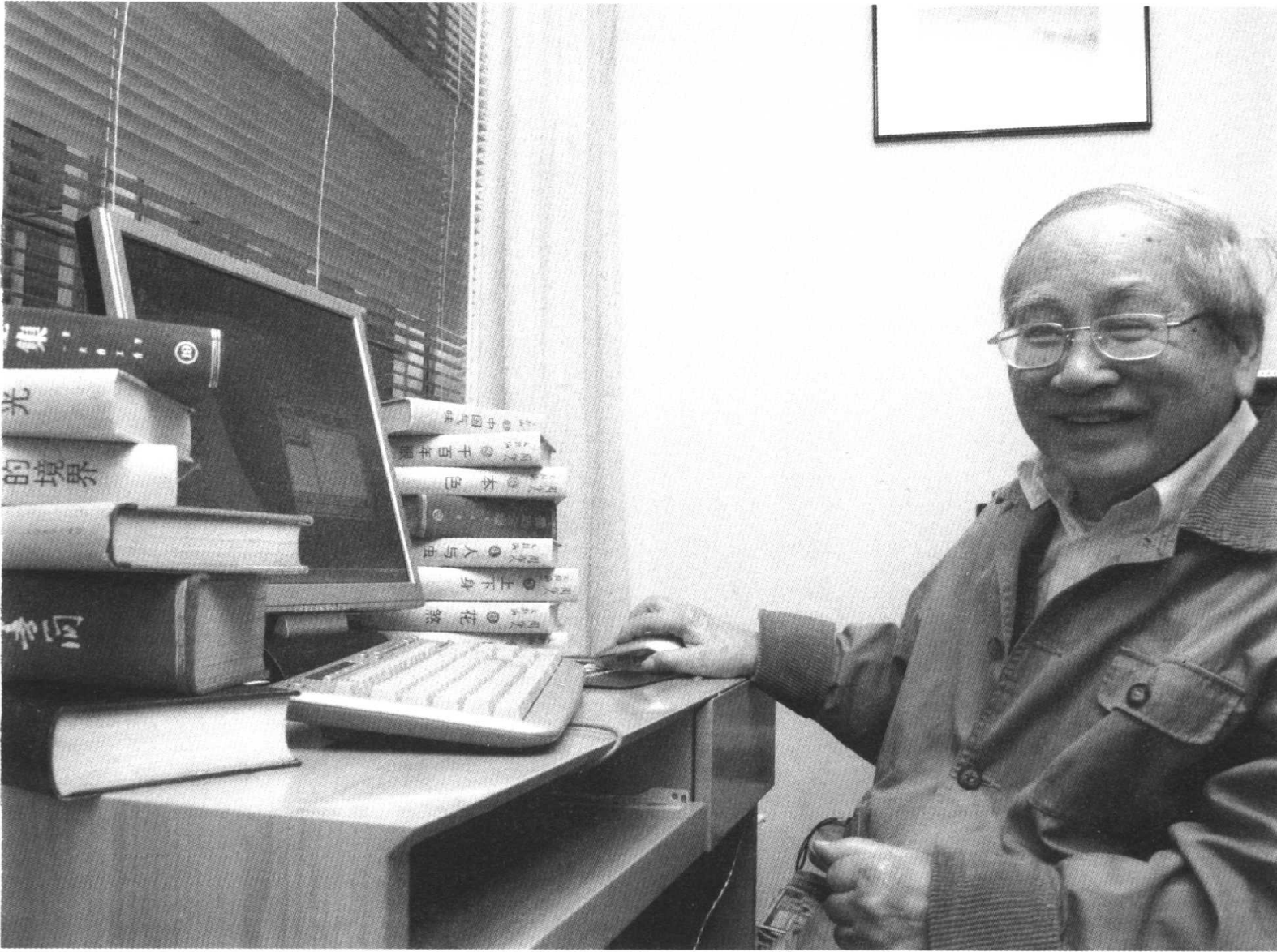
罗孚

原名罗承勋，1921 年生于广西桂林。

1941 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工作，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馆工作，曾任《大公报》编辑、副总编辑，前后有四十一年之久。

曾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等为笔名，在内地多以柳苏为笔名。

著有《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香港，香港……》、《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繁花集》、《丝韦卷》，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罗孚

我行我素我罗孚

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董桥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東西。我们看还比较合适，一般读者恐怕就不一定了。

多年前买过一本柳苏编的《香港的人和事》，作者是马国亮、黄苗子、罗忼烈、黄永玉、梁羽生、董桥等，所写的人物是钱穆、徐复观、邓尔雅、林风眠、金庸等，一看入迷，从此就迷上香港这个地方。后来知道，柳苏就是劝我们“你一定要看董桥”的老头。再后来，读罗孚写的《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才知道“柳苏”和“罗孚”俩老头儿是同一个人。从此就喜欢到处向人打听这个老头的故事，这些人中有老有少有左有右，说起罗孚来，都伸出拇指：“一个好人！”

巴金百岁时，香港中央图书馆有一个庆祝会，台上有金庸等人发言。会议尾声，主持人潘耀明介绍：“今天到会的还有罗孚先生。”台下站起一位矮小老头，笑眯眯地向四周致意。我心中不禁一震，不想竟在此处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高人，赶紧走上前去。第二天下午，我坐在罗孚先生的客厅里

喝茶，像一个孙子辈急切地想听老爷爷讲过去的故事，罗先生笑着慢慢道来，一一满足我的八卦心理。

日后我到北京采访多位文化老人时，又听他们谈起这位在香港的老友。沈昌文谈起当年请罗孚为《读书》写稿的故事，简直可以入武侠小说。罗孚先生还是诗家，应董桥之约写的“燕山诗话”，见地独到。我不懂诗，却喜欢看这些老人饮酒和诗的故事，觉得魏晋风骨于今犹存。聂绀弩八十一岁生日时，罗孚的祝诗是：“流水行云任所之，自由主义智如痴。忽开药店二鸦笔，崛起骚坛三耳诗。寿当三万六千日，人似炎黄虞夏时。愿学烂柯千载弈，是甘是苦自家知。”聂绀弩和诗：“落日燕山吊子之，鲁公应赏此情痴。千年绝塞千山雪，一树寒梅一首诗。月满庭除花睡处，日航天海酒醒时。古今中外谁诗好？你不知兮我不知。”在1993年，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赠罗孚的诗就各有风采，黄苗子：“万事当头钻酒瓮，三杯下肚打油诗。”杨宪益：“酒逢知己千杯少，文出惊人万口传。”邵燕祥：“却认香江似故林，可怜寸草惜分阴。”

再次拜访罗孚先生时，已事隔两年多，罗先生居然还记得我这个无名晚辈。而我写过的一本记录港台妙人的小书，罗先生竟也读过了，我对罗先生深表谢意，他的大作对那本小书启迪良多。罗先生的住处，窗外是维多利亚海景，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算是豪宅了，据说是一位朋友借给他住的。客厅书架上鲁迅和周作人的著作独占一方，罗先生说：“周氏兄弟的书我都喜欢。”

罗先生晚睡晚起，有此作息习惯的还有同为报人的金庸和董桥。每天读报纸看看电视，尤其爱看凤凰卫视。窗边新装了电脑，最近老人家开始学习这门新科技。社会活动懒得参加了，近年印象最深的是回北京参加聂绀弩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罗家儿女分散在香港、北京、美国，香港作家周蜜蜜是罗家大媳妇，周蜜蜜的母亲黄庆云、父亲周钢鸣，都是知名作家。

客厅中老友黄苗子相赠的大字“岛居”让人忘俗。罗先生说，刘海粟也写过一大一小两幅“岛居”。画坛朋友中，深交的还有林风眠和黄永玉，家中都藏有他们的赠画。我见窗边有一幅黄宾虹山水画的印刷品，一问才知罗先生钟爱黄宾虹山水，半个世纪前已常在北京荣宝斋买黄氏作品了，那时候价

格不贵。有一次在澳门花三百元买了一卷黄宾虹手卷，后由香港艺术馆之友以一百万元收藏，香港艺术馆馆长谈起这幅画，认为是黄宾虹第一山水，现在价值千万。

许多港人港事，在罗先生优雅的言谈中一一登场，如历历在目。聊到日近黄昏，罗先生送到电梯口，意犹未尽地问：“你说说，内地的‘超女’是怎么回事？”于是又聊了好一会儿才依依而别。

1941年，罗孚在桂林读完中学后参加《大公报》工作，抗战岁月中辗转到重庆《大公报》，1948年到香港《大公报》工作。40年代末，一批内地的作家、学者南下，曹聚仁、叶灵凤、徐訏等人从此扎根香港，而共产党员夏衍、聂绀弩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北京。这些文化人都和罗孚有过深交。聂绀弩曾戏赠：“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罗孚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李怀宇 40年代末那批从北方来香港的所谓“南来作家”，在国内已经成名，后半生都在香港度过。你是什么时候和曹聚仁先生认识的？

罗孚 50年代，先是吵架（笑），后来成了朋友。

李怀宇 曹先生那时候好像是左右两边都不太讨好。

罗孚 对。那时吵架是因为我们过左，其实他在右边也不讨好。尽管他有很多意见，但他首先讲他是从光明中来。不管怎样，他首先肯定那里面是光明的，但现在看又有很多问题。

李怀宇 他的房子是在胡文虎的花园边上？

罗孚 胡文虎花园边上的一个顶楼，上面没有房子，是搭起来的临时居所。到处都是书，后来很多书都运回上海了。他每天写很多，在好多报纸刊登，后来三联书店出了好多他的书，身后他女儿曹雷也替他编了很多本书。

李怀宇 他儿子曹景行现在凤凰卫视。我很奇怪当时他的家里人都在上海，就自己一个人在香港。

胡文虎

1883—1954，南洋华侨企业家，祖籍福建永定，生于缅甸仰光。他跟随父亲创办永安堂虎豹药行，研制万金油、八卦丹等成药，风行中国和南洋各地。1929年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日后更形成星系报业，是著名的报业大王。此外，他还致力慈善事业，资助教育不遗余力。

罗 孚 那不奇怪。徐诤也是一个人来的。

李怀宇 曹先生当时一个人在香港生活过得好不好？

罗 孚 生活不是太好，当然也过得去。他看病都在澳门的医院，去世也是在澳门。

李怀宇 关于曹先生“和平大使”身份的传闻，到底怎么回事？

罗 孚 “和平大使”我有点怀疑。当时在这里他要做对台工作，这个问题就归《大公报》老总费彝民管，但是没有听到费彝民提过，不过也不等于没有，看样子恐怕不太像。当时传说蒋经国坐了一个军舰到香港的外海等他会见，那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台湾一个军舰到这里来那当然是很轰动的，蒋经国晚年差不多都拒绝他的。

李怀宇 费彝民是你的上司，许多海外文化人都是经过他的努力由香港回内地的，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罗 孚 当时好像是总理讲过：“香港要是多几个费彝民和郑铁如，那我们就好办多了。”郑铁如是中国银行的经理，当时就是从他手上把中国银行交给里头的。费彝民做了很多统战工作，主要工作是领导《大公报》，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去做，报馆的事情他办得不多，主要是对外统战工作。总理说的“好办多了”就是指他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他的统战工作也包括对台湾的，曹聚仁是他联系的，还有章士钊几次来，也是费彝民照顾。章士钊也没有搞成什么工作，住在这里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诗，寄给台湾的上层，从于右任起到下面好多人都有。

李怀宇 你当时觉得曹聚仁的文章怎么样？

罗 孚 曹聚仁的文章很博。叶灵凤后来写的散文也很好，主要写读书随笔。

李怀宇 你是怎么认识叶灵凤的？

罗 孚 他替我们写稿，《大公报》、《新晚报》都写过稿。他一直在《星岛日报》，我们报纸找他写，他就写了。

李怀宇 他是有名的藏书家。

罗 孚 他家到处都放着书，厅里都堆着书。他身后，主要的书送给香港中文大学了，有一部《新安县志》送到广州。《新安县志》实际上就是“香

港志”，当时香港属于新安，国内都没有几本，也残缺不完整，香港官方和一些外国人曾出好几万港元的高价想买，相当于今天上百万了，他都不放在眼里。后来我们想办法送了一部给广州中山图书馆，其他的书就送给香港中文大学。

李怀宇 鲁迅骂过他。

罗孚 鲁迅骂过他，他也骂过鲁迅（笑）。我后来写过一篇东西，主要是根据他留下来的日记写的，提了他跟鲁迅的关系。他日记里写鲁迅的很少，基本上是自己也承认当年对鲁迅的态度不够好。他跟我们口头上是这么讲，回去旅行去过鲁迅的墓，而且表示了自己的歉意，但是文章他没有写。日记里提到他怎样替《星岛日报》组织文章纪念鲁迅。

李怀宇 徐许是南来作家里比较有名的，董桥写过《满抽屉的寂寞》，说他的晚景很寂寞。

罗孚 徐许文字之外有一回事跟我有关。他当时从上海来，太太刚生下个女儿，只有几个月，据说他准备携太太来香港，但后来政策变了，就不能来香港了。到了晚年，他很希望接女儿出来，也申请不了。他没办法，跟我表示能不能帮忙，我当然答应他了，反映上去，看上面决定，后来批准他女儿出来，来了之后没有多久徐许就死了。他这里的太太跟儿女不接受这个女儿，而且不让她参加丧礼，也不让她到家里去住，弄得这个女儿很糟糕，只好又让她回上海去了。

事隔一年，有人就把这个女儿来香港的事情写出来，我们《新晚报》就登了这篇文章。

李怀宇 徐许在香港好像一直都不太如意。

罗孚 不怎么如意。他在上海、重庆都是很红的作家。

李怀宇 他的东西写得比较欧化，很多奇思异想。他后来认了个干女儿——三毛，据说他去世之前三毛曾在跟前照顾他。

罗孚 那时三毛在台湾，徐许在香港，不是整天在他身边，晚年三毛经常来看他。

徐许

1908—1980，小说家，浙江慈溪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3年开始从事创作，曾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人间世》半月刊。1936年赴法国留学，抗战爆发即回国，在上海、重庆等地办刊物和写作。1950年起先后在中国香港、印度、法国等地执教。作品有长篇小说《风萧萧》等。

李怀宇 聂绀弩也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

罗 孚 曹聚仁来的时候聂绀弩也在香港，跟曹聚仁打笔战还是聂绀弩领头带的。

李怀宇 黄永玉那篇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里说，聂绀弩为了批曹聚仁，还让黄永玉去找狄更斯的《双城记》，要查那句有名的“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你跟聂绀弩交往比较多？

罗 孚 还算多点，因为那时在香港是同一个党小组的，他当时做《文汇报》的总主笔，刚开始替《大公报》写文章。后来夏衍认为聂绀弩的杂文是鲁迅之后最好的，夏衍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点，这篇文章是我按夏衍的意思替他写的。

李怀宇 听说聂绀弩和梁羽生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梁羽生新婚到北京度蜜月，跟聂绀弩下围棋下到把太太给忘了。

罗 孚 他把太太给忘在旅馆里头，这是真的。他们俩下围棋下得很认真。聂绀弩常到《大公报》找梁羽生下棋，下着下着下到晚上他就忘乎所以了，懒得回去上班了，他就打个电话回报馆，今天就不写稿子了（笑）。他还跟梁羽生说这事情不要让我知道，因为我们是一个党小组的。

李怀宇 后来你为他编了《聂绀弩诗全编》。

罗 孚 他的“三草”（罗孚帮聂绀弩在香港出旧体诗集《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称为“三草”）之后，我发现他没有收进集子里的诗有很多，就把它弄成全篇。有一个叫侯井天的人，专门研究聂绀弩的，他也在搞，搞得更全面了，收集更多的东西，出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聂绀弩诗全编》也有新体诗，他就没有，完全是旧体，那里面东西比较多了，而且注释也很全。

李怀宇 你觉得聂绀弩的诗怎样？

罗 孚 他的诗写得很好，有功夫，他的旧体诗就是旧体，完全符合格律的，不像有的人就乱写一顿，根本不合格律。聂绀弩有他独特的风格，又有很多通俗的东西。有些俗语他都用进去，但是又符合格律。

李怀宇 胡乔木给他写那个序是怎么回事？

罗 孚 胡乔木看到我们在香港出的“三草”，觉得非常好，主动要给

聂绀弩的诗集写序。聂绀弩就紧张了……又推不掉，他没想到胡乔木会写一篇对他这样肯定的。最初没看到那篇序的时候，他很紧张，不知怎么办，后来那序来了之后，出乎意料，他还是比较满意，没有“我的诗好好的给他的序搞坏了”这么骂他。但是他的书为了等那篇序迟了才出，因为他事前已经有那种情绪，所以传说他否定那篇序。

李怀宇 黄苗子、杨宪益和邵燕祥合出过《三家诗》。

罗孚 他们三个人的诗各有千秋。黄苗子很有功夫，也有打油。杨宪益就好像写得很随便，随便就写出一首来了，但邵燕祥有的时候就比较深刻一点。

李怀宇 你在北京的老朋友有哪些人？

罗孚 黄苗子、杨宪益、丁聪、王世襄、范用、邵燕祥等。跟他们在一起，常常言不及义，喝酒啊。

李怀宇 北京这帮文化人以前的主心骨是夏衍。夏衍在香港待了多长时间？你跟他当时交往多不多？

罗孚 夏衍大概待了三五年，交往不是很多。他实际上在搞文化工作，好像是《华商报》的主笔，管副刊，后来就回北京了。范用替我在三联书店出了一本写香港的书《香港，香港……》，他就让夏衍知道，夏衍写信给他，说你替罗孚出这本书是好事，告诉他有空就到我那去谈谈，这样我就去找他了。

在《大公报》下属的《新晚报》工作时，罗孚有两位后来名满天下的同事，查良镛（金庸）和陈文统（梁羽生），两人共同的爱好是围棋和武侠小说。1954年1月17日，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报纸上的笔战难分胜负，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那天，《新晚报》的新闻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 香港客五千人观战”。罗孚灵机一动，力劝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梁羽生“只酝酿一天”的《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后来，罗孚又请金庸“参战”，于是，《书剑恩仇录》横空出世。几分钟就玩完的比武，打出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

李怀宇 大家都说你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婆”，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都是由你发起。

罗 孚 （笑）其实这就是拉稿的关系，搞报纸组织稿件，因为平常听他们俩谈得很多，马上就找他们了。我觉得值得说的倒不是找他们写，而是第一篇稿子产生的速度非常快，这是别的报纸少有的。今天比武，当时马上就找到陈文统，第一天决定要写，第二天陈文统就交稿了。而且就在第二天报纸上登预告说明天登武侠小说，第三天小说就出来了。没有更快的了。

李怀宇 有传闻说是你登预告逼他写的。

罗 孚 不是，已经讲好了的。他说他最初不想写，实际上他很有兴趣写，他们俩也很有意思谈，有兴趣写。

李怀宇 陈文统为什么用“梁羽生”这个笔名呢？

罗 孚 后来他解释了，南北朝时是“宋齐梁陈”，梁在陈的前面，陈是继承梁的，羽是他们喜欢宫白羽的武侠小说。

李怀宇 金庸是把查良鏞的鏞字拆开。

罗 孚 其实《龙虎斗京华》写得普普通通，那是第一篇。当时读者反应还是比较热烈，所以以后才搞得下去。

李怀宇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是在《新晚报》刊登吗？

罗 孚 是。当时不是有个《商报》嘛，《商报》看到《新晚报》登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有读者，他们就要求梁羽生替他们写，我们只能同意，因为当时要支持《商报》嘛。这是我们办的左派报纸，准备继承《大公报》、《文汇报》的。以前《大公报》、《文汇报》跟香港政府打过一场官司，控告《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煽动，很可能就把这三个报纸搞掉了，所以马上就筹备另外的报纸《商报》，但是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这官司了结了，报纸没有停掉，《商报》也还是继续存在。因此大家就要把《商报》办成一个比较灰色的报纸，吸引更多的读者，内容就要比较低，不是那么左，因为武侠小说有读者，我们当然要让梁羽生替他们写了。我们自己还得出啊，当时马上就找到金庸了。他也很乐意。

李怀宇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比《龙虎斗京华》写得更好。

罗 孚 《书剑恩仇录》比较成熟，《龙虎斗京华》是匆匆忙忙赶出来的，写得也比较短。

李怀宇 当时他们写武侠小说有没有经常一起聊怎样写？

罗 孚 他们俩谈得比较多，我们都没有参与的。

李怀宇 金庸就是在《新晚报》待了几年之后，去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

罗 孚 对，长城公司。他一边在《新晚报》做编辑，一边写武侠小说，他也写电影，后来帮长城公司写，搞了个《绝代佳人》，是夏梦主演的吧。

李怀宇 当时说他暗恋夏梦，是真的吗？

罗 孚 是真的。

李怀宇 夏梦你见过吗？很漂亮吧？

罗 孚 见过，应该说是很漂亮的。

李怀宇 他有没有追过夏梦？

罗 孚 说是追过夏梦。

李怀宇 说是后来他的很多小说的女主角都有夏梦的影子。

罗 孚 那倒不一定，因为那时夏梦已经成名了。

李怀宇 那时金庸跟第一任太太离婚了？

罗 孚 对，他第一任太太离婚后就直接回杭州去了。

李怀宇 他接受采访说是他太太背叛他。

罗 孚 他是这样讲，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后来他离开《大公报》，去长城公司搞电影剧本，再后来创办《明报》。

李怀宇 创办《明报》的时候，金庸才三十几岁，刚开始的时候境况很惨，当时是跟第二任太太在一起。

罗 孚 第二任太太朱梅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李怀宇 当时看好他的《明报》吗？

罗 孚 最初没有注意，看好他的报纸是到他跟左派报纸笔战的时候。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后，广东很多人跑到香港来，那时候我们左派报纸是没有办法报道的，一直不登，右派报纸大登，《明报》也大登，那么利用这个，报纸销量就增加了。

李怀宇 你觉得他的社评写得怎样？

罗孚 他的社评写得不错，另外一方面是有的问题左派不能谈，他能谈，谈得又比较中肯，当然声望也就提高了。他好像是继承老《大公报》的传统，实际上我觉得他所谓的“继承”恐怕也不是那么一回事。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明报》针对这个写了很多东西，引起读者注意……

李怀宇 很多人提议金庸将社评结集出书，但一直都没有出。这很奇怪。

罗孚 武侠小说跟社评是另外的一回事。武侠小说一直能保持和流传。社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亡的（笑）。

李怀宇 你看他的武侠小说看得多吗？

罗孚 他们俩的小说我都看得很少。金庸是自成一体。梁羽生也有自己的风格，他对对联、围棋、象棋有研究。

李怀宇 后来他们俩的关系好吧？

罗孚 表面还是不错，见面客客气气的。在我看来，梁羽生对金庸多少有点不服气，但是他也不好说出来，毕竟金庸名满天下。他并不去跟金庸相比，但实际上又在相比。

李怀宇 梁羽生写过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

罗孚 这是我要他写的，他说他要用笔名，但要我承认是我写的，不是他写的。到了“文革”以后，香港中文大学开一个武侠小说研讨会，还出了一本有关文集，里面写文章的刘绍铭提到这篇文章，肯定是我写的。我在北京看到，事隔这么久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就写出来了，说这文章是梁羽生写的，因为我觉得文章也没有问题。但是金庸的那帮拥趸看了不服气，有人就写文章骂梁羽生，说他捧自己。我本来意思是说这文章就由我来负责，因为是我让梁羽生写的，谁知道他们就更骂梁羽生了。

李怀宇 金庸这边怎么看？

罗孚 我没跟金庸谈过这个问题，我料想他当然很自负了，这是没有话讲的，他表面还是客客气气。

李怀宇 后来有没有见他们一起下围棋？

罗孚 机会不多，一个在《大公报》，一个在《明报》。梁羽生这篇文章登出来之后，《大公报》的负责人跟他说，你写这个东西要准备死无葬身之

地，说他不应该写这篇文章去捧查良镛。所以，他变成左右不讨好。

李怀宇 梁羽生后来移居澳洲了，你到过他家，他在澳洲生活怎样？

罗孚 他住的地方小一点。小孩很大，不晓得第几个儿子用体外授精的方法生了一胎三个小孩，三个小孩是很少见的。

李怀宇 查良镛去办《明报》之后，你跟他交往多不多？

罗孚 还是跟他有来往，所以他后来常常跟别人讲，当时《大公报》很多人都不理他了，只有我跟他有来往。

李怀宇 后来他的《明报》在商业上越来越成功，赚了很多钱。

罗孚 《明报》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报纸本身来讲是怎样的，也很难说。我以为《明报》有成功的地方，也有不怎么成功的地方。写武侠小说当然是成功的（笑）。

在北京，罗孚常与黄苗子、杨宪益、丁聪、王世襄、范用、邵燕祥等朋友饮酒和诗。在香港，他提携后辈不遗余力，率先撰文向内地介绍董桥、亦舒、林燕妮、西西等作家。80年代末应沈昌文之约用笔名“柳苏”在《读书》杂志上推介香港作家，沈昌文当年说：“我们又大胆地请柳苏先生连续三期畅谈几位香港作家，包括新派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作者。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沈昌文：《请柳苏出场》）在1989年4月号的《读书》杂志上，柳苏的《你一定要看董桥》一文影响深远。此文之前，董桥的书要在台湾出，是怕在香港卖不出去；此文之后，两岸三地争看董桥。

李怀宇 许多爱书人都忘不了你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桥》。

罗孚 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他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我们看还比较合适，一般读者恐怕就不一定了。

李怀宇 他三四十岁时写的文章感觉不错，有英伦的风情，心境又寂寞，而且他不断地有文风的突破。后来，陈子善还把这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作为一本书的书名。

罗孚 广州不知哪个出版社比较早出董桥的文章，当时国内还没什么人出，想把我的这篇文章附在书的后面，后来主持审稿的人就问：为什么一定要看董桥（笑）？就抽掉了。

李怀宇 怎么想出这么有意思的标题？

罗孚 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是针对文化沙漠来讲，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東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

李怀宇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50年代初期南来的作家学者对香港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罗孚 对。因为他们人虽然走了，但作品留下来了，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以前人们讲香港是文化沙漠，现在香港文学活动还是很多。香港现在的教育也发展了，大学增加了，以前只有一个香港大学，现在当然好多大学了，大学里有老师有学生，有发起动笔的，很自然地文学活动就有了。

李怀宇 文学之外，香港文化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艺术方面像林风眠、黄永玉、刘诗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到香港来，在艺术上大有作为。这些人“文革”中都受过苦，黄永玉纪念林风眠的那篇文章结尾说，九十二岁的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上帝问他：“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林风眠回答：“画家！”

罗孚 “文革”后林风眠从上海来香港，他跟别人讲，他在香港看到最好的共产党员就是我（笑）。他跟我们家很熟，常来我家里看我的小孩和孙子，跟我们好像一家人似的。所以他去世后我作了一副挽联：“情义难忘，待我全家如骨肉；丹青不朽，知公百世有辉光。”

李怀宇 在学术上还有当年南来的钱穆、徐复观。

罗孚 徐复观有件事情好多人都不知道，实际上他本来是蒋介石的一个侍从室的，跟我有来往，别人很奇怪，他常写文章批评中共，我跟他很有来往。最后他决定回去走一趟，到山东曲阜去看看，他是一个新儒家。已经

讲好了，他准备1982年晚一点去，1982年上半年他就病了，很严重的，就到台湾去看病，就死了，他的遗书说，以一生不能到曲阜一看为憾。本来讲好了去，结果去不成，这本来就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他曾是蒋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在延安住过，后来回到重庆替蒋管情报，情报各方面由他来综合。

李怀宇 你后来怎么编了《香港的人和事》一书？

罗 孚 牛津大学出版社要搞一本书，可以申请艺术发展局的资助，要我替他们弄一本，那时我刚好去美国，在那里联系一些人写的。里面有一篇引用了一句话：香港“除了金庸，只有平庸”。意思是香港只有金庸，别的就没有了，但这句话是谁讲的我查不出来了，好像是台湾一个人讲的。香港有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



倪匡

1935 年生于上海，1957 年到香港，1992 年移居美国，2006 年回到香港。
居港期间，倪匡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散文，其中以卫斯理系列小说最为著名，为创作量最高的华语作家。



倪匡

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

我和古龙是1967年在台湾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代武侠小说杂志约他写稿，他写了《绝代双骄》。他写了一段就断稿，我帮他续了很多。所有名家的小说我都续过，金庸续过，古龙续过，卧龙生续过，诸葛青云续过，司马翎续过，我喜欢续小说，我觉得很好玩。

倪匡先生的住处位于香港铜锣湾，高处可见豪宅，低处是一片旧楼，他说：“每天看着窗外风景，告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刚坐下来，他就介绍：“我们在美国的房子很大，见过的人没有不喜欢的。这房子是一个建筑家专门建给一个舞蹈家住的，三层五千多尺只有一间房，反而有四个洗手间，古怪到极点，我一看就喜欢。”

从平静的美国回到热闹香港，倪匡顺其自然，说起美国神采飞扬，谈到香港妙语连珠。一个下午的采访，是在笑声中度过的。

我说：“今天是来听你讲故事的。”“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五十年了，这五十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倪匡操着有浓重口音的粤语，讲话速度飞快，“写稿之外，就是吃、睡。人家问我现在忙什么，我整天睡觉，而且一睡就做梦，人家笑我的人生有两次，

梦中一次，现实一次，好像庄子一样，都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中。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做梦做出来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小小说在梦中想到很古怪的情节，我一定即刻跳起来，记录下来，要不然明天就会不记得了。昨天我就梦见潜到海底，见到一条古怪的鱼，奇怪，我根本就不会潜水。”

这位自称是世界上写汉字最多的作家，即使今天出品锐减，谈起写作，还是感慨良多：“我写稿除了稿费没有第二个目的，没有什么崇高理想。因为我发现我来到香港以后，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除了写稿，我去打任何工都不够资格，不够学历，不够经验，也不够能力。我做生意都亏得厉害，一次炒股票，一次炒黄金，我以为最容易了，结果亏得几乎跳楼。最后只有哈哈大笑。现在我知道，上天造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本事，不要硬来。”如今酒烟的配额已经用完，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在谈话中，他对后辈作家的作品如数家珍：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婆妈，也觉得好看；余华的《兄弟》是晚清讽刺小说以来最好的讽刺小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要看三遍才看明白；平路的《何日君再来》有相见恨晚之感。对自己的妹妹亦舒，他也不忘吹捧：“亦舒的小说好看，文字简洁明了，情节发展得快，人物性格鲜明，这是小说的必要条件。”

谈到兴起，倪匡起身带我欣赏他和倪太、女儿倪穗和洋女婿、儿子倪震和周慧敏的照片。又进电脑房参观两部电脑，随手打开的那部电脑桌面上是倪匡夫妇、倪震和周慧敏四人在美国旧居前的合影。突然，他说，客厅里还有一样好东西，原来是舒淇早期的裸体写真集。他笑道：“真靓！”

1935年，倪匡生于上海。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度由家长带到故乡浙江镇海的乡下避难。童年时喜欢博览群书，养成了一生好读杂书的习惯。1951年，倪匡初中毕业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后参加解放军和公安，至苏北、内蒙古垦荒。

李怀宇 你在抗战年代已经养成喜欢看书的习惯？

倪匡 我从小到大都喜欢看书，最开心的事就是看书。我差不多在十

二岁以前就看遍中国传统小说，那是在小学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我看《聊斋》时完全不明白，就选一些最短的来看。我在小学已经看《红楼梦》，但是看不明白。我在当兵的时候看得最多的是《红楼梦》。真是好笑，那时候有一本书叫《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写的，当时要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我最喜欢看《红楼梦》，周围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对我叫嚷：“在看什么？”“《红楼梦》。”他们看到《人民日报》上正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就狠狠地批判我。我说：“我看的是《红楼梦》。”“《红楼梦研究》都要批判，《红楼梦》更不能看！”（大笑）我说：“这些事报到上级，上级如果有一定知识程度的话，一定会批评你们的。毛主席也喜欢《红楼梦》，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出自《红楼梦》。”解释了半天，他们也不明白，也没有见过这么蠢的人。

李怀宇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这些红学研究著作你也看吗？

倪匡 我看的，俞平伯的文章好。我对《红楼梦》有一定研究的。周汝昌当年的《红楼梦新证》我也看过。最近刘心武来了，我听了很喜欢，他发现的很多问题我都没有发现。刘心武考证秦可卿的来历，很新鲜。

李怀宇 小时候外国小说看得多吗，像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些小说喜欢看吧？

倪匡 我到中学时已经看很深奥的翻译小说，好看的小说我都看。福尔摩斯看了很多。你说得出来的好看的外国小说，我几乎都看过。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都看，很多都看过几遍。我还看过很多美国的冷门小说。我也看俄国小说、苏联小说，我最喜欢普希金，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好，写得比卫斯理还传奇。

李怀宇 在上海读到初中就没有再读下去了？

倪匡 我勉强读到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心思去读书，后来就去当兵。

李怀宇 为什么去当兵？

倪匡 没有事做嘛。十六七岁的少年，无所事事，在外面逛街，到了一座桥，在想过桥还是不过桥呢？想着电车来了就搭电车，但是电车老半天不来，就过桥了。走了一半，见到柱上有一张布告。这张布告很大，被风吹下一半，如果它完全不动，我就不会留意它，如果完全吹下，我就看不到。

这一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走上前翻起全张布告来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招生，只要中学程度，满十八岁就可以参加了。首先去检查身体，然后就是很简单的考试。当时我在上海这么无聊，有机会到苏州玩一下还是很好的。

李怀宇 但是当时你还不到十八岁呢。

倪匡 填表时，我就填了十八岁，后来他们一查证件，说：你还不到十六岁哪。但是身体检查通过了，也就录取了我。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性质，以为是读书的大学，最多是野鸡大学，原来是受政治思想训练的，训练三个月以后，就可以去当兵。好像校长叫舒同，是第三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后来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李怀宇 舒同后来以书法闻名，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倪匡 我在受训时，见过来演讲的最高级首长是罗瑞卿。后来受训三个月，就去当兵了，但我的脚是平底的，不能行军，所以复员，就去公安部当公安。第一个任务是修治淮河，修完淮河就去苏北搞农场，搞完农场就去了内蒙古。

1957年，倪匡由内蒙古至香港。初到香港时，在工厂做杂工，并在夜校读书。倪匡自信写作天赋与生俱来，于是提笔创作，投稿即中，开始以写稿为生。不久，倪匡用笔名“卫斯理”写的小说在《明报》副刊连载，一举成名。

李怀宇 江湖上传闻你从内蒙古骑马到香港，到底实情是怎样的？

倪匡 骑马怎么能骑到香港呢？这根本就离奇到极点！1956年，党委书记突然间说我犯这样错误那样错误，完全是反革命分子，把我关起来审查，让一个工作小组查我有没有反革命背景。我在内蒙古离开我的单位时，骑一匹马，本来想向北方走的，5月份下一场大雪，我看不到北斗星，就朝东走，见到火车，也不理它是朝南朝北，就上了火车。那时候有人查票，但不是每站都查，有人来查就下来，没有人来查就再上去（大笑）。到了上海，那时候“鸣放”刚刚开始，还没有“反右”，时间刚刚好，所以说我运气好。我一辈子运气好得不得了，很多事应该过不了关的，应该死的，我都没有努力，但都过来了。

那时候上海的公园有人摆档，去香港要多少多少钱，人到了香港再给钱，坐大轮船到香港要四百五十元，偷渡到香港要一百五十元。那时候我父母已经来香港了，我就写信问父母，他们说最多能负责一百五十元，我就用一百五十元的方法来了。这样子被塞进运菜的船，船上有暗舱的，大家都塞在里面，到了公海没有人巡逻，可以上甲板休息一下，大家聊聊天。到了九龙哪一个码头上岸我都不记得，一上岸，当时香港的政策是来了香港就可以拿身份证。我在香港又没有学历，又不会讲广东话，只能去做体力活。有很多年轻人集中在荃湾，那时候荃湾很荒凉，很简陋的工作环境，但是已经很开心了，因为自由了。我是什么杂工都做，一天有三块半工钱，由工头抽去六毫子，那时候一碗叉烧饭七毫子，这么大碗叉烧饭（用手比划）！我第一次吃，天下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在内地经历过大饥荒嘛。我一天拿两块九，可以吃四碗。有饭吃，自由自在，非常开心！

李怀宇 很快就发现写稿可以赚更多的钱了？

倪匡 1957年7月我到香港，第一篇小说发表是在10月，在《工商日报》投稿的，一投就中。很妙的，到现在为止，我还很喜欢投稿，从来没有被人退稿。后来有一个记者很伟大，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发表的第一篇稿，拿来重新排版，我自己看了打冷战，那时候文艺腔，每句话都有五六十字长（大笑）。那时候我只有二十二岁。那篇稿有一万字，我在一个下午写的，还很小心地抄了一遍，才寄出去。你猜他们给我多少稿费？给了九十元！不止一个月工资。这一个下午就可以拿这么多钱，原来在香港写稿是可以养活自己的。他们说《工商日报》是大报，其他小报就没有这么高的稿费，我说即使小报一块钱一千字也好。此后我就去投《真报》、《新闻天地》，个个都采用了。从此我就不用做工，专心写稿了。如果不从内地来到香港，非但没有机会写作，连继续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反右”我肯定过不了关，“文革”也挨不过。幸亏来了香港，没想到中国文化靠香港这个小地方来发扬光大。

李怀宇 什么时候去读夜校？

倪匡 读夜校是在安定以后，有钱交学费了才去，在1958年。

李怀宇 在那里认识了倪太？

倪匡 是啊，1959年就结婚。我在联合书院读新闻系，后来读了一段

我就不读了，因为那些教授都是自己办报倒闭了，才来新闻系教书（大笑）。那几个教授都是好人，现在都去世了。倪太是来补习英文的。机缘很凑巧，那么多夜校我不去读，偏偏读了这一间。我们坐在同一个课堂里，那时候同学中还有几个尼姑，戴着假头发，我开始还不知道是尼姑，后来有一次聊天才知道她们是尼姑。

李怀宇 我看倪太年轻时的照片很靓的。

倪 匡 很靓的！她到现在都很靓。你想不想看她年轻时的照片（起身找照片）？这张照片是结婚之后在1960年拍的。我们那时候思想很新潮，登不登记都无所谓，但是我岳父说，不登记成何体统。我们是先同居再结婚的，那是在五十来年前哪！

李怀宇 后来你在报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真报》？

倪 匡 我在《真报》投稿投多了，他们就叫我去工作了。我那时候写政治性杂文的，他们说你的政治观点这么特别，知道共产党那么多内幕，好像很了解共产党似的。我说我当兵出来的，当然了解了。那时候办报纸很儿戏的，缺三千字的稿子，就叫我写三千字来。后来副刊有一个武侠小说家司马翎，突然断稿不来了，我一直看武侠小说的，续下去很容易，就续写他的小说，结果个个都叫好。后来他不写了，就由我来写，写了不到三个月，《明报》就来找我了。

李怀宇 这样就和金庸先生认识了。

倪 匡 是的。在报界，我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别人，完全不和人家争的。我是不喜欢争取的人。我所有的工作都是人家找我的。当时很多报纸都来找我写稿，但是我的很多武侠小说都没有存下来。当时我写卫斯理是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明报》已经写了两篇武侠小说，查先生（金庸）说：再写一篇。我说：难道又是武侠小说吗？他说：是啊，好像不是很好。我说：现在占士邦（詹姆斯·邦德）很流行。他说：那你就写时装武侠小说，时代背景是现在，但是主角会武功，很特别的，可以一试。我写第一篇是时装武侠小说，第二篇也是，到第三篇时，我说：加一点幻想好不好？他说：好！于是我在第三篇才开始写成幻想小说。

李怀宇 你自己说是幻想小说，但是人家总说是科幻小说。

倪匡 我自己从来没有说是科幻小说。出版社一定要说是科幻小说，我不反对，出版社给我出书，封面是黄色、绿色、红色，我也完全不理。我不懂，要理这些事干什么？而且我觉得一本书的封面有什么关系呢？人家看的是内容。我反而觉得现在出的书用的纸张太好，纸张太白，看到我眼红，用黄一点的纸也许会好一点。我写稿，除了第一篇重新抄过一遍，以后的稿没有再看第二遍的，更不要说改了。写完已经很累了，还要看第二遍吗？小说最重要的是好看，其中有一些小错误有什么关系呢？不止小说是这样，文章也是这样，文章是讲究气势磅礴、汪洋恣肆，使人看了有感受，其中有一些小错误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余秋雨散文写得这么好，但是其中有一些小错误，金文明先生猛挑他的错误，我看了哈哈大笑。即使金文明讲的全对，余秋雨错了，金文明始终是金文明，余秋雨始终是余秋雨。

李怀宇 那时候看不看金庸先生正在连载的武侠小说？

倪匡 看，我最喜欢武侠小说，到现在我都看查先生的武侠小说，年年都看一遍。我有很多书年年都看一遍的，金庸小说、《聊斋》、《水浒传》、《红楼梦》，温故知新，次次都有收获。

李怀宇 你相信写作是靠天才？

倪匡 我相信写作是靠天才的。现在的小孩子问我：为什么会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写，没有别的办法来谋生，只有靠写作来谋生了。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靠天才的。靠训练可以训练出一个数学家，但是训练不出小说家。

李怀宇 一天怎么可能写那么多字呢？

倪匡 我一天可以写两万多字。我也不知道会写这么多，这是天生的本事。我没有第二种吃饭的本事。我学人家炒黄金，结果亏了。

李怀宇 你写字的速度很快？

倪匡 一个小时可写九张五百字的稿纸。除去空格标点，最多三千字。

倪匡曾说：“我是个极端情绪化、常常糊里糊涂的人。我不喜欢受约束，不爱争胜负，不喜欢正经八百，也绝不会道貌岸然。”倪匡喜欢结交朋友，他和古龙、金庸、张彻、蔡澜、黄霑之间的趣事，说之不尽。

李怀宇 有人说古龙狡猾，一行写很短的句子，用“星。/星星。/满天星。”之类的手法，大赚稿费。

倪匡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骗稿费，他喜欢这种写法。

李怀宇 你最欣赏的台湾作家是古龙？

倪匡 古龙当然是最好的朋友。有一次我到台湾，没有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从谁那里听说我来了，全台北的酒店找我，终于被他找到，大家在一起很开心。我们一起吃喝玩乐，人家觉得很奇怪，我们两个人是莫名其妙的，坐在一起，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哈哈大笑，很爽，很好玩！

李怀宇 可惜他四十八岁就去世了。

倪匡 我一生当中写过最好的文章就是古龙的讣文，只有三百来字。很多人看了之后，争着要我为他们写讣文。（大笑）

李怀宇 古龙去世时，你们这些朋友合买了四十八瓶XO？

倪匡 是我一个人出的钱。后来大家打开了来喝，每瓶酒都喝了一半，喝到醉了。算起来，我和古龙是1967年在台湾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代武侠小说杂志约他写稿，他写了《绝代双骄》。他写了一段就断稿，我帮他续了很多。所有名家的小说我都续过，金庸续过，古龙续过，卧龙生续过，诸葛青云续过，司马翎续过，我喜欢续小说，我觉得很好玩。

李怀宇 金庸的小说中你续过《天龙八部》中那一段，传说金庸从欧洲回来，你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倪匡 不是的，他已经知道了（大笑）。他望着我，我说：“你临走时叫我不要弄死人嘛，我是弄伤人，打打杀杀肯定会受伤嘛。”金庸不愧是大小说家，他本来有通盘计划，让我这么捣蛋一下，后来发展的那段故事多好啊。

李怀宇 你还写了一副对联“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

张彻

1923—2002，原名张易杨，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40年代开始从事电影工作，是新派武侠片的掌门人，代表作有《独臂刀》、《刺马》等。2002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倪匡 （大笑）“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续小说。”很妙，没有人做得到。

李怀宇 你和张彻先生认识好像是从打笔战开始的？

倪匡 我想是1960年之前，起初他从台湾来香港，写影评。我在《真报》，编辑说：“今天影评没

有了，上海仔，你来写一篇。”我说：“我还没有看戏呢。”“看戏来不及了，你看说明书吧。”（大笑）张彻是很霸道的，就说《真报》影评完全不通，我就跟他打笔战。你知道当时香港的新闻圈很小，笔战打得多了，上海人在一起说，张彻我们认识，倪匡也认识，大家就约在一起吃饭聊天。他也是上海长大的，那时几乎天天见面。后来他当了导演，突然间来找我写剧本，我说：“我不会写剧本。”“你就当小说那样写。”“这样我就会。”（大笑）

李怀宇 和他合作的《独臂刀》最早出名了。

倪匡 《独臂刀》是第一部，以后差不多全部都让我编剧。

李怀宇 张彻先生在片场经常骂人？

倪匡 是呀，那时候导演一定骂人。导演很威风的，坐在那里，咬一支雪茄，戴一个黑眼镜，身边四五个人服侍，一起身，那张椅子要跟着他走。我认识的导演没有一个不骂人的。

李怀宇 张彻先生的文章也写得很有气势。

倪匡 他的文化程度很高，在电影界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他了，他自己也写剧本，写小说。他和胡金铨的文化程度都很高。现在电影界的人完全不懂文化的，不读书的。

李怀宇 你那时候写的剧本，张彻先生有没有不拍的？

倪匡 没试过，他拍不拍我完全不理的。我很霸道的，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是拿了支票才写的。我写剧本是空前绝后的：钱是先收的，写后不改的（大笑）。

李怀宇 什么时候认识蔡澜先生？

倪匡 有三十多年的交情了，那时候亦舒在邵氏，说有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人很好玩，叫做蔡澜。我第一次到他家，就用他家里的电饭煲来热日本清酒。蔡澜很喜欢朋友的，我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人在背后说他坏话的就是蔡澜，做人做到这样很难得，太君子了。蔡澜做生意常被人骗，他都不出声，他本事大，按照他这种性格本来在香港早就被人家吃死了。

李怀宇 蔡澜先生说第一次让你去演戏是用路易十三引诱你，才成功了。

倪匡 是呀，他说有好酒喝，又有很多靓女来听我说故事。那时候利智刚刚选中了亚姐冠军嘛。

李怀宇 听说利智选中亚姐冠军是你力撑的啊？

倪 匡 没有，我哪里有资格力撑她。记者来问我，我说：“今年最靓就是这位利小姐啦，如果选不中就奇怪。”记者说：“你老眼昏花了。”后来个个都说她靓。

李怀宇 蔡澜先生写你演戏的那些事就像小说一样，是真的还是假的？

倪 匡 当然是真的。我演过很多部戏的跑龙套，有一个戏叫《四千金》，四个靓女，老爸是一个作家，介绍倪匡去演，人家说：“倪匡哪里像作家？”（大笑）

李怀宇 他以为作家要咬根烟斗，写稿写到咳血才像。

倪 匡 是呀，当跑龙套多好玩呀！在片场要十二个小时，我真正演出的时间最多半小时，其他十一个半小时坐在那里没事做，全套柏杨版的白话《资治通鉴》就是我在当跑龙套时看完的。

李怀宇 你还演过嫖客？

倪 匡 我第一部戏就演嫖客。第一晚演得人家很满意，第二晚喝醉酒了，全部演员都是大牌明星，在等我一个人，导演打电话给蔡澜：“你介绍来的人，现在怎么办？”蔡澜说：“他演什么？”“演喝醉酒的嫖客。”“这不合适吗？”于是就把我搬上一顶轿子，后面一个人把我的手摇呀摇的，个个都说我演醉酒演得很像（大笑）。第二天我酒醒了，整个片场只有我一个孤零零的，我还以为是到了什么地方呢。

李怀宇 后来有人对倪太说：“蔡澜叫倪匡演作家也就算了，叫他演嫖客，简直是污辱了大作家。”

倪 匡 倪太说：“他本来就是嘛。”（大笑）

李怀宇 黄霑先生也是很早就认识了？

倪 匡 我认识黄霑很早，第一次见面是1972年，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时我另外租了一层楼来放贝壳，我放贝壳的房子比现在的房子还大。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我始终觉得人的脑电波频率如果合拍就可以谈得投机，有很多人半句话都不投机。最近我认识两个新朋友，李天命和陶杰，一见面大家自然会拥抱，自然会聊天，觉得很有味道。陶杰是才子，董桥也是才子。董桥和我见面很客气，但是就谈不到一块儿。我喜欢开放一点

的人。我和查先生很熟，都已经算是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

李怀宇 江湖上说金庸、倪匡、蔡澜、黄霑是“四大才子”。

倪匡 他们三人是，我不是，英文一句都不懂。查先生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我记得四十多年前到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柜子，不知道放什么东西，后来一看，是一张张卡片，全部是英文，有几万张。他讲话一向不多，广东话、国语都不行。

李怀宇 你和蔡澜、黄霑性情比较相近，所以后来搞了电视节目“今夜不设防”。

倪匡 是黄霑和蔡澜主导，我完全不懂电视节目应该怎么做，我只懂喝酒（大笑）。那时电视台经常找我们三个来访问，我们想与其让他们做，不如自己做。有酒喝，有靓女聊天，我们是首创付访问费给嘉宾，至少一万元一次。张国荣、周润发、林青霞那几次都很好，“今夜不设防”没有播出来的部分比播出来的更加精彩。

李怀宇 张彻先生的挽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是黄霑先生写的。你曾说：“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好了。”没想到现在黄霑先生也去世了，蔡澜先生写了“一笑西去”四个字悼念他。

倪匡 人生很无常。如果让我写四个字，我就写“岂有此理”。你看我抽烟更厉害，就没有见我生肺癌。

1992年秋，倪匡飘然离开香港，隐居美国，留下一纸声明：“我已决心‘淡出’，自此天涯海角，闲云野鹤；醉里乾坤，壶中日月；竹里坐享，花间补读；世事无我，纷扰由他；新旧相知，若居然偶有念及，可当作早登极乐。”一去十四年，直到2006年才回到香港。

李怀宇 在美国这十四年的隐居生活怎么过的？

倪匡 很容易过的，我喜欢睡觉，喜欢发呆。我又喜欢看书，喜欢听音乐。又养鱼、种花、买菜、倒垃圾。有多少事情忙？倪穗打电话来，我说：“你不要讲太久了，我很忙的。”我的房子有一个天窗，美国的空气好，一打开就可以望见星星，夜观天象。还有多少东西没有玩呢！

李怀宇 你人在美国，害得很多朋友要漂洋过海去探望你。

倪 匡 金庸、蔡澜、黄霑个个都去过。罗孚也去，以前跟他们《新晚报》打笔战，他的文章写得好，见了面我和他拥抱一下，大家欢笑。这时候真是“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李怀宇 在美国有没有写文章？

倪 匡 我一直在写小说，我写卫斯理写到前年才全部完成。

李怀宇 是不是用电脑写的？

倪 匡 去了美国两三年我就用电脑写作。用声控的，我用国语。

李怀宇 你的国语行不行啊？

倪 匡 它听得懂我的国语的。这个软件我用得很好，可以先训练一下，起初比较困难。那时候我手痛，如果不用电脑根本没有办法写作。我用电脑写了三十多本书。

李怀宇 你还自称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第三。

倪 匡 （大笑）这个说法是开玩笑的。煮东西只有我一个说好吃，别人没人说好吃的。我煮东西很简单，牛肉、羊肉、鱼，都是一样的煮法，不加任何调味，至多加点盐、胡椒。我觉得调味品加多了，原来的味道都没有了。最讨厌的是吃大闸蟹点醋，吃生蚝加番茄酱，真是离谱，不会吃就不要吃了，糟蹋好东西干什么？三藩市没有好吃的，没有好玩的，不知道为什么变成最佳旅游城市。黄霑来找我，我们两人走来走去，想找一间好吃的酒店来招待他，黄霑口刁嘛，最后找不到。蔡澜来了，有时候自己煮东西，有时出去吃。

李怀宇 你在那里还看黄碟？

倪 匡 我回来时有五千多张黄碟送给人家。本来我想托运回来的，托运的外国人怕得要命，说中国禁止的，我说那是香港。他说，香港也是中国，你敢冒险，我不敢。我只好全部送给别人。我想回到香港还是有得买，旺角不知道有多少呢。

李怀宇 你在三藩市讲英文行不行啊？

倪 匡 我不懂英文的，只会很普通的对话。三藩市华人多，到了银行，大喊：“有没有人会讲汉语？”一定有人来的。美国对少数民族照顾得很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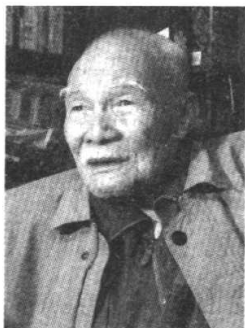
到，只要有百分之五的人使用这种语言，政府部门一定有人会讲这种语言。所以我到政府大楼，一点都不怕，大声地叫，不像中国百姓走进政府部门一样，美国政府人员对我都客气得不得了，真是为人民服务，这点给我印象最深刻。我始终对美国的地方是喜欢多于不喜欢，比如对面走过一个人，你对他笑，他一定对你笑。如果在香港对着人家笑，人家当你是神经病。在美国，像我这样的肥佬去看人家的小孩子，人家很开心，在这里人家就怕了。

李怀宇 我听说一次在中文书店你被一个小女生认出来，她重金买下一本《卫斯理》请求签名。你问：“书这么贵，你还买？”她答：“平常租来看，今天碰到你才买……”

倪匡 这是真的。美国买书很贵的，平时大多数租来看。现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有几架全是我的书，人人借来看，我就没有收入。如果是法国图书馆，有人去借书，图书馆要付作家版税。

李怀宇 当年你移民去美国时，有人说，你过不了两年就会回来的。

倪匡 还有人说过不了两个月呢，结果我十四年没有回来过。但是倪太实在不适应美国生活，她一年要回来三四次，一年有半年在香港，即我一年有半年一个人在美国，相安无事。到了我七十岁以后，她突然间觉得我老了，不可以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了，她就在美国陪我，不回香港了。但是十个月不回香港，她又神经衰弱，又憔悴。我看不对路数了，就对她说：“你回香港吧。”“我回去你怎么办？”“我很喜欢一个人生活的，我有很多事要做，大把书未看，大把音乐未听，大把碟未看。我可以一个月不出门一步的。”她说：“你就陪我回去一次。”一回来，所有的人，认识的也好，不认识的也好，个个都说：“倪匡回来了，倪匡回来了！”（大笑）梁凤仪还特地搞了一个很盛大的欢迎会，二三百个社会名人参加，很多人我都不认识，说：“欢迎回来。”我考虑一下，从美国回来不到一个月，倪太就像活虾一样，本来憔悴得不知像什么似的。不过，她现在不认是她要我回来的。现在记者问我：为什么回来？我说：“我晚节不保！”（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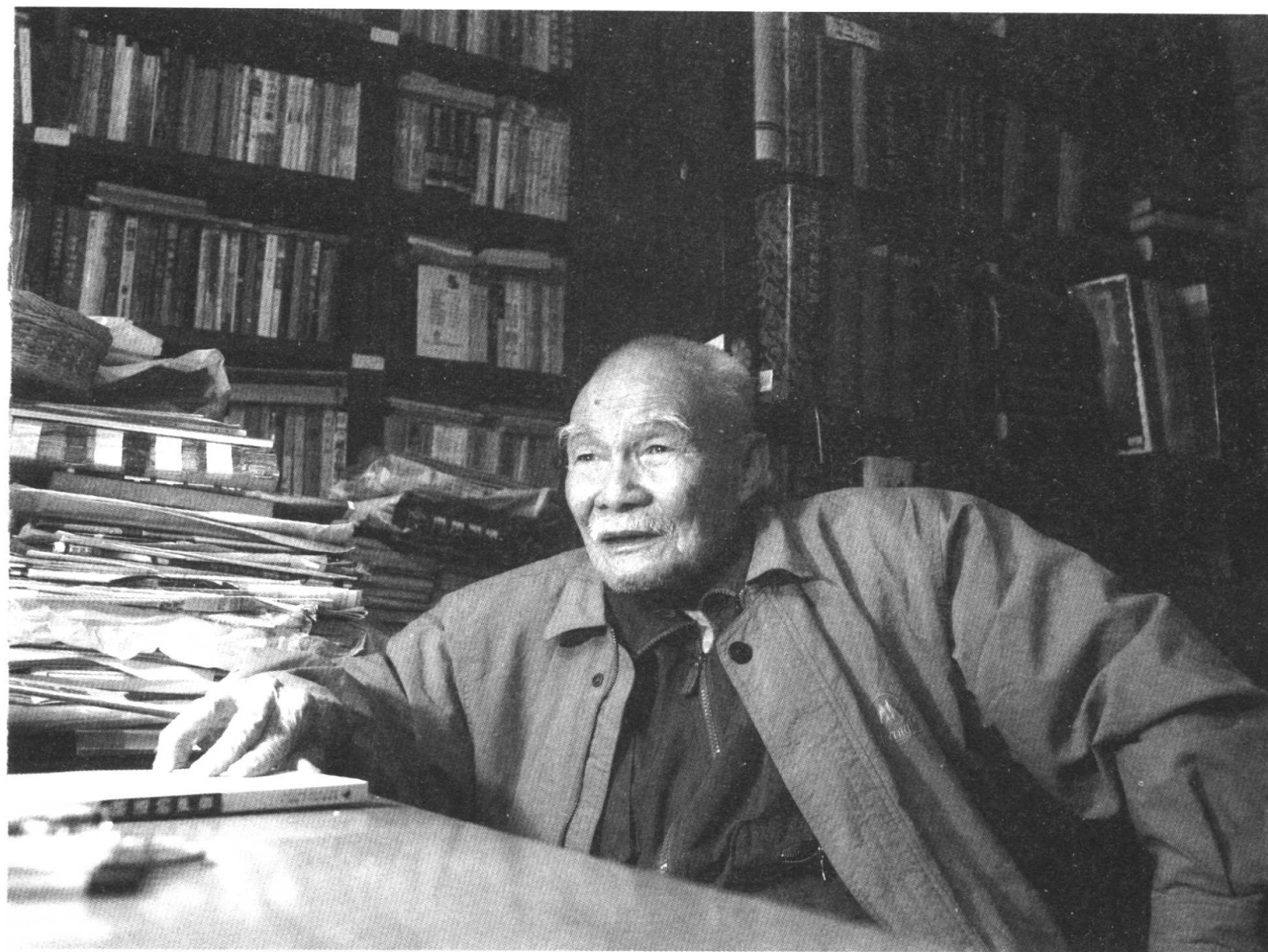


李育中

1911年1月生于香港，童年在港澳等地度过，学过英文、葡文等外文。1933年年初将海明威的作品 *A Farewell to Arms* 译为《诀别武器》，是中国最早的译本。

1938年回内地参加抗日，曾随杜聿明第五军入缅远征，担任英文秘书兼战地记者，作报告文学《缅甸远征记》。曾在广东省立、市立艺专及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任教，后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岭南现代文学史》(与人合作)，诗集《凯旋的拱门》，报告文学集《缅甸远征记》，点注《广东新语》。



李育中

泛舟书海纵横论

茅盾学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在上海向全中国号召，出一本《中国的一日》，他的做法是在同一天里，各个地方的人写文章，挑选一篇出一本书，全中国很多人响应。我当时在香港《华侨日报》当编辑，我那时很讨厌蒋介石，那天晚上有关蒋介石的消息来得迟，我就故意不登，第二天老板发现蒋介石这么大的消息都不登，就开除了我。那正是茅盾号召写《中国的一日》那一天，所以我就写我失业的事，茅盾就取了那一篇。

李育中先生的家里到处都是书。客厅里一面书架上摆放各个时期的合影，一眼便可认出的文化人有廖冰兄、李欧梵、黄霑、孔庆东、余杰，七十多年前在香港和穆时英等人的黑白照片则已发黄。更多的照片是和学生合影，漂亮的女学生尤其多。

窗边挂了一首自题诗：“未因老去感蹉跎，不为闻歌唤奈何。我自吹笙倩人唱，一帘花影月婆娑。”这是李育中七十七岁时为退休而写的。诗成之后，学校又返聘了四年，退休之后，每天家里还是学生满座。等到老先生九十岁时，友人送了一首祝寿诗：“九十诗翁眼未昏，泛舟书海纵横论。机锋妙射难平事，朗语春风破院门。”如今老先生眼未昏，听力不减，行动灵便。相识之后，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每次和他谈天时，总有学生轻轻地推门而入，或来借书聊天，或来帮忙做饭，或带来礼物。

李育中是一位妙人，当过翻译、诗人、影评人、战地记者，晚年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却告诉我：“我占有书的欲望很大，倒不是以藏书自居，根本不是什么‘藏书家’。”他曾收集了不少孤本善本，做完研究之后，便公诸同好。这些年，他陆续捐给华南师范大学的书刊有万册以上。现在常在校内书店买书，每个星期还要出校门去买一次书，随便找一个学生同去，因每次买书一二十本，需请学生帮助提书。广州好几处买书的地方，老先生说起来如数家珍。

以前，书籍、电影、美术、书法、诗词，他样样涉猎。“现在最大的兴趣是看书，比年轻人还积极。以前曾把看电影摆在第一位，写影评，用一句外国笑话讲是second to none。”谈起电影，他兴致不减当年，“1949年之前很多大学生喜欢写影评，但是不太了解电影的历史，看的片子也没有我这么多，外文也懂得不多。当时我看完电影马上写影评，同时也介绍外国电影的历史知识。”在他杂乱的书堆里，我见过一张《断臂山》的影碟。

李育中早年曾以新诗知名，抗战时期出过诗集《凯旋的拱门》。如今他和华南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也常常唱和，当了诗社社长，写的多是旧诗，其嬉笑怒骂文坛趣事的打油诗，读来有聂绀弩的味道。他曾不遗余力地向国内观众推介毕加索等当时“新潮”美术画家，也曾在市价便宜时收藏了不少岭南名家的画作，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许多。在谈笑中，他找出一本自制的画册，自称那是“一点小趣味”：根据照片画了很多文化名人的画像，只为讨自己和朋友一笑。

1911年1月，李育中在香港出生，不久民国成立，他笑称是经历了清朝、民国、共和国的“三朝元老”。童年在港澳两地读书，学习中文、英文、葡萄牙文。1933年年初，李育中在香港第一次翻译了海明威的《诀别武器》。后来，他曾笑数自己人生的多个第一：1936年被茅盾采录文章编入《中国的一日》的香港第一人；1938年第一次作长文介绍马雅可夫斯基于《文艺阵地》上；1942年用文学的形式为湘、粤两份日报写战地通讯，报道缅甸远征，次年年初出版战史

《缅甸远征记》；战后，1946年在南方第一个向国人介绍萨特和毕加索；第一次作长文介绍芭蕾舞进入中国；新时期第一个介绍卡夫卡并且翻译其作品，在《外国文学研究》详述意识流写作手法源流；1985年第一个在中国内地写文章评介李敖其人其文。

李怀宇 你童年在香港、澳门两地都读过书，英文、葡萄牙文都学过？

李育中 我学过英文、葡萄牙文、世界语、俄文，另外还自学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来曾想过翻译一本葡萄牙著名的史诗，现在没有精力做了。

李怀宇 五四文化对当时的港澳地区影响大不大？

李育中 五四运动时我在澳门，外国学校以殖民地语言授课，澳门是葡萄牙文，香港是英文，上午用殖民地语言，澳门是下午才用中文上课，香港则只有最后一节课用中文。学校要求学好外文就可以了，中文学也行，不学也行。澳门还有点内地的味道，我很受五四影响，开始懂得爱国，香港殖民地的味道就更厉害——1935年，香港大学给胡适一个博士学位，我听过他演讲，他很能演讲，英文也漂亮。

李怀宇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就喜欢演讲，他的老师曾说他：老是演讲恐怕会耽误学业。

李育中 胡适演讲确是好听，英文自然很好，讲话的姿态、语音都行。

李怀宇 你那时读英文著作多不多，后来怎么会去翻译海明威的作品？

李育中 英文著作读得多。我很喜欢看电影，看到海明威的《战地春梦》。以前的电影译名很妙，不会直译的。我那时已经在香港做翻译工作，我得益于香港的两个图书馆，一个是大会堂，英文书很多，另一个是华商总会的图书馆，有很多中国书。看完戏，我到大会堂图书馆找英文原著，觉得值得翻译，就翻译这部小说。我跟报纸很熟，就在报纸上连载，那时是1933年年初，我二十二岁，直译作《诀别武器》。那时根本没有人知道海明威（大笑）。到后来介绍海明威是施蛰存存在上海主编的《现代》杂志，那是在1934年之后吧。

李怀宇 为什么喜欢海明威？

李育中 他写的文章好，风格明快，到现在还是站得住。

李怀宇 1936年你在香港写的文章收入茅盾编的《中国的一日》是怎么回事？

李育中 1936年，高尔基是那一年死的，茅盾学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在上海向全中国号召，出一本《中国的一日》，他的做法是在同一天里，各个地方的人写文章，挑选一篇出一本书，全中国很多人响应。我当时在香港《华侨日报》当编辑，我那时很讨厌蒋介石，那天晚上有关蒋介石的消息来得迟，我就故意不登，第二天老板发现蒋介石这么大的消息都不登，就开除了我（大笑）。那正是茅盾号召写《中国的一日》那一天，所以我就写我失业的事，茅盾就取了那一篇。

李怀宇 上海沦陷后，茅盾去了香港，你那时和他的交往怎样？

李育中 茅盾到香港，是香港地下党为他安排的。我跟他一家人都熟悉，他住在太子道，住一层楼。我在香港办过很多文学团体，文化人南下，都是我们接待的。他知道我是一个进步文学团体的负责人，那时筹备《文艺阵地》，请我写文章，我就写了《马雅可夫斯基七年祭》的长文，那是中国详细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发在创刊号。他有时在广州，有时在香港，《文艺阵地》不是香港的刊物，如果是香港刊物，会受到香港政府的监督的，又需要按金。《文艺阵地》开始由茅盾编，后来由楼适夷接手编，我都有写稿。

李怀宇 茅盾的风度如何？

李育中 茅盾以前没有留须，生得清癯，眼睛有些毛病，老是眨眼，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郭沫若我也认识，我经常将他们两人进行比较，郭沫若是豪放的人，演讲很厉害，茅盾刚刚相反，郭沫若的四川口音还容易听，茅盾的浙江口音就很难听清楚了。他是语不惊人，文笔很不错。我写的文章，茅盾都给我发表，他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改我的文章，他很欣赏我写的新诗，我写了很多诗，也喜欢写报告文学。茅盾旧文学的基础不错，字也写得不错，我以前有很多他的信，后来失散了。

李怀宇 你在香港和许地山的交往怎么样？

李育中 1939年，我和郁风、刘火子从韶关回到香港住了一个多月，不知道谁介绍我到香港大学和许地山谈了一个多小时，什么内容都不记得，只记得大热天，他给我冰镇的柠檬茶（笑）。许地山是一个很纯朴、冷静、温和

的人，穿中装，不穿西装。我们当时在香港搞左翼运动，他不参加，没有表态。

抗战爆发后，李育中从香港到了广州，参加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负责伤兵难民工作。广州沦陷后，到粤北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还创办两个团体：粤北青年记者学会与粤北文协分会。后从粤北转至桂林，一边教书，一边编《中国诗坛》等报刊，1941年，出版个人诗集《凯旋的拱门》。1942年，参加抗日远征军，1943年年初出版报告文学《缅甸远征记》。

李怀宇 抗战时你在桂林编报刊之外，还去教书？

李育中 1940年反共高潮就开始了，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站不住，就跑到广西一个不搞反共活动的特殊地区避难。我也是属于避难，1940年春，我在桂林逸仙中学教书，你猜我和谁在一起教书？有李嘉人，后来当了广东省副省长，还有陈残云、黄新波、廖冰兄等，逸仙中学是广东同乡会办的。我在广西认识了我太太，她是一个小学教师。

李怀宇 后来如何去随军？

李育中 那个学校改组，换校长，很多老师就走了，我看报纸上说，有一份新办的大报纸，要请很多编辑记者，我就去应考，有一百多人，结果我考了第一名（笑）。我开始估计错误，以为像传说中那样是李宗仁的老婆要办一份大型报纸。后来我到了杜聿明第五军办的小型报纸，杜聿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这个人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忠于蒋介石，是他的骁将，当时他比胡宗南还高一层。第五军是特殊的部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唯一有坦克的部队。1942年春天，我就随军，应邀去做杜聿明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是政治部宣传科代科长。那时候刚刚结婚，便要上战场，很勇敢！（大笑）

李怀宇 当时缅甸战争的局势是怎样的，你如何写出《缅甸远征记》？

李育中 整个缅甸战争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杜聿明打了败仗，第二阶段孙立人反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打完新加坡就打缅甸。缅甸是英军的

孙立人

1900—1990，安徽舒城人。1923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学习土木工程和军事，曾任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和新一军军长，在缅甸作战中功勋卓著。1948年到台湾后，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其间，孙大事改革，影响到蒋氏父子对军队的控制。1955年遭撤职，并被长期软禁。

领地，英军比较薄弱，我记得指挥官叫亚历山大，是一个少将，要求中国支援。当时新开一条滇缅路，请中国部队由滇缅路入缅甸，中国就派了最精锐的第五军前去，其中包括孙立人的一个师，由杜聿明统领。第一场战由杜聿明指挥，发挥过威力，可惜英军无能，不会配合，打了败仗，就撤退；第二场战反攻，杜聿明没有参加，由孙立人指挥，有美军支持，便打胜仗。

我参加了第一场战，战争很短，我还没有到过最前方，已经开始大撤退，我参加了大撤退（大笑）。那次撤退很壮观，一支部队经过野人山到印度，野人山从来没有人走过，蚊虫野兽很多，天天下雨，几乎死了一半人，听说杜聿明的十个卫士死了八个。那时是雨季，没有地方睡觉，也没有东西吃。我跟的是另一支部队，由坦克团经滇缅路回来。我就在下关采访了很多军人，了解整个战争的情况，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打得很壮烈，中国士兵能到国际上支持人家抗战，表现得不错。我那时还有两个身份，分别是衡阳的《大刚报》和韶关的《大光报》的战地通讯员，因为这次战争很匆忙，还没有其他战地记者，我写了一本《缅甸远征记》，这是唯一一本记录这次战争的书，很多人曾经引述这本书。这本书印了两版，1943年春在桂林印了土纸本，我听说重庆图书馆还有这本书。另外广州战后出一本白报纸本，我本来这两本都有，“文革”时抄家抄走了。

抗战胜利后，李育中到广州从事文艺与教学活动。在报界、电影界、学术界，他与梁宗岱、钟敬文、金应熙、黄谷柳、秦牧、廖冰兄等文化人均有交往。李育中熟悉广东文化界的掌故，曾撰写多篇文章回忆旧日知交，并与人合写过专著《岭南现代文学史》。

李怀宇 我看到一份资料，是1948年中国电影复员以来电影论坛第一次电影座谈会上，你和夏衍、丁聪、陈歌辛等人都参加了，夏衍主要搞文学电影活动，丁聪画漫画，陈歌辛是“一代歌仙”，那是怎么一回事？

李育中 有一个富家破落子弟叫欧永祥，有些钱，就要搞电影杂志，请我帮助他搞电影论坛。开始在广州出，后来因为没有登记证，就去香港，一路赔了很多钱。因为这个电影论坛倾向进步，才请到夏衍、丁聪、陈歌辛、

欧阳予倩这些人参加，其中多人我早就认识，高谈中国电影的发展前途。我和夏衍在《救亡日报》就已认识，并且一同撤退到桂林。丁聪和黄永玉很闲散穷困，黄永玉的老婆张梅溪是我在文艺学院的学生。我欣赏黄永玉早期的版画，他现在是最有钱的画家了，很有才华，但是那种味道就是有点怪诞。

李怀宇 廖冰兄和丁聪、黄永玉很早就交情匪浅，后来都成了有全国影响的画家，可惜廖冰兄晚年不大能讲话了。你在桂林就和廖冰兄同事过，觉得他的性格如何？

李育中 有句广州话说“直肠直肚”，用来形容廖冰兄最合适不过了。他的漫画政治性很强，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他是穷家子弟。他以前讲话百无禁忌，他对关山月不满意，经常骂关山月。我也认识他妹妹，就叫廖冰，廖冰很高大，人又很豪爽，后来翻车死了。

李怀宇 我在《聂绀弩诗全编》的附录看到你写的《怪客奇诗聂绀弩》，才知道钟敬文教过聂绀弩诗词平仄的事，你是如何认识钟敬文的？

李育中 1938年搞组织活动，第一次是广州组织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的活动，我记得是在西关的南海中学，钟敬文和我都参加，就开始熟了起来，到了纪念上海“八一三”抗战活动又在一起了。我后来到粤北工作，范长江就委托我当国际新闻社第一个驻粤的特约通讯员，到了韶关翁源。1938年年底在翁源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第三组住了一个月，大家很无聊，经常和钟敬文他们在一起聊天。钟敬文属于文人参军，当时是上校参事，搞宣传，他很怕事，中间偏左。他的民俗学受杨成志和顾颉刚的影响不小。

李怀宇 钟敬文后来到了北京，生前被人许为民俗研究第一人。

李育中 广东人要离开故土就容易出名。钟敬文没有什么学历，古文修养很不错，那时候，聂绀弩要向他学平仄和押韵。他有书生的气质，旧诗写得不错，他受罗曼·罗兰影响很重——黄秋耘也是一个书生，受罗曼·罗兰影响也很重，他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小资的味道很重——钟敬文一解放就在北师大，我两次到北师大，他就想委托我去搞广东的民间文学，我说：“我干不了这个，既没有这方面的修养，也没有兴趣。”（笑）

李怀宇 梁宗岱百年纪念时，你写过文章纪念他，你们的私交是怎样的？

李育中 他这个人不问政治，好饮酒，好打抱不平。他不肯戒酒，老是

说越饮越高兴。我在50年代认识他，听说他在中山大学说过至少有七十个第一的话，例如酒量第一、健康第一、业务第一。他长得高大结实，身体很好，平时穿短衫短裤，即使在冬天，他还穿着短衫短裤。有一次我和他去海陵岛，要坐船一个多钟头，那是8月大暑天，中午阳光很烈，他没戴帽子坐在船头，让太阳直晒（笑）。

梁宗岱的特殊经历很多。他受法国文艺的影响，还很爱好歌德。在欧洲留学时，结交了文坛名宿罗曼·罗兰和梵乐希，梵乐希曾经给他的诗文集写

梁宗岱

1903—1983，诗人、翻译家，广东新会人。十六岁在广州培正中学念书期间，就被誉为“南国诗人”，1923年得保送岭南大学学习。192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晚祷》。同年先后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学习文学和语言，1931年回国，在多所高校任教。1956年后在中山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

过序，这在中国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有人还说梵乐希在法国名气比罗曼·罗兰更大。在梁宗岱家里，他给我看过一些罗曼·罗兰的信，劫后他那二十多封罗曼·罗兰的亲笔信已不知哪里去了。蒋介石底下有一个侍从室的人，在重庆时想介绍他进去，他不干，他的直觉很敏锐，有超然的味道。但是梁宗岱的悲剧之一就是同女作家陈沉樱的婚姻，陈沉樱先嫁马彦祥，后嫁梁宗岱，最后她和梁宗岱也不美满。

李怀宇 据说梁宗岱在广西时还救过一个女演员，后来那个女子死心塌地要报答他？

李育中 梁宗岱为人好打抱不平，早在重庆时，他就跟帮会的袍哥斗过，一点都不怕，那不是书生，是侠客了。在抗战时，他在广西百色见到一个草台班的女演员，那时女演员地位低下，受到一些非人的欺负与压迫，梁宗岱挺身而出，救了这个女演员，后来还不惜降低身份跟她结婚。这也不能只说他是名士风流，而是他有侠气。这位女子仗义，后来在他去世前几年，也拼了命服侍他，回报他。

李怀宇 广东还有一位和梁宗岱一样个性独特的学者金应熙，你和他交往又是怎样的？

李育中 我和金应熙也认识，我喜欢龚自珍的诗，他也喜欢。他来学校参加龚自珍研讨会，我跟他谈得来。金应熙的父亲是大汉奸，曾当过广州的伪市长，金家是广州世家，所以在广州沦陷时，出来当汉奸。金应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很怪，关于他在街边下象棋下到忘记回家的传闻很有趣。

李怀宇 梁羽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金应熙下象棋的趣事，也谈了后来陈寅恪与金应熙师生不和的事，你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缘故？

李育中 金应熙是陈文统（梁羽生）的老师，陈文统来过我家里，他有一个岭南大学的同学在这里教书，陈文统经常来找他，就顺便到我家里。我觉得陈寅恪的众多学生里面，只有金应熙有条件继承他的学术，我见过陈寅恪的学生写纪念陈寅恪的文章，多是不着边际的。金应熙学术功底很好，外文功底也深，但是后来变成驯服的工具，上面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和陈寅恪的事是时代的悲剧。很可惜，他死得太早，没有发挥他史学的专长，留下的东西太少。

李怀宇 秦牧也很可惜，他很有才华的，但是时代所限，很多文章没写出来。你在和他的交往中，见证过他的曲折历程。

李育中 秦牧在香港华侨学校读完书，到广州参加一个官办的前锋剧社，跑龙套。他早年很喜欢研究戏剧。广州沦陷后，在韶关时我认识他，秦牧开始在国民党党报编副刊，左派看不起他，我为他写过稿。秦牧自视很高，有疾恶如仇的书生气，但是很孤立，朋友也不多，我见到他的朋友都不是“进步”的朋友。40年代在桂林，秦牧写散文开始受到注意。秦牧旧文人的气质很重，性格冲动，很是自由主义。解放初，他在杜国庠领导的文教厅编一本文教杂志，他脾气很大，一不合意就拍案而起，丢下东西走人，到香港去了。后来不知谁劝他回来了（大笑）。本来这种性格适当运用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他所有的棱角都没有了。百炼钢都变为绕指柔，十分听话就是，所以一路平安。

1953年，李育中调入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许多学生回忆，李育中上课别开生面，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由于对海外文学一直很关注，李育中很早就向学生推介卡夫卡、乔伊斯、尼采、萨特等人的作品。退休后，李育中一直喜欢买书聊天写文章。在华南师范大学女生对老师的排位中，李育中曾被排为第四偶像，前三名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老师。

李怀宇 你有半个多世纪都在华南师范大学任教,此前你的经历很丰富,对教书生涯影响大吗?

李育中 我原来在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教书,1953年调到华南师范学院,1991年退休。这几十年中间,经历了很多运动,但我不是“运动员”,没事。我1929年开始在香港发表文章。我写过小说、诗、散文、杂文,后来比较集中搞文学理论。我给外国人打过工,在香港当过公务员,在英国新闻处当过翻译,在美军当过翻译,当过杜聿明的英文秘书,那些历史他们都没有追问的(大笑)。

我们有一个同事康白情是五四名诗人,他也是1953年从海南师专调入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和我关系不错。他写新诗很有名,旧诗修养也不错,解放后没有写新诗了,旧诗继续写,写得不错,甚至可以说很出色。他在五四时很活跃,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没有什么活动,就很消极。他是四川人,和袍哥有关系,又和康泽——大特务,蒋介石十三太保之一——是老乡,就当了康泽的清客,吃闲饭。康白情很吊儿郎当,五四运动过了三四十年,他那种自由散漫、乱讲话的味道都没有改。康白情教古典文学的,最妙是他讲屈原可以数屈原十大罪状,主要说屈原无父无君,《楚辞》的淫荡,《楚辞》代表南方的东西,不是正宗的文学,使文学走歪路,随便说了种种罪状(笑)。我是当学习组长的,他在我下面学习,我看着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变成“右派”,他自夸是没党没派的,说:“民主党派想争权,是争不过共产党的,共产党有军队。”结果,他就当了“右派”。上面要我这个学习组长处理他,我就问他,要么去劳动,要么回家乡。他要回四川……就在回四川的路上去世了。他是五四人物中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说明很多问题,我很想写一篇文章谈他,而且要深入一些,准确一些。

李怀宇 听说你教书很受学生欢迎,有什么好经验?

李育中 我教书还算平平稳稳,我教外国文学、文学理论,后来教过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在这个学校里,在中文系上课没有问题,外语系我上过课,美术系上过课,历史系没有请我,如果请我,也可以教历史的(笑)。我主持过很多教研组,最长时间的是外国文学教研室,近代文学教研室是我带头的。我在广州教苏联、西欧文学比较早。打倒“四人帮”之后,历史弄清

楚，让我当系主任，我不当，行政的工作我不做。一般旧学术界的教授不愿意当系主任的，当教授比当系主任更高尚、更超然。系主任的事务又会得罪人，工作量又多。

李怀宇 你曾在《香港风情》等报刊写专栏，很关注港台的文化现象，据说是内地详细介绍李敖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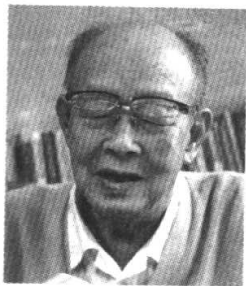
李育中 我在1985年就评介分析李敖。那年我到香港开一个国际研讨会，年轻和年老的朋友告诉我，李敖是“台湾的鲁迅”，送书给我看，有一本《李敖人物论》，我看了很满意，他专反国民党那些文化人。我就写文章介绍，是国内最早的。

李怀宇 你很早就介绍尼采、萨特、卡夫卡、乔伊斯，一直以来对外国文化都很感兴趣？

李育中 我因为接触外文方便，一路都有选择性地介绍外国新的东西。1941年我在桂林，就介绍乔伊斯，最早应该是叶灵凤在香港介绍乔伊斯。30年代内地稍微介绍过毕加索，1946年我在南方第一次向国人系统地介绍毕加索，我用了整大版图文介绍，后来写了很多文章继续介绍毕加索，我介绍了很多现代派画家，当时可成一本书的。战后就开始介绍萨特，萨特从抗战到战后在青年中很有影响，我当时有材料，就介绍萨特，那是1946年。

我对尼采早就很有兴趣，我有他的英文本、日文本及早期中文本。尼采是一个多面体，他是什么样的思想家，到现在还没有认真解决，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以前他的研究是一个禁区，在1980年左右，我已经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谈他，文章本来是谈鲁迅有没有受尼采影响。王元化早期的文章就完全为鲁迅辩护，说一点影响都没有（笑）。

1981年，我介绍卡夫卡，那时中国没什么人介绍他，我从英文资料看到他，就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介绍他，并翻译了他的一篇小说。卡夫卡很新鲜，我很喜欢新的东西。我一向很注意文学批评。有一个人你要注意，叫小泉八云，爱尔兰人，归化日本，鲁迅受过他的学生厨川白村影响，要好好地介绍他。我曾对学生讲，认识小泉八云是中学程度，认识勃兰兑斯便是大学程度，认识别林斯基才算研究生程度。



周有光

原名周耀平，1906 年生于江苏常州。

1923 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

1925 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1927 年毕业。

1927 年至 1948 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

1949 年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1955 年奉调到北京，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

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

周有光著述宏富，共出版书籍数十种，2005 年出版《百岁新稿》。



周有光

百年风云笑谈中

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家居的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书房兼会客室里，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患白内障后他的眼睛换了晶体，重放光明；耳聋后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长谈不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当年在西安即兴赋赠给他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遇有光西安》）

周先生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三十五岁。他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他的寿命。周先生现

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

每天早晨，周先生的第一件事是细看《参考消息》，他觉得《参考消息》内容比较多，很多重要的信息就在字里行间。美国和香港地区的朋友每周都给他寄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多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

近年，周先生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内容不止于语言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周先生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他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送给他一台。周先生笑道：“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所以，这个投资就失败了。”他边说还边示范打字机的操作。对他来说，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他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家里挂着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妇各个时期的合照，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张允和年轻时容貌如花，晚年雍容大方，从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安然去世，享年九十三岁。望着照片，周先生悠悠回忆：“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精神就痛苦了。”

问起长寿之道，周先生笑答：“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

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农村，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羨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蕙心兰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李怀宇 你和你太太两家都很有家学渊源，有学者还专门研究“张家四姐妹”，当作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缩影，你自己是怎么看“张家四姐妹”的？

周有光 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大笑），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耶鲁大学的金安平女士写过一本《合肥四姊妹》。张家作为一个大家，开始于我老伴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张家”与“李家”并列。李鸿章因母亲去世，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生于清朝末年，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他知道家里有钱、有地位，但总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离开安徽，到上海、苏州兴办新式教育。他用父亲传下来的财产，广办学校。后来，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很成功。蔡元培、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跟他结成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他不接受外界捐款，别人想办法搞捐款，他恰恰相反，有捐款也不要。当时有

一个笑话，他的本家嘲笑他：“这个人笨得要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其实，他在当时比较先进、开明，财产专门用来办教育，主张自己的钱不给儿女，只给儿女教育。我的老伴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丈人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笑）

李怀宇 你和张允和相爱的经历是怎样的？

周有光 我与我的老伴张允和结识，是因为我的九妹在张允和父亲办的学校里读书，并且与张允和是同班同学，这样张允和就经常来我家玩。我和她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里，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在浙江杭州创办新式学院，要我去教书，我

大概教了两年；而她本来在上海大学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当时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笑）。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

之江大学

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所办大学，校址在杭州。前身为1845年建立的宁波崇信义塾，1914年始称之江大学。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并入浙江大学等校。

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讲得那么好！”（大笑）后来我们都离开杭州，结婚了。结婚之后，我丈人给张允和两千块钱做嫁妆，那个时候两千块还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就用这两千块去日本读了一年书。我们七十多年的婚姻的确很幸福。

李怀宇 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有光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

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大笑）。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外国一个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李怀宇 “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与昆曲名角顾传玠的交往好像没有你们这样顺坦？

周有光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 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的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玠相识，顾传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元和结婚后就 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李怀宇 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有光 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

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李怀宇 张充和与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有光 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过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他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李怀宇 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后来为找

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阅读了大量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证明沈从文度量宽，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李怀宇 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周百科”，就是沈从文先生给你起的？

周有光 “周百科”是沈从文开玩笑的话（大笑）。到了后来就更有意思，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笑）。

刘尊棋

1911—1993，生于浙江宁波。1928年入燕京大学学习，后从事报业多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等职，1978—1981年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主编和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主席。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十张纸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

己去创造的。”缘定今生，他们决定在1933年4月30日结婚。婚后，他们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两千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抗战胜利后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周有光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

李怀宇 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在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 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有左倾思想。1933年，我就去日本，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河上肇已被逮捕了。当时日本不承认

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两年就可以。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随后就回了上海。

圣约翰大学

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学校，1879年由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而成，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教学的学校，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892年设大学部，1906年正式定名为圣约翰大学，1913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开始招收女生。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撤校。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抗战八年期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银行里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

业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1945年我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业余读书。当时很用功，一下班我就到纽约著名的公共图书馆读书，晚上10点才回家。晚饭也在图书馆里吃，很便宜。图书馆非常好，因为每天都去，图书馆的人就问我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经济，他们就以为我是搞研究工作的，就给了条件很方便的“研究生房间”，我借的书不会被拿走，可以放在里边。我就利用每天下午晚上来读书。周六周日我在大学里听课。工作的原因，我没有修学位；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所以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李怀宇 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 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中国朋友是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李怀宇 1949年你为什么回国呢？

周有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能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当时，中国解放后，在外国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外国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中国和美国相差得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

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笑）。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藏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笑）。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的待遇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风浪不断，文化人的命运随之起伏。周有光坐看云起后追忆：“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

李怀宇 回国以后，你在各界都有很多朋友，记得你的《新陋室铭》中说：“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你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 我的朋友圈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早期在银行工作，当年银行界的大人物我都认识。解放后回国，我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兼任新华银行的总行经理和秘书长，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第二业务处处长。所以，当年银行界第一代的大人物我都认识。由于我在大学教书，特别是解放后政府把华东地区很多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把我也调到那里，所以我也成为财政经济学院的教授兼研究处处长。当时研究所的规模很大，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所任职。很讽刺的是，我调任“文改会”后不久，就开始“反右”，上海的经济学教授一个一个都被划成了“大右派”，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当然是“反动”的。我调走之后，就与经济学没有关系，幸免于难。“反右”把我上海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打倒了，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

来的经济学家，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自杀了。我在上海最为器重的博士生也自杀了。当时我不知道，事后一年多我才知道。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重庆的轿子——下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中，天天都有死的危险。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我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文艺界我也有一些朋友，丁聪、曹禺、吴祖光都跟我有过不浅的交往。我曾经跟吴祖光在四川做过邻居，曹禺更是后来天天在一起工作，而丁聪年纪很小就跟我们很要好。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1955年至1956年，我在北大开文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

周有光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其中的意义已不仅限于文字，而且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李怀宇 你原来研究经济，后来如何进入文字研究领域的？

周有光 上海解放以后，我就从美国回来了，主要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授。1955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也把我找来了。开完会以后，我准备回去继续教课，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

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这个改行是偶然的，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可是从中学到大学，我对语言学、文字学，特别是文字改革都有兴趣。青年时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20年代，我写了一些文章在新语文运动的杂志上发表。出于这些原因，他们邀请我到这里来工作。这个改行，在兴趣方面是常年延续下来的，但是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大家对于建设新中国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提倡“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样，我就服从领导要求，改行了。改行之后，我就“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

李怀宇 你认为文字改革的意义在哪里？

周有光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于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

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来。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之中。

90年代以来，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话？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30年代我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个人的感觉，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晚年，周有光每天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2005年出版《百岁新稿》，他自序：“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李怀宇 《百岁新稿》中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你在书中说，老来读书，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

苏联和美国。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

周有光 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大笑）。

《百岁新稿》是我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完全讲的是人，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笑）

李怀宇 在书中《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一文，你重点谈到“后资本主义”，这样“与时俱进”的思考从何而来？

周有光 “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

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看到的，自己也难以置信，但是亲眼看到了。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两个工程师跑来跑去看看机器有没有故障，没有一个工人，但是生产快得不得了。那么，资本主义没有工人，还算资本主义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比尔·盖茨，他的钱比很多非洲国家加起来都多，原本一个书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财富呢？他不是用资本去赚钱，而是用知识去赚钱的。所以，现代人都说“知识时代”。有人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称为“信息化时代”，美国的未来现代化就是这样讲，很多人就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很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这种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发展了经济，但是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外国人来中国开工厂是不能接受的，是资本侵略。由资本侵略到发展外资，这也发生了变化，也是“后资本主义”。所以，思想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前几年有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王去世，儿子继位，但是儿子在国外读书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让国民看电视，他召集大臣开会，兴办电视台。但是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电视里都是魔鬼。谈不妥，大臣就离开皇宫，出门却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回来问新国王，新国王告诉他们：“汽车也是魔鬼。”（大笑）这些大臣就哑口无言，后来电视台就办成功了。中国的改革难，但是外国的改革更加难。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不是很容易。



黄苗子

1913年生，广东中山人，书法家、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著有《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黄苗子书法选》等，编著有《吴道子事辑》。

郁风

1916年生，浙江富阳人，画家、散文家。著有《我的故乡》、《时间的切片》、《陌上花》、《画中游》、《故人·故乡·故事》等，编有《郁达夫海外文集》、《郁曼陀陈碧岑诗抄》等。



黄苗子 郁风

一流人物一世情

我觉得启功很可惜，这么大的一个天才，什么都懂。有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提到书法，不能不说他是头一把交椅。他对书法理论太熟悉，把书法研究透了。提到书法，他能讲几天几夜。他现在的桂冠就是书法大师，这实在还是他小而又小的一方面，反而使他其他的才华没有很好发挥。

每次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会面都是愉快的。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万荷堂的黄永玉生日会上，李辉、应红夫妇热情引见，黄苗子露出经典的微笑，顿觉亲切。当日上百宾客之中，黄苗子、郁风是黄永玉的老友代表。晚宴开始时，黄苗子开怀大吃的形象让人难忘。随手拍了一张照片，镜头中馋嘴的黄苗子，活像个大孩子。

几天后一次不经意的会面是在中国美术馆门口，又见黄苗子“经典的微笑”，二老刚看了英年早逝的画家刘宇廉的画展。画展的序言是郁风写的，这是一篇让我在展览现场顿时就被震住的序言。当晚找来郁风的文章，读她笔下的人和事，仿佛生动的画面浮现在眼前，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只有在读黄永玉的文章时出现过。

在二老家中采访时，未觉两人的岁数加起来已经超过一百八十岁，黄苗

子不时欢笑，郁风中气十足。谈到邵洵美，黄苗子取出一把扇面，朗读自己手书的邵洵美的诗作，又取出六十多年前在上海为邵洵美画的漫画，郁风也感到有些意外，称赞把邵洵美风流倜傥的神采刻画得很像；谈到聂绀弩，黄苗子又取出聂绀弩在山西写给他的诗。谈到郁华，郁风取出自己的散文集《画中游》，其中有她写父亲的文章；谈到郁达夫，又取出《郁达夫海外文集》。可以想象，老友们在他们家聊天是何等愉快。

他们家的布置是适合老友来聊天的。书房名为“安晚书房”，画案不大，书架上堆满了书，墙上挂着黄苗子刚刚重写的聂绀弩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书房门前的对联是黄苗子的篆书，造型悦目，事后请教高人方知是：“春蚓爬成字，秋油打入诗。”黄苗子喜欢打油诗，这两句真是打油到家了。客厅墙上的一幅字是黄苗子写的“月是故乡明”。二老曾经在澳大利亚住了十来年，居住条件比北京好，如今还是喜欢住北京。

毕竟，北京有许多老友。数十年来，二老身边总少不了患难与共的朋友。30年代的上海，40年代的重庆“二流堂”，50年代的北京栖凤楼和后来王世襄芳嘉园的家，劫难后重逢北京的一场场聚会，这对夫妇总是生活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朋友圈中。这些人都是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郁达夫、邵洵美、夏衍、聂绀弩、叶浅予、启功、吴祖光、王世襄、丁聪、杨宪益、黄永玉……他们的言谈行止，如果有心人记录下来，便是一部现代的《世说新语》。

近三十年间，黄苗子和郁风声名日隆，夫妇书画合璧，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但他们自称是“行走在艺术世界里的小票友”。黄苗子的打油诗和郁风的散文，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玩票，却玩出大家风范。声名如同云烟，他们更在意的，是老友们历尽风雨后的一次次重聚。真奇怪，这些人受了那么多苦，却那么长寿，这个问题值得医学家好好研究。

岁月如风，老友渐渐老去，有人一睡不再醒，有人哈哈大笑而逝。夏衍走了，叶浅予走了，吴祖光走了，冯亦代走了，启功走了，都带着笑。如今郁风也笑着走了。在他们的主心骨夏衍去世时，朋友相顾说：“这是喜丧！喜丧！”黄苗子、郁风夫妇送的挽联云：“旧梦懒寻翻手作云覆手雨，平生师友一流人物二流堂。”

30年代的上海，黄苗子因拜父亲至交、国民党高官吴铁城之赐，身居政界，郁风因叔叔郁达夫的影响，热衷于进步活动，两人却因为艺术交流成为朋友。多年后，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为黄苗子担任说客的是共产党人夏衍。1944年，不同政党的人物在重庆一同参加他们的婚礼，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证婚人沈尹默赠诗：“无双妙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在爱海里，两人不顾政治的因素，却总是避不开政治的旋涡。“文革”中，夫妻含冤入狱七年，关押在同一个监狱，却相互不知下落。

李怀宇 你们俩是怎么相识的？

黄苗子 这里边有争议，我跟她有两个版本。我记得是在叶浅予家见面的。当时，我经常去找叶浅予，晚上，郁达夫来了，我没有发现他带着郁风来，就说：“达夫，你管管你的侄女啊！”郁达夫答道：“你瞧，我带她来了！”

郁 风 没有。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初出茅庐，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刚毕业。我年轻，什么也不懂，跟着叔叔郁达夫到处乱转，郁达夫带我去霞飞路的漫画俱乐部，黄苗子他们几个漫画家就经常在那里聚会。我记得清楚极了，没有错的。可能也不矛盾，他说的是一回事，我说的是一回事。当时是在一个按摩院的楼上见的面，那是一个不大好的地方，可能不仅仅有按摩。他们一帮人在一起，我跟张光宇、张正宇、丁聪、叶浅予，还有黄苗子见的面，都是头一次，以前不认识他们。

李怀宇 当时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们两人一个当国民党的官，一个是进步青年。

郁 风 其实无所谓“进步”。黄苗子他们也不属于右派，也没有国民党的右派关系。后来，是为了阶级斗争才划出来。当时国民党也“争地盘”，但是没有争到什么。

黄苗子 国民党争取不了我们，我们也不听国民党的话。像徐志摩和胡适他们关系很好，但是从来不听国民党的话。所以，这个是很难讲的。

李怀宇 朋友间的志趣相投很重要。

黄苗子 我们主要在来往中，彼此吸收东西，像邵洵美、郁达夫，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自然而然套进去的。

李怀宇 你跟郁华、郁达夫的交往如何？

黄苗子 我没有见过郁华。但是当年上海有一个南社俱乐部，是纪念南社的，柳亚子主持，算是南社的后身，有郁华，也有我。有一个南社点将录，

郁华

1884—1939，字曼陀，浙江富阳人。曾赴日留学，回国后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等职，曾任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上海沦陷后，不为敌伪所用，积极帮助、庇护共产党人，遭日伪特务暗杀。

把水浒的一百零八人编到南社俱乐部的一百零八人身上。我是“矮脚虎”，郁华是什么我记不起来。

我跟郁达夫的交往还比较多。只要郁达夫从杭州来，邵洵美一定找我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他给我写了十首诗，我当作宝贝裱起来。抗日战争时我有四首诗丢在香港，有一首胡适之写给我的诗，一首是郁达夫写给我的，一首鲁迅的，一首顾颉刚的。1940年

我去新加坡，郁达夫陪我玩了一个礼拜，临走郁达夫送了我一首诗。

1940年，我跟郁风还没有恋爱，但是一到新加坡打电话给郁达夫，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不是跟郁风很好了？”我回答说：“没有呢。”（笑）1944年，我才跟她在重庆结婚。郭沫若和柳亚子还合写了一首诗。沈尹默是我们的证婚人，也写了一首诗。

李怀宇 你跟郁风是怎么相爱的？

黄苗子 因为老谈艺术和创作，在书信中也谈，还聊一些文艺界的情况。郁风在香港编了一本杂志《耕耘》，我是发行人。后来我在重庆，夏衍、徐迟、冯亦代很多人都在一起。出了两期，就因为抗战结束了。

黄苗子生于广东香山（1925年改名“中山”）的书香世家，阅读和背诵古诗文奠定了文学基础，练习书法则是他每日乐此不疲的内容。十六岁时，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览，并在叶浅予主编的《上海漫画》发表，使他对上海无限向往。1932年，黄苗子从香港前往上海，开始艺术的漂泊之旅；一年后，郁风也随家人从北京南迁上海。与黄苗子不同的是，郁风的大法官父亲和大作家

三叔在她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她先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随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在徐悲鸿、潘玉良门下深造。

李怀宇 20世纪中国很少有夫妇两人都是艺术大家的，两人成就如此之大。

郁 风 我们不敢比，钱锺书、杨绛，吴作人、萧淑芳，张伯驹、潘素，都是夫妇艺术家。80年代，他的书法、我的画出版比较多了。

黄苗子 我们都是票友，根本没有成为什么“家”。

郁 风 都是半路出家，他的老师邓尔雅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过他会有多大成就。

黄苗子 我八岁到十几岁在广东跟邓尔雅学习。我父亲当时在香港办中学，邓尔雅跟我父亲是同学，就经常来教我。邓尔雅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当时年纪小，勉强跟他学，并没有受到他多少的艺术影响。现在，我才体会到他的艺术精髓，他很了不起。但是当时我得到他的一个好处，学会搜集材料。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是搜集材料，不会搜集材料怎么做学问？读书凭脑子记忆，不可能全部记清楚，一定要有根据。所以我从50年代初起，就学习邓尔雅先生，凡是书上有用的东西，都抄下来，做卡片。邓尔雅先生抽卷烟，经常用卷烟的纸来抄材料，然后一分类就出来了。

邓尔雅

1883—1954，原名溥，字季雨，号尔雅，广东东莞人。早年东渡日本，学习美术。1910年回国，活跃于艺林，诗书画皆负时名，擅篆刻，精鉴赏。1922年到香港居住，1932年回广东，先后在学校、军队、政府任职。1937年复移居香港，日军侵占香港后，匿名隐居。

郁 风 他搞了很多卡片。

黄苗子 比如我看到聂绀弩的诗，我都一首一首地抄下来。最后，聂绀弩的诗就全了。我就学全了这些做学问的方法。

李怀宇 书法要几十年的工夫才能练好。

黄苗子 我们当时对张正宇的书法是很佩服的。

李怀宇 他自己好像讲过一个五个指头的故事。

黄苗子 这是黄永玉跟张正宇开玩笑开出来的。张正宇举起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数起古今的书法家：王羲之、颜鲁公、怀素、米芾，大拇指则是张正宇自己。张正宇确是天才。

李怀宇 中国传统讲书画同源。启功的画也画得很好？

黄苗子 画得好！但是他不画了，因为写字已经被追捧得要命，他如果再画，就不得了。早期画得多，后来不画了。

李怀宇 你们夫妇之间如何交流艺术？

郁 风 我经常是他的第一个批评者，他写了字，我其实不懂，但是从艺术的角度、直觉、构图等方面，最不客气地评价。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也不听（笑）。我的画，他也批评。后来，他总说他画画是跟我学的，其实不是。我们先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年，那里地大人稀，住的房子很大，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我们一共有三个工作台，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我画完以后的颜料都不用收起来，他写完了字就“偷用”我的颜料画画（笑）。

李怀宇 当年你是传奇女画家潘玉良的学生，你跟潘玉良学画的经历是怎样的？

郁 风 当时，因为搬家到上海，我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想继续学习，就去了南京中央大学。那时候徐悲鸿刚刚从国外回来，成立了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那时很火，他对艺术系实行一种制度，按照教师分班。不管一年级、二年级，只要选某个老师的课，就在一起上课。徐悲鸿邀请了潘玉良讲课，潘玉良刚从法国学画回来，没有什么名气，没有什么人知道她。结果徐悲鸿的教室人山人海，一层一层包围。我觉得人太多，根本看不见老师，就选了潘玉良的课。潘玉良只有两个学生，一个男学生，一个是我。虽然只有两个学生，有点尴尬，但是我觉得上课舒服极了。我们画景物的时候照样有经费可以买道具，照样可以雇模特。潘玉良教得也很好，因为只有一两个学生，就像带自己的孩子，我们反而学到了很多。我还给潘玉良当模特，画了一张油画，画得很好，但是不知道去了哪里，也没有发表。但是学了只有一年时间。

郁风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曾留学日本，郁华成为著名法官，曾营救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郁达夫成为新文学健将。1939年，郁华遭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寓所门前；1945年日本投降后，郁达夫遭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

李怀宇 你的父亲郁华、叔叔郁达夫都是抗日烈士，生活中郁华和郁达夫是怎么样的？

郁 风 我的父亲是我们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有机会到日本留学，接受了新文化。他本人完全成长于中国的旧道德、旧传统下，爱诗爱画。郁达夫比我父亲小十二岁，都属猴。我父亲已经成人的时候，郁达夫还是小孩，所以郁达夫受我父亲的影响很大。我的父亲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搞法律，回国之后在司法部工作。第二次又因公出差去日本考察，就把郁达夫带去日本。我父亲留学的时候，郁达夫十来岁还在家乡，在杭州府中学读了几年，就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后来因为看不惯教会学校，就没有念好，他主要还是在家里读书。因为我的祖父是教私塾的，家里留下的书对他们影响比较大。郁达夫从小就看经史子集，喜欢诗。他最早喜欢清代吴梅村的诗，到了杭州就买旧诗集。中学没有毕业就跟我父亲去日本，先学经济，后又改学医，总之也不听哥哥的话，自己喜欢搞文学。

我父亲当时也带我母亲去了日本，我母亲在日本读女校，三个人一起生活、做饭，生活很简单。我父亲平时也指导郁达夫的日文。郁达夫从小能诗，《沉沦》也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所以他们都是在小时候的环境里就养成了文学功底。郁达夫学别的东西学不下去。《沉沦》有一些生活体验，当然是夸张了。鲁迅称他为“颓废派”，但是他说自己实际不是这样。有时候故意要把自己说得更“坏”，好像才能对社会有“惊醒”或者“炸弹”的效果。郁达夫对旧社会很愤恨，有一种揭露的意图，所以常常把事情写得很夸张。郭沫若跟他最好，后来还搞了创造社。

李怀宇 在许多人看来，郁达夫的一些行为惊世骇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不免封他为“颓废派”。在你看来，真正的郁达夫是什么样的呢？

郁 风 我要说的是，别人给郁达夫带上“颓废派”的帽子，实在是冤枉。不仅是我这么说，刘尊棋写过一篇文章叫《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替郁达夫打抱不平。如果真是“颓废派”，就不会以身报国，参加抗战，这是很冤枉的。我自己搞了很多年美术、编辑等，根本不是搞文学研究的，但是国内很多读者根本不了解郁达夫，我就为郁达夫打抱不平。因为1958年冯雪

峰写到郁达夫，提醒了我。从那时开始，我就搜集了海外出版的有关郁达夫的材料，我利用香港的条件搜集这些材料。因为当时国内的人只知道郁达夫的《沉沦》，根本不了解抗战之后的郁达夫。我针对这些现象，写了一篇很长的编后记，介绍他在海外的情况。刘尊棋、胡愈之对此也比较了解，郁达夫在新加坡，他们当时也在新加坡搞华侨抗战宣传工作。日本侵占新加坡以后，他们后来都去了印尼。他们都了解郁达夫当时是非常悲惨的。

2005年8月15日，作家协会在文学馆召开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会议，很隆重。我受邀请，我最后向会议主席要求用两分钟讲郁达夫的事情，也没有讲很长，就是稍微提一两句。郁达夫就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被日本宪兵杀害的。这个调查是被日本的作家铃木正夫完成的。胡愈之当时知道，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1945年郁达夫被害，第二年，胡愈之回到国内写了一本小册子《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为了把这个中国的重要作家在海外的遭遇告知国人，向国内文艺界的作家协会汇报，专门用几千字写了这本书。但是没有引起注意，也没有什么转载。所以，一直到了今天大学里讲现代文学史，始终把郁达夫算作“颓废派”。

鲁迅就对郁达夫比较了解，尽管鲁迅对创造社有看法，但是觉得郁达夫真实，有作家的良心。鲁迅欣赏郁达夫，两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郁达夫实在是很冤枉，一是被当作“颓废派”，一是后来风传他跟王映霞的关系，弄成绯闻，台湾对此也出了很多无聊的书。我们算一下，郁达夫在新加坡做过很多工作，两个报纸的副刊主编，每天要到报馆看电稿、上班、写评论，然后要做很多社会活动的事情，比如华侨抗敌协会的很多工作。我说，不是“颓废派”的作家都很难做到郁达夫做的事情，还要把郁达夫归为“颓废派”，实在是太冤枉了。

郁达夫隐姓埋名叫赵廉，办一个酒厂，拿收入养活了好多当时逃亡在外的文化人，像胡愈之他们都在那里逃难，生活没有着落，就靠这个酒厂，大家生活下来，掩护了很多华侨同胞。有一次，他跟一些华侨坐的车被日本人拦住，因为不懂日语，大家以为日本兵要加害他们。其实，日本兵只是问路，但把那些华侨都吓坏了。郁达夫就跟那个日本人说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些人就把郁达夫看成是与日本人有什么关系的、了不得的人物，需要的时候，又让郁达

夫去做翻译。后来一旦华侨跟宪兵有什么纠纷，都是郁达夫在中间做翻译。当时印尼的一个地下党被日本人抓到，手上有一个他们会员的名单，日本人不识字，就让郁达夫翻译。郁达夫马上机警地说，这个人放高利贷，这个名单是欠他钱的人的名单，这样掩护了很多革命的地下党。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做了很多保护华侨利益、财产、生命安全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人知道，都是我在海外出版的一些文章中看到的。总而言之，始终都没有一个对郁达夫公正的评价。

黄苗子在上海时，认识邵洵美。邵是风流绝代的才子，也是当时上海漫画界的重要人物。黄苗子认为：“《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对中国漫画的发展起很大的作用，漫画的发展也影响到绘画的发展。如果没有洵美，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的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

李怀宇 你认识邵洵美，他是什么样的人？

黄苗子 他是所谓的“新月派”诗人。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跟徐志摩很好。天分很高，诗写得很好，字写得很好。

郁 风 而且是有名的美男子。

黄苗子 邵洵美曾经送给我一把扇子，上面题了几首诗。他女儿让我给她写出来。这首诗是这样的：有了充分的经验，一粒谷里可以看见宇宙。热闹里有人生，静寂里也有人生。石头会说话，草会有感觉，这时候你已是一位完全的艺术家的，写下来的便是完全的艺术。

郁 风 很美。现在的艺术派，还没有他“现代”。

黄苗子 这是我给邵洵美画的漫画（取出漫画请大家欣赏）。

郁 风 这个画很潇洒，你当时也受他们的影响。

黄苗子 他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很有钱。因为对文艺有兴趣，他办了好几个书店。最主要的是，他办了一个时代图书公司，把当时有名的漫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鲁少飞全都收罗进去，张光宇是总编辑，张正宇是总经理，叶浅予编《时代画报》，还从德国运来巨型机器印画报。时代图书

公司养活了一批漫画界的人，并且把中国漫画家介绍到国外，把国外好的漫画家介绍给张光宇他们。从这方面，把中国漫画提高了很大的空间。我最早也在上海学漫画。当时，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有空就到时代图书公司，几个刊物都有我的稿子，与邵洵美较熟。尤其是郁达夫每次从杭州来，邵洵美都会打电话约我出来，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有幸跟他们来往。我曾经说，没有邵洵美办时代图书公司，就没有中国漫画，特别是30年代蓬勃发展的中国漫画。

郁 风 邵洵美把自己家里收藏的田黄图章卖掉，给钱时代图书公司。在30年代，同时出五个刊物，在美国等于一个托拉斯了，很了不起。

黄苗子 当时，两个大的“小托拉斯”，一个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还有一个广东帮，以梁得所为首办的大众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穷途末日，“快完了”，仍然是根深蒂固地继续发展。当时延安鲁艺已经培养出一大批艺术人才。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条件、机器印刷漫画。所以，最早的漫画宣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在没有人再提起了。像张乐平、叶浅予、陆志庠、特伟、张仃，这批人全部是漫画宣传队的重要人员。他们的根子都是上海漫画，分散到很多地区用漫画做抗战宣传，张乐平在上饶，黄胄、特伟在重庆。尤其是在农村，漫画宣传队起到了很大作用，一边挂着画，一边讲解。在没有敌人侵略的地方，很多重点城市都有漫画宣传队。比如廖冰兄在广州，后来到他的家乡广西，穷乡僻壤里，漫画起到了作用。但是当时的照片不容易收集，现在也很少人提起。当时，鲁少飞他们在广东，我也去了广东，办了一个《总动员画报》，由部队出钱。《总动员画报》一出就是几十万份，对抗战影响比较大。当时涌现的一些好的作品，艺术性与政治性结合得很好，现在看来仍然是很有力量的。

黄苗子和郁风的朋友中，聂绀弩是特立独行的一代怪才，如今“已经成为一部情感的老书，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一定要翻翻他”（黄永玉语）。黄苗子说，朋友们见面常常以怀念聂绀弩为话题，许多人认为绀弩是“鬼才”，中国之大，传奇性人物甚多，绀翁是尤“奇”者。

李怀宇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聂绀弩三人的旧体诗都写得很好。

黄苗子 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发现一批聂绀弩的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十七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十七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

李怀宇 我觉得聂绀弩跟郁达夫很像：性情中人，都喜欢喝酒，旧体诗都写得好，经历都很坎坷。

郁 风 那个时代才出现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很少有了。

黄苗子 聂绀弩晚于郁达夫，鲁迅先生对他很重视。现在大家一致公认，聂绀弩是把旧体诗变成现代诗的了不起的文人。

李怀宇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真是好诗！

郁 风 他是开创新一代诗风。旧诗虽然是老套，那种规律、美，如果不了解旧诗，掌握不好，就拿不到旧诗的精髓。但是拿到精髓的人，又不免落入老路。而聂绀弩既精通旧诗的精髓，又能将现代语言融入得很好，兼顾平仄的规律。

黄苗子 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都有这种开创。但是聂绀弩做得更高一些，新中国之后的很多新词，以前的人不懂，他都能融进来。

郁 风 杨宪益受他的影响，诗写得也很好。

黄苗子 现在我们来往的仍然写诗的就是杨宪益、邵燕祥。宪益最近身体不大好，不能走动，但是脑子清醒，对着电视机，现在一天要抽两包烟，偶尔也写一两首打油诗，一般没有从前那么起劲了。

李怀宇 我在香港罗孚先生家里谈到聂绀弩在北大荒的一些事情，车子撞倒他，大家以为撞伤了他，没想到跑过去，看见他坐起来，拿着一根烟。

黄苗子 他这种事情很多。我们一些劳改的朋友帮助聂绀弩去盖房子，房子刚搭上棚顶，他总是抽烟，就烧掉了。哎呀！要判死刑。夫人周颖马上

赶过去，千方百计找人营救，总算免去一死，轻判三个月就放他出来了。

有一天我跟聂绀弩开玩笑，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我给他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用隶书写好了挂在他书房。后来要命了，红卫兵来了。我都不知道红卫兵的事情，事后他才告诉我。他说，我要赔他一张“三红金水之斋”。红卫兵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就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偏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啪就撕掉了，说：“你也配！”（笑）他就让我重新给他写一张。十年之后，我们再见面，我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但是后来我都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直到最近看他送我的十七首诗，我才记起来。

在现代文化史上，“二流堂”是一个特别的场所。它在重庆和北京，汇聚了文化界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有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电影界报刊编辑唐瑜、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大牌明星金山、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在地欢聚一堂。抗战时，在重庆的“碧庐”，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用“二流子”互相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找不到宣纸和毛笔，未能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交流，日后更成就了一批文化大家。1949年后北京的“栖凤楼”，被称为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柯灵、于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这儿跑。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从此，“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专案组在查“二流堂”重要人物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李怀宇 从30年代开始，艺术界的朋友圈中就少不了你们两位，1949年之后又有启功、王世襄等文化大家，你们朋友之间在生活中的交往是怎样的？

黄苗子 启功比我大八个月，跟我比较熟，他去世时九十三岁，我九十二岁。去世以前，就算我们身体不灵便，也总是通电话。启功进了医院以后就不能说话了。启功、王世襄对我的帮助都是很大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写了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艺林一枝》，研究古代艺术。启功的打油诗非常有意思，滑稽得很。我跟启功相识大概是从50年代开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当时住在王世襄的芳嘉园，启功从黑芝麻胡同迁居小乘巷，因为佩服他的学问，我们经常来往。“反右”以后，都被划成了“右派”，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来往。但是我们彼此平时来往还比较多一点，大家都互相理解，启功、王世襄有时候来看我。

“反右”以后，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就都写一点东西。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研究清朝人的建筑法则《营造法式》等好几本书，还有对于鸽子、葫芦的研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我们有一个朋友以前给启功的老师陈援庵老先生抄东西，当了“右派”以后没有事情可做，他就替我们三人抄东西。抄完之后大家交流互看、提意见，当时来往比较密切。启功最有名的一本书《诗文声律论稿》，给诗律平平仄仄的发音总结了很好的表格和规律，从平平仄仄中拉开五言、七言，这就让人们能抓住旧体诗平仄的规律，让它变得简单。启功改稿子的每一页都是手写楷书，《诗文声律论稿》最后大概改到第九次才满意。我十分钦佩，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第七次改稿。差不多是几年以后“右派”平反，我的《吴道子事辑》才在中华书局出版，启功也替我纠正了不少错误，他都用纸条夹在稿件里，很细心。

我觉得启功很可惜，这么大的一个天才，什么都懂。有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提到书法，不能不说他是头一把交椅。他对书法理论太熟悉，把书法研究透了。提到书法，他能讲几天几夜。他现在的桂冠就是书法大师，这实在还是他小而又小的一方面，反而使他其他的才华没有很好发挥。

李怀宇 1949年后，“二流堂”那些朋友之间如何交流？

黄苗子 阿英同志50年代初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他

每次来北京都住在我们这个“栖凤楼”，所谓“二流堂”。后来，吴祖光也住在我这里。阿英同志鼓励我搞美术史，解剖几个“麻雀”。大家都知道吴道子是“画圣”，可是“圣”在何处，有哪些作品，历代有什么评论，到底有多少作品，都需要系统地说明。在他的启发下，我、徐邦达、张仃、叶浅予常常为吴道子的研究互相交流。

李怀宇 “二流堂”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黄苗子 北京“二流堂”在东单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浩子（戴浩）花了几个金条买下了这栋楼。起初是盛家伦、浩子两对夫妇住在里边，后来，我从香港来，没有地方住，也住在里边。再后来，《新民报》公私合营，也搬到里边，我也去参加管理。最后是吴祖光也搬进来。吴祖光很可惜，多少年的朋友，他的才华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当时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跟郁风是美术界的朋友多，盛家伦是音乐界的朋友多，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朋友多。有一句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险，我们就不知道危险。“反右”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在北京恢复重庆的“二流堂”，还上告了中央。其实周总理是很清楚的。在重庆，郭沫若、夏衍都和我们在一起，到了北京又聚集到一起。“四人帮”把我们揭露出来，目的也就是为了针对周总理。

其实，“二流堂”除了朋友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想法、意识去振兴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郁 风 其实，因为文化圈里的人兴趣相投，大家也是以兴趣结合，不是从一开始就严肃考虑任务，要完成什么任务的。

黄苗子 好像现在的分行比较明显。以前我们跟电影界经常沟通，现在很少有什么交流。

郁 风 以前很多画家、作家都不分彼此，特别是抗战时期重庆的很多画家。大环境在一起，都是相通的，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都是靠着一些旧的关系，虽然不同行，也还继续保持友谊。建国以后分行比较细，大家似乎都老死不相往来。现代从业的人多了，生活工作压力大、紧张，也不大有机

会见面了。现在的学科划分更细，互相的沟通也更少一点。而彼此之间的交流，对自己的专业是很有帮助的。过去的通才多，现在的专才多了。

黄苗子 陈逸飞希望成通才，但是被“累”死了。

郁 风 我们在美国见过几面，但是也不大熟悉。

李怀宇 现在老朋友间的来往怎么样？

郁 风 当时最活跃的叶浅予、吴祖光都离我们而去，搞外国文学的冯亦代也去世了，老朋友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也增加了一些新朋友，像范用、邵燕祥、李辉，也大多限于写作、出版的朋友。

黄苗子 我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得到过的最大益处就是朋友。我的很多朋友，有些比我年长，比如陈寅恪。1957年，我到广州送母亲上船回香港，为了研究吴道子，我特地去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先生。当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要跟着一一条白线去课堂。陈先生的头脑十分清醒，博闻强识。他指导我，让我查《新唐书》第几卷第几页，有一些有关唐代壁画的材料，《旧唐书》第几卷第几页也有，都是如数家珍。

我二十来岁在上海就认识了张大千，后来认识了徐悲鸿，抗战结束后结识了齐白石，都是经常来往的朋友。张大千总是惦记我，后来台湾跟北京能通信以后，他还送我他住在南美洲的四套照片，专门让人从香港带给我。临死前，还画过达摩像托付朋友带给我。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朋友。齐白石是抗日战争以后在南京认识的。建国以后，我到北京，就经常跟叶浅予一起去看他，老人家对我们这些后辈非常好。

郁 风 齐老的画50年代六元钱一尺，我们都觉得太便宜了，让他提到十元钱。

黄苗子 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我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



杨宪益

1915 年生于天津。

1936 年，在英国通过考试进入牛津大学学习。

1940 年与同在牛津大学读书的英国女子戴乃迭订婚并共同返回中国。

杨宪益与戴乃迭合作翻译中国名著成就斐然，译有《离骚》、《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鲁迅选集》等。

杨宪益亦工诗，有诗集《银翘集》等问世。



杨宪益

是真名士自风流

《红楼梦》翻译了好多年，刚开始我翻译到八十回，翻译后四十回时，我们就进去了（进监狱）。回来以后，我又重新翻译了一遍，年头拉得很长。就是小说人物太多了，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难的。人物名字太多，有的名字我就翻译意思，有的我只翻译读音。

北京什刹海一带如今成了老北京“胡同游”的胜地，清晨时分走在颇有几分古意的巷子里，让人暂时忘了现代生活的喧嚣。时不时有一两辆脚踏车闪到眼前招揽“胡同游”的生意，倒成了我们问路的好帮手，寻到小金丝胡同里，幽静得只能听见自己清脆的脚步声。推开杨宪益家的大门，我们走进了一个古朴的小天地。

这是一座翻盖了的四合院平房，家中的布置中西合璧，简单而典雅，客厅明净的落地玻璃对着满墙的绿茵，有一种说不出的悦目。王世襄的手书“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挂于客厅中墙，对于老友这副对联，杨宪益曾写下注解：“难比圣贤，不甘寂寞；冒充名士，自作风流。”杨宪益先生斜靠在沙发上，举止儒雅地招待我们，行动时则需要家中的助手搀扶。谈起往年趣事，杨先生神情闲淡，语气和缓，风云变幻成了过眼云烟。不知何故，

如今每当见到“绅士风度”一词，我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杨宪益。

这位集英伦风度与魏晋风骨于一身的绅士，如今身边少了那位半个多世纪患难与共的淑女。1999年初冬，戴乃迭因病去世，杨宪益赋诗缅怀：“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如今家中摆着杨宪益和戴乃迭当年那张身着唐装的著名结婚照，杨宪益的卧室则挂着郁风为戴乃迭晚年画的肖像，郁风在画上题字：“金头发变银白了，可金子的心是不会变的。”

房子是杨宪益的小女儿为父亲安度晚年置办的，杨宪益曾赋诗记此事，其中有句云：“独身宛转随娇女，伤偶飘零似断蓬。莫道巷深难觅迹，人间何处不相逢。”我好奇地问：“您的后代有没有与外国联姻？”杨宪益笑答：“我的小女儿的丈夫是加拿大人，我的大女儿的儿子跟一个美国小姐结婚。家里像个联合国。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我们那时候比较少。”

2003年，杨宪益患重病后行走不便，遵从医嘱不再喝酒。这位一生“情有别钟烟与酒”的长者，只能抽香烟过过瘾了。他说，现在每天睡得很多，看看电视读读报，朋友来了聊聊天。我留意到墙角有一幅一尺见方的人物小品古画，画一打坐的老翁，题诗为：“不知老翁有何事，独坐此处等人来。”没有戴乃迭的日子，杨宪益如同画中老翁，我想。每次到北京，我都会到什刹海杨家，饮茶谈天，言不及义。

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父亲留学日本，曾是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1934年，杨宪益到英国留学，1936年通过考试入读牛津大学。一年后，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入读牛津大学。戴乃迭生于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幼时曾在北京生活，对中国有着美好而甜蜜的记忆。在牛津大学，杨宪益和戴乃迭相爱了。1940年，中国战火纷飞，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邀请他回国任教的来信，戴乃迭毅然随他辗转回到中国。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李怀宇 我很想听听你跟戴乃迭的故事。当初在牛津大学是如何相识相爱的？

杨宪益 我跟戴乃迭相识很偶然，但是也有必然性。戴乃迭出生在北京，父亲在燕京大学做教授，她从小就对中国有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她还经常跟我说起小时候烤山芋的事。但是她母亲不愿意到中国来，她小时候没有学中文，五六岁以后，就回英国读书了。我跟她认识是在牛津大学，我读四年的荣誉学位，她读三年的普通学位。她愿意跟中国人来往，我们一个朋友就介绍我认识了她。当时，中国学生在牛津大学很活跃，经常学英国朋友搞一些活动，她也参加了。我是当年的中国学会主席，她做了学会秘书，我们就混熟了。那时候日本学生在牛津大学也有学生会，也很活跃，会员比中国学会还多一些。我们就努力多认识一些朋友，慢慢就把日本学生会比下去，比他们会员还多了。1937年至1939年，我们都在忙学生会的事情。1940年我毕业，戴乃迭与我订了婚，她父母也在中国传教，所以她也要到中国来。我说中国的情况很艰苦，她不在乎，非要来。

李怀宇 郁风写过你们的趣闻，你说戴乃迭是看到你俊美而爱上你的，戴乃迭说自己是因为爱上中国文化才爱上你，你又说这至少说明你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杨宪益 也不一定是这样。反正有人问她为什么喜欢杨宪益，她说是喜欢中国文化。

李怀宇 你太太喜欢中国文化，她的生活习惯也是中国化？

杨宪益 对，我们家的生活还是很中国化的，思想方面就比较西化。

李怀宇 听说你的丈母娘不太喜欢女儿嫁到中国？

杨宪益 一开始都不大同意。我母亲听说我要娶一个英国姑娘也哭了一天，哭了以后就想通了。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人都很没有保障，娶一个外国人恐怕更不好办。两边都不太答应，但是两边都没有说，因为她的父亲比较开明。

李怀宇 有一篇文章讲，你的丈母娘对你太太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们会自杀的。”后来你们的男孩子真的出了问题。

杨宪益 她母亲说跟中国人结婚，小孩子以后也许要倒霉。我们的男孩读中学的时候，考北大，分数刚刚考上，同班一个干部的孩子也考上了，结果就把我儿子的名额顶了。因为那个孩子的家庭有背景，比我们家好。我儿子没有读上北大，就上了北京的一个工科大学，他一直不开心，上了大学以后就与我们不大接触了。在大学期间，很多年轻人左倾得很厉害，觉得我们太“资本主义”，所以他与我们也不大来往。到了我们被关起来以后，对我儿子开了斗争会，说他是特务的儿子。他受了些刺激，说：“我父亲也许不是杨宪益，我母亲可能跟另外的英国人生了我。”斗争完了以后，他就觉得他是英国人的孩子，不是中国人的孩子，他就总往英国大使馆跑。来回几次后，乃迭的姐姐后来就把他带到英国去待一段时间。因为在国内精神病院一年之后治不好，恐怕永远就有精神病了，就不如去英国。他去了英国后，看起来还比较好，圣诞节时，乃迭的姐姐去了外地，就他一个人在家，又发作了，把房子烧了，自己也烧死了。

牛津大学是杨宪益一生梦魂牵挂的地方。在那里，杨宪益找到了终身伴侣戴乃迭，也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有后来成为大学者的向达和钱锺书。毕业考试时，戴乃迭得了个二等荣誉学位，是获得牛津大学中文学科荣誉学位的第一人。杨宪益自称算不上苦读的学生，他的精神只能集中到自己喜欢的事物上去，毕业考试时得了个四等荣誉学位。

李怀宇 在牛津大学的生活是怎样的？

杨宪益 那时候，在牛津的学习也完全在于自己。一个星期与导师见一次面，其他时间都靠自己在图书馆看书。我不大爱学习，很多时间都是与朋友一起聊天、玩，生活很自由。

李怀宇 很多学者说，学问都是在聊天的时候聊出来的。

杨宪益 对。我们那时候上午和下午的课程都是自愿选听的，晚上没有朋友来就看书，有朋友来就不看书，很自由。结婚以后也有很多朋友一起聊天，也有很多交流。

李怀宇 当时在牛津大学你已经认识钱锺书先生了？

杨宪益 对。那时候还有一个好朋友向达，我通过向达认识钱锺书，我们三个都是很好的朋友。他跟杨绛一起去的。我那时候年纪比较轻，他们都叫我“小杨”。那时候留学生中有三个姓杨的——“大杨”、“中杨”、“小杨”，我是“小杨”。

李怀宇 据说钱锺书毕业回国后在西南联大和一些关系处得不太融洽，就改到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教书，后来又去了上海，这段经历后来融到《围城》之中？

杨宪益 我没有接触过。钱锺书以前讲话也很随便，后来把字改成“默存”，默默地存在，性格跟在西南联大以前变化挺大。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但是我们彼此没有通信。

李怀宇 后来他也与外界没有太多接触，自己做自己的学问了。

杨宪益 解放后我们与钱锺书他们的联系多了起来。向达推荐钱锺书翻译毛主席著作，中央也想调我与他一起翻译，我当时在南京，觉得政治性文章的翻译我不内行，婉言谢绝了。后来到了北京，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1989年我写过两句打油诗：“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钱锺书见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两句，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整，建议改为“万事足”对“一身轻”，问我如何。我看了笑一笑，也忘了给他回信了。

李怀宇 黄苗子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说你因抗日回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后来香港大学给你颁发了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杨宪益 在英国牛津大学，我读了四年，得了荣誉学士学位。我是得学士学位以后就回了中国，但是那个时候学士学位就相当于硕士学位。我没有读博士，因为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读博士要八年时间。

李怀宇 黄苗子说，你原是个公子少爷，却醉心于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经历很奇怪。

杨宪益 我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小时候家里就有很多佣人，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少爷，比他们高一等。我父亲死了以后，抗

向达

1900—1966，历史学家，字觉明，湖南溆浦人。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5年到牛津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等职。在中西交通史、敦煌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

战时家里给我寄钱也越来越少。我在英国牛津学士毕业以后，美国、日本都有工作机会，我一直都没有考虑，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本来出国读书就是为了回国以后更好地工作。

李怀宇 你在英国接受的思想是怎样的？

杨宪益 我是比较自由主义，但是也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也看过一些马克思的著作。那个时期我也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我就参与地下党工作。我要求入党，但是不能一个人介绍，要两个人介绍，但有一个人去了外地，所以就没入成。

李怀宇 你在英国自由主义惯了，回国以后会不会觉得不适应？

杨宪益 刚解放的时候，我也比较左，但是不像其他人左得那么厉害。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都比较接受，比较激烈的运动我大部分都不大赞成。土改我没有参加，“三反”参加了，“反右”也参加了，因为各种原因，我“三反”也没有挨斗，也没有划成“右派”。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左的。那个时期我跟冯亦代他们一起，我还是比他们左一点。我太太不参加这些，但是讲话很自由，出乱子很多，“文革”时期也不知道安的什么罪名。本来中国人就会觉得外国人特别，容易出问题。所以她母亲觉得我们结婚以后，孩子会出问题。

杨宪益曾自嘲：“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婚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杨宪益和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红楼梦》，译作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丈夫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2003年，一本关于她的书出版，名为《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李怀宇 从英国回来时，国内正是战火纷飞，你们的经历是怎样的？

杨宪益 1940年，我们经过加拿大，走海路过太平洋回到中国。日本当时已经占领了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我们在上海登陆，船在租界旁边停了一夜，后来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们遇到了“二流堂”的一些人。我母亲

当时也刚从天津到后方，当时住的是罗家伦的房子。我跟戴乃迭1941年结婚，然后我们两个都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我们跟同事关系都很好。可是，当时学生中间有人当特务，我们追求自由，说话也不注意。她也说了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话，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可是她认为共产党有进步之处。我们订了一份《新华日报》，还收藏鲁迅的著作，他们知道了。过了一年，中央大学就把我们解聘了。第二年，我们就到了贵阳，她就怀孕，生了第一个孩子。她母亲当时在四川成都，说成都的医院比较好，所以就去了成都。第二年，我也要求调到成都教书，去了成都郊区的光华大学，也是从上海搬去的。在光华大学教了一年书，在那里收到了一些朋友的邀请，有一位朋友认识梁实秋，他当时是重庆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我们就接受了他的邀请，进入编译馆。抗日战争结束我们才离开重庆，跟着编译馆去南京。解放以后，我们在南京工作了一两年。1952年，北京有朋友邀请我们加入刚成立不久的外文出版社。那时候找外国人做外籍专家，头一批专家就找了我太太。

光华大学

1925年6月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所创建的民办大学。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学校一部分迁入四川，在上海的本部不再公开招生。本部于1946年复校。1952年在高校院系调整中撤校。

李怀宇 你们在一起翻译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杨宪益 我的翻译大部分是她打字的，她加工了。还有一些是她自己翻译的。后来她的中文也不错，白话文可以看，一些古典的东西还是要我先翻译，她加工。一些现当代的东西，就是她自己翻译。《红楼梦》的翻译也是我们合作。有的时候是我口述，她打字，她打字比较快。中国近代小说史，三天时间，我一边口述她一边打字。这样的情况不多，大部分都是我先打字，她对着原著看，然后再校改。

李怀宇 在生活中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杨宪益 翻译的交流我们用英文，但是在家里说话就是用中文，日常生活与孩子说话用中文，但是我们两个单独说话用英文。

李怀宇 你从小就喜欢英文么？

杨宪益 上中学以前就对英文有接触。我父亲过去在天津是中国银行的行长，我父亲的老婆没有生一个儿子，我母亲是姨太太。三四岁的时候也许我母亲教过我一些，后来家里请了老师。我对老师很不客气，气走了好几个

老师，最后一个老师跟我比较投缘。十九岁我到英国去。

李怀宇 在英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把中国的古典名著翻译成外文？

杨宪益 原先的时候都是翻着玩，没有想翻译整部著作。后来是到了外文出版社，刘尊棋是社长，制订计划要翻译一百种古典名著和一百五十本当代文学作品，我很高兴参加。《红楼梦》翻译了好多年，刚开始我翻译到八十回，翻译后四十回时，我们就进去了（进监狱）。回来以后，我又重新翻译了一遍，年头拉得很长。就是小说人物太多了，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难的。人物名字太多，有的名字我就翻译意思，有的我只翻译读音。

李怀宇 你太太也看原著么？你如何看《红楼梦》？

杨宪益 她也看原著，但是应该有困难。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大喜欢这本书，我一次也没有看完过。后来外文局让我翻译，没有办法了。翻译的时候，我喜欢贾宝玉、王熙凤、秦可卿，薛宝钗这样的人我就不喜欢。

1968年4月，杨宪益和戴乃迭遭遇牢狱之灾。在此后四年中，杨宪益与戴乃迭关押在同一监狱，但是彼此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情。戴乃迭后来说，她心想杨宪益不是外国人，可能没有问题，一直以为他会留下照顾家里。而杨宪益觉得戴乃迭是个老实人，又从来不过问政治，应该不会被捕。被捕当晚，杨宪益如常与戴乃迭对饮，获释回家时发现那瓶未喝完的酒依旧在茶几上，颜色已经变黄，四年伤心酒，难以再下咽。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一直没有人浇水，看上去还活着，杨宪益一碰，哗一下全变成了灰，坍塌下来。

李怀宇 “文革”中你们都进了监狱，这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样的？

杨宪益 “文革”时期，我们分开了四年。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酒，喝完酒她先去睡觉。到了晚上11点以后，他们就叫我上楼，我去了就发现有解放军在那里问我，要将我逮捕，也没有说理由。后来，也盘问过我一些问题，问我认识一些什么人，让我交代。可是一直也没有清楚地说我是特务，也没有说为什么逮捕我。四年以后就把我放了。过了几年，公安部又来人向我

道歉，说调查结果发现，我还做了一些好事。那些材料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

李怀宇 郁风的回忆文章说，你太太在监狱里，每天吃饭时人家给她发窝头菜汤，她都会说“谢谢你”。

杨宪益 在英国，“谢谢你”是常用的，在中国好像说“谢谢”很奇怪。

李怀宇 你太太的回忆录里说，你先被释放回家，她回来时你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她在桌子上看到一瓶白兰地，她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你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当天晚上你们又喝酒了？

杨宪益 当时同狱的“犯人”问我出去以后还喝不喝酒，我说要看给我多少钱。如果给我以前的工资，我就既喝酒又抽烟；如果给我工资少了，我也许只喝酒不抽烟。后来，差不多我们每天都喝一些酒，但是没有喝醉过。我从小就喝酒，我父亲就是洋酒也喝、国酒也喝，大人喝酒，我十多岁就开始喝一点酒。我太太以前很少喝，后来也喝一点。

李怀宇 现在医生不让你喝酒了，那每天抽多少烟？

杨宪益 一包到两包。以前搞翻译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我太太偶尔抽，不像我这么多，也不反对抽烟。我抽烟还是因为我太太，去英国以前我是不抽烟的，到了英国看到她抽烟，我请她抽烟，也就抽上了烟。

李怀宇 现在每天的生活怎么样？

杨宪益 现在也没有什么生活了，腿不好走，每天坐在这里看看电视或者看看书，朋友来了聊聊天。最近去过几次医院，去了医院以后也就不大想喝酒了。烟还抽，我抽的烟是最便宜的，据说对身体不好，不过我也活到九十岁了。

杨宪益和戴乃迭家的客厅，曾是朋友们欢聚的天堂，饮酒畅谈，吟诗唱和。1976年，杨宪益写了一首《狂言》：“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锏未残。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从此，这位翻译家诗情勃发，与打油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宪益与黄苗子唱和时，

撰有一联：“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启功认为对得不错。后来有心的朋友将杨宪益的打油诗搜集成册，名为《银翘集》。

李怀宇 听说家里原来是高朋满座？

杨宪益 到北京以后，我们家住在外文局的宿舍里。原来是普通朋友，坐牢几年，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李怀宇 我感觉你们这帮朋友在一起，很有魏晋风骨的味道。现在很少有不同学科的人一起聊天了，以前搞电影、美术、文学、翻译的都在一起。

杨宪益 对，我的朋友中，向达是研究历史的，搞美术的也很多，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黄永玉，我都认识。现在每个人都忙自己的，朋友间的聊天就很少。以前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就很多人，“二流堂”也很多人。我不属于他们的一分子。“二流堂”是他们在重庆搞的，我没有参加。郭沫若开玩笑起的名字。后来很多左倾分子觉得名字不好，里边的人也被划了“右派”，然后就完了。

李怀宇 跟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太太如何与他们交流？

杨宪益 一般她说话比较少，偶尔也说一两句。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人很好。

李怀宇 你是搞翻译的，为什么写起打油诗？

杨宪益 我小时候，练过一些古文，所以写起打油诗没有什么困难。在英国的時候，差不多中文就没有怎么看。回国以后，我认识一些老先生，他们喜欢在一起作诗，把我拉了去，他们写，我也跟着写。

李怀宇 黄苗子说你的打油诗非常好。

杨宪益 小的时候也认识一些写诗的同学，那个时候也想写一点诗，因为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也就没有写了。到了晚年，才开始写诗。

李怀宇 英文诗与中国的诗有什么不一样？

杨宪益 文字不一样，道理还是一样的。外国的格律诗也是差不多道理。

李怀宇 文学艺术到了最高境界也就殊途同归了。

杨宪益 写诗一般都是朋友写，我跟着一起写。我很少一个人写诗。黄苗子爱写诗，后来有朋友在香港给我出了一本诗集《银翘集》。

李怀宇 下一代跟你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很不一样，你们的国学功底都比较深，西方的思想也接触了不少。接下来的一代，国学的东西、西方的东西接触都少了。

杨宪益 现在留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接触西方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但是国学的东西少了，不同学科的人也很少有交流了。



沙博理

1915 年生于纽约。1947 年到上海，1963 年加入中国籍，长期担任外文出版局英语专家。

译有古典名著《水浒传》、中国现当代小说多种，著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我的中国》等。



沙博理

不辞长做中国人

我原来是美国人，“文化大革命”不是说你里通外国吗，你怎么没事了？我说一个笑话：“宋江救了我。”因为《水浒传》的英文翻译是很光荣的，我们外文局的派性斗争很激烈，一会他掌权，一会又他掌权，翻来覆去，不管谁掌权，都愿意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是他领导下翻译的《水浒传》，所以他们都没有麻烦我。

北京什刹海一带的小胡同里，外国游客络绎不绝。在南官房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一位九十多岁的外国人清早起来，在院子里打太极拳。吃过早点，他推开柴门，漫步在小胡同里，遇见邻居，用京片子打招呼：“您上哪儿？”“吃了饭没有？”

这位外国人不是游客，他在中国已经住了近六十年。严格来讲，他也不算是外国人，早在1963年就加入了中国籍。这位“华籍美人”的名字叫沙博理。这个名字是他在美国时的一位中国同学取的，意思是“博学明理”，“沙”是他英文姓氏的音译。

1962年，沙博理入住南官房胡同，从此就不愿离开。“现在小胡同的小孩都记得我，这叫人心很暖和，很高兴，所以我很愿意住在这里。”说起这儿的建筑，他富有深情，“北京老城的建筑反映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建筑这个

玩意儿很有美术水平，几百年都不变的。香山水流下来，到了什么湖什么湖，后来入了后海，到了什刹海，最后又到中南海，水一直流到通县。在北京这个比较干燥缺水的地方，大家都愿意住到离水不远的地方。”

沙博理还喜欢中国菜，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以前，每到周末会有许多朋友到家里来，做各式各样的菜，喝茶聊天。女主人凤子好客，在戏剧、电影、文学界都有朋友，当中有冯亦代和黄宗英、杨宪益和戴乃迭、丁聪和沈峻夫妇。戴乃迭和沙博理在一起讲英文。如今，客厅里挂着凤子的遗像，老朋友也走了不少人。和南官房胡同相隔不远的是小金丝胡同，杨宪益便住在那里，可惜凤子和戴乃迭这两位女主人都不在了。

离休以后，沙博理一直没闲着。除了翻译，他还行使政协委员的职责，常到全国各地考察，对一些问题提议案。前些年，因为凤子在文艺界的关系，沙博理也在一些电影里客串角色，演外国人。在表现抗美援朝的影片《长空雄鹰》中，他演一个美国驻朝鲜的空军司令，“简直坏透了，所以当时我就说再不演戏了”。后来，他还是在《西安事变》中演蒋介石的一个顾问。

沙博理手执烟斗，谈笑风生，行动矫健地带我在书房中看字画，在院子里看花草。问起他的养生之道，除了打了几十年的太极拳外，他说：“多动身体多动脑，不然就会生锈。但什么都不要太过分，也不要发脾气，不要闷，开朗一点。”

沙博理和凤子的女儿是医生，现和父亲同住，方便照顾。沙博理的外孙女和外孙女婿也都不爱住高楼，同住在四合院里。外孙女婿是美国人，说起外孙女，沙博理神采飞扬，详细谈起她在美国读小学又回中国读中学再去美国读大学的经历。“她在大学认识了一个美国小伙子，他是个中国迷。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给他们在华盛顿找了工作。可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外孙女就说想回家，结果自己跑回来，把美国小伙子也带来了，就在中国结了婚。”我笑道：“凤子把你这个美国小伙子迷住了留在中国，没想到几十年后外孙女又把另一个美国小伙子吸引到中国来。”沙博理说：“应该国际主义，管它哪国。”

1947年春天，沙博理带着两百美元，乘坐小客船从纽约来到上海。

此前，他在美国做过律师，当过高射炮兵，二战结束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在上海，沙博理向凤子学习中文。凤子

毕业于复旦大学，早期主演过《雷雨》、《日出》，抗战时转移到大后方从事新闻报道，抗战胜利后，她回上海主办进步杂志《人世间》。不久，沙博理和凤子相爱，1948年5月16日结婚。

李怀宇 1947年来中国以前，在美国的生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沙博理 我爸爸是律师，妈妈是全职太太，我们算低层的中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啦。我年轻的时候跟着爸爸做律师，但并不喜欢这个。20年代以后，美国失业率很高，那已经让我受了影响。我白天工作赚学费，夜晚上夜校学习法律。我就是想着年轻人不要靠父母，自己要独立。有一年我在一家大法律公司做徒弟，就发现这些人非常反动。虽然他们也是犹太人，但很赞赏希特勒，跟法西斯的思想很接近。所有这些都是跟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影响。

李怀宇 二战期间你曾参军，退伍后才学中文？

沙博理 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法律，毕业后当了三四年的律师。二战时我参军，搞高射炮。后来，美国当局需要一批军人去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我本来是申请学法文的，大学时候修的也是法文，后来去考试，虽然及格了，但由于那时候搞法文的人太多了，用不着我了，就安排我去学中文。

李怀宇 那时候对中文还一无所知？

沙博理 可不是，那时候从来没想到过会去学中文和中国文化。他们让我去，我就去了，去到大学里面，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中国同学，彼此就做了朋友。跟他们在一起学习，我的兴趣慢慢地就越来越大。除了语言，还有一些其他课程，一些中国人或在中国待过的外国人来跟我们讲课，我觉得有意思。这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不做律师了。

李怀宇 为什么不做律师了？

沙博理 我爸爸也是律师，我原来是跟他一块儿的，可他在二战的时候去世了，我一个小伙子，就没法搞了。此外，我也不喜欢搞法律，觉得很庸俗：人家给我钱，我就得帮人家说话，给人打官司。正好有了新的兴趣，喜欢上中国文化了，就索性扔掉法律，一心研究起中文来了。当时美国有个规定，你参了几年的军，回去念大学就给你几年的学费。因为哥伦

比亚大学的汉学家比较多，所以我就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在那里学了一年，然后我又去了耶鲁大学，还是继续学中文。在耶鲁大学里认识了好多中国同学，后来熟了，他们就跟我开玩笑说：“你学的那个中文到底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纽约的华侨多，但他们说的都是广东话，要继续学中文就应该到中国去。我就特别想去中国看看，可那时候没钱，正好发下来五百美金的退伍军费，我就拿去买票了。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只能坐船，买不起大客船的票，就坐一个小货船，大概三百美金。那船很小很慢，从纽约坐到上海，花了一个月。

李怀宇 来中国前，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吗？

沙博理 那时候我从书本上知道一些，也看报纸，虽然了解有限，但我不是完全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不过去上海我是谁也不认得。在耶鲁大学等通知我来中国的时候，就有个中国同学托我把礼品偷偷地通过国民党的海关转送给他爸爸和舅舅。我到了那儿，中国人很热情，对我好得不得了，就让我住他们家。他们家有一个人会说一点英文，我那时候不会说上海话，普通话也就会说一点。我在耶鲁大学还有一个演戏剧的中国同学，我们很要好，在大学他教我一个小时的中文，我教他一个小时的英文。我来上海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有个朋友，叫凤子，能教我中文。我到上海才三天，就去找她了。

李怀宇 第一次见到凤子，觉得她漂亮吗？

沙博理 我觉得挺好看的。怎么说呢？要说她美，她也不是非常美，但她表情很有神，感情很热烈，叫人很喜欢。

李怀宇 凤子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沙博理 那时候她比我还大两岁。她当时在做地下党的工作，编了一个杂志叫做《人世间》，还演过很多戏。她爸爸是个老学者，所以她的家庭教育很不错，她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文言功底很深。大学的时候，她有一个老师是戏剧家洪深。40年代，洪深把外国的话剧介绍到中国来，这以前中国的戏剧都是唱的，没有光说话的，而他觉得外国的话剧很有意思，就让那些学生将外国戏剧翻译成中文。凤子是他的学生，也参加这个翻译工作，洪深那时候发现凤子当演员很有希望。后来毕业了，她演出了曹禺的戏剧《雷雨》，在抗战的时候比较出名。抗战期间，凤子一直在内地演戏。后来回到上海，就又恢复写散文、编杂志。

李怀宇 那次见面后，你跟凤子就开始交往了？

沙博理 我们见面后，印象都挺好的，都觉得还可以。只是说话不太方便，她的英文水平跟我的中文水平差不多，她是破英文，我是破中文，反正谈着谈着就明白了。她这人也很热情，非要带我到上海一个小饭馆吃有特色的菜。后来我们就做了个决定，用中英语言对照来互相学习。那个时候就开始交往了，一个星期见两三次面，慢慢地时间长了，我们就好了。这样我才了解她所从事的工作，我帮了一点忙，后来也认识了她工作中的一些同志。通过她，我理解了很多事，比如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上海，也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很残忍，老百姓苦得不得了。很多农民打仗的时候流亡到上海来，没有工作没有钱，就睡在地上，饿死、冻死的不计其数。每天早上都来一辆大垃圾车，把这些尸体运到郊区烧掉。我这人有正义感，觉得这样太坏了。后来同志们让我慢慢明白了，中国只有革命才行，没有别的办法，到底由谁来领导，这我也慢慢清楚了。

李怀宇 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了解吗？

沙博理 也不是完全没有。当时美国青年人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反希特勒、反墨索里尼，这些我在来中国之前就很清楚。我在美国的时候也跟一些青年搞搞地下进步的事，什么阶级斗争啦，这些词我们不会说，可意思都是很明白的，有钱的人欺负穷人。所以这个理解的过程，并不是太困难。

李怀宇 凤子一个女孩子搞地下工作，你当时怎么看？

沙博理 我很佩服她，在爱她之前我就尊敬她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很了不起。

李怀宇 1948年5月16日就结婚了，当天请了很多朋友？

沙博理 好记嘛，“5·16”（大笑）。有几百人，都是文艺界的。这是冯亦代调皮，开玩笑害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跟凤子好，可我们还没定日子。冯亦代他自己说了，为了五十块美元的奖金，把这个消息卖给报纸，就给刊登了。结果文艺界的朋友就都来问我们了，要我们说具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样就把我们弄得很被动，所以只好赶紧找一个地方把大家给请了。

凤子从事地下工作多年，当得知国民党准备逮捕她时，带着沙博理离开了上海，本想到解放区去，后滞留在北平。不久解放，凤子和沙博理从此定居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沙博理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此后将大量中国作品翻译成英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水浒传》。

李怀宇 后来你跟凤子离开上海去了北平？

沙博理 我是1947年4月跟凤子相识的，到1948年5月就结婚了。那时候凤子还在搞《人世间》，国民党的特务掌握了这些情况，把她列入黑名单，准备要抓她。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决定离开上海。我们想去解放区，想到延安去，组织上也批准了，还托给我们一个美国女青年，叫寒春，她才十几岁。这样我们在逃亡路上就多一个责任了，还要管她，简直就是瞎子领瘸子走路了。

上到北平，就等着人来领我们到解放区去，拖了很长的时间才来人。我们先从北平去到天津，然后就开始琢磨怎么个走法：乘火车还是乘公共汽车？后来组织上决定让我们坐公共汽车到济南，再从那儿转到解放区。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就演了一出戏。我是一个美国大律师，要去济南；凤子扮演一个丈夫刚去世的东北寡妇，也是要到山东某个地方去。总之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能暴露，这个是很荒唐的（笑）。

我们头一天离开天津，就被一个国民党宪兵站发现我们是假冒的。寒春原来有肝炎，刚刚好，她去解放区怕没药，就随身带了个大麻袋，里面装的都是药。国民党看到这么多药，就认定我们是走私的。那时候走私的很多，是要给他们钱打点的，我们不懂这个行情，事前也没人跟我们说，所以没给他们钱。他们就把我们拦下了，但话说得很客气，要我们先回天津找美国领事馆写个条子，明天再来。这就完了，我们总不能让美国领事馆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只好回了天津，在那里住了一两天，组织上觉得就算了，太危险，你们别玩这个命了，你们就回北平吧，我们把解放区给你们送到家门口去。后来果然是这样，很快就解放了。

到北平后，凤子马上就有工作了，我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律师，跟社会主义中国格格不入，没法给我安排。过了一两个月，我们认识的文艺界的

一个朋友写了一本书叫《新儿女英雄传》，他们说，这个语言比较简单，让我试着翻译，我在家没事，就搞翻译了。正好有一天，有个领导来看凤子，发现我在翻译这个，他看我喜欢翻译工作，当时也没说什么，第二天就通知我去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了。从那时候起，我就有工作了。外文出版社成立后，我就调到外文出版社去了，后来出了一个刊物，叫《中国文学》，杨宪益、戴乃迭也在那儿，我们一块儿搞翻译。

李怀宇 你看了《新儿女英雄传》，感觉怎么样？

沙博理 文字也不复杂，不是那么文言，此外，它写一个斗争，面对坏人，很不容易。我也喜欢看打仗这些玩意儿，所以我很有兴趣。50年代，我翻译的书拿到美国去，还是被纽约正式的出版社所接受的。这不错了，算是一个突破。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并不愿意将红色中国的出版物引过去。

李怀宇 从《新儿女英雄传》开始，你就大量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了？

沙博理 对，那以后，我就搞翻译了，主要是文学作品。开头就是搞所谓的“革命文学”，像《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我也很喜欢，因为很有斗争性。后来也让我翻译五四时候的作品，茅盾、巴金。再后来我就在《中国文学》杂志社了，在这里接触到的就多了，小说、诗歌、戏剧，什么都有。有时候，我自己也喜欢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找一两个片段来翻译。真正开始翻译古典文学是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上面问我愿不愿意翻译整个的《水浒传》，那我当然很高兴了。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弄得乱七八糟，就被打断了，所以我翻译《水浒传》不是连着的，做几个月又停几个月，直到1975年才把它完全翻出来。我原来是美国人，“文化大革命”不是说你里通外国吗，你怎么没事了？我说一个笑话：“宋江救了我。”（大笑）因为《水浒传》的英文翻译是很光荣的，我们外文局的派系斗争很激烈，一会儿他掌权，一会儿又他掌权，翻来覆去，不管谁掌权，都愿意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是他领导下翻译的《水浒传》，所以他们都没有麻烦我。

李怀宇 在你之前，赛珍珠已经翻译了一个版本。

《新儿女英雄传》

长篇小说，袁静、孔厥著，叙写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自卫的英雄事迹，塑造了黑老蔡、牛大水、杨小梅等英雄人物形象，既有英雄事业，又有儿女情长。

赛珍珠

1892—1973，美国女作家，生于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母长期侨居中国。1922年起从事文学创作，作品大多取材中国。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沙博理 基本上是用我这个。我们编辑觉得给外国人看的话，这个故事是没有结尾的。他们就想了一个妙的办法，原来有金圣叹的七十回，后来用一百回加上去，一直说到最后宋江死了，就变成一个专门为国外介绍的版本，在国外很受欢迎。

李怀宇 你什么时候开始了解中国的古典文学的？能阅读文言文吗？

沙博理 我是看了《水浒传》以后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至于阅读古文，除了《水浒传》，我看《红楼梦》也可以，《三国演义》就不行。《水浒传》里面对话很多，跟现在区别也不大，反而是它的思想感情难把握，这是一个古代的社会，他们穿什么衣服，拿什么武器，我都要琢磨。

李怀宇 凤子对你的翻译事业有没有提供过帮助和建议？

沙博理 她对我的帮助特别大。那时候，领导叫我不要上班了。因为我们单位来了很多大学毕业刚分配过来的年轻人，他们有问题就老过来请教我，后来就发现我自己的工作时常被打断，没法一心一意做了。领导就叫我在家里翻译，开会的时候再来。这样我跟凤子在一块儿的时间就比以前更多了，她的父亲能写文言文，她的文言功底比较好，所以很多问题都可以问她。不仅是词儿，而且人的思想感情，她也能给我解释。那是中国几百年前的东西，我不通过凤子，理解起来确实很困难。不但我，可能一些中国的青年看那个东西都不一定能完全理解。

这对中美合璧的夫妇，彼此的感情一次次遭受不同困难的考验。抗美援朝时，凤子曾到前线访问，差点被炸死，一度使她对丈夫的感情蒙上阴影。“文化大革命”当中，凤子曾有四年时间受到审查，沙博理始终对她不离不弃。

李怀宇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你跟凤子一起参加了？

沙博理 这是刚解放的头一件大事。我们都去看了，在观礼台看阅兵。

李怀宇 听说凤子当时激动地哭了？

沙博理 她太感动了。凤子是个女的，感情很丰富。看到几十万人在呐喊欢呼，这个场景不但是她，连我都动感情了。她哭了也是高兴啊。

李怀宇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反美的情绪很高，凤子也到过抗美援朝的前线，你当时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沙博理 当时的反美情绪是很高涨，抗美援朝的时候，凤子还去过朝鲜。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理解水平：无论美国还是中国，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持哪个阶级的观点，中国反美，反的是美国帝国主义，不是美国人民。侵略朝鲜的是美国帝国主义，不是美国人民，当时我也是反美国帝国主义的，这没什么。

李怀宇 凤子去了朝鲜，同行的演员有人牺牲了？

沙博理 凤子跟一个慰问团一起去的，其中有个天津的相声演员，在美国的飞机扫射下牺牲了。本来凤子也差点死了，多亏有个小士兵把她推倒在地上，压在她身上保护她，子弹离她的鼻子就差那么点儿，很危险。她回来后，心里就很矛盾，对美帝的仇恨很深，偏偏丈夫又是个美国人，所以有一两个星期我们关系很窘。后来是她的组织来批评她，劝说她，说你要反的是美帝，不是你老公。她后来明白过来了，我们的关系就好起来。

李怀宇 1949年以后，凤子从事什么工作？

沙博理 她加入了戏剧作家协会，做了《剧本月刊》的主编。这个杂志里收集了很多新剧本，在全国各剧团都有影响力。她是党员，所以同时还做些组织工作，帮一些年轻作家写剧本，介绍、修改什么的。凤子这个人很热情，年轻人有什么工作、生活困难都找她。

李怀宇 后来凤子受到了冲击？

沙博理 “文化大革命”，江青领导的“四人帮”搞了她。江青解放前在上海做演员，凤子那时候也在上海做演员，相互知根知底。凤子非常了解江青这个人，包括她以前的生活和男女关系。所以江青一上台首先就打击这些人，胡编乱造给他们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凤子也是受打击的人之一。她后来虽然没事了，但这个过程中是很苦的。她受到审查，还进了“五七干校”，别人都不太严，周六周日还可以回家，但她不行。这么一来，差不多四年，我们都很少见面。她回不了家，我想我还可以去看她，可同志们又都劝我别去，说那些家伙都左得一塌糊涂，我一个美国人跑去干校看她，那些人就更乱说了。

李怀宇 你们的女儿叫亚美？

沙博理 亚洲和美洲。其实更早的时候，因为南方都管小丫头叫“阿妹”，我们也就叫她“阿妹”，后来就变成“亚美”了。我们夫妻又是亚洲，又是美洲，这正好又合了亚洲和美洲的意思。

李怀宇 那么，当时是你在照顾女儿？

沙博理 她那时候还是个学生，刚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为我们就一个孩子，所以分配的地方离家还不太远。她分配在通县造纸厂，这样一来，她就成了工人阶级了（大笑）。那时候交通没现在这么方便，离家说近也不近，所以她很少回家，顶多一个假期回来一次。我还让她到干校去看她妈，她也去了一两次。

李怀宇 凤子后来有没有跟你谈她在“五七干校”时候的经历？

沙博理 那当然，谈了很多。

李怀宇 她那几年应该是很难受的。

沙博理 她觉得很冤枉。她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结果被江青乱扣帽子。

李怀宇 郁风在上海也认识江青，“文革”中被关了七年。

沙博理 是啊，凤子、郁风、苗子都太了解江青了，知道她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就都没好果子吃。

1963年，沙博理的母亲从美国几经辗转来到中国，受到沙博理夫妇和好友的热情接待。看到沙博理过得很幸福，母亲打消顾虑回到美国。这一年，沙博理加入中国籍。1971年，沙博理回美国看望母亲，颇费周折。在中国的时间相当于在美国的两倍，沙博理的生活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李怀宇 到了中国以后，你和美国家里联系多吗？

沙博理 我爸爸去世了，我还有一个老妈。我们可以通信，也可以打电话，至少保持着这种联系。我也跟她谈了工作、生活都不错，她半信不信。1963年，她偷偷来中国看我。很费周折，先取道日本，再转到香港，然后到深圳。我们夫妻去深圳接她，就在那个罗湖桥上，她站在那头，我们站在这

头，这个场面我至今都记得。后来我们把她带到家里住，把床给她睡，我们睡地板，那时候我跟凤子的女儿已经有十来岁了。我妈妈一来，同志们、朋友们都热情得不得了，请她吃饭，陪她聊天，我们单位还安排人带她出去旅行，苏州、杭州都去了。这样以后她心里就放心了，知道我在这里确实很快乐，就不坚持要我回美国了。

李怀宇 她大概住了多长时间？

沙博理 大概住了有一个月，我们也留她多住些日子，但她一个老太太，对我放心了，又牵挂着美国那边的亲人朋友，所以住了一个月就走了。

李怀宇 你在美国还有没有兄弟姐妹？

沙博理 就一个妹妹，比我小七岁。

李怀宇 你母亲不跟妹妹一起住吗？

沙博理 美国人独立性很强。我母亲七八十岁了，我妹妹几乎是求我母亲跟她一起住了，但她不肯，就是坚持要一个人住。不过她住的地方离妹妹家也不远，还是可以经常照顾她。我回去探亲的时候问我妈：你干吗不住妹妹家啊？她说：我住你妹妹家里要考虑的事情太多，比如想着你妹夫要上班，就要早点吃饭。不像自己在家，什么都不用考虑，随便穿什么衣服，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况且这里还有其他老太太做伴，也不寂寞。我听了，觉得也有道理。

李怀宇 那时候有没有想着回美国看看？

沙博理 我1963年入的中国国籍，拥有了中国的护照。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我去美国探亲是一点限制都没有的，什么时候去美国都可以，没去的原因是害怕回不来。因为当时美国国内还有些势力在反华，我回去了是作为中国公民去美国的，难保他们不借口说我是什么中国来的特务扣住我，我怕牵扯国际的问题，就放弃了。

李怀宇 1963年你加入中国国籍，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沙博理 其实很多年前就在想了。那个年代忙得不得了，忙着运动，忙着打仗，抗美援朝，还有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再加上美国特务的嫌疑，根本没时间去考虑国籍的事情。后来我妈来了，看我们都挺好，不反对我在中国了。当然我不完全是因为这个问题，可是有这么一个理由，我自己下了决心，

这辈子就在中国，不回美国了。后来我就申请了，也给批了。

李怀宇 你回国去看你母亲也是等到中美关系好转以后？

沙博理 那当然，在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

李怀宇 那时候还要取道加拿大才能到美国？

沙博理 有一次，我单位一个同事看报纸，说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已经入了美国国籍，回国来看他老母亲。同事就跟我说，你看人家入了美国国籍的能回来看自己的老母亲，你入了中国国籍的怎么就不能回美国去看你的老母亲？（笑）这话有道理啊。那个时候中美还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政治空气明显好转了。我拿着中国护照，但还需要一个美国签证。我就想好了，先到加拿大去，渥太华离纽约不远，我可以在那儿等着我妈，他们可以开辆车过来看我几个钟头。到了驻加拿大的美国大使馆，我就拿我的护照跟他们要一个签证，说要去纽约看我妈。那个办事员就慌了，他还没遇到过一个拿中国护照的美国人要到美国去探亲的，他说他没这权力，然后就电话电报来来回回地去问。到最后他不能不给我了，因为正好那个时候中美建交了。但也没马上办下来，我心里还是没底，我在那儿等了一个星期，只好让我妈先来加拿大，过了两三天她才回去。她回去以后，我才拿到了美国签证，这才去了美国。

李怀宇 1979年，你带了凤子去美国。

沙博理 那时我已经是第四次去了，她是第一次。那个时候国务院规定我是外国专家待遇，可以两年去一次，路费都由国家出。这个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我是中国公民，但我的待遇还是按外国专家算的。外国专家来华建设，可以两年回一趟家，我也享受这个待遇。

李怀宇 每次都是住一段时间就回来？

沙博理 我是离休干部，探亲不受限制，想留多久就多久。但是，美国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也发生了变化，跟以前的老朋友老同学都谈不到一块儿。而且，我对中国的感情和兴趣更多。刚过去的时候还有点意思，可两个星期下来，我就烦了，就提前回来了。

李怀宇 1983年离休后，你当政协委员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沙博理 这个主要是组织上分配的。政协分了好多组，大家各司其职。

我被分到新闻出版组，现在还在那儿。我们虽然没权，但影响很大。我们讨论国家大事，反映我们的看法。有时候为了反映情况，我们还要下基层去实地了解。政协领导每年都要安排去全国各地视察，做调查研究，我们自己也可以申请去。二十多年最少去了十七八个地方，全国东南西北都有。

李怀宇 中国的生活方式你习惯吗？

沙博理 在中国当然跟我老家不一样，中国这边电器很少。但我这人没什么特别要求，只要房子干净安静，朋友有空来坐坐，我就很满意了。

李怀宇 你在中国住了快六十年了，比在美国的时间还多了一倍，见证了中国六十年来的变化。作为一个从小接受美国教育的人，你怎么看中国这些年的变化？

沙博理 我觉得很了不起。1947年我到上海，那时候的中国那么穷，那么落后。一年年过去，到现在这么一个水平，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在世界上没有了。虽然毛病缺点不少，但总的来说，很佩服了。



吴冠中

1919年生，江苏宜兴人，画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

先后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和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回国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多所高校。

1990年获法国文化部最高文艺勋位，1993年获巴黎市金勋章，2002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



吴冠中

东西艺术高处相逢

过去我也反对，觉得绘画不需要文学，但是现在我想法不一样了，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关键。我们中学时代都喜欢丰子恺，雅俗共赏，但是后来学了艺术，就觉得丰子恺画得很简单，不是美术，现在看了这些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东西，再看丰子恺，觉得很亲切。

吴冠中先生的家简朴如斯，使我大感诧异。听了我的疑问，吴冠中满不在乎地说：“生活上我是完全不管。”然后急切地问我前一天拜访过的杨宪益先生身体如何。“杨宪益非常有水平，而且人品很高贵。他的诗好像是打油诗，实际上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英国美术评论家叫苏立文，跟杨宪益当年是同学。苏立文去看杨宪益，杨宪益把我送他的一张画给苏立文，苏立文一看，觉得这张画价钱太贵，不肯要。”

吴冠中温情脉脉地回忆老朋友，而提到讨厌的人和事，顿时给人怒发冲冠之感。他说：“我这个人疾恶如仇，有一些讨厌的人就是非常讨厌，而且公开地骂。当然喜欢的人就非常喜欢。”正因这种性格，多年来，“笔墨等于零”、“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的吴氏话语常常为人提起。我问：“有没有留意这些观点引起的争论？”他说：“我心里很坦然，我觉得我讲得非常对，

都是真话。”我坦率地提出当年他花精力去打《炮打司令部》伪作官司是浪费时间，他连声称是：“那是很荒唐的官司。端木正是我留法的同学，也劝我别打这个官司。当时心里老不平，老觉得这个官司讨厌，所以就写了《我读石涛画语录》。”

吴冠中似有诗人情结。闲谈中，他说起自己的老师吴大羽晚年喜欢写诗胜于画画，又随口背出杨宪益的打油诗，和我品评杨宪益与聂绀弩、黄苗子、邵燕祥诸家诗的特色。“美是心灵的灵感，像诗一样。画家就像诗人，但是社会不需要诗人，因为诗人没有用的，诗人不会干活，社会不培养诗人。诗人自己有才华，努力创造了诗，震撼了社会，社会才重视诗人。诗人很困难，社会开始是不要他的。绘画也是这种情况，比如郎世宁在宫廷画点东西，就要你，如果不会画，就不要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工’的。本来是创造很高文化的，结果是‘打工’的。”他谈话的神情如在吟诗。“我现在更重视的不是技术，我觉得技术容易学，三年四年五年就可以学了，但是那种灵性、灵感、境界，往往是不容易达到的。技法可以一步步往上面走，每一个阶段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进入殿堂，这个殿堂是人文的殿堂，也可以说是诗的殿堂。”

曾经以“要艺术不要命”命名文集，吴冠中现在的生活却不紧张，上午看点书，下午画点画，偶尔接待客人。他介绍，离家不远处有一个地方画大画：“年纪大了，画大画已经不实际，主要是思考一些新的想法，什么没见过的，什么没想过的，不再抄袭，不停地想。”而对当下门派纷纷扰扰之争，他笑道：“我反对画家立门派，这些东西都是人为操作的。风格就是流派。风格是作者的背影，自己看不见。”

1935年夏天，吴冠中为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电机科学生，在全省大中学生暑期军训中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朱德群相识，从此决心学画。1936年，吴冠中违抗父命考入杭州艺专预科。吴冠中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期间，学校人才济济，教师有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学友则有朱德群、赵无极、苏天赐等。

李怀宇 在广州，我采访过谭雪生、徐坚白夫妇，谈了许多当年国立艺专的事。在香港，罗孚先生谈了林风眠先生晚年的情况。国立艺专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像你、苏天赐、朱德群、赵无极。我一直想在国内采访两位先生，一位是你，一位是苏天赐先生。

吴冠中 苏天赐刚过去了。

李怀宇 2006年8月25日，我在南京，一清早就给苏天赐先生家里打电话，一位女士接电话，很有涵养地告诉我：苏先生在医院里做化疗，希望等他身体好些，到家里坐坐。后来朋友告诉我，当天下午苏先生就去世了。

吴冠中 哎呀，可惜！

李怀宇 你是十六岁在暑期军训时认识了朱德群，到国立艺专参观之后，才决心学画的？

吴冠中 对，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朱德群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我在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当时规定，高中一年级读完了，要搞军训，全浙江的学生就在杭州集合混编，我和朱德群编在一班里。我们俩排在一起，因此整天接触，什么事情都交流，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彼此很了解，友谊很深。有一个星期天，他就说：“我带你去参观参观我们学校。”参观以

朱德群

法国华人画家，1920年生于安徽萧县，1935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1949年随中央大学迁往台湾，1955年赴法国定居。1997年当选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是法兰西艺术院的第一位华人院士。

后，我大吃一惊。我在中学里，除了主要功课以外，受鲁迅的影响，爱好文学，对美术兴趣一般。但是到他们那儿一看，那些老师、同学的作品陈列出来，油画、水墨、素描，哎呀，觉得美极了。因为我在杭州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么美的东西，好像孩子诞生以后，一睁开眼睛，这个世界是那么美丽！一见钟情，很快就入迷了，后来念念不忘。朱德群看我这样，就说：“你以后要学美术。”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因为我家在农村，比较贫穷，艺术学校收费比较贵，是贵族学校。我认为不可能，但还是爱，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爱。后来还是改了，不管家里反对也好，哪里反对也好，不顾一切，一定要学美术。浙江大学附设工业学校已经读了一年，我丢掉不要，重新考国立艺专，从预科读起。这样我就和朱德群在一起了，原来我们是同级，因为我要重新读起，就比他低了一班。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弟一样，他从那里学到的东西告

诉我，我学到的告诉他，两边学东西，互相交流。

后来学校搬了，我们逃难，关系一直很好。到他毕业了，学习成绩不错，在学校留下来当助教。我毕业以后就在重庆大学建筑系当助教，那个学校和国立艺专很近，我们来往很多。那时候我学法文，他也学法文，关系一直不断。后来我考到公费留学，到法国去。他后来到台湾去了，再到巴黎去，这样就没有联系了。一直到几十年以后，1981年，我参加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非洲，途经巴黎，就见到朱德群了，在他家里住了几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们过去学习的老师都是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同样的老师，学的东西一样，观点一样，看的画册一样。我们当年观点、趣味一样，过了几十年后，到了巴黎，他带我去看那些新的东西，我们的观点还是很接近。

李怀宇 现在回想当年你在国立艺专，在美术上有什么学习心得？

吴冠中 中国的美术中，一种是沿袭传统，老一套的东西，这是没有前途的，这种东西可以说是花开花落，陈陈相因，一定会淘汰。这不改变的话，艺术不得了。所以五四以后，林风眠、刘海粟用西方艺术来改变，另一方面，保守势力、画老的东西还在。林风眠的观点是把西方的东西开放，而且中西结合，林风眠是搞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刘海粟也比较开放，愿意接触西方的东西。徐悲鸿是完全反对西方的现代绘画，他学的是老的，他学老的也不要紧，艺术其实不分新旧，只有好坏，古画也有很好的，不一定新的就是好。但是他的观点是要写实，不写实的東西他就看不惯，公开反对现代的绘画。他反对可以，但是他回来以后，在政治上占了很大的优势，跟国民党的要人有很多关系，他的力量比较大，因此推广他的现实主义，压制现代绘画。

我在中学时代看报纸，报上经常有徐悲鸿骂刘海粟，刘海粟骂徐悲鸿，中间徐志摩也参加，但是徐志摩的观点比较新，要开放一些。这种情况下，刘海粟的上海美专是私立的，比较开放，影响好像很大，培养了很多学生。刘海粟的艺术很新，但是功力不行。更开放的是在杭州的国立艺专，林风眠起到主要作用。因为是国立学校，有经费，教授一个月三百块大洋——当时的画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可以请最好的教员，比如请吴大羽、潘天寿，高价请法国、英国、俄罗斯的教员，所以杭州艺专很傲，瞧不起其他的东西，

觉得徐悲鸿的东西很幼稚，格调很低。所以杭州艺专的老师和学生，与徐悲鸿之间，可以说一切观念都是完全敌对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去看了杭州艺专，觉得很美，就改变了人生。如果我不是去参观杭州艺专，而是参观徐悲鸿的展览，或者是苏联的展览的话，我不会改行，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技术，现代艺术是审美，审美与技术是不同的，是杭州艺专的美吸引了我。

李怀宇 你觉得当时这些不同艺术观念的碰撞，对后来中国美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冠中 今天我明白了，过去我们中学时代，美术、音乐、体育都没有人关心，中国的美术水平也很低，老一代的科学家或者学者，有的人是“美盲”，相当多的人从来不接触美。现在提倡“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这是很好的。美是提高人的精神、思想质量的。道理大家很清楚，但是实际上一般民众中间对美的欣赏水平很低，看不到哪些是美，哪些是丑。比如说，我有朋友是很有成就的医生，但是到他家里去，那里陈列的美术作品、工艺品非常庸俗。这种情况很普遍。早些年，有些作家、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去参观博物馆。西方的博物馆那时候抽象的东西比较多，西方的作家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我们的作家一窍不通。这是他们自己讲的。我们对美完全没有理解。

这里面，徐悲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因此他的力量很大，现在还在提倡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等，但是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什么样都可以。现在的形势我看哪，又把现实主义拼命在抬，画那些革命的题材，这当然可以。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美术的功能像诗一样，当然可以画插图，不过这不是它的主要工作，它主要的任务是创造美，创造精神世界。但是现在政治上也好，社会各方面也好，没有重视这一点……徐悲鸿可以称为画匠、画师、画圣，但他是“美盲”，因为从他的作品看，他对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画《愚公移山》，很丑，虽然画得像，但是味儿，内行的人看，格调很低。不过他的力量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审美的方向给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苏联的影响，苏联的东西还是二手货，从欧洲学来的。这些东西来了以后，把中国的审美方向影响了，但是这几年来，年轻人不管了。

现在中国在美的道路上要创新。今天报纸上说要“创新”，明天报纸上说

要“保护传统”，读者闹不清楚，人云亦云，不知往哪里走。传统也有很好的东西，但是祖宗的东西是放在博物馆里的，如果要临摹、抄袭，我们就受害了，因为画家要创新的话，要推陈出新，要“推”！旧的不去的话，新的不会起来，现在要创新的话，必须要斗争。文化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和谐是不行的，要创新必须要斗争。有人讲得很幼稚：“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在传统的基础上是不能创新的，在古人的笔墨上创新，那是很荒唐的。现在讲“和谐”，当然，政治安定需要和谐，人与人相处需要和谐，这是对的。但是，文艺的进步、科学的进步，讲和谐是进步不了的。和谐是大家你好我好，进步、创新是个斗争，是个战争，你叫大家和谐就是大家休息。

李怀宇 国立艺专的老师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在艺术上那些创新的想法，后来遭到什么样的斗争？

吴冠中 他们是很孤立的，有蔡元培的支持，但是当时徐悲鸿他们的力量很大。解放以后，讲一切为政治服务，这种情况下，林风眠、吴大羽他们生活都不行了，很惨很惨的。

李怀宇 幸亏林风眠晚年去了香港，艺术上又有新境界。

吴冠中 他到香港很不容易，躲在公寓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因为他害怕了，跟社会的接触很少。他走在街上，人家说：“你是林风眠先生吧？”他说：“你看错了。”

李怀宇 现在回头来看，国立艺专培养了一批后来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艺术家，其中有什么秘诀？

吴冠中 林风眠在教学上重中西结合，在宽松的气氛下才能培养出这么多学生来。徐悲鸿那边是一个模子教过来，所以出来人才就有限了，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才都是杭州培养出来的？”这跟林风眠的思想还是有关系的，跟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也有关系。但是国立艺专作为当时唯一的一颗种子出来，很快就夭折掉了。

1942年，吴冠中自国立艺专毕业，在重庆某小学做代课教师，后在重庆大学建筑系任教。1943年，吴冠中与重庆女子师范学生朱碧琴由相识而相爱。1946年7月，吴冠中考取“中法交换留学”公费，

是年冬，与朱碧琴在南京励志社举行婚礼。1947年，吴冠中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留学，其时朱碧琴怀孕，留在国内。在巴黎，吴冠中师从法兰西学院院士苏弗尔皮，与潘玉良、熊秉明、赵无极多有交往。

李怀宇 你在国立艺专的时候已经对法国的艺术很喜欢了？

吴冠中 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林风眠、吴大羽他们都是法国来的，图书馆的画册通通是法国来的，所以当时我们说：“我们是法国艺术学院的分校。”（笑）我到了法国以后，并不觉得新鲜，因为本来学的就是这些，学得很顺，没有觉得差距很大。我在国立艺专是学法文的。

李怀宇 你去法国留学时，同去的有熊秉明？

吴冠中 熊秉明跟我一起去的，我们同一班考试。他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到了巴黎之后，他很喜欢美术。他是熊庆来的儿子，熊家的墓在云南，熊秉明的墓好像也要搬到云南去。

李怀宇 在法国时看到的艺术跟原来在国立艺专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吴冠中 基本上一样。不同的是在国立艺专看印刷品，到巴黎看真迹。在国内大部分印刷品都看过，现在是看原作了。我到巴黎，三天之内，先把主要的博物馆看一遍（笑）。

李怀宇 当时巴黎已经是欧洲艺术的中心了？

吴冠中 是的，抽象派已经抬头了。那时候，法国人瞧不起美国，因为美国的东西都是从法国去的。我的同学中有很多美国人，拿着照相机，很神气，但是学习不行。现在美国艺术恐怕好一点，我在法国的时候，美国艺术根本就没有地位。

李怀宇 后来你换了一个好老师——苏弗尔皮教授？

吴冠中 对。我在国内的时候，觉得应该从基本功学起，于是到了巴黎就先学学院派的东西。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学到，因为那套东西陈旧得不得了。法国也是这样，老的教授都不太行。我就换了一个

熊秉明

1922—2002，云南弥勒人。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1947年赴法留学，曾在瑞士、法国任教。在雕塑、绘画、书法、哲学、文学等方面均有建树。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颁发的棕榈骑士勋章。

老师苏弗尔皮，这个老师我很满意，他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跟他上课，他的几个观点使我很惊讶，他说：艺术有两路，一路是小路艺术，使眼睛舒服，大路艺术是感动心灵，不仅好看，而且震撼心魂。现在的画家都是觉得怎么样好看，他讲这话是了不起的。他区别作品，一种是美，一种是漂亮，我们习惯说：“很美！很漂亮！”他认为美与漂亮不是一码事，漂亮是表面的，小白脸啊，搽了口红啊，是漂亮，不是美。美是构成，整个结构美。而且他的画也很好，气魄很大！跟他在一起，很有好处，他每一次讲话，都指出你的要害，他一看你的画：“漂亮啊！”这是贬义的话。他教的不是方法，而是观点，在观点上启发。比方说有一次，有一个女模特，个子比较高，上身比较长，头比较小，坐在那里，他问学生：“你们看对象是什么感觉？”学生都说不出来。他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笑）他这种启发给人很大影响。

李怀宇 你还寄了一部分公费回到家里？

吴冠中 对。因为家里很穷，尽量寄一点钱回来，想办法把钱夹在明信片里，挂号寄回来。我去法国的时候，我太太怀孕，回来时孩子已生出来了。

李怀宇 在法国时跟赵无极交往多吗？

吴冠中 交往多。他有才华，我们在杭州时就是同学。赵无极的情况不一样，他是花花公子，有钱，很爱交际。他们夫妻两个一块儿去，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出国考试非常严格，像考状元一样。后来网开一面，自费考试。赵无极的父亲有钱，帮过陈立夫的忙，所以赵无极夫妻两个出来是陈立夫帮的忙。离婚以后，他后来娶了一个香港的电影演员。

赵无极

法国华人画家，1921年生于北京，1935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1948年偕妻子赴巴黎留学，后到世界各地游历，画技渐成。2002年当选为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并获荣誉勋章。

李怀宇 听说赵无极最新的太太是法国的文化部部长，是真的吗？

吴冠中 不是，是法国一个博物馆的管理员，不过这个太太很厉害，现在完全控制了赵无极（笑）。

李怀宇 我听郁风讲过潘玉良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她画画的故事。

吴冠中 潘玉良我很熟。她是很好的人，但是画卖不掉。我们在吹“世界名画家”呀，像这样的画家在巴黎不知有多少。客观地讲，潘玉良的画不

算好，格调不高，她和常玉比，差很多。常玉的画相当不错，有格调，有性格，我觉得中国人画油画到西方去的，常玉是第一个。常玉开始是花花公子，很有钱，后来钱花光了，有时画，有时不画，非常自由，非常任性，完全是艺术家的个性，不管明天，但是画得很有意思，最后是穷死了。他的画不值钱，一捆一捆的，几个法郎一捆，台湾一个画商买了，现在价钱很高。常玉和赵无极的关系不错。那么，潘玉良一直在法国，画得不好，卖不掉，就用宣纸画裸体，也很庸俗，华人或是朋友买她的画。她的生活很困难，住在一个贫民区的楼上，在五楼，自来水只到四楼，五楼是加的楼，没有自来水，我星期天去玩，帮她提水（笑）。她人非常豪爽，好像男的一样，心地很光明，画稍微俗一点，但是人好像是大姐，很好的。

李怀宇 后来很多电影、电视表现潘玉良，搞得名气很大。

吴冠中 胡来，胡扯！

李怀宇 到法国留学，对你在艺术上的影响如何？

吴冠中 开了眼界，对我后来的艺术非常重要，使我感觉到造型艺术是怎么回事，构成、结构是什么东西。法国的艺术讲格调，我觉得跟中国文人讲的格调很接近，表面不一样，实际上骨子里是一种很接近、很高级的东西。

李怀宇 八大、石涛的作品也是讲格调的，艺术到了最高的境界往往是殊途同归的。

吴冠中 对！凡·高和石涛他们见面的话，一见如故！相反，那些低级的，像徐悲鸿这样的画，他们并不接受（笑）。徐悲鸿从法国回国以后，画得比较写实，比较像，一般的官僚就懂了，觉得画得像。他会搞那些人际关系，跟官员搞得比较好，中国慢慢知道有徐悲鸿，画马呀，画了很多东西，在中国就很厉害。

李怀宇 在法国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将西方高格调的东西和中国的好东西糅合在一起？

吴冠中 看了几年以后，我完全理解，欧洲的高级艺术跟我们古代的好东西道理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回国以后讲，中国古代优秀的东西和西方优秀的东西是“哑巴夫妻”，虽然语言不通，爱情是甜蜜的。我到今天还是这样

看，中国今天的好东西跟西方的好东西太相近了，完全一样。到了法国以后，我懂得艺术是什么东西了，而且到了法国以后，回来看中国的东西，更能看懂。这一点，赵无极有同感，他原来在国内不喜欢中国画，潘天寿上课时，他不上，考试时画一块石头，潘天寿要开除他，是林风眠把他保下来的。中国的东西，他原来根本不看，到了法国以后，把中国画看懂了，因此他的画把中国好的传统放进去了。

1950年，吴冠中从巴黎回到北京，是年秋，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2年，吴冠中在文艺整风中受到批评，被称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所作人物画被批判为“丑化工农兵”。因不愿按照流行模式画人物，自此改画风景。1953年，吴冠中调至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后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文革”爆发后，一度被禁止绘画、写作。下放期间，吴冠中在劳动间隙作画，常背粪筐去写生，被学生戏称为“粪筐画家”。

李怀宇 在1950年你怎么想回来了？

吴冠中 这个不仅是我，也是所有留学生的人生大问题。当时想，回来以后，这一辈子就出不去了，命运就完全改变了，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考虑。大部分的留学生都是比较优秀的，都想报国，觉得回来特别苦，关系不大，因为我们穷惯了。他们考虑的问题是回来以后还能不能研究，所以美国当时阻碍科学家回来，搞文艺的关系不大。

李怀宇 你和赵无极、朱德群在艺术上有相近的志趣，有没有想过跟他们一样留在法国？

吴冠中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50年代吧，我在农村劳改，对着青天黄土，准备开荒了，全学院的师生都要下去劳改。这时候听说赵无极回来了，周恩来请了一些国际上有名的华人回来参观参观，赵无极也是被请之一。这给我感触很深。赵无极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但是在思想上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周恩来请他回来参观，他就觉得中国的力量又起来了，因此他就做了一件事——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就把江青所吹的户县的农民画拿到

巴黎去展览。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比较远，感情上可以说我们是同学。他成名比较早，朱德群去法国比较晚，成名也比较晚。早些时候，有一个台湾的画商去买赵无极的画，恭维他：“你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赵无极说：“我不是中国人。”

李怀宇 听说赵无极当年到家里来看你时，你告诉他，不要喝太多的水？

吴冠中 有这个事。他回国来，因为是老同学，我家里再破，他也要来。我就告诉他：“你来可以，但是到我家里不要喝水，我家里没有厕所，喝了水很麻烦。”后来他到了我家，喝了很多绍兴的黄酒，要上厕所，我就带他到街道上好一点的卫生间去（笑）。

李怀宇 回来以后，有一段时期，你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吴冠中 那当然！我把我认为在艺术上很正确的东西都很认真地教给学生，后来批判这些东西都是反动的。

李怀宇 你画的人物画被认为是“丑化工农兵”？

吴冠中 说画得不像，“丑化工农兵”，必须画红、光、亮的东西，虚假的东西。实在走不下去了，所以后来我画风景画了。

李怀宇 在那个年代，你已经感觉到在国立艺专和法国学的那些东西跟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画风格格不入了？

吴冠中 完全是两码事情！如果我早先知道艺术是他们提倡的这样，我宁可打工，也不去学艺术。那不是我所爱，是我讨厌的，我觉得虚假。艺术是真实，不讲假话。所以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讲我心里的话，画我心里的画，没有改革开放的话，我们根本就完了。

李怀宇 那二三十年里，你的艺术理念不断受到打击？

吴冠中 不断打击，不断打击，永远打击（笑）！所谓的打击，原来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受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来我站不住，这样就把我搞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一般的技术，就无关意识形态了。

李怀宇 你去清华大学建筑系还是吴良镛点的将？

吴冠中 对，他后来讲的。因为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有一个画家叫李宗津，画得很写实，吻合中央美术学院的要求，吻合江丰、徐悲鸿的要求，所以就把他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去。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是梁思成，副主任

是吴良镛，吴良镛到中央美术学院去点干部，把我换了李宗津。吴良镛后来讲：“我去点了你的。”（笑）

李怀宇 在自己的艺术理念没法表达的年代，有没有困惑迷茫过？

吴冠中 相当痛苦！这种痛苦是再穷点都无所谓。后来我想不在乎了，搞风景画。开始我想过，我刚从法国回来，法语还是很不错的，想过搞翻译，不搞美术了，对美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当时我很想翻译凡·高给他弟弟的信，因为国内没有。我翻译了一部分，拿给北京的出版社看，他们说：“这样的书我们根本不能出版。”（笑）后来我找比较中性一点的东西来翻译，给上海的出版社，上海也给我退稿了。翻译的路子也走不通。

李怀宇 这样也好，改画风景画了，开创了一条新路。

吴冠中 对对对，这样我就比较自由了。我可以画，当然不能卖了，顶多不发表。后来我到清华大学也好，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好，都是打工的，我不是重要的教员，这样我就有时间搞自己的东西。我自己搞自己的东西，你也管不着，画了我自己藏起来。

李怀宇 你曾到各地大量地写生？

吴冠中 恐怕讲写生的话，没有第二个画家有我写生多！我到各地去写生，古代的画家我不知道，现代的画家没有人像我写生这么多了。

李怀宇 你对江南的风景情有独钟？

吴冠中 很亲切。江南也只是一点，我的画还是比较宽，全国我都跑的。我是江南人，但并不感到故乡美，相反，是看了鲁迅的小说，觉得江南的风土人情是这样的可爱。绍兴我跑得很多，大量资料从那里来。

李怀宇 当时的环境允许你去各地写生吗？

吴冠中 非常的艰苦！当时我心里很明白：我搞的东西是中国的、西方的，而且是现代的、感情的。但是这些东西当时是该批判的，不能拿出来，要藏起来，万一抄家，他们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抄走毁掉。我是分散地藏起来，当时我想，我这东西将来是“出土文物”，将来会有人找得到。当时有这个自信！

李怀宇 现在看来，从50年代开始，徐悲鸿他们所倡导的或者是从苏联传来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美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吴冠中 这几十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也许未来几年里有

所突破。现在看来，他们那些传统的也好，现实主义也好，尽管叫得很响，无可奈何是要垮下去了。新的东西一定要出来，新的不一定好，但是新的东西必定会有好的出来，时代是换了。中国的美术时代实在要换了，中国的美术是相当落后的，在国际上来比，比非洲都要落后。

李怀宇 比非洲还要落后？

吴冠中 喂，我到非洲去过嘛。非洲直接从法国学来的，毫无阻碍学法国的，学欧洲的，我们不能学西方的！我看到非洲对西方主流的艺术都可以学，我们中国是唯一不能学的。我们当时如果要画印象派啊什么的，是被禁止的。从这一点看，徐悲鸿对中国美术是起到负面作用的。

1981年，吴冠中以中国美术家代表团团长身份赴西非访问，途经巴黎时与老友朱德群、熊秉明、赵无极会晤。1990年获法国文化部最高文艺勋位，1993年获巴黎市金勋章，2002年入选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吴冠中的作品曾创造中国在世画家国际画价的最高纪录。

李怀宇 现在法国艺术界，普遍都把你和朱德群、赵无极的作品放在同一条线上看。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吴冠中 我自己明白：“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知道我的分量，吴大羽先生讲：你的作品不要叫人去看，自己有多少分量，自己知道，用不着去上秤。人应该明白自己的好坏。为什么说很多东西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因为人际关系很复杂，影响了对作品的印象。作品要经过两代人之后，不看人际关系，只看作品了，才会比较客观。如果国内的人对我有些误会，那么在法国，就比较没有人际关系，就看作品了。

李怀宇 可能是你的作品跟法国人的审美很接近？

吴冠中 对，审美很接近。还有一点，可能我原来审美的趣味有很多是法国的，我从小在杭州艺专，从林风眠的时代就对法国艺术有一种偏爱，趣味比较接近，谈话比较投机。比方我到美国去，就觉得不如法国亲切（笑）。

李怀宇 这几年你跟朱德群、赵无极联系还多吗？

吴冠中 有一点联系，不太多，因为大家年纪都大了，就打打电话。

李怀宇 人家称你们为“三剑客”。

吴冠中 赵无极在生活上是一个花花公子，但是人聪明。朱德群也很努力，画得也不错。现在我们是朋友，多少年后，我们都死掉了，下辈的人来看他们，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画家到了法国，拿一点中国的味儿混在法国里面。在法国的花园里，可以开一朵玫瑰花，或者什么花，品种呢，可能带一点中国的味儿。我完全不一样，我是回到中国苦难的土地上来，在荒土里面重新长出的花还是草，我与他们之间已经逐渐没有可比性了。

李怀宇 当年从巴黎回来后，二三十年郁郁不得志，对你后来的艺术创造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冠中 回来以后，对我自己的美术有一点点影响，对中国的美术界起了一点波浪，有一点新的因素进去了。熊秉明曾经对我讲：“如果你不回去，一定走在朱德群、赵无极的路上，你后悔不后悔？”我说：“我不后悔。”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我后来也免不了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是到了最后看，我愿意回来，还是今天的我。当时我走的时候，我和我的老伴感情好，山盟海誓，她说：“你回来的成就，实际上是我的成就。”（笑）

吴冠中以敢言著称，其观点“笔墨等于零”、“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等在文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声中，吴冠中依然我行我素，持续关注文化问题。

李怀宇 改革开放之后，你在艺术上的许多提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吴冠中 当时引起争论，我还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讲得很平常呀，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我讲的都是普通的规律，如果放到法国去讲，是当然的，没有什么可争论，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引起争论了。

李怀宇 多少年来，大家都还在争论你讲的“笔墨等于零”的问题。

吴冠中 很可笑的。因为中国很多的传统都是靠笔墨，不能画什么东西。社会上的画家很多，跟什么老师学一学，不会画什么东西，画个兰花，画个竹子，画个梅花，这几样东西，都是一样地画，没有绘画能力，说穿

了，不是画家。因此他靠笔墨，你说不要笔墨了，就把他的生活打掉了，把他的饭碗打掉了。

李怀宇 这些观念是不是你在心里已经想了很久？

吴冠中 对，我想了很久，但是我觉得我讲的是真理！

李怀宇 另外一方面，你对石涛、八大的东西又作了深入的研究？

吴冠中 他们很懂！一本《石涛画语录》，大家都觉得是了不起的东西，但是没有几个人读懂了。我也很喜欢石涛的作品，我看那些老先生解释的，原来都没有看懂。后来有一个机会，打官司的那几年，搞得我不能画画，我专门找一本《石涛画语录》，后来一看，恍然大悟，太清楚了。石涛的主要观点是“一画之法”，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后来我看到，很简单，石涛非常重视感受，就是现在讲的感觉、灵感。他讲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感受要用不同的方法画出来，同样的方法画不出同样的感受来，而且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因此每一次的方法不一样。他讲这就是“一画之法”，并不是具体的方法，“一画之法”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感受造出不同的方法来。这讲得非常清楚，和现在的观点是一样的，不过是语言、说法不一样。我们不懂这样的道理，不懂西方的艺术，就乱讲，把“一画之法”歪曲了。

李怀宇 苍松翠柏在低处是不碰到一起的，要彼此长得很高，树叶就在高处相逢了。优秀的西方艺术和中国艺术就是高处相逢的。

吴冠中 对，真是高处相逢！他们在艺术的感受、艺术的结构、艺术的构成、艺术的境界、艺术的味儿，是完全相同的。我和李可染谈过这个问题。李可染在杭州的时候比我高几班，开始他也学过油画，油画是黏糊糊的，跟水墨很不相同，这两个东西怎么结合啊？这就像一座大山，沙子在两边，互相不见，彼此很隔膜，但是你往山上爬，一点一点地爬，到山顶上了，喔，相见了，相遇了！他也是这个观点。

李怀宇 你是不是跟李政道先生交往比较多？

吴冠中 我们关系不错。他是大科学家，我不能找他，是他找我的。我是从来不找比我更高的官僚或者什么人的。他觉得我的一张画点线结合，我们曾经共同主持“科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李怀宇 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文艺复兴人”是将各个学科结合在

一起的，而不局限于某一个专业。你既画画，又从小喜欢文学创作，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吴冠中 在19世纪、20世纪，西方绘画发展到重视形式，重视视觉冲击力，他们觉得绘画中文学性的东西不是什么绘画，所以他们反对绘画中的文学性：绘画就是视觉艺术。用他们的角度看有道理，但我觉得是片面的，因为人是整体的，科学、文学、艺术都是一体的。现在钱学森、李政道这些科学家，都讲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因此我也想到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过去我也反对，觉得绘画不需要文学，但是现在我想法不一样了，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关键。我们中学时代都喜欢丰子恺，雅俗共赏，但是后来学了艺术，就觉得丰子恺画得很简单，不是美术，现在看了这些乱七八糟、各式各样的东西，再看丰子恺，觉得很亲切。现在看艺术和文学本身没有什么区别。比方说，我的老师吴大羽是绘画大师，但是到了晚年，基本上都在写诗，诗写得很有意思，他跟赵无极讲：我还是不想画画了，我想写诗，诗比绘画更有深度。过去有人讲：一切艺术都倾向于音乐。现在我觉得一切艺术更倾向于诗，音乐也还在诗的殿堂里面。我觉得现在绘画要思考的问题更多的是境界、思想，境界和思想是更重要的，技术只是基础，艺术要看境界的高低。所以现在艺术学院的学生文化水平偏低，这是致命的。

李怀宇 当下艺术学院的教育问题陈丹青也曾经抨击过。我们今天来回顾你在国立艺专和法国的求学经历，就是想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吴冠中 对，目前的艺术教育不行。艺术教育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教育，艺术讲灵性，只有少数的人适合学艺术，现在是大量地招生，招来的那么多人都不是适合学艺术的。但是出来以后，他们都要吃饭，我们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艺术学生不可多招，宁可少招。当年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在人大会议上对高校的教师作一个报告，我在场听了，他说：我们国家有条件可以承诺培养五十个顶尖的科学家，但是不敢承诺能培养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我当时就鼓掌。现在艺术家完全是泛滥了，有些根本不是画画的，专门骗人！所以鲁迅说，宁可找些小事情做做，千万不可以当空头的美术家、文学家。现在不是空头美术家，是流氓美术家！这个社会有很多流氓美术家。

李怀宇 这跟当前的艺术市场也有很大关系。

吴冠中 对，这个市场太狂热了。也许有一些很优秀的美术家，但是他要适应这个市场，就给这个市场吃掉了。有的画家画得不错，但是他被市场绑住了。

李怀宇 听说，天津大冯(冯骥才)曾经对范大画家说：你的画怎么都是那样，不能变一变吗？范大画家说：我变了，那些画商不认得啊！

吴冠中 这种现象在西方也有。西方一些画廊把画家捧出来了，不要他变，一变就卖不掉了（笑）。这就牺牲了很多画家。画主要是情，必须是真情。太关心画价，一出来都是复制。

李怀宇 相信有很多人探讨过你的画价问题。

吴冠中 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的画价。现在市场的“心电图”不准确，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是不算数的。我很清楚，可能将来远远不止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跌下来。这是自然的，用不着去关心。我从来不管的，由他去。

李怀宇 凡·高生前，他的画根本就卖不出去。

吴冠中 但是他有自信，他说：“将来我的画要卖五百法郎。”（大笑）

李怀宇 你很推崇鲁迅，讲过“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

吴冠中 对，当然两个不可比。虽然不可比，但是感情上我非讲这个话不可。因为鲁迅对这个社会精神世界的贡献，对人格、人品各方面的影响是了不起的。齐白石当然是一个好画家，我们也很尊重他，多一个齐白石也是很不错的，少一个齐白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少一个鲁迅，精神世界就不一样。有些东西不可以比，但是有些东西基本上可以比。比方说，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他怎么样表达叛徒的心态呢？他到聋哑人那里去观察，看聋哑人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讲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姿态。我想，如果达·芬奇用文字来写，要比他的壁画更动人。但是有些好的美术是不能比的，比如凡·高的作品，如果用文字来描写，很难，表达不出来。当然，文学大有好坏，绘画也大有好坏，不能拿坏的来比，文学达到高度的文学，绘画达到高度的绘画，拿这两种东西来比的话，文学的深度更容易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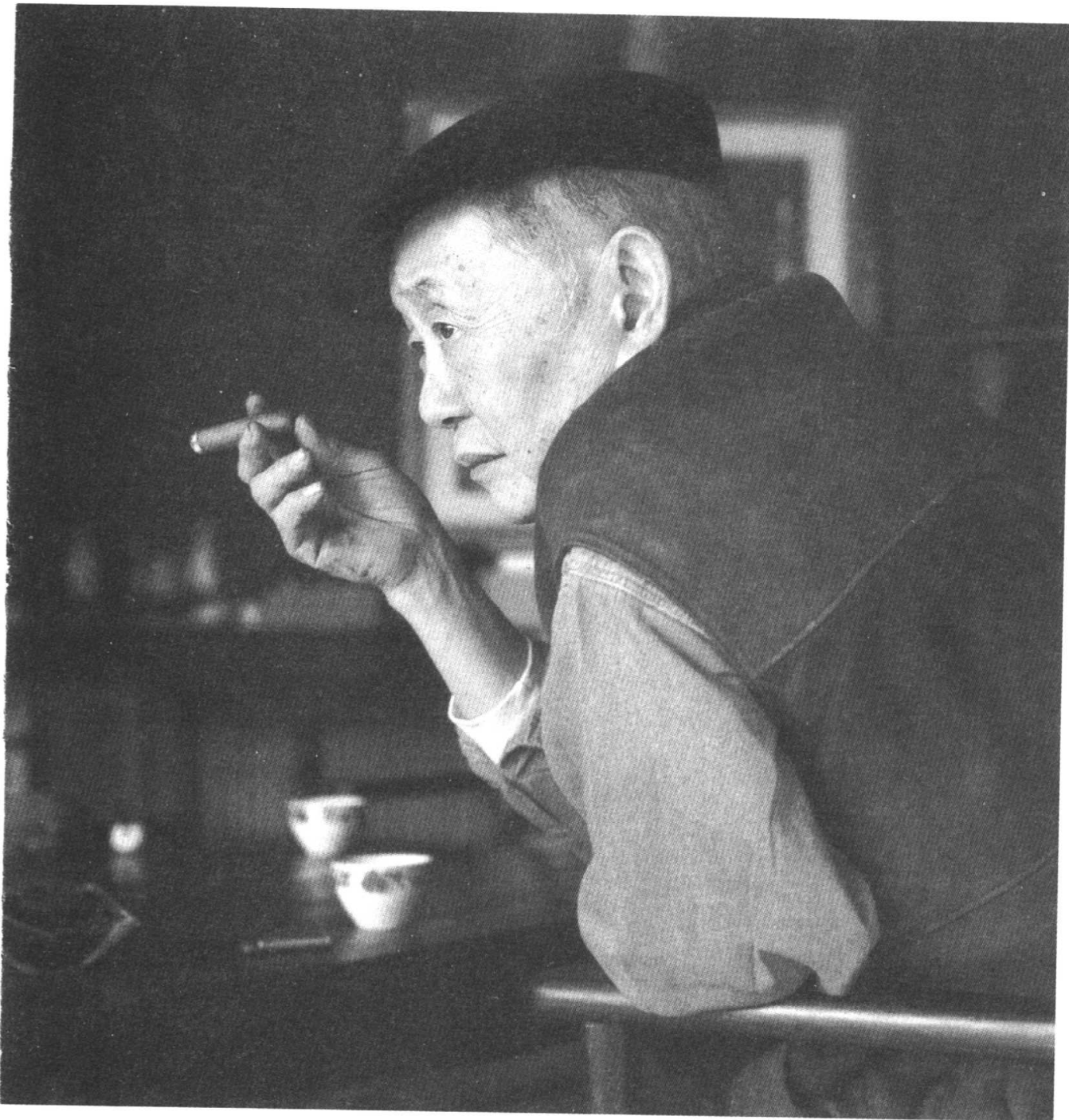
黄永玉

1924 年生，湖南凤凰人。

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级中学教育，十六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做过瓷场小工、小学教员、民众教育馆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艺术创作形式多样，水墨、水彩、油画、雕塑、木刻、版画，不一而足，也写诗、散文、小说、剧本。

出版多种画册，著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等书。



黄永玉

创作的起点是快乐

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

2005年8月13日，黄永玉在北京万荷堂举办八十一岁生日酒会。《比我的老头》一书记载，黄永玉生于1924年7月9日。近年来，黄永玉每年都会随心情变化，在盛夏选一个吉日请亲朋欢聚。我们乘坐美术评论家陈履生夫妇的车，出北京约一小时，到达通州区徐辛庄万荷堂。堂外公路上的汽车早已停放成长龙，几名警察在维持秩序。路口有一座八角亭，不见题匾。陈履生介绍，此亭名为“侃亭”，黄永玉专门建来方便周边村民歇息“侃大山”，并亲笔题字制匾。不想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题匾不知所踪，黄永玉便不再题字。侃亭下依然有侃爷，只是成了“无字亭”。

万荷堂为独立的中式园林，远望四周皆是田园。走进大门，那几条传说中的大狗早已被拴到不知何处，没有机会出来迎客或吓人。地上铺着粗石，院子里躺着几尊古旧的石雕，抬头一看，“万荷堂”三个大字颇为拙朴，走

廊上挂有一个拳击沙包。大堂是黄永玉的画室，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居中摆放着几根硕大的原木，上有黄苗子题字。一面几十平米的大墙专为画大画而设，墙角有升降机。墙上挂着黄永玉新写的书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

堂上高朋满座，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专程从香港回来打点老爸的酒会。每次见到黄黑蛮，总觉得他这么憨厚，哪像他老爸的性子？有人说，黄黑蛮的性子像他妈，黄黑妮的性子才像她爸。喝茶抽烟的众来客中我一眼就认出清瘦留须、手执烟斗的广州雕塑家许鸿飞，独特的形象占了便宜。

画室后面的另一幢房子“老子居”才是黄永玉居住的地方。先进入饭厅，但见黄永玉的太太张梅溪手执葵扇，正指点厨师准备晚餐。王世襄曾夸奖：“永玉夫人梅溪精于烹调。”房中蝈蝈和鸚鵡的叫声不绝于耳，转入客厅，一位貌似黄永玉的长者在招呼客人，这是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黄永厚也为名画家，也住在通州。兄弟俩有二十年不相往来，直到前几年才重新和好，唉，这俩老头儿。坐在我旁边的是建筑大师张开济的公子张永和，如果不是和身边的外国友人讲着流利的英文，外人还认为这位是黄永玉老家来的亲戚。凤凰老家自然是来了不少亲戚，忙着倒茶待客。里屋走出一位身材高挑的客人，张永和旁边的女士觉得眼熟，便问我这是何人，我脱口而出：“刘诗昆。”心里暗暗庆幸电视看得多。当天的压轴好戏是刘诗昆演奏钢琴。

李辉、应红夫妇开车载黄苗子、郁风夫妇也早到了，李先生带我进入里屋认识黄苗子、郁风，这才见识了黄永玉那间宽敞典雅的卧室兼会客室。许多曾在电视里见过的客人，正陪着黄永玉聊天。黄永玉穿一件浅色衬衫，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房中那张其大无比的睡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更难忘的还是黄苗子温暖的微笑。

“老子居”外的另一个院子才是荷塘所在，数亩地大的池子栽满荷花，顿感“十万狂花入梦寐，一袭清馥逸荷塘”并非虚言。荷塘中间是一个石砌的舞台，上面摆放一架钢琴，刘诗昆在试音，旁边站着两位妙龄佳丽。荷塘周围是走廊和几座两层楼房，不少艺术家在此挥毫的墨迹随处可见，黄永玉各

个时期的照片和画像尤为醒目。

沿荷塘漫步，看看字画，赏赏荷花，幽香扑鼻，远处则飘来烤全羊的香味。日渐黄昏，宾客陆续到达，荷塘边的广场已摆上自助餐，生日蛋糕则摆在舞台后的大厅里。黄永玉站到舞台中间，只说了一句：请大家来聚聚，开心一下。于是上百位宾客食指大动，分坐荷塘四周，觥筹交错之间，欣赏舞台中的表演。

华灯初起，正是酒足饭饱之时，刘诗昆一曲奏响，全场肃静。黄永玉嘴叼烟斗，坐在钢琴旁的台阶上，已然心醉了。

※ ※ ※ ※ ※

和黄永玉共进晚餐，光听他讲话，已经半饱。那种调动气氛的功力，至今犹历历在目。座上有人问他：“您现在吃辣椒吗？”“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问：“平时有什么活动？”“打乒乓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个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乎差不多，认得中国字的那部分……”

谈兴最浓的还是他的故乡凤凰。“有一次，我在江边画画，一个导游带了一帮人，看我在江边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夺翠楼’，导游就说，黄永玉以前有一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其实哪有这种事情，从字面上讲，‘夺翠’就是把绿颜色‘抢’过来，在我们家乡话里说这件东西很‘夺翠’，就是很多绿颜色，颜色鲜艳的意思。”笑咪咪的黄永玉仿佛在讲着与自己并不相干的故事。“还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

晚餐后的第二天下午，我提早半个小时到达黄永玉的住处。黄永玉还在午休，黄黑蛮出来泡茶聊天。黄黑蛮也是画家，现居香港，言语质朴。我知道经济学家张五常写的文章都指定由黄黑蛮画插图，称他为“我的御用画师”，便聊起张五常在美国卖假古董的新闻。陆续有黄家的朋友到来，带来了各类相机，黄黑蛮很喜欢摄影，说起来深得门道。

正谈间，黄永玉出来了，手执烟斗，面带微笑，在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肃立起来。访谈一开始，黄家亲朋拿着相机在不同角度上拍照。闪光灯影里，我恍然觉得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会。可惜“黄老大”的听力不太好，只好凑近一些，提高声调，距离感顿时消失了。一会儿工夫，便觉得这位老大不喜欢正儿八经的访谈，更乐意百无禁忌地聊天，“黄老大”的英雄会变成“黄爷爷”的故事会了。

黄永玉的童年在湖南凤凰度过，读书时以逃学闻名，十二岁离乡求学，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时多次留级，后来校友聚会时，曾经跟他同班的有一百五十来人。1948年，黄永玉从台湾来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中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黄永玉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后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金庸、梁羽生等。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霑、蔡澜成为忘年交。

李怀宇 在香港罗孚先生家，我们聊到你的一件趣事，说一家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你和朋友经常去，有一次你们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你就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先生笑咪咪地来了，你交上画，叶先生预付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 有这个事，就是偶然的这么个事。罗孚当时没有跟我去，主要是叶灵凤先生，叶先生当时在《星岛日报》工作，那个店叫“美利坚”，里面有童子鸡，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常常去。

李怀宇 那时候还有一位后来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龄。

黄永玉 喔，查良镛。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过我，请我谈他，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笑）

李怀宇 黄霑应该是后来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几岁。

黄永玉 湖南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黄霑，问他，听说你失恋时黄永玉安慰过你？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又问，听说黄永玉让你享受“失恋的诗意”，有没有这回事？黄霑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大笑）

李怀宇 你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他根本没有发掘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黄永玉 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敢这样做，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这样一来他当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的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学才能也很高，他写广州的竹枝词，信手写来，举重若轻。我看过他一本书，写他自己的，很了不起，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杀出来。今天你们这么好的环境，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就有工作，那时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这个不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杰出的、少有的艺术家，一个战士。

廖冰兄

1915—2006，漫画家，原名廖东生，广西象州人。1932年开始创作漫画，抗战时期避乱重庆，一度迁居香港，后长居广州。作品以政治讽刺漫画为主，代表作有《猫国春秋》、《自嘲》等。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革”期间，黄永玉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黄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渐为市场所重。

李怀宇 1953年怎么从香港回到北京？

黄永玉 1948年到1953年我在香港，最初是1946年去的，后来又在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去香港之前又在台湾待了几个月，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我们到台湾，很多画家也在台湾，住了不到半年，后来中共地下党知道第二天中午国民党要抓我，通知我赶紧走，替我买了票，用车子送我，从基隆离开了，到香港，那是1948年。1953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书了。

李怀宇 沈从文先生读过小学，当了教授，你读过中学，也当了教授。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毕业？

黄永玉 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笑）。

李怀宇 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写信让你回北京的？

黄永玉 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先生也写信，这是我们老这么讲，人家喜欢说是沈从文写信让我回去这么一个故事。事实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时候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虽然我多少年来一直是左倾的，拥护共产党，但也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广义地来讲，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社会主义，其实我懂得多少社会主义呢？回来总是开心的，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有很多人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

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50年代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结起来，他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的过程是左翼文化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

李怀宇 50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黄永玉 我们每个星期多少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来了，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天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到我家里，我就谈到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领导我们的党是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我们也不是党员，但是感觉到在他的领导下，真正是奋不顾身，吃饭、穿衣、走路，一切的生活都是自己料理，但是上头一有指示马上行动，毫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讲“没有钱怎么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都是自己去打算、自己去找，不用拿津贴的。具体的领导都是我们的老前辈，是李桦、野夫、陈烟桥这些老木刻家，一年开两次全国性展览会。那时不像今天的展览会这么简单，没有经费，周围都是敌人，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在老大哥家里拼命地工作，总得管饭吧、管交通吧，什么都不管的（大笑）。这样的状态底下，感觉到这么好！

李怀宇 那时候许多文化人都是有这么一股激情的。

黄永玉 是的，不要说在上海，就是在香港，解放了，我跑到旺角买了一块木板，这么高，这么长（用手比划）。自己用三轮车运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刨，找一个帮手，我就画稿子，刻了整整九天九夜，手都起泡了，送到展览会去展览。那时候也没有可能去拍照，发表都没有发表过，稿费都没有拿。我们义卖慰劳解放军，到了香港华商总会卖那张画，两三千块钱，当时的两三千块了不得，全部慰问解放军。“文革”时把这张画当作“黑画”，说歪曲解放军的形象，说把解放军画得那么矮什么的。我心里想，你们这帮人，我当年是怎么样工作的，你们是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你们有我们当时那样有出息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讲我？当时心里这么想，也不敢说，历史给人很多的委屈啊！二十多年就这样浪费了。所以有一次我讲：他妈的，这么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浪费了。我也不是懒惰的人，很愿意工作的，要是我现在只有五十岁多好啊，但没办法。

李怀宇 你在中央美院任教时，记下的当年徐悲鸿和一位裸体模特老头

儿的对话，我印象很深。徐悲鸿了解到老头儿曾经是厨师时，说：“喔！厨房的大师傅，了不得！那您能办什么酒席呀？”老头儿眼睛一亮，从容地说：“办酒席不难，难的是炒青菜！”徐悲鸿听了这句话，肃立起来说：“耶！老人家呀，你这句话说得好呀！简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这和素描、速写一样嘛！”

黄永玉 这话说得多好啊！

李怀宇 当年你住在中央美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时，邻居都是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仃这样的大艺术家。当时的环境下，大家艺术交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黄永玉 在困难情况下，我也还是能“偷安”的，一般很适应生活，没有感觉像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那么痛苦。最不正常的是“文化大革命”，其他的不正常我还能忍受，我以为是“革命的需要”……当时香港的亲戚要寄东西给我，我写信阻止说，不要寄了，和人民一起经受困难，我觉得很光荣。“文革”来了，我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到了“文革”末期，我感觉有大问题了，很不正常，这个事情都是逐渐认识的……林彪掉下去以后，我们都觉得很震惊，也很高兴，觉得“四人帮”跟着就要完蛋。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四人帮”不但没有完蛋，还掌握了运动的旗子，又批林批邓，我就感觉到这里头有大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就感到周总理受委屈了，过去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的党过去团结得像一个人……过去没有怀疑的事，没有想过的事情，自己暴露给我们听到，给我们看到。

李怀宇 画不了画，写不了文章，会不会痛苦呢？

黄永玉 不痛苦，自然的事情怎么会痛苦呢？痛苦是对比了之后才会有痛苦。比如说，我们在干校，每天哪里有空去痛苦呢？每天大家去劳动，劳动完睡觉，第二天还要劳动。除非你有闲情逸致的时候才会痛苦（笑）。这个事情不要说我们，古代划船的奴隶，锁在铁链里，不见天日，每天就是摇呀摇的，从历史来讲，他是痛苦的，但是他在摇的时候，仅仅是希望活下去，别死，来不及想我痛苦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小组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为什么还愿意接受改造，大家说来说去，轮到我发言，我说：“大概活着比死好吧。”（大笑）

大家就来批判我，说死刑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将领认识了共产主义的原理啦，认识了社会主义的好处啦。我们都没有那么清楚，他们怎么就那么清楚了呢？不太可能吧。

李怀宇 当时那个“猫头鹰黑画”事件出现以后，你是怎么对待的？

黄永玉 反正没有这个事情，他们说有，一定有一种很大的力量使我很被动。如果有机会跟他们辩论，几句话就可以驳倒。所谓的“黑画”，那个“猫头鹰事件”，他为什么说我画猫头鹰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让他说为什么，他也是说不出的。不要讲出意思来画画，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另外一些人在领导国家的时候，每一样东西都要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是坏。上海有个画家画一个笑咪咪的苏东坡，叫《中苏友好》，苏东坡和他爸爸比，小一点，和他弟弟比，大一点，就不是大苏，不是小苏，是“中苏”，笑咪咪就是友好。还有一个画家画一张《又红又专》，画一块砖，红砖，就是又红又专。现在好了，就是不是太有意思的东西也不追究了。

李怀宇 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去香港，是不是觉得那里的创作空间比较适合你这种自由的个性？

黄永玉 允许去就去了，不是自由的问题。我这几十年在北京，从没有感觉“不自由”，因为自由不自由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只有很少很少的情况下，是人家命令我做的，其他都是自愿做的。包括“大跃进”的一些作品，我都不是如实描写，而是加入了我的艺术处理表达出来的。我做出来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自由”了。“大跃进”时说谎话，稻谷上还可以跳舞，我看了真开心，人家跳舞多有意思呀（笑）。一亩地有几十万斤的稻子，人踩下去都不会倒了。我就刻出来了，开心嘛。另外，羊长得比牛还大，那是真开心哪……

有一次香港一个什么人说，你这样不是说谎吗？我说，不是我说谎，别人说谎，我跟着表达出来，多开心哪……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像小孩子看戏，一出来就是好人坏人的。从我个人来讲，开始他们这样做，“反右”啦，“大跃进”啦，我都认为是有道理的。可能包括要我死，都是有道理的。我都不明白，觉得跟着做就没有错。慢慢地才感觉有问题，后来才发现，越

来越儿戏，把生命当儿戏，把国家的命运当儿戏……

黄永玉画风多变，和他半生漂泊息息相关。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黄永玉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背着画箱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近年来，黄永玉热衷于置办豪宅：北京有“万荷堂”，凤凰有“夺翠楼”、“玉氏山房”，佛罗伦萨有“无数山楼”。

李怀宇 在香港、北京、凤凰、意大利都有房子，很奇怪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建房子？

黄永玉 我那是发疯了，神经病嘛（笑）。我研究过我自己，人家这么讲多了我也得想一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有房子？现在我想那就是一个艺术上的创作，那是借用素材来创作，每一个不同的素材在不同的地方都不一样。

李怀宇 最近几年哪个地方住得比较多，喜欢哪里多一点？

黄永玉 意大利那边，现在我的女孩子（女儿黄黑妮）住在那里，因为国内事情忙，我一两年去一次。香港嘛，当然常常去，但是最近一两年去得也不多。总是北京与凤凰两边跑，总是想着凤凰那个房子加一点什么，北京那个房子加一点什么，这么来回加，越加越多。也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就好比问你问母鸡，你生这么多蛋，特别喜欢哪一个？它也没法告诉你嘛。它天生爱下蛋，也没有什么选择了啦（笑）。

李怀宇 那创作的题材是不是北京、凤凰这两个地方多一点？

黄永玉 无所谓题材，都是荷花，北京荷花、凤凰荷花——凤凰没有荷花，长不出来的。我们那个小学池塘里，这一百年来都想栽荷花，都栽不出，我父亲做校长的时候想栽荷花，一直到现在的校长也栽不出。水土的问题，水寒。但这无所谓，不存在题材的问题。别人的画表现淮海战役、辽沈战役，需要题材，但是我的荷花不需要。表现力有些探索，也不叫探索，有些变化，高兴的时候，环境不同了，会有些变化，一下画个粗的，一下画个细的，一下画个大的，一下画个小的。荷花能有什么意思呢？只要

人家不讨厌，愿意看，我就不停地画（大笑）。有些人怕大家忘记他，隔几年开一个展览，不停地拿同样的作品出来展出，免得你忘了他。这是一种办法。我每天都在工作，我不能说我画画是为了讨厌我的作品才画，是讨厌我的生活才画。当然我喜欢自己的生活，喜欢自己的工作，我相信我的观众也喜欢我的画。我也不能讲，我每张画具有什么深刻意义。明明没有意义，画一张荷花有什么意义呢？

李怀宇 是一种无言之美。

黄永玉 为什么美到画十张八张都画这个呢？我说每一种里头有画得细腻一点的，有画得豪放一点的。现在也画另外一种方法，用自己的作品作一种研究。把画画提高到深刻的意义上，文化贡献啦，全是扯淡的（大笑）。人家问毕加索：“你的画什么意思呀？”毕加索说：“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画说些什么。”“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不好听啊？”“好听。”“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吗？”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喜欢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活动，都讲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人活着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人应该冷静地对待这样一种东西——尤其是画家喜欢把每一件事情讲得很有意义。如果画革命历史画，那意义可能很多，但一般的，其实就是把一些普通的感受、修养的积累画出来。人死了以后，别人可能把你的画讲得非常有意义，每一个人说得都比你原先设想的“有道理”得多，而且各不相同。我出过一本摄影集，在里面说，比方我家里有一张破椅子，我不想要了，我就请拍卖行帮我卖掉，我去参加那个拍卖会，看见拍卖的人把我这张椅子吹得好得不得了，好到最后我自己把它买回来了。我本来没那么好，你一讲我有那么好，由不得我就自己爱上自己了（大笑）。没有这么了不起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冷静、从容，有一点幽默感，嘲笑嘲笑自己。

李怀宇 我觉得你的画难得的一点是，每一张都不墨守成规，有自己的想法，有新意。

黄永玉 中国传统绘画有个特点，仿八大、仿石涛，这是正路，如果在国外，你要是仿凡·高，画一辈子，那你就完蛋了。中国的传统就说我仿

谁，还公开地写在画上。每个地方传统文化不一样，风格不同。至于创新，我是不同意的，什么叫做创新？一个人能有多少新可创？就是每一个人都

安德鲁·怀斯

美国画家，1917年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他着迷于美国乡村田园生活，被誉为乡情写实主义画家，1948年的《克利斯蒂娜的世界》使他一举成名。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曾掀起学习怀斯画风的热潮。

都有每一个人的风格。一个人的创作道路里面有一些变化，也不叫创新，过去我们叫做“变法”。变法也要依据原来的基础，不能完全脱离。改革开放初期，有一阵子大家学怀斯画画，有一个人有一本怀斯的画册，别人没有，他就照着怀斯的画来画，人家说他创新，大家都有这本书了，喔，原来是照着怀斯画的，就没有新了。所以我不太承认创新这个概念，我只承认好坏。这个人画得好，那个人画得不好。

黄永玉曾说，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它们基本上挣不到什么钱。他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写到自己四岁时，已有二十万字。

李怀宇 你的《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写得怎么样了？

黄永玉 还在写，不写就死掉了，来不及了，再说不写也可惜了，我觉得我那些故事都很有意思，得赶快写。写文章就简单了，不像画画，要带很多东西，一支钢笔和一些稿纸就可以了。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市场上已经有整本的在卖了，可是我还没有发表哪，已经有盗版了。不过，盗版不盗版也没有关系（笑）。另外还有一本，我女儿建议我赶快写，那本在香港《明报》登过，叫做《大胖子张老闷儿列传》。还没有写完，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国内的人会喜欢看，但国外的人就不喜欢，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这几十年国内的情况。

李怀宇 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说很多年前跟聂绀弩先生走在街上，你告诉他有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讲。”

黄永玉 文学不光是讲故事。写文章也像作对联一样，上一句下一句，要讲得有意思，结构、关系，但不是讲故事，巴尔扎克讲故事讲得好，出神

人化，但他写得没有司汤达、左拉有意思。我用有点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要太紧张，从容一点，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来说。

李怀宇 我听懂桥先生开玩笑说过，你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

黄永玉 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在北京万荷堂，黄永玉喜欢请一些老朋友来聚会。黄苗子、郁风、丁聪、王世襄、范用、杨振宁、张开济、刘诗昆等人都曾在这里留下欢声笑语。“文革”时，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如今安享晚年，这些老人有了另一种从容的生活。

李怀宇 我觉得你和那些老朋友了不起，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还是那么从容，而且都很长寿。

黄永玉 对人生从容一点，别嚣张，苦也别嚣张，得意的时候更不要，这需要修养，有知识的修养，也有人生的修养。前一段我对一个年轻的朋友说，你不要光研究胜利者的传记，也研究一下失败者的传记，很多失败者也写了传记，而且具有和胜利者写的传记一样的价值。很多人研究胜利者，但胜利者写的传记里，有很多夸张的东西，而失败者传记里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

有人说，人活着一辈子，太没有意思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意思啊？对死，我曾经有一个系统的看法，当然，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是死了。为什么要活在人的心上？有什么理由你要活在人的心上呢？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嘛……且不管这个，既不要骨灰，又不想活在人心上，你还想干吗呢？所以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不把骨灰放在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

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用粤语讲,黄太张梅溪是广东人),说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所以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关于死,杨宪益讲了很好的话,他说与其等人死了以后称赞他怎么好,不如活着时就开追悼会,他想自己快死的时候,搬一张靠椅,可以旁听大家吹捧他。

李怀宇 黄苗子在他那篇著名的《遗嘱》里也讲了类似的意思。

黄永玉 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笑)。

李怀宇 不管画画、写作,还是对待人生,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的“快乐”。

黄永玉 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最近我画了一张画,写了《快乐论》,我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快乐方式。

画画的基础,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为了开心,有一个兴奋点,对吧?要是你碰见灾难倒霉,你就没法好好画。我在毛泽东纪念堂画完了以后,人家替我感觉到这个工作很重要,来访问我:“你说说看,你在画这个稿子的时候一边画一边想什么?”我说就希望赶快完成。他说不是不是,画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说心情就是希望认真地画,赶快完成。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一边画一边流眼泪,想着毛主席伟大的恩情,这不可能嘛。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哭一边画画,有这样的事吗?这样也画不好。你想我这么讲,像郭兰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流眼泪,你相信那眼泪是真的?搞艺术当然有很严肃的使命,但是起点肯定是快乐。

看画不靠耳朵,要靠眼睛的。我有一张画,我拿给你看(进房取出一张画)。你看看,我在这画上题了跋(边看边念题跋):一切创作的起点是快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快乐能做得出事。我这也说得不全面,不快乐的人也能做

使天下不快乐的事。创作不只是让自己快乐，也能令别人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论》早已把快乐的根源剖析得很畅明了。有人问：悲剧呢？史诗呢？我说，悲剧令人掉泪，史诗令人肃穆，而作者是快乐的。



丁聪

1916 年生于上海，漫画家。

创作有大量的讽刺漫画、名著插图、人物肖像等，影响颇广，出版《丁聪漫画系列》、《鲁迅小说插图》、《文人肖像》等数十种集子。

郭延冰 摄



丁聪

笔底才情敌万夫

我到了香港就接触了共产党，与廖承志、夏衍他们相识，我们在上海的那些进步青年就靠拢了党。一接触共产党我们就发现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够朋友。我们当时就编了八路军的画报，《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战以后我们都改成画八路军将领，都是爱国题材了。

采访丁聪，先要过“家长”这一关。丁聪的“家长”是妻子沈峻，电话预约时，她仔细地问清采访的主要内容，连到丁家的路线，她也会细心地指导如何坐车。第二天顺利到达丁家时，“家长”热情地引路斟茶，把一切安排妥当后便悄然地忙她的家务去了。在“家长”面前，丁聪像个小孩，什么事都不大管，只管听“家长”指挥。丁聪说，“家长”比他忙多了，以前“二流堂”的老友聚会，都由“家长”张罗。郁风说他：“画他喜欢的画，吃他喜欢的肉，有他喜欢的朋友，津津乐道地受他喜欢的妻子管制。”

客厅的墙上挂着老友黄苗子的字，黄永玉的画，家具上到处摆着书，看不出摆放的章法，一排《读书》杂志倒摆得整齐。丁聪笑咪咪地坐在书堆里，谈吐随便得让人严肃不起来。谈起自己的父亲“老丁”丁悚，丁聪就像聊家常一样，事无巨细地回忆着，以至于“家长”为我们续茶时不得不打断他的

话头，怕一个上午都聊不完家事，丁聪笑咪咪地转换话题。当谈到中国漫画的命运时，丁聪依然是笑咪咪的，但言语之中流露的是对艺术的痛思和人世的关切。

丁聪气色很好，却说前一阵摔了一跤，躺了两个月，身体才好，老友们刚有一个聚会。现在社会上的活动他很少参加了，以前经常跑去《读书》编辑部，现在家离杂志社很远，公交车太挤，也不大去了。“一般是他们送稿子过来，我在家里画，人活着总要做点事情。”老人家笑道，“这也是健康的一个秘诀。漫画是我唯一的爱好，我不能放手啊。”

现在家里只住着丁聪和沈峻二老，他们唯一的儿子在国外。丁聪告诉我们：“我四十岁结婚，就只生一个孩子，我不敢多生‘右派’的孩子，怕祸延子孙。孩子毕业以后，因学的电脑，当时国内还无用武之地，只能出国了。今年暑假，我儿子带了两个孩子从美国回来，我就带了孙子去乡下祭祖，他们很开心。”

丁聪说的乡下，是上海枫泾，那里如今建成了一座丁聪漫画馆。“小丁”的讽刺漫画、名著插图、人物肖像等都陈列在馆中，而有“中国现代漫画先驱者”之誉的“老丁”的作品，也有专门陈列室。丁氏父子的作品铺开了中国漫画一个世纪的漫漫长路，子子孙孙看到的，也许不只是画中的人间百态，更多的是画外的笑声和泪影。

丁聪人称“小丁”，他的父亲丁悚人称“老丁”，是著名漫画家。30年代，“老丁”创办中国早期的漫画协会，丁家曾是上海著名的文化沙龙场所。汪曾祺撰文回忆，小时候看过一张“老丁”的画，一个人在扬袖而舞，另一人据案饮酒，看神情似在嘲笑舞者，上面题诗为：“张郎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张郎当筵舞，恐更郎当舞袖长。”汪曾祺感慨：现在能画这样的画——笔意在国画和漫画之间，能题这样也深也浅、富于阅历的诗的画家似乎没有了。又建议搜集“老丁”的作品，出一本《丁悚画集》：“这对丁悚是个纪念，同时也可供医学界研究‘小丁’身上的遗传基因是怎样来的。”

李怀宇 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说你父亲绘画的水平很高，非常推崇他。你记忆里的父亲是怎样的？

丁 聪 我也很佩服我父亲。我们家祖辈过去是读书人，在上海附近的枫泾，我现在也有一个漫画馆在那里。我父亲十二岁时，因家道没落，就自己搬一个铺盖到上海当铺学做生意，学了十多年，已经从当铺做到柜台上写当票。他在上海当铺工作的时候，业余都在函授的美术专业学校自学。我父亲并没有中文基础，后来的题画、写诗，都是自学成材的。对于西画，他也是自学。我父亲在报上投漫画稿，先是画《百美图》，鸳鸯蝴蝶派，后来画漫画。成家以后，二十五岁生第一个孩子，然后就一直生，生了十几个孩子出来。

李怀宇 听说你父亲每生一个孩子就跟你说一次“对不起”？

丁 聪 对，有这回事。我父亲二十五岁结婚生了我。当时，上海也是军阀混战，很混乱，我们住在租界的房子里。租界不属于国民党统治范围，外国人有治外法权，日子相对就好过一点。如果住在老城区，城隍庙那些地方就比较落后。我父亲画画好，也学西画技法。刘海粟在上海办美专，我父亲是第一任的教务长。我还没有生出来，就已经是刘海粟的干儿子了。刘海粟比我父亲略小一点。我父亲当时很出风头，但是因为画漫画稿费太少，而孩子是接连不断地生，所以也在多家学校教绘画。他不希望我学画，因为学画不能养家。以后他生一个孩子就跟我道一次歉，因为我的那些弟弟妹妹都要我帮着抚养。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大概有十个弟弟妹妹了。我父亲也很累，就到英美烟草公司去画广告，每个月可以拿月薪，也算是高级职员。

李怀宇 你父亲成为著名的漫画家后，成立漫画会，家里也成了著名的沙龙场所。你对当时到你们家里的文化人有什么印象？

丁 聪 我父亲跟《礼拜六》等杂志社联系很多，为当时上海很多大型杂志绘制彩色仕女封面。他当时画《百美图》，出了第二百个，后来又画漫画，出版过《丁悚百美图》等画集。那个时候的生活也过得不错，我们家有三层楼，亭子间、大厨房。那个时期画漫画的都是个体创作，没有出身美院的，所以，我父亲就成立了漫画会，漫画家聚会的时候就在我们家。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漫画会”的牌

《礼拜六》

通俗文学周刊，1914年6月在上海创刊，主要刊载用白话写的言情小说等。一般把在《礼拜六》上发表这类作品的作家称为“礼拜六派”，也称为“鸳鸯蝴蝶派”。

子,中国第一个漫画协会的组织就是在我们家成立的。我从小就认识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他们都是我父亲一辈的,但是都比我父亲小,我都叫他们叔叔。我九岁的时候,叶浅予二十多岁,画《王先生》,很出风头。等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报纸上投稿,也没有什么学校可以学习漫画,我都是在编电影画报的时候从国外的杂志上学习,有美国的、苏联的。画漫画开始签名“丁聪”,很烦琐,跟画面一比,字显得很大,张光宇就让我签“小丁”,因为我父亲是“老丁”。谁知这一签就签到了九十岁。

李怀宇 你父亲在1949年后的经历是怎样的?

丁 聪 他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馆,虽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文革”抄我们家,他怎么也想不通,就说去楼上洗洗脚,上了楼就再也没有下来,就这样死掉了。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痛苦,而我当时关在牛棚。

抗战期间,丁聪辗转于香港及西南大后方,主要从事抗战漫画创作,他和唐瑜、黄苗子、吴祖光、盛家伦、戴浩等好友形成了著名的“二流堂”文化圈,也接触了夏衍、乔冠华、廖承志、潘汉年等共产党人。抗战胜利后,丁聪发表了许多以“争民主”为题材的讽刺画。

李怀宇 你的漫画创作经历基本上是20世纪中国漫画的一个缩影。30年代,你的漫画与上海的商业文化尤其是电影有关,抗战时是抗日爱国的漫画,抗战胜利后讽刺社会黑暗,1949年以后又跟社会变化息息相关。当年你是怎样渐渐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的?

丁 聪 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中学毕业以后,连大学都没有读,就因为家庭负担重,弟弟妹妹多。父亲不画国画,漫画又不卖钱,所以穷。我父亲不让我画漫画,但是我又没有机会深造,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还是喜欢画画。中学毕业的时候因家境不好升不了大学,然后就开始打仗了,我就出来“混”了。

1935年,我中学毕业,十九岁。中学毕业只能做一些银行职员、翻译这样的工作,我不想做这些工作,父亲又不让我画漫画,我就去教中学,在晏摩氏女中都教过书。当时晏摩氏女中不允许男生进去,所以我反而很受羡慕。

我长得比较显小，年龄也小，个子也小。那是一个贵族教会学校，女中学生都住校，有初中、高中。虽然我没有进过美术学院，但是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上海美专的大教室里练习画画。一方面自己画画投稿打基本功，一方面是找电影公司编电影画报，编类似于现在的《大众电影》。那个时期，一边投稿，一边教书，一边到小报里做记者，然后到《良友》画报工作。

李怀宇 抗战开始后，你的漫画生涯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丁聪 最初上海抗战的时候，我在《良友》开始画抗日漫画，那是最起劲的时候，拼命画，用漫画救亡。上海沦陷后，我逃到香港，八年抗战我一直是在后方，辗转于香港、重庆、昆明、桂林等地。1938年，我创作了《流亡图》。画抗战漫画以后，我才开始接触政治。以前都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讽刺一下，开开玩笑。30年代初的文艺界，一直是左翼领导，鲁迅他们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特别是电影界，首先被共产党掌握，比如夏衍、赵丹他们都是左倾文艺工作者。慢慢地，左派的文艺势力占据了上风，我们也就开始接触共产党。共产党开始先抓文化，联华电影公司就比较进步，大学生比较喜欢看。而“天一”、“明星”这些就比较老，没有文化，也没有有声电影，是默片。左翼文人就抓联华电影公司，大学生也开始演话剧。党就是靠抓电影，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

联华电影公司

全称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1929年成立，总管理处在香港，上海设分理处，北京设分厂。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下，生产了一批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片。1937年8月由于抗战爆发而停办。

因此，新电影兴起之时，我们的抗日刊物就与电影公司合作。我最早就是与唐瑜编画报，之后去《良友》。后来上海成为孤岛，日本人肯定要对我们的抗日知识分子动手，我与张光宇他们逃难到香港。刚好《良友》也从上海搬到香港，所以，我一到香港马上就有工作了。香港是个自由港，只要不骂英国，什么活动都可以做。我到了香港就接触了共产党，与廖承志、夏衍他们相识，我们在上海的那些进步青年就靠拢了党。一接触共产党我们就发现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够朋友。我们当时就编了八路军的画报，《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战以后我们都改成画八路军将领，都是爱国题材了。

李怀宇 当时，你与夏衍、廖承志他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关系如何？

丁聪 抗战以后，左倾的进步文人都是倾向于共产党。我们到了自由

的香港，共产党也公开了，我们与乔冠华、廖承志、潘汉年经常接触。我那时二十多岁，夏衍比我大十六岁，夏衍是广州沦陷后，撤退到香港，再去桂林。在香港待了两年以后，我跟随夏衍到桂林、重庆等地，然后走昆明、河内等地回到香港。以后也总是通过越南到内地，受到他们的照顾。我在上海的时候不能画蒋介石，到了香港以后画了《现实图》，我在《现实图》里一下画了两个蒋介石形象过过瘾。

李怀宇 你为了画漫画，在重庆还跑到妓院了解情况，画成了彩墨漫画《花街》？

丁 聪 对。重庆有一个最下流、最低级的地方，我把它画出来了。徐悲鸿非常肯定。有这样的现实，我就要画。

李怀宇 周有光讲过一个笑话，抗战时期你经常去他家，他儿子十分崇拜你。有一次家中闲谈时，周有光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他六岁的儿子就向你告密。等到他儿子七十岁的时候，对周有光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丁 聪 周有光当时也在重庆，他跟我们也很接近，那个时候大家都向往共产党。当时我到了重庆不到半年，就赶上皖南事变。重庆的共产党疏散了，进步人士又跑去香港。我跟张光宇说，我们刚回来挺热闹，就要回香港么？那个时候唐瑜从仰光回重庆，唐瑜是我们活动的主心骨，我、张光宇就跟唐瑜去了仰光。到了仰光，张光宇一个月就住不下去了，我把他送回香港。后来我的护照要过期了，三个月以后我也从仰光经过新加坡回到香港。在香港我有《大地》画报可以画，也参加了不少话剧团。在报馆里，铜版印刷不方便我们就开了木版印报纸。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我们没有路可以走。我们周围吃了好多炸弹。我就找组织，去了东江纵队。到了东江纵队，一边被国民党包围，一边被日本人包围。我们在里边待了一百天，后来到了桂林，又到了重庆。我花的都是唐瑜的钱，用唐瑜的关系。现在我们依然来往。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唐瑜搞起来的。那么老的人物，现在只是一个处长。

李怀宇 抗战时期你和唐瑜、盛家伦、戴浩他们在重庆“二流堂”的事很有名。

丁 聪 “二流堂”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根本没有这么一个集团。我

最早跟电影接触，跟唐瑜结识。唐瑜后来跟潘汉年去武汉，就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唐瑜很早就参加共青团了，从仰光到上海进了电影界，随从潘汉年发传单、坐监牢。唐瑜的哥哥是仰光的华侨，做生意发财，就供给弟弟一个房子。唐瑜比我大四岁，我们一直很要好。唐瑜靠近共产党，出狱以后一直与潘汉年有联系。我又与唐瑜在一起，所以也就与地下党很熟悉。我跟共产党很多年，当时并没有想加入，只是一心想画画，能够发表就满足，与共产党有了不小的缘分。“二流堂”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最后才平反。现在关于以前“右派”的事情，我统统不讲……

李怀宇 抗战胜利后，你画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漫画。当时整个文化界的风气是怎么样的？

丁 聪 因为整个文艺界抗日协会都是周总理在领导的，文艺界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夏衍、陈白尘、阿英他们很早就是地下党。

1949年后，丁聪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此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无法在内地公开发表漫画。“文革”结束后，丁聪以超常的精力，创作了大量的讽刺漫画和文学书籍插图。1979年《读书》创刊后，他的漫画专栏从未中断。

李怀宇 1949年之后，漫画界的风气如何呢？

丁 聪 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我们跟阳翰笙、张瑞芳一批回到北平，那个时候还没有建国。后来，开文代会、青代会、政协会议。解放初期，周恩来他们也很平易，后来就不一样，但是周恩来对我还是很好，给我敬酒。解放以前，我们很大胆，以为不是共产党，好做事情，什么事情我都好做，那个时期反而是共产党比较困难。就算我被国民党抓到监狱，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共产党。那个时候，反而最大胆。

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画东风压倒西风，可以骂外国人，骂帝国主义。开始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反右”后才慢慢清楚……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跟第一次慰问团和廖承志去了，画画也都是凭概念的。刚刚建国以后，廖承志就找我去上海买邵洵美的机器，招工人。1950年年初运回机器，就让我们创

建《人民画报》。其实我不想编画报，这样就没有时间画画了，我是副总编兼编辑部主任，因为不是党员，后来就被打成“右派”。

李怀宇 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之间，有没有画漫画？

丁 聪 我偷偷地画，在北大荒我画了很多。1958年，我们去了北大荒，聂绀弩后来也去了。我当时也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画。我们当时怎么会反党呢？这样是胡说八道、没有理由的。现在我还搞不清，也根本不问了。在编《北大荒文艺》时，也为他们画出了一些插图，当然不是用自己的名字。这些都不是漫画，真正画漫画还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我一个人主要搞技术，每个月我在农垦局的印刷厂里设计版式、排版和校对，一待就是半个月。等刊物印出来后，再用牛车把它们运到火车站，装上货车，押运回来。这样，在编杂志的半个月里，我便有时间画画。我在《北大荒文艺》，聂绀弩当时关在监牢，我就把他也弄到杂志社。帽子不摘我就不回来。后来，我到了北京才摘了帽子，摘了帽子还是一样，还是“摘帽右派”。平反以后，我仍然不能在内地发表画，但可以在香港发表。我和龚之方合作，在香港《文汇报》上刊出《北京小事记》，他写文章，我配图，写北京的题材，都是歌颂的题材。

李怀宇 “文革”结束后，你又进入一个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创作环境怎样？

丁 聪 “文革”结束后，我们才基本恢复以前的工资、权利。断断续续地，我跟陈四益合作写了很多本书。1979年，范用、冯亦代他们请我去《读书》。但是受上海电影制片厂之邀，我去了上海搞电影，戏没有拍成。回来以后，我也不回《人民画报》。最自由的时期，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因为“四人帮”压得太厉害了，文艺界需要喘息。三中全会以后，我也画了很多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画。只要有机会、有氛围，我就会画……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英美都有限制，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只要不违法，都可以。

李怀宇 范用写过一篇叫《相约在书店》的文章，讲你们一起到三联书店旁边吃饭谈天，朋友间的情谊很让人感动。

丁 聪 跟《读书》那些人，我们是好朋友。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都退了，我是最老的了。我跟吴彬她们关系也不错。二十多年来，我还在拿《读

书》的稿费。我对《读书》有感情，尽管脑子跟不上了。这两天我又要给《读书》发稿子了，连标题也是我做的。

我们现在也是总跟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有黄苗子、郁风、邵燕祥、李辉、杨宪益、沈昌文他们，有些已经九十多岁了。我都怕这个聚会又被宣传、造谣。以前，跟唐瑜他们也是这样吃饭、聊天，就被打成“二流堂”。我们这些朋友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几年不见面以后，再见面依然如故，就好像昨天见过一样。我们都是很真的好朋友。对国家、对党，我们都只有好，没有坏。这些都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丁聪的漫画生涯，是现代中国漫画的一个缩影。杨宪益打油：“丁侯作画不糊涂，笔底才情敌万夫。今日语言无禁忌，只缘身畔无仙姑。”回首风云，他对中国漫画有自己的思考。

李怀宇 廖冰兄2004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漫画已经死了。你怎么看？

丁 聪 对。他比我大一岁。现在没有气氛画漫画了。我现在还在画，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

李怀宇 你觉得漫画在绘画的几种题材里有自己什么样的特点？

丁 聪 漫画应该是一个讽刺的东西，是一个讽刺的工具。我们总是要把不好的东西去掉，要去掉不好的、腐朽的东西，反腐倡廉嘛！

李怀宇 你怎么看待漫画的幽默元素？

丁 聪 漫画都是讽刺和幽默的两种味道，当然也有卡通，供人娱乐也可以。真正讲到点子上的东西，当然是大胆、分量很重的讽刺了，但是就有人怕这个啊。其实，有什么可怕呢？只要是讲道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如果没有地方讲道理，才可怕啊。至少我认为，从我个人的漫画成长经历谈起，漫画应该是讽刺的。漫画要有讽刺的东西，如果兼顾幽默自然更好。

李怀宇 那么在技法上，你觉得漫画的个人风格如何表现？

丁 聪 我是这么认为的，只要你画的、想的、感受的都是中国的、民族的，慢慢地你就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开始我们可以找自己的老师，也可以

学习外国人的，但是画着画着就要表现自己个性的东西。完全模仿外国人是不可可能的，必然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其中就会形成自己的个性。30年代，我主要也是接触外国人的漫画技法，但是我画的主要都是中国的事情。人物都是穿中国衣服、长中国模样，反映的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国社会的现实，那么就慢慢形成我自己的风格。

当然还有一个表现方式的问题，有人愿意这样画，也有人愿意那样画，个人的漫画表现方式应该是多样的。如果规定种种所谓的“纪律”，这个不允许谈，那个不允许谈……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还是要讲事实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标准谈或者不谈。今天他在台上，你就不能碰他，他下了台，人家才可以碰，根本不是讲法治的……

早期我漫画中的西方技法很多，现在我的风格也形成了，很难改变了。本身我还想学一些新鲜技法，但是也难改变了。所以，虽然开始是学习国外的，但总是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我现在不用署名字，都能看出是我的画。国民党时期我也是一直署真名的，因为我暑假名也没有用，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当时国民党警告过我几次，我曾经想过改风格，但是后来觉得一改就是证明了自己的胆怯，我就不改了，随便他们怎么样吧。

李怀宇 我看过你一张非常有意思的漫画，一个人在创作，背后有另外一个人在押着，标题叫《监督》，为什么有这样的创意？

丁 聪 有个人的影子在他的思想里，他创作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掉这个影子，如果去掉了，就不知道自己哪天倒霉了……

李怀宇 现在出现了蔡志忠、朱德庸、敖幼祥的新漫画，你怎么看？

丁 聪 那是有别于我们的另一种，就是供人娱乐的。开开玩笑也可以，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要怎么样。现在有一种东西打破了，就是漫画像。除了领袖之外，其他都可以画了。电影明星、体育明星都可以画了，这些很有意思，很好玩的。

李怀宇 有学者说，你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现实主义漫画家，所有作品都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

丁 聪 漫画与时代应该是紧跟的，不同时期的漫画应该有不同风格。因为社会在变，有权的也要求变，这些事情都难做了。我这个人是很守规矩

的，我画的基本上没有把人丑化。我画的文人肖像，没有大夸张，只是让人觉得有趣而已。有的人没有欣赏水平和幽默感，我画夸张了，对方可以说我丑化。既然不允许太夸张，我也不想惹麻烦，我就小夸张，一般的夸张。漫画给我带来了很多朋友，但是我不能放开了说话。我认为漫画如果离开了现实，就不成其为漫画了。现在就是缺乏讲真话。巴金讲真话，他有好日子过么？比死还难受！非要说不好的人好，我也做不到，难啊！



沈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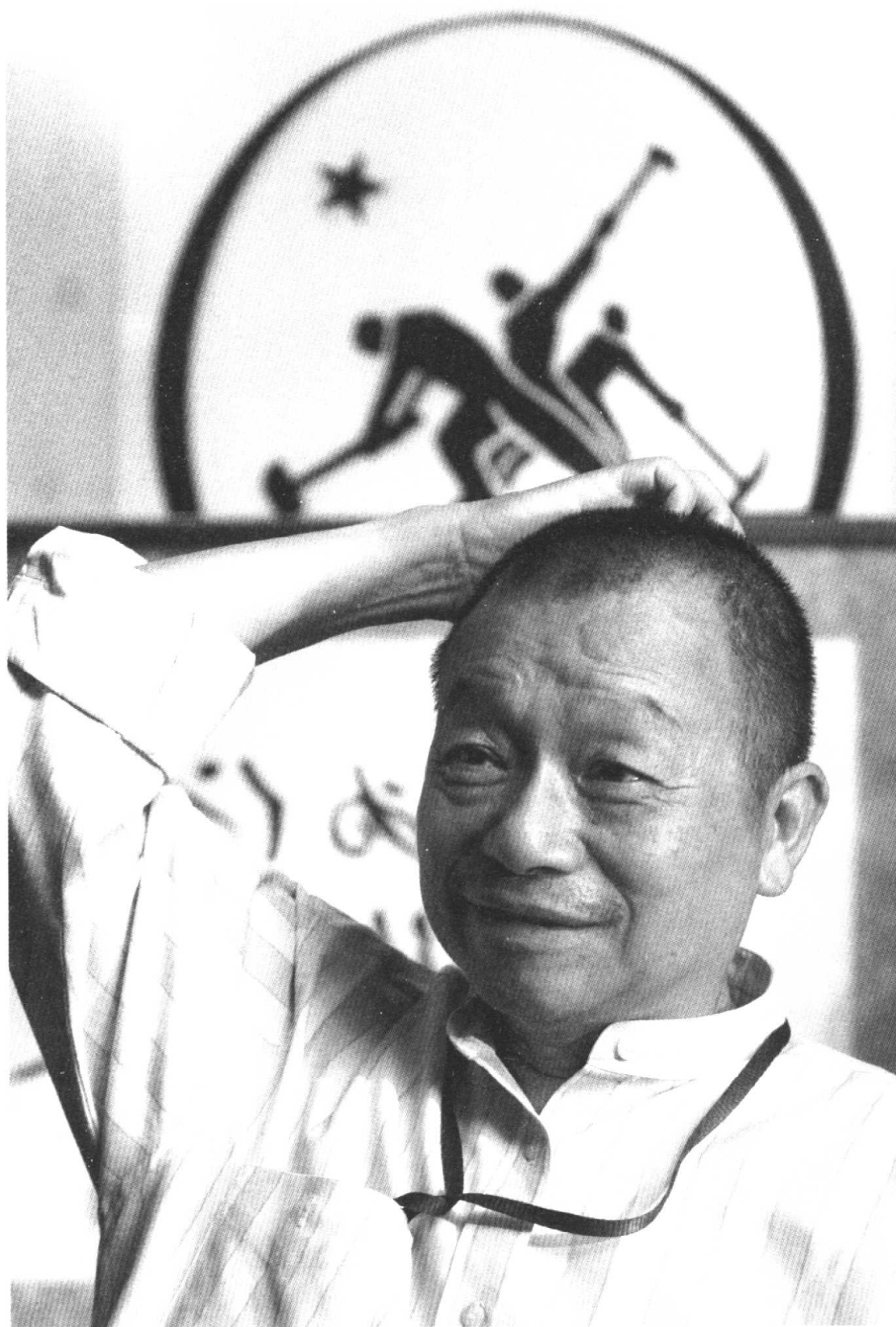
1931 年生于上海。

1951 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等职。

1986 年到 1996 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后发起创办《万象》杂志，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著有《阁楼人语》。



沈昌文

谈情说爱当编辑

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 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见沈昌文前，和北京文化界的几位朋友在三联书店后面的一个饭馆餐叙，话题上半场的热点是“超女”，下半场的主角是“沈公”。“沈公”是文化界后辈对沈昌文的尊称。提起沈公，他的阁楼，他的旧单车，他的红烧肉，他脖子上挂的U盘，他“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种种传说如数家珍，大家强烈要求我当面一一求证。

和沈公见面是在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乍见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也不好问是不是U盘。先问旧单车，他说：“我最近生了一场病，家里不准我骑车了。我太太和女儿都是医生，所以我家里医生比病人多。”

再问他住的阁楼，话就开始多起来。“这都是形象的说法，不是具体的真正阁楼。当然我现在住的也是小楼，因为我书多，我们两口子住三间一套，还有两间一套给我大女儿，我小女儿在美国。我对上海阁楼的印象很深，原

因不是我住过阁楼，而是我想住阁楼，住不到。我在上海的时候属于最底层，住的是街上的临时建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是，我一边做数学，一边偷懒的话，从板缝里就可以看到马路上的汽车经过。可是以后我跟上海的文化人有接触，知道阁楼。”一提起上海，不免从旧社会说起了。“我在上海做了六年的学徒，一边还上学念书。后来交代历史的时候，我交代我已经上了十四所学校，5点钟就开始上学，我每天上三个学校，念《古文观止》，念无线电。我会收话报，当时人家给我介绍一份工作，幸好我没有去，据说是‘中统’。我想去航空公司，但是我英语不好，1948年，我就开始学外语，俄语、世界语、法语、德语都学过一些。因为我穷困潦倒，我念书的学费是靠跟资本家造假账得来的，参加革命以后我都交代了。我们当时很拥护共产党，我的服务对象就有不少地下党员。解放后，三联书店在上海招考，我就去投考了。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我是工人，非常乐意去。我觉得我是工人，三联书店一定愿意让我去。结果，人家给我回信说要的是大学生。所以，我这一次‘投机’没有投到。再后来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我这一次就变成大学生了，因为我在市内的新闻专科学校读书。上海人都是很滑头的，我自己刻了一个图章‘学习报’，说‘介绍本报记者沈昌文前来应考’。我考得也不错，就到北京来了。当年三联书店没有录用我，多年以后我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又问当年在编辑部里煮红烧肉的事，他乐了：“当时《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都非常穷，就用电饭锅烧一锅红烧肉请兄弟姐妹吃。我喜欢做饭，一直到现在。我们家里有重要客人的时候，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做饭。家常便饭就是我太太做，我太太是北京人，擅长包饺子，不会做菜。我是穷人出身，从十三岁我就做学徒了，当做饭的人的下手，所以会做饭。王世襄做饭不得了，我后来跟他学了不少。他告诉我一条经验就是，做饭必须自己买菜，必须要早晨菜市场刚开的时候，就去挑最新鲜的菜。挑回来以后，自己洗、切，然后下锅炒，这样才能做出像样的菜来。我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当时住在芳嘉园里，我早晨陪他去买菜，他骑一个自行车出来，带一个菜篓。王世襄做菜是‘大家’了，但是有一道手艺我实在是学不会的。王世襄做菜经常买两斤，只挑其中最好的半斤用。那我不行，我小家子，我最多是买两斤菜扔掉半斤烂的。”

对“不是在饭馆里，就是在去饭馆的路上”这个说法，他更有得说了：“大多跟我有联系的作家都‘好吃’。不‘好吃’的，我们就慢慢引诱他，让他‘好吃’。所谓不‘好吃’，不是他不爱吃，是因为饮食习惯。我的老长官陈原先生是广东人，老家口味重。有一次我陪他到沈阳去，辽宁教育出版社请他吃饭，他就告诉我，那才是老派广东菜，他对港派的广东菜一点也看不起。有一次，我办得不是很妥当，我请王蒙吃大闸蟹。我发觉，王蒙平时很爱吃，但是一吃大闸蟹，他速度特别快。我们上海人就意识到了，大闸蟹吃得快的话就是他不能欣赏其中的奥妙。我一想，他是北方人，我怎么请他吃大闸蟹呢？南方人吃大闸蟹的时候，特别是女士，要把大闸蟹里边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考察’到啊。”

1979年的一天，几个读书人聚在陈原的病房里商量办一份杂志。大家觉得噩梦醒过来之后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这个园地，便是一份讲真话不讲官话的杂志。陈原曾撰文回忆当时众人的共识，那就是：“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不崇尚豪言壮语，不夸夸其谈，不随风倒，也不凑热闹，保持冷静客观头脑，独立思考。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人师表那样道貌岸然，自然、朴素、平等，完全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杜绝棍子！”（陈原：《界外人语》）这一年的4月，“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读书》创刊。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历经沧桑的文化老人，为这份杂志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激情。一年后，沈昌文进入《读书》编辑部。

李怀宇 现在谈到80年代读书和思想界的历史，少不了要谈《读书》这本杂志。许多人都会说，你编的时候是最好看的。

沈昌文 《读书》是这样的，我是躬逢其盛而已。《读书》创办的时候，我还在干别的。一直等到1980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才加入《读书》杂志。《读书》杂志已经出版了一些时候，我们那个年龄大概都算是“工作需要”吧（笑）。当时，陈原他们一些老人家已经把《读书》办成了，我只不过是接过手来，按

照他们的路子走。我并不是很有文化修养，不是很干练。我的长处就是很“听话”，那些老头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听话”到什么程度呢？最后是老头不讲，我也知道他大体什么意思了。或者讲一句话，我就知道他大概要说什么了。陈原老喜欢讲外国话，他的外国话大概就几个词，我就知道老头要说什么了，当然老头就很得心应手了。《读书》杂志的创意等，我都没有怎么出力（笑）。

李怀宇 当时的《读书》编辑部，好像一些编辑都不是文科出身，吴彬原来是工人，赵丽雅原来是卡车司机，后来都成了知名文化人，这种风气是怎样的？

沈昌文 当时《读书》奉行一条“干部路线”，这条路线现在当然不能用了，就是要“好人家”出身。所谓“好人家”出身，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招人的时候，像你们这种年龄的在当年没上过大学，都是经过“文革”，上山下乡。所以，我们选择的就家庭成分比较好的。但是，我们的“家庭成分好”不是毛主席所说的“家庭成分好”，不是“贫下中农”、“工人子弟”，而是要知识分子家庭、文人家庭，这样，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很多文人。比如吴彬，她刚开始就叫我们叔叔阿姨，因为她是吴祖光的外甥女，在吴祖光家里长大的嘛。比如赵丽雅，她从小跟祖父母长大的，受了熏陶以后，能够写一手好的毛笔字。写信写得很好，写信的语言都不是工农兵语言，而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语言，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地道的“腐朽”的知识分子语言。这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很受用，我也很受用。她给金克木教授、张中行先生写信，特别是张老，觉得很难有一个编辑能够这样给他写信。当时也招了一些有高学历的，反而在编辑工作上没有成就。这是当年《读书》一个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地方，今天当然用不到了。

李怀宇 这些人国学的功底深，西学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沈昌文 西学方面没有找到人，主要依靠外边的，冯亦代、董鼎山这些西学的专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总来我们《读书》杂志看看、聊天，他们也很需要那种氛围交流，大家谈得来。

李怀宇 这种风气很重要，梁思成、林徽因的客厅、“二流堂”、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黄永玉的万荷堂都是这样。大家不是同一个专业，在一起交流，有一种大的文化观念。

沈昌文 重要的是，要有思想要交流，我们就是不断地搜集研究这些事情，然后才想出一个题目来。所以，到现在我还欣赏，文化工作思想上要有一个这样的观念，要尽量吃饭、尽量可以说坏话，然后用不用稿子就是你的事情。这样，就比较容易成功，容易在圈子里树立影响。比如金克木教授，那都是几十年不说话的知识分子，到了这个氛围里就说话，他说起话来简直是不得了，聪明到什么程度啊，都握手说再见了，他还要说十五分钟，至少十五分钟。因为他的聪明用不完啊，肚子里东西太多，憋了很久。所以，跟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打交道，必须采用这种松散的方式。

李怀宇 现在文化界多是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很少不同专业的人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这一辈人好像越来越没有这种观念了。

沈昌文 这个我倒是觉得遗憾，我觉得特别是做出版的，更不能专业分工。要善与人同，要跟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而且自己要甘心处于为人服务的状态。比如听大家讲话，谁说了一本什么书，我明天就要想办法找到这本书，跟他说去。赵丽雅最有这个本领了。这样子，完全不考虑目前的功利，都是为了长远的教化。对于出版来说，我还是相信，编辑要跟作者有一个长远的交往、文化上的认同，中外都是一样的。我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不如赵丽雅他们，但是我也很努力，尤其是现在。比如明天我要跟一个作者吃饭了，我马上查Google，网上去查查他最近的想法，这样谈话才有共同点，拍马屁也能拍到点子上啊（大笑）。我要说出，最近李先生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又如何看法。我可以全部同意，也可以部分同意，这样才能谈得起来。所以现在比过去好多了，有Google、有百度了。过去没有，但是也必须要了解。

1954年，一位出版老前辈曾彦修，是你们广东来的大领导，他曾当过南方日报社社长，我是他的秘书，他教我们“以文会友”，我一直受用，做编辑就要“以文会友”。你肚子里没文，作者就觉得跟你没有意思。你送他什么他都不高兴，就不如送他一本书，他真的想看到的一本书，但是买不到，十几块钱比你送他一个花篮甚至别的好多了。文化人啊，都不计较这些事情，要在文化上有认同。1957年以前，那些老前辈在一起聊天，聊的都是“以文会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作家是衣食父母”、“拿来主义”这些话头，聊到的作家学者都是陈寅恪、陈登原、陈达、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这些

人。这些话头，我天天耳濡目染。可惜到了1957年话头都给打断。二十多年过去，基本上还是这么些人，又借着《读书》杂志把话头接上了。

李怀宇 从1957年到1976年大概二十年的时间，知识分子没有太多的园地去表达自己对文化的见解。改革开放了，正好有《读书》这样一份杂志，有这样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有这样一个氛围。你是如何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的？

沈昌文 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知识分子都需要有自己的园地，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自然地提供一些园地……我当时也是适逢其盛。我经常跟编辑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说，我比你们幸福多了。你们现在苦恼的是，你们有一些开放的做法受到限制。我们在80年代做编辑，经常是上边跟我们说：“你们开放得还不够。”（大笑）这就应该感谢邓小平和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管我们最多，常常批评我们不够开放，我想你也应该很高兴挨这种批评吧（大笑）。以前有这种批评，现在是没有了。我赶上了好时候。改革开放应该就是这么过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啊。按说我的专长，我在编辑部多年负责的是马克思主义史，我特别研究苏共的马克思主义史，我当然是斯大林主义者了，不是任何异端思想。但是，真正让我转过来，还是改革开放的大形势。

李怀宇 那些老先生都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都知道什么是科学民主。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五四的文化气氛在1979年又回来了，那些老先生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以后，把那种风气带到《读书》这里来了？

沈昌文 是的，那些老先生我印象非常深刻。比如吴祖光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他们风格就不一样，但思想是一样的，姿态不同，思想还是五四的。

李怀宇 当时《读书》杂志汇集了各种流派不同的意见，而不是办成小圈子内的同人杂志，你又是如何把握其中的度呢？

沈昌文 那些老先生非常注重各种流派的交流，不同的言论可以在一个杂志里进行讨论。我在《读书》杂志里边有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远在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老师，看了我的文章给我反映，我觉得他的反映真好。所以，我对每一期的读者来信都非常注重，我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读者来信，看看读者有什么反响。这些读者中可能有的是甘肃某一个县的中学老师，而我在北京的大机关里，以前根本不会在意他们。但是后来看了他们的来信，发现他们的思路跟我们很合拍，大家容易取得共识。这样的来信我还

保存很多很多，有时间的话，我还想重新整理，现在没有时间。

沈昌文主持《读书》杂志，按他的说法是“出于无能”：“好在编辑部里边实际办事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因而接受大文化人的种种指教室碍甚少，关系容易融洽。我以后常说，我们的这种方式，可称‘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而所有这些，说得难听，实际上还是一种对知识资源的‘贪污盗窃’，只不过彼此都心甘情愿而已。”（《阁楼人语》自述）抱着开放的心态，《读书》注意介绍海外、港台的文化现象和思想。同时，沈昌文善于将《读书》杂志的资源转化为三联书店的出版资源。

李怀宇 你有时间的话，把跟这些人的交往再写一本书，不要只出一本《阁楼人语》哪。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很多搞外文翻译的，把外国的思想介绍到《读书》杂志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沈昌文 外来的东西开头真正得益于冯亦代先生。冯亦代先生是真正的外国通，他了解美国，写过很多东西，他本身也有很多研究。并且，他善于启发别人来做这些事情。更主要的是，他给我介绍朋友，于是就开了很多专栏。后来，朋友约得多了，一直影响到我们的图书。举个例子，比如《第三次浪潮》，我跟韩素音一起吃饭，我一点没有想起来要跟韩素音谈书。我就问韩女士：“我马上要到美国去访问了，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啊？”韩素音当然指点我，说：“你注意，第一要衬衫，第二要皮鞋。你不要以为披在外边的衣服要像样子，但是美国人最看重的不是这个，而是你的衬衫和皮鞋，这是身份的标志。”就在那次吃饭，她跟我讲了，美国出了一本书叫《第三次浪潮》，出版以后很有影响，大家都惊讶了。我们决心由此突破，大力引进新思潮。

韩素音

华裔女作家，1917年出生，父亲为留比工程师，母亲为比利时人。1942年在英国出版处女作小说《目的地重庆》。其主要作品均取材于20世纪中国生活和历史，体裁有小说和自传等。曾多次访问中国。

从《第三次浪潮》开始是美国新思潮。后来，我接受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现在对出版界还是有用：就是我们要研究这个新思潮的来源。因为，中国目前还处于很多新思潮的前身阶段，更别说十几年前。所以，我们中国的问题跟那个比起来，我们觉得太远不可及了。像现在考虑新左派的观点一样，我对新左派观点也很佩服了，但那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发达了，自由主义变成一个普遍观念了。任何一个观念都有错误的地方，如果社会上普遍自由主义观念占统治地位了，新左派思潮应该说是很有作用的。这个观点也是在很多老人家的启发下，我才开始做。一开始是房龙，房龙一下子轰动了，一本《宽容》出来，一印便是十五万册。现在很遗憾，三联不印房龙的书了，都给其他地方印了。我记得《宽容》有十个译本，他讲的都是资本主义中期的事情，对中国特别有用。可能在美国已经不需要讲“宽容”了，如果讲“不宽容”反而可能还能引起注意。对于中国，尤其是当年，特别有用。

李怀宇 你们那时候已经想到，三联书店可以借助《读书》杂志这个平台发展出版事业了？

沈昌文 对。主要是跟《读书》杂志连在一起，就是这些人，这些作者就是《读书》的作者。所以我现在还是主张，出版社要办杂志，通过杂志了解思想界的脉搏，最主要是知道脉搏，很多事情就可以做。当然，要有上面掌权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要把上面的精神跟各方面的思想协调好。然后出书，我们很堕落的思想是，看了我的书以后怕产生很激烈的冲突，怕产生很危险的思想。就让他去产生吧，你不要介入，你介入就很麻烦。我为了保全我的帽子，为了保全我的看法，这是我当时的“反革命策略”（笑）。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编辑，最后的结论你不要下，我们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告诉你历史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编刊有一个好处，中国发展得比较慢，历史经验太多了。而且我发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各国做过的，很少有没有做过的。一直到现在，传统思想、国学等，尽管外国没有国学，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房地产，你去查外国的历史，都是外国做过的，还有城市改造、环境等问题，我们要吸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出版界就是要提供一种氛围，提供一种材料。可以作结论的作结论，但是尽可能不要作结论。因为你要相信，别人比你聪明，读者比你聪明。我们做编辑的可以不怎么介

人，要介入也不要介入。人生的乐趣也在于此，太介入就太烦恼了（大笑）。

李怀宇 现在回过头来看，像五四时期《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它也是有一批作者提出有影响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不是相同的，多元化的思想同时也带动了出版事业，所以才形成了繁荣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氛围里，你做的哪些书是值得回忆的？

沈昌文 特别有一个类别，像《美国读本》。因为要了解美国经验，大家说了很多美国的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没有看过《独立宣言》。所以，我们专门编了《美国读本》。那么我现在喜欢讲的一个故事跟木子美有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性解放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前奏，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许多革命前辈思想解放，他们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婚姻不自由。这是我翻看三联书店编辑的许多革命前辈事迹的目录知道的，夏衍很早就翻译了《妇女与社会主义》这些书。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因此我做了一本很得意的书，就是《情爱论》，俄文的。我一看到这本俄文书就大为惊讶，因为我很早就想出这方面的书，但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正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才强调肉欲。如果性爱的问题上，只讲感情，就是唯心主义的，对不对？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排斥肉欲，我觉得这个观点新颖极了，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讲，我这里好通过。一出版几年就印了一百二十万啊。这本书是我觉得很高兴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又作了一些有关的书，蔼理士的《性心理学》，潘光旦的译本。潘先生我过去认识，他是上海人，跟我很谈得来。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书。所以木子美现象一出来，我当时就跟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是不是去做木子美是一回事，但是从思想情况来说，思想解放到一定程度，就要解放到这个层次。

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我讲一个列宁的例子。柯伦泰夫人是列宁培养出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教育部长，当时不叫“教育部长”，提法是“教育人民委员”，她在性的问题上非常开放。她提出一个主义列宁非常反对，中文翻译为“杯水主义”。她认为，女性要解决性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柯伦泰夫人年轻时候美貌过人，当年她高兴的时候情人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他们两个人高兴了就去外地“喝一个礼拜的水”。回来以后，俄共中央委员会要处理，有人当时提出来要枪毙，报告给列宁，

列宁说枪毙太轻，要给他们两个更重的处分，就是立即结婚（大笑）。所以这种问题，必须很好地处理。如果采取特别处理，就不好。因为当时俄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情况，人们思想解放，什么都可以解放。为什么说老爷们的东西是解放的，但是姑娘们的东西就不能解放呢？所以，必须进行讨论。我比较赞成李银河的意见。后来我就退休了，但是我在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出了不少书。

李怀宇 在港台方面，罗孚先生当时介绍了一批香港的作家，像《你一定要看董桥》就非常有影响，后来又有作者介绍台湾的东西，这种东西当时你怎么看？

沈昌文 开阔了眼界，主要是香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又跟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了。原因也很简单，三联书店成立了，可是国内的出版界有分工，比如，文学出版社可以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可以出古典书，三联就没有分工。我当时就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说：殖民地已经分割完了。那就逼着我非要跟其他出版社“打仗”，我也要抢着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抢，一方面要开辟新领域。这个新领域根据《读书》杂志的经验就是港台，于是我们就很成功。后来，我们就更成功了，我把我的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做香港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样，我们就把蔡志忠漫画垄断了，全部由我们出版，并且将他的版税存到三联书店，用他的版税买了房子，给三联书店做职工宿舍。蔡先生觉得很好，也很支持我们。所以，三联书店内部叫我“卖蔡”的总经理，说我“卖蔡”起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过去的国学基础，我后来很奇怪，“蔡志忠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进行国学的启蒙。一方面我觉得高兴，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可悲。中国的读者啊！好多年轻人，跟他说起《论语》、《庄子》、《孙子兵法》，都是蔡志忠漫画。

李怀宇 据说许多海外华人还让子女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签给三联书店是怎么回事？

沈昌文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时是我联系，后来已经不是我当家了。金庸是罗孚先生介绍的，他们是好朋友。1989年，我到香港，老罗给我郑重介绍，金庸很重视我，谈了很多条件。可是那一年国内多事，我忙于这里的事

情，也就搁置了金庸的事情。后来等我退下来，董秀玉主持工作的时候，又重新跟金庸提过去的事情。所以，金庸的收入不在我任内，我任内是“卖蔡”。

李怀宇 蔡志忠与金庸两个人都研究佛学，不过金钱观不太一样，蔡把钱看得轻，金则看得重。

沈昌文 那的确是。后来董秀玉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才有金庸的武侠小说版权给了广州出版社。

1994年，沈昌文、吴彬、赵丽雅、陆灏协助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署名“总策划：脉望”。“《书趣文丛》的面世，确实在读书界引起一些波澜，一方面使‘书话’类图书走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读书方式、方法、目的’的种种思考。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询问：‘脉望是谁？’上面已经说过，它是几位爱书的人；但是知情者还是说，脉望的那双大眼睛颇有些像戴着一副大眼镜的沈昌文先生！”199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间咖啡馆里，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老总俞晓群聚会。陈子善从书包中取出厚厚的几本旧杂志，那是40年代的老《万象》。老辈们都说它好看，时常怀念不已；小辈们也说它不得了，因为这其中有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陈蝶衣、平襟亚、柯灵、傅雷、郑逸梅、张恨水、李健吾、张爱玲。沈昌文说，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万象》杂志。（俞晓群：《人书情未了》）

李怀宇 你从《读书》退下来以后，《万象》是怎么一回事？

沈昌文 《万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在编《读书》的时候，一直对《读书》有一个想法。《读书》当时老前辈定的是思想性的刊物，特别强调思想性。因为当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而且陈翰伯、陈原都是非常思想的。那么，我的兴趣不在思想性，而在趣味性。我想做趣味性的，而又比较能登堂入室的趣味性。上海有两种趣味性，我十三岁在上海做学徒，

《万象》

1941年7月创刊于上海的综合性月刊。陈蝶衣、柯灵先后任主编，以刊登文学作品为主，兼容文史掌故、科学与生活常识、影剧评介等内容，是上海沦陷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1945年6月停刊。

就是在柜台上看小报长大的。小报看看没有味道，我才开始注意柯灵先生主编的老《万象》，那个时候已经停刊了，但是在马路上还可以买到旧的刊物。特别是我老板的弟弟去世，留下来不少好的《万象》。我经常看，是店里唯一喜欢这种东西的人。

退休以后，没有事情了，我跟柯灵又比较熟，老去拜访他。于是谈起《万象》，想复办。当年，我记得李欧梵谈过，他特别赞成，他熟悉上海文坛，特别赞成恢复，我就把他请来当顾问。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恢复了以后，我就没有管，完全是陆灏在管。

李怀宇 陆灏编的时候，几乎每期《万象》我都看。《读书》大概一年买一期。

沈昌文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资（笑）。

李怀宇 我觉得《万象》还不是小资，是遗老遗少（沈昌文大笑）。《万象》有一个特点，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老的，但是写的人受过西学的教育，懂得西方那一套，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中西结合得很好，有趣味性。

沈昌文 对于这一条，我总是奉劝。你是从广东来的，我特别可以说说。中国要特别注意海外的东西。大陆的发展比西方落后，包括比台湾也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 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李怀宇 《书趣文丛》也是引进了很多海外的作者的书。

沈昌文 对。都是《读书》的资源，吴彬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所以我觉得一份杂志的资源非常重要。我现在有时候还是跟三联书店建议，应该重视这些资源。最好编辑部高层能够合在一起。这样，联系作者、编书都很容易。

李怀宇 《书趣文丛》总策划“脉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沈昌文 是陆灏提议叫“脉望”。赵丽雅、吴彬、陆灏等，我当时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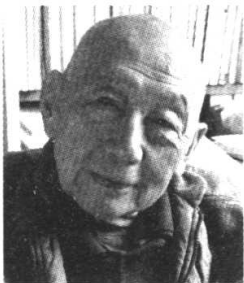
他们的头头。离开《读书》以后，我又把他们老朋友集起来，当时主要吴彬做得多一点。后来，赵丽雅倾向于研究、做学问。

李怀宇 怎么跟俞晓群交往的？

沈昌文 俞晓群原来是赵丽雅、吴彬的朋友，是《读书》的广告客户。俞晓群负责辽宁教育出版社，他们认识后给我介绍。我认识俞晓群的时候，已经退休了。他在《人书情未了》后，最近要出一本书，写作很勤。

李怀宇 我听到一个传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俞晓群不是给你付工资，是给你报销那些差旅费？

沈昌文 是，我不拿工资。我就是所谓的二十个字的最后四个字：“坐以待币。”我把单据寄出去，坐着等人民币。我在外头开支也很大。我这二十个字就是：“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二十个字，字面上都是不应该提倡的，要另作解释：“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就能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让我帮过的单位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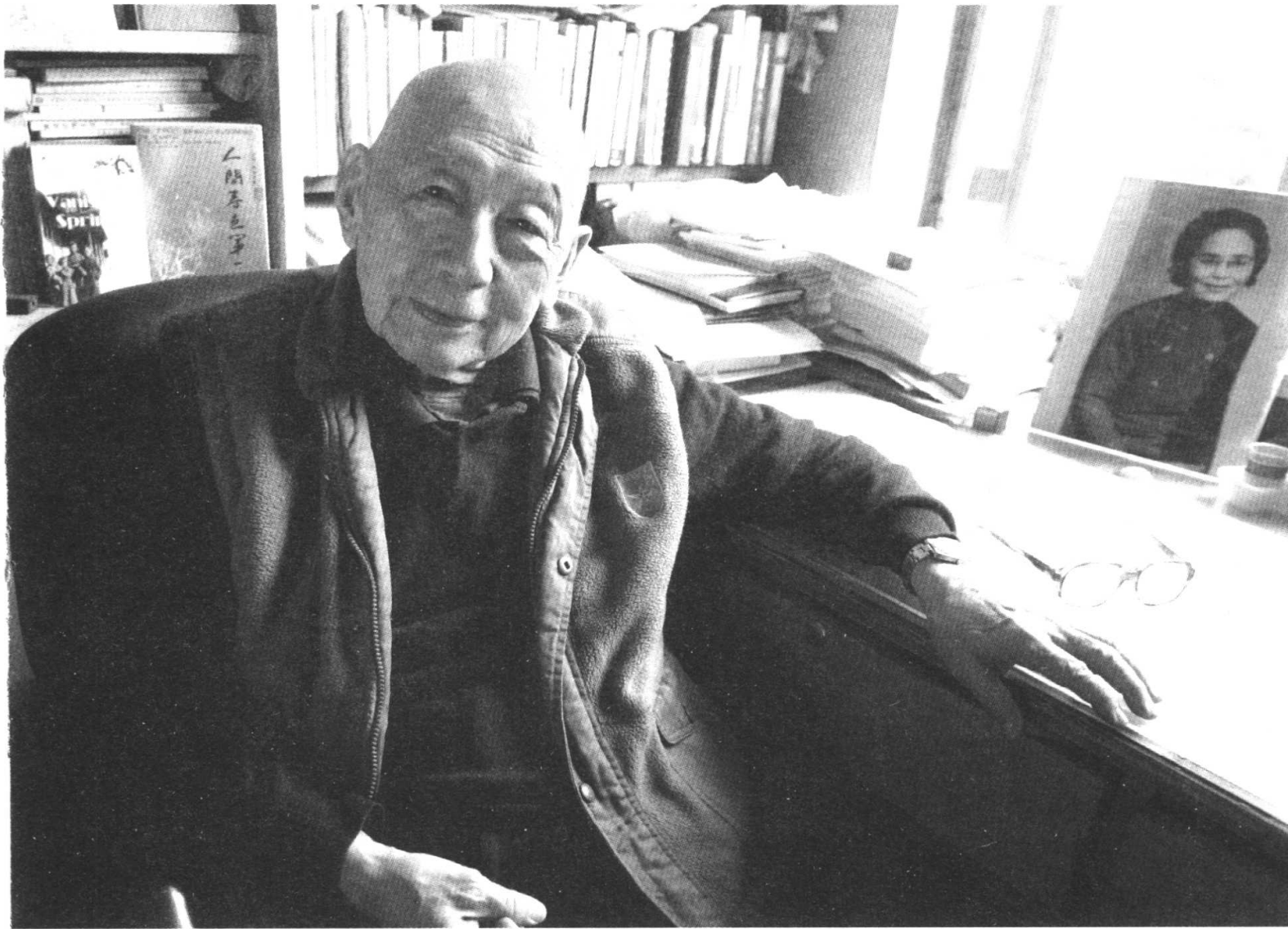
何兆武

1921年生，湖南岳阳人。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

1956年至1986年，历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



何兆武

兴之所至自由读书

一个人在看鲁迅的书，工宣队把他训斥了一顿：不要看与运动无关的书。还有一个人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果也是被训斥了一顿：你不要好高骛远，你就老老实实在看你的小红书，好好检查你的思想。一个研究所，鲁迅也不让看，马克思也不让看，我觉得这太荒唐了。

何兆武先生爱笑。一见面我就问：“为什么不出《上班记》？”他笑道：“还没写呢，也不好写，因为涉及好多事情。”对《上学记》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他也觉得出乎意料。《上学记》为“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他介绍，文靖是三联书店的编辑：“原来没有想到写书，她找我想了解从前的事情，我们谈天，她有兴趣了，就成了书。”

我对《上学记》中的大才子王浩甚感兴趣，便讲了一个从陈之藩先生那儿听来的故事：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任教的大学演讲，时间在下午。午饭后，王浩经过陈之藩的办公室，一看门牌上写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就敲门进去，自我介绍后，两个人聊了起来。王浩特别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陈之藩却从来不看金庸的小说。王浩说：“我们在海外，这么寂寞，这么无聊，没有金庸小说怎么过？”陈之藩说：“我不看金庸小说，过得也不寂寞，也不无

聊。”两个人争了起来，争完了一看，王浩演讲的时间早已过了。何兆武听了，哈哈大笑，说起这位一生最好的朋友：“王浩一个是天赋好，一个是外在条件好，没有外在条件也不行。”

谈了一会，我觉得何兆武的谈话风格太像沈昌文了，便提起沈昌文的趣事。他马上说：“沈昌文了不起，他学历不高，但水平高。《读书》现在不如沈昌文时代办得好。现在非得都是博士，那也不一定，人家能够作出贡献，不一定非得是博士。我觉得应该看水平，看贡献，就像运动员一样，看谁跑得快。现在过分重视学历，我觉得不应该。”

谈了半天，何兆武好奇地问我采访过哪些老先生，然后大发感慨：“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一代是受了五四的强大影响。”我好奇地问他还有哪些老先生可以采访，他若有所失：“周一良、邓广铭、张岱年都去世了，季羨林、侯仁之身体不大好。”我几乎问遍了视野所及的学人，他不时品评两句，突然说：“还有些东西，现在不鼓励，可是应该抢救，就是关于‘文革’的这一代。再过几十年，这一代人就不在了，‘文革’就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这太可惜了。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抢救。江青没有留下一个口述历史，太可惜了，你为她留一个口述历史，并不意味着你赞成她，就像法官审判一个样，原告被告都应该申诉自己的意见嘛。”

何兆武笑称现在不务正业，每天看看书报，偶尔有朋友来聊聊天。爱好也别致：“电视里凡是古装的戏我都不看，觉得败坏胃口。我看旧的京戏，可剧目太少，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戏。听一下古典音乐，我的理解就到19世纪为止，19世纪以后现代化的东西理解不了，现代音乐我也接受不了。”黄昏时，他送到门口，我说：“下次来就不是采访，而是聊天。”他哈哈大笑：“聊天最好！”

1939年，何兆武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他回忆：“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这段好时光的故事，大多记录进了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上学记》。

李怀宇 我在春节前去昆明看了西南联大的旧址，也在全国各地采访过几位西南联大的校友。当时物质那么贫乏，西南联大的生活为什么还让人那么神往？

何兆武 邹承鲁说的那两个字：自由。我觉得他说得还笼统了一点，我想具体地补充一下，他的所谓自由，就是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

李怀宇 你在西南联大读了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个系，在同学当中有没有人像你这样读了四个系的？

何兆武 转系是常见的，但是读了四个系的，大概不多（大笑）。这里面也表现了一种自由，你对什么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不是对你限制得很严格。

李怀宇 进入西南联大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主要兴趣在哪里？

何兆武 就是因为不明确，所以老转系。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且没有这个想法：我将来准备做什么？也有的人，对自己的前景想得非常具体，**何炳棣**就是，你看《读史阅世六十年》那本书里，从小就是目标非常明确，非常严格地给自己规范一套道路。我自己就是这样，没有具体的设想，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兴之所至，没有功利的思想，没有想到哪一年我要读硕士，哪一年我要拿到博士，然后哪一年怎么样，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何炳棣

历史学家，1917年生于天津，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5年赴美留学，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广泛。1975—19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会的首位亚裔会长。

李怀宇 当时知道西南联大有那么好吗？

何兆武 在抗战以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在北京，南开大学在天津，都算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当时西南联大在国内就算是最好的学校了。

李怀宇 那时候常泡茶馆吗？

何兆武 经常泡，没有别的消遣和娱乐，那时候也穷，而且当时的条件也不好，就是到茶馆里去喝茶、聊天。

李怀宇 你还看了两百多场电影？

何兆武 都是好莱坞原版的，有的打字幕，有的不打字幕，没有配音。

李怀宇 当时读书用功吗？

何兆武 有的人用功，有的人不用功。像我，喜欢看一点书，不过没有一个目标，完全是自己兴之所至，觉得这个好，看，觉得那个好，看，没有

功利的想法，说我要研究出一个什么项目。

李怀宇 你怎么学外语的？

何兆武 也没有打下特别好的基础（笑）。后来翻译那些东西，也都是兴趣，高兴就搞一点。

李怀宇 汪曾祺写他在西南联大，也是兴之所至、自由散漫的。

何兆武 他就是那样，不是很功利的，有的人很功利，就是要研究出什么来，有很详细的规划。有些人就是觉得读书好玩，没有规划。

李怀宇 《上学记》里说，王浩后来到哈佛大学只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你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西南联大有那么多跟国际同步的书吗？

何兆武 他那一行比较容易找，他搞哲学又搞数学，那些重要的书我想都有。

李怀宇 你泡图书馆时喜欢读的都是些什么书？

何兆武 我读的都是古典的，现代化的东西读不下去。所以我的欣赏水平到19世纪为止，19世纪末、20世纪都不行，现代化的东西我接受不了，没有那个基础训练。

李怀宇 西南联大里也有一些老师互相之间不服？

何兆武 这是很正常的，中国有一句古话：“文人相轻。”（笑）

李怀宇 你有没有留意当时在学校里面，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

何兆武 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尖锐，有时候缓和一点，但是始终存在。抗日战争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抗日战争以前我在中学，但是大学的情形也间接知道一些，各个大学也是左派右派闹得很厉害。抗战以后，1937年到1938年，左派右派之间的矛盾缓和一些，那时候面临着共同的敌人了。1938年以后到抗战的中期，战局比较稳定的时候，左派右派的矛盾又尖锐了，一个表现是解散新四军，从那以后，矛盾就更尖锐一些。

李怀宇 当时在学校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左派学生？

何兆武 那当然会接触。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意见，但是一般的不会太尖锐。也有个别同学把重点放在政治上，不过大部分人都不是过分地重视这些东西。

李怀宇 复员后，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分开，那种学术传统有没有断？

何兆武 我想是解放以后跟解放以前不一样，教育体制不一样，教育方式也不一样。

李怀宇 台湾大学在1949年以后是不是较完整地保留了那种学术传统？

何兆武 台湾大学最初一批人就是老北大的，傅斯年带的那一批人都是从老北大去的，姚从吾、钱思亮、毛子水。后来他们自己培养人才。

李怀宇 《上学记》里提到你有所保留的两个人，一个冯友兰，一个吴晗，书出版以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何兆武 吴晗没有，冯友兰的姑娘宗璞不同意。不过我觉得每个人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不一定说每一个问题大家都一致同意。我是这么看，你是这么看。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授给冯友兰荣誉博士，奖励他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贡献，冯友兰也就接受这个博士了，在我看来就有点滑稽（笑）。因为包括冯先生自己都知道，有两个冯友兰。他在1959年写过一本《四十年的回顾》，认为四十年不堪回首，觉得自己是一个逆流，他否定自己，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这显然有两个冯友兰了。哥伦比亚大学表扬冯友兰的贡献，是表扬逆流的冯友兰的贡献呢，还是表扬毛泽东的小学生的冯友兰的贡献呢？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很精，只提他的贡献，不提他的什么贡献。冯友兰答词的时候，他应该有个交代，可是他也不说，我觉得牛头不对马嘴。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虽然古老，可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完全对不上口径，你的贡献你怎么看呢？这个戏演得非常滑稽，但是宗璞先生认为非常严肃，非常认真。那么，各人可以有不同理解，就好像看一个戏一样，你觉得很好，我觉得不好，可以允许观众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我想我们可以各人保留自己的意见。

1946年，何兆武从西南联大毕业，先后到台湾、湖南教书。1949年，何兆武回到北京，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三个月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两年，又到西安工作四年。1956年至1986年，何兆武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李怀宇 1949年回到北京后，你怎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去学习了？

何兆武 那时候好几个革命大学，叫“革大”。解放战争胜利了，形势来得很快，那么大的地方需要大量的干部去接收，就在社会上找主要是中学生，还有一些在旧社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进来学习三个月，就出去工作。那个大学跟我们普通的大学不同，我们大学是有专业的，几年才毕业，它是三个月就毕业。来了学什么呢？学政治理论、马列主义理论、《人民日报》社论，还要改造思想，自我检讨，做思想总结：我是旧社会过来的，我有个人主义，要不得。后来学习政治的风气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比如说社论出来了，我们学习怎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谈个人的体会。

李怀宇 心理落差大吗？

何兆武 当然也有些不习惯，过去思想自由惯了。学习的时候结论是摆在那里的，比如说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家都要进行到底，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半途而废吧。（笑）

李怀宇 自由惯了的人，是怎么适应过来的？

何兆武 所以要改造思想，就是要改造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一定要纠正，《毛泽东选集》里面有一篇《反对自由主义》，这就叫自由主义。

李怀宇 你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对胡适怎么看？

何兆武 胡适那时候名气大得不得了，而且影响也大。胡适的地位有点像解放以后的郭沫若，但是跟郭沫若还有点不同，就是郭沫若的牌子是当局要树立的，胡适跟国民党毕竟不是一条路，所以国民党并不树立胡适这个牌子，胡适这个牌子倒是他自己闯出来的。

李怀宇 后来批胡适的时候，你怎么看？

何兆武 那是运动啊，大家都得批。后来批吴晗的时候，大家都得批吴晗，你不批吴晗，自己过不了关。

李怀宇 余英时写过，在美国时大家谈起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钱锺书忽然对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

何兆武 那也可以原谅，当时的条件是那样。

李怀宇 当时你对郭沫若的文章和行为怎么看？

何兆武 郭沫若也是高度紧跟的。郭沫若在“文革”里边很惨，他两个儿子都是非正常死亡。解放前，他是一面旗帜，一面左派的进步的旗帜，影响还是大的，可是解放以后不一样了，地位也不一样了。

李怀宇 在北京时，觉得当时读书的风气怎么样？

何兆武 解放以后，没有自由读书的风气了。可以读的就是标准的学习文件，没有自我探索的兴趣。后来我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挂了个牌子，应该研究历史吧，可是不行，还有人看着你。一个人在看鲁迅的书，工宣队把他训斥了一顿：不要看与运动无关的书。还有一个人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果也是被训斥了一顿：你不要好高骛远，你就老老实实地看你的小红书，好好检查你的思想（笑）。一个研究所，鲁迅也不让看，马克思也不让看，我觉得这太荒唐了。

李怀宇 你在历史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何兆武 主要工作就是学习，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大革命”，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

李怀宇 1957年“反右”对你有没有影响？

何兆武 那当然有，政治上倒没有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因为我没有活动，也没有发言，所以没有抓我（笑）。

李怀宇 你跟你的上司侯外庐接触多吗？

何兆武 接触多，因为他就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直接领导我们。他有点书呆子气，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要找马克思的原典，政治有时候不是凭原典的，是凭当时的需要，所以他有时候赶不上政治的步伐。

李怀宇 你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搞翻译了吗？

何兆武 对。搞翻译算起来是资本主义的自留地，说是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所以不鼓励个人去搞什么。今天你可以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那时候不可能。

李怀宇 后来上面让你去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请罗素到中国来访问，罗素同意了，可是一直身体不好，就把他的《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当时商务印书馆找我来翻译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

务。“文革”的时候说我这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因为罗素是资产阶级。幸亏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书是毛泽东交给译的，我想给我这个帽子的人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那他也是反毛泽东了。

李怀宇 1966年“文革”爆发时，你在北京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何兆武 天下大乱，看到的每一个场面都是惊心动魄的。1966年的冬天，我那时候住在城里，红卫兵押着彭德怀去游街，那时候彭德怀很老了。北京冬天刮风，非常冷的，把他五花大绑，也不戴帽子，头发乱的。我看了，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他如果有罪的话，应该经过正式的程序判他的罪，对一个老人不能这样呀，就是对一个年轻人也不能这样呀。我是看不惯。

李怀宇 你所在的研究所呢？

何兆武 也是这样。侯外庐也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李怀宇 “文革”时你自己的处境怎么样？

何兆武 我有两条罪名，一条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一条是“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

李怀宇 怎么攻击的呀？

何兆武 我不太喜欢样板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我觉得京剧是古典的剧种，古典的剧种要穿起那套古装的衣服载歌载舞，穿现代的衣服在台上载歌载舞就觉得不是味儿。这就构成了“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怀宇 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怎么处理你？

何兆武 关到牛棚里。那时候还好，因为牛棚里的人多，所以也不觉得寂寞（大笑）。我们历史所里，年纪大点的在旧社会成长或工作过的是“牛鬼蛇神”，大概有三分之一，后来年轻人变成“5·16反革命集团”的又有三分之一，革命群众也有三分之一。“老反革命”和“新反革命”加起来占多数，革命群众占少数。

李怀宇 你的同学汪曾祺就是去写样板戏的。

何兆武 对，好像是他最后统的。我问他：“你还懂京戏哪？”他说：“不懂。”我说：“不懂京戏怎么能写剧本哪？”他说：“写剧本跟不懂京戏没关系。”

李怀宇 后来也有人拿他写样板戏这一点来诟病他。

何兆武 不是，这东西是上边给你的任务，你非得干不可啊！我们那时候劳动，拆西直门，西直门是元代的城门，八百年来首都的城门给它拆掉了，那我们也得去拆。

李怀宇 梁思成曾对拆城墙痛心疾首。

何兆武 我不赞成拆，可是上面要你去拆，你就得去拆。

李怀宇 在“文革”十年当中，你还有没有条件看书？

何兆武 “文革”的前两年，我是任何组织都不参加，因为太混乱了，我看不出谁是革命分子，谁是反革命分子，就在家里，那倒是确实看了点书。后来关进牛棚了，就没法看书，到了“文革”后期，又可以看书了。

1986年后，何兆武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近二十年来，何兆武在译介西方史学、哲学思想方面不遗余力，与其对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

李怀宇 1986年后怎么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来了？

何兆武 50年代院系调整的时候，清华大学的文科没了，“文革”结束以后，觉得还是要恢复，就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其实就是文科。我来了清华，第一年教西方思想史，是大课，后来教研究生的课，教了几年之后，到我七十周岁的时候离休了。

李怀宇 葛兆光给《上学记》写的序说，清华大学给你举办八十寿辰庆祝会，你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

何兆武 现在帽子乱加，我觉得不太好。比如说“国学大师”，这个是国学大师，那个也是国学大师，大师满天跑（大笑）。还有，也可以庆祝别人的生日，那是这个人要有特殊贡献的，我又没有贡献，又没有什么，干吗庆祝这个呢？那是贬值，货币贬值，大师也贬值了，动不动就是什么大师。

李怀宇 这个时代还有大师吗？

何兆武 也许有，不过很少，如果多了就不是大师了，大师顾名思义就

是很少的。我想梅兰芳可以算是大师，京剧大师，不能那么多大师。

李怀宇 “文革”结束之后的学术风气又有什么变化？

何兆武 比从前当然好很多，不过还不够，慢慢来吧。

李怀宇 你怎么有兴趣翻译了那么多西方的学术经典？

何兆武 大体上都是自己欣赏的东西，欣赏并不意味着我完全同意它的观点。总之都是自己有兴趣的东西，都是自己找的，只有《西方哲学史》是它找我的（笑）。

李怀宇 改革开放之后，你到美国去访问，都见了哪些学者呀？

周策纵

1916—2007，历史学家、红学家，湖南祁阳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1948年赴美国留学，由博士论文扩写而成的《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影响巨大。

何兆武 王浩肯定见啦，还有余英时、唐德刚、夏志清、周策纵。余英时用我们的标准来看，他是右派，学问还是有的，这没问题。唐德刚对口述历史有贡献，尤其是他写《胡适杂忆》，别是一种风格。还有，他写着写着，喜欢随便插进一点。夏志清年龄跟我差不多，早该退休了吧。周策纵到我们这里讲演过，讲五四，那是1989年。

李怀宇 你在美国住的时候，看外文原版书多吧？

何兆武 我去过六次美国，访问了几个大学，开开眼界。我每天到图书馆去转，就好像我们做学生时候一样。我们的图书馆不准人进去的，我在历史所干了三十年，都是六十岁的老人了，都不能进书库，要借什么书，填个条子，管理员进书库给你拿，拿来了没有用，又拿回书库。你每次要借书，只能填三个条子，拿来的书没有用，好了，你这半天就浪费了。你要是去逛书店，半天能看多少书呀。美国的图书馆真是方便，而且真是有意思，我在历史所干了三十年都不能进书库，到了美国，我是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都没有，可以随便进去，一天没有事的话，可以看一天，能看多少呀。

李怀宇 香港的中央图书馆也是这样，不管你是哪里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看。

何兆武 对呀，就应该是这样。这个要看图书馆的定位是怎么定，如果定位这个图书馆是个藏经楼，尽量不让人进来，是国宝，保护国家财产，尽量不让人看，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这是一个救济的仓库，你们精神饥

渴的人都可以来吃、来喝，越多越好。图书馆的作用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李怀宇 你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也是开放的？

何兆武 开放的，随便进去，你一天能看多少呀。而且设备很好，这边是书架，那边是桌子椅子。只有你有精神，可以从早看到晚。

李怀宇 有朋友说，看了《上学记》之后，竟莫名地生了今不如昔的感慨。

何兆武 有些方面是今不如昔，但整体来看，学术水平是不断提高。今天的科学水平肯定比当年高，文科也是一样，不过有些方面就很难说了。我想这个要实事求是。你给他大的自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他的潜力。我在中国社科院待了三十年，“文革”以前和“文革”以后大不相同。“文革”以前那十年，成果实在寥寥可数，改革开放以后，那现在的成果不知比从前翻了多少倍。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给大家一点自由，可以搞你自己有兴趣的领域。过去不许写文章的，写文章必须是上级给你的任务，要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不让你写，你自己不能写。而且那时也不可能自己写文章，因为必须配合上面的形势，上面不给你任务，你配合不了形势。总体来说，今天还是大大超过从前。

李怀宇 你提倡现在尽可能地记录老人的口述历史？

何兆武 对，老人有两种，一种就是本人是很重要的历史人物，应该写回忆录。可惜没有给江青留一个口述历史，“文革”十年，江青是挂帅的人物，不给她留下口述，太可惜了。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人，可以就普通人的观点感受来记。那也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历史中并不仅仅有伟大的人物，也有普普通通老百姓，他要是写下真实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你看，清朝初年的时候，有名的两部书，一部《扬州十日记》、一部《嘉定三屠》，那都是普通人写的，他不是重要的人物，可是他写的事情值得我们参考。比如说，日本人占领南京，南京屠城的时候，据说屠杀了三十万人，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写的屠城情况。普通老百姓也是值得写的。



高莽

1926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

毕业于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长期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其所属单位工作，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

曾获俄罗斯美术研究院“荣誉院士”称号、俄罗斯作家协会“高尔基奖”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授予的“友谊”勋章。

著有《久违了，莫斯科！》、《灵魂的归宿》、《心灵的交颤》等，译有《保尔·柯察金》、阿赫玛托娃长诗《安魂曲》等。



高莽

在翻译和绘画之间

我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翻译？之后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高莽先生的家名为“老虎洞”。高莽和妻子孙杰同岁，都属虎，家里摆放了各式各样的老虎模型和绘画。

在“老虎洞”里，我见到了热情豪爽的“老虎一家”。十年前，孙杰双眼失明，女儿正在巴西工作，回来探亲时看见母亲的样子，毅然留下来照顾双亲。高莽说：“我女儿是我们的厨师、清洁工、护士、秘书，还是我的电脑员，什么事情都是她管。”

高莽看上去精神抖擞，却对我说：“我开玩笑说，除了妇科病，我什么病估计都有了。我爱人虽然失明，但身体比我好。”他喜欢给她照相，让她在花开花落之间留影，期盼着她的眼睛好了以后，可以看看自己失明时的样子。“这十年里，她看不到我，不知我头发白了多少，脸上长了多少斑，但我能看到她一天天的变化。所以无论我女儿多么孝顺，我还是想活到把她先送走，

不是我贪图多活几年，而是想完满地走尽一生的路。但现在看起来未必能做到，我身体不如她。”

高莽说：“一生当中有三个女人对我影响最大。”除了现在身边的妻子和女儿，还有他的母亲。老太太活了一百零二岁。母亲九十岁时，高莽从干校回来，记挂着小时候的鞋、袄都是母亲做的，便亲手给她做了一身衣服。夜里，高莽见母亲屋里灯亮着，悄悄过去一看，发现她把衣服全拆了。高莽纳闷，后来实在憋不住了，一问，母亲说：“你扎的线不直，穿在身上会不舒服的。”老太太一辈子不认识字，临终时对儿子说：“我死后，在我身上放本书吧！我一辈子想识字看书。”旁边的小曾孙说：“您不识字，看不懂书，还是给您放本字典吧！”这本是玩笑，但老太太欣然接受了。

高莽给我讲了冈察尔的小说《永不掉队》：“这个故事在我一生中影响很深，无论我干什么，都不能掉队。翻译上如此，当编辑也是这样。后来把我调到《世界文学》杂志，对我来说是个新的行业，我在较短时期内，掌握了做编辑的基础知识。”在《世界文学》杂志工作时，他画画的名字是“高莽”，做翻译的名字是“乌兰汗”，有读者来信：“偌大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很多，你们怎么找了个搞绘画的人当主编？”

如今高莽最大的兴趣是画画。“画画是一种陶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专搞绘画，有人又问我为什么不专搞翻译，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专搞写作，我觉得这是相互的关系，可以彼此促进。”他一边说着，一边请我欣赏他画的表现巴金和梅兰芳的两张大画。

1926年初冬，高莽出生在哈尔滨市。他回忆：“从我记事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饱尝的是家乡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辛酸、民族的灾难和家庭的屈辱。”其间，他入读哈尔滨市基督教青年会十年，从教科书里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艺术。

李怀宇 你早年在哈尔滨生活，当时哈尔滨的情况是怎样的？

高莽 我1933年进基督教青年会，到1943年毕业，在那儿念了十年

书，这十年正处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时期，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那时候，日本人通过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统治民众。东北资源富饶，日本人想吞并中国，想把东北变成他们的粮食产地和物质供应处，所以很早就派了日本浪人过来，暗地进行活动。而哈尔滨是个国际城市，很多国家的人都流亡到这里来，特别是俄罗斯人。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在东北修筑铁路，十月革命后，许多俄国人留在了哈尔滨，有白俄，也有红俄。另外还有从欧洲流亡过来的，有波兰、法国、爱沙尼亚等许多国家的侨民。

李怀宇 在1945年之前，日本人对待哈尔滨的平民百姓怎样？

高莽 特别不好。我亲眼看到醉醺醺的日本人，在马路中央一边号叫，一边撒尿。他们是侵略者，要改变我们的民族。他们把日本字强加到中国汉字里，把中国的文化变得不伦不类。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协和语”，就是日语和汉语混合的意思。

李怀宇 你在基督教青年会读书的情形如何？

高莽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上是个教会，其实是个学校。在敌伪统治时期，我受的教育非常有限。教会学校的学习用的是外文，所以毕业出来的中国学生很多都在各地从事翻译工作。这个学校最早是美国人办来做宣传基督教的场所的，但主要教职人员是俄国人。当时汉语是作为外语来学的，因为学生主要是俄国孩子。1941年美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回国了，日本人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很快就投降了。我们上课基本上用的是俄语，开始还讲英语，后来全部用俄语了。到我离开学校的时候，又加入了日文。不仅我们学校，其他人办的学校都是这样的模式，以外国孩子为主，也吸收一些中国孩子。我进这个学校带有偶然性，我们房东的儿子在这个学校里读书，他说这个学校挺好，离家又近，我也就跟着上了这个学校。家长把我送进这个学校，等于把我放在一大群外国孩子中间，虽然有个别中国人，但通用语言是俄语，所以我是在俄罗斯孩子群里长大的。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挺难过的，我听我妈说，我那时回家尽哭，因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

李怀宇 后来怎么融入这种环境呢？

高莽 那时候我爱画画，父母就让我去跟一个俄国画家学画画，一方面是满足我画画的愿望，另一方面是让我去练习俄语。老师是俄国人，不会

讲汉语，教画时全都是用俄文。我那时候还小，小孩子学语言就是快，过了一段时间我多少可以讲俄语了。在学校里，我对文学艺术特别感兴趣，当时觉得文学讲的都是故事，很吸引人。当然也是由于老师讲得好。他们有个爱好文学的团体，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格雷佐夫就是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他们的文学素养都比较高，善于把文学作品里的思想感情很好地传达给学生。很多俄国的寓言诗我都是幼年时从课堂上学来的，还有普希金的童话诗，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和诗歌的韵律感染了我。俄罗斯文学较多反映的是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的生活，课堂上讲的也是这些内容，给我印象很深。从那时候起，我就接受了一种民主主义思想和一种自觉地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被奴役人民的爱护和关心，这是我无形中受到的一种教育，对我后来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3年，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刊出了高莽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翻译生涯。抗战胜利后，高莽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翻译了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由此也找到了终生的爱人孙杰。

李怀宇 你是怎样走上翻译道路的？

高 莽 我在学校没学到过中文，但我学习从事翻译挺早。我非常欣赏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觉得很美。1943年，我十七岁，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读了他的散文诗，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其实远不理解该诗的深层含意。屠格涅夫晚年远离祖国的生活背景，跟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受奴化毒害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我感受到俄罗斯语言的伟大，让人着迷，给人以力量。那时候，我认为能看懂，拿起笔能用汉语写清楚，就算是能翻译了。可翻译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越到后来越觉得不简单。我是越来越不敢翻译了，因为觉得看着文字都懂，可文字深层的东西就体味不出来。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剧本也好，这些文字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方面我有很多教训。

李怀宇 有什么样的教训？

高 莽 那时候觉得能看懂俄文作品，能把作品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就是翻译成功了。投稿，发表了，得意洋洋，直到后来翻译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才发现了问题。那是1948年，剧本中全部是人物对话，对我而言翻译对话比较容易，因为我小时候跟俄罗斯同学们讲话一直用俄语。剧本翻译好了，在当地演出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这部话剧时，发现里面有不少东北土话，尽管编导已经改了很多，但仍有东北腔调。这时我才明白：语言是种艺术，搬上舞台更要注意语言的文采，外国剧本不能变成中国地方戏。

李怀宇 后来如何提高自己的水平？

高 莽 翻译确实不容易。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一种科学，一种艺术。1947年，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三十周年，举行了一次苏联图片展览，参观的人很多。从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看过之后，说我翻译的图片说明语言不纯。我知道自己中文功底薄弱，但没有想到语言的纯与不纯。这件事情给我敲了一个警钟。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阅读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不仅读，而且还琢磨和研究遣词造句，并开始有意识地注意表达方式。草明的批评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让我在中文上下了一番苦工夫。

李怀宇 1948年，翻译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高 莽 那时候我在哈尔滨市的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中苏友好协会领导下有书店，有电影院，有合唱团，有各种文艺组织，我什么都参加。我给电影院画广告，给书店画插图、画封面，给合唱团译苏联流行歌的歌词，反正什么都干。我的办公室和睡床都在一个屋里，没有上下班的概念，什么时候喊我，什么时候就去工作。那是个革命浪漫主义时代，工作热情很高。

我还管理过友协（中苏友好协会）的俄文图书，那些图书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给友协的。有一天我发现有一部剧本叫《保尔·柯察金》，那时我还没看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一看那个剧本，很震惊：天下还有保尔式的人！完全崭新的一个人物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从年轻的时候献身革命，为人类解放事业进行艰苦的斗争。他当过工人、红军战士，打过仗，负过伤，身体残了，眼睛瞎了，还坚持革命事业。这对我来说太新鲜了，我没见过这

样的人，过去见的尽是些世俗的人。所以看过剧本以后，就非常喜欢保尔这个人物。我把剧本译成了中文。我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打算，也没想到这是一部特别有影响的著作，纯粹出于喜爱。我的译文很快印成了书，我也没有想到这是我最早翻译的一本作品。哈尔滨教师联合会文工团有人看了以后，觉得很好，决定演出，非常轰动。

李怀宇 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你的爱人孙杰？

高 莽 是的。她当时是哈尔滨马街小学分校代理校长，她在《保尔·柯察金》剧里扮演冬尼娅。她来我们中苏友好协会，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要演出苏联革命戏剧，而她完全不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我接待了她。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给她讲了，包括生活习惯、家居摆设以及服装等。我记得我还把案头上的一尊列宁雕像借给了她的演剧组，还有一件乌克兰的衬衫，反正能提供的东西都尽量给她。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但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保尔·柯察金》是我翻译的。认识以后，就越来越熟了。新中国一成立，她就想到北京考中央戏剧学院，得到市教育局负责人的批准。她来到北京，到中央戏剧学院报名，有关人员看了她的简历，知道她演过戏，还扮演过一些重要角色，就让她直接参加了剧团。新中国刚成立，需要的不是学员，急需的是工作人员。

李怀宇 那时候谈恋爱了吗？

高 莽 那时候已经有感情了。我那时已调到沈阳，在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她从哈尔滨路过沈阳去北京时，我在沈阳接待了她。我们之间多少有了一些苗头，但还没有明确关系。1953年，我出国回到北京后，代表团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是演员，大伙就说，趁着代表团还没解散，干脆结婚吧！大家这样一起哄，我们就成了夫妻。婚后，过了没几年，1957年年底到1958年年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夫人赖莎来到中国。那时候我已经在北京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外联络部工作。我是代表团的翻译，赖莎得知我翻译过剧本《保尔·柯察金》，而我妻子演过冬尼娅，就想见见我妻子。我妻子来了以后，赖莎拉住我们俩的手，看了半天，说：“我祝福你们，要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还送给我们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给高莽、孙杰，希望你们的生活幸福得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微笑那样迷人。以后她给我写信、寄书，都

署名“你们的媒人”。老太太很有幽默感，懂得人生乐趣。她向中国青年人做报告时，特别轰动。我记得在北京大学，在中山公园礼堂里，大家的掌声使地板都颤了。

还有一次，我给苏联女英雄卓娅的母亲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做翻译。她一上台就对着中国观众说：“我的黑眼睛黑头发的儿子们和女儿们。”她的话刚一传到听众中，大家的眼泪就哗地流了出来，我也就控制不住了，哭了，翻译不下去了。我知道，做翻译不能随着演讲者的感情而波动，我可以尽量地表达她的内心感情，但我不能哭，这就耽误工作了。

李怀宇 在你的翻译工作中，戈宝权先生给了你很大的启发？

高 莽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派戈宝权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他路过哈尔滨，看到哈尔滨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他特别细心，就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要跟大家交流交流。我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他说：“你们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守时啊？约好了时间开会怎么没人来？”我就问他还有哪些人，他把本子掏出来给我看，又把人名读了一遍。我说人都到齐了，因为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笑）。

戈宝权

1913—2000，翻译家，江苏东台人。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进上海《时事新报》作编辑。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等报刊编辑。1949年后曾任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译作有《普希金诗选》、《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等。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我不想做翻译。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这个印象很深，我怎么能去干这个职业呢？可是我自己又喜欢俄罗斯文学，又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所以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戈宝权先生。他讲了一些道理，然后概括成两句话，大意是：关键看我翻译的是什么东西，是为谁翻译的。这两个问题一说，我就明白了。我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翻译？之后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50年代初，高莽从东北调到北京，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附属机构工作。作为翻译人员，高莽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了中苏等国文学艺术界的很多名家，也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后工作了二十七年，从编辑到主编。

李怀宇 你还记得第一次去苏联的情况吗？

高 莽 我第一次去苏联是1953年。过去我只是从文学作品中、电影中和报刊上知道苏联。记得莱蒙托夫写的《莫斯科全景》一文曾使我着迷，很想看到那里的克里姆林宫，看到红场，看到列宁墓。第一次见到独具特色的大教堂，听到那悠悠的钟声，看到匆匆忙忙的行人，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那里的大街宽阔，广场上耸立着各种历史人物的纪念碑，街上的汽车都是国产的。那时对苏联、对莫斯科充满幻想、充满希望，苏联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国家。那时，我们住在豪华大旅馆，外出有车接待，盛情、真挚、友好。多少年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我才知道当时的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从外表上没有看到的生活。后来，我发现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深得多。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懂俄文，但看过俄罗斯的小说、苏联电影和戏剧等。他们的年轻人对中国情况，知道很少。

李怀宇 50年代，你多次和中国代表团访苏，又多次参加接待苏联代表团，发现了两国文化人之间不同的观点？

高 莽 那时，苏联是老大哥，我们处处向苏联学习，交谈以友好为主，但也有看法不同的时候。比如，1955年10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率团来中国。有一天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接待他，茅盾当时兼任《译文》杂志的主编，他提到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苏尔科夫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抱有很大的成见，他就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海明威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有天壤之别。另外，《老人与海》写的是一个渔夫在大海里与鱼搏斗的情形，他认为这是个人主义，这个小说对青年读者会有负面影响。茅盾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人的坚韧和勇敢。茅盾那时候就已经没有唯苏联是从了，没听从他的那一套，很温和地说：我认为这个作品是好作品，我们要发表。苏尔

科夫就坚持认为这个作品不宜发表。我们还是发表了这篇小说。多年以后，苏联意识形态起了变化，才发表了《老人与海》。这说明在认识上，我们的作家在很多方面并不比苏联老大哥差。

李怀宇 中国和苏联关系变化以后，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高 莽 有影响。开始是什么都好，忽然苏联把专家撤了，意识形态发生了分歧，中苏两国人员来往大大减少了。两国的分歧由不点名地相互批判，转向指名道姓地攻击。我们接触苏联人也往往发生一些争吵。那时，凡是苏联肯定的文学作品，我们就斥之为修正主义。《世界文学》批判修正主义时就不再登苏联的作品，批判帝国主义时就不登英美的。后来只剩下亚非拉国家的，那些作品水平差些。有一段时间我们编辑出版过黄皮书，后来为“反修”提供资料，黄皮书中登载的作品过了若干年又作为红皮书来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批修”的余波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刊登苏联作品时，还附一篇批判文章。

李怀宇 你在“文革”中受过冲击？

高 莽 我长期做翻译，给赫鲁晓夫当过翻译，给刘少奇当过翻译，给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做过翻译。红卫兵、造反派、军宣队让我交代跟他们的反动关系，我只是为他们做过翻译，是工作关系，有什么反动关系？他们说我是“苏修特务”，还拿照片让我给照片上的人逐个逐个地写他们的反动言论，有的照片上有三十几号人，我怎么写？以前我挺喜欢搜集照片的，那以后我就把我出国的照片全烧了，我怕他们从我身上找到的照片来让我交代“罪行”，我说不清楚。这种诬陷已经见怪不怪了，我曾想过自杀，多亏妻子一直在身边劝慰我，她说人死了，很多问题就更说不清了。她是对的。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事，她的外号叫“小鸟”，调走了，大家都给她写信，我也给她写。我画了一群鸟，各种各样的。后来军宣队拿着这封信来要我交代，说我下命令让她逃离大陆。本来是同事间的玩笑，怎么说得清？那位女同事家里有人在香港，她也申请过去香港探亲，这与我有什么关系？硬把她要去香港的事栽在我的头上，说是我给她下的命令，让她逃离大陆。还不止这些呢，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家是我避风的港湾，在这港湾得到很多安慰……

李怀宇 80年代再去苏联，你看到的苏联有没有什么变化？

高 莽 80年代以后我几次去苏联，苏联解体以后又去过俄罗斯联邦。我是在相隔二十年后再去莫斯科的，莫斯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修建了一些高楼，增加了不少新的纪念碑，特别扎眼的是教堂都进行了修葺，变得崭新。莫斯科一些高楼上出现了日本、韩国及西方公司的广告牌，街上奔驰的也尽是外国的轿车，社会两极分化比较突出。青年男女的衣着变得时髦了，可是街头上、地铁通道里出现了不少衣衫褴褛的老年妇人在兜售家庭的用具或服装。她们显然是穷了，但出售身边的货物时，保持了人的尊严，不投机取巧，也不低三下四。意识形态混乱，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我觉得青年当中民族主义意识在扩大，文学艺术方面正处于转换时期。过去被禁止的作品大量出版，流亡到国外的文学艺术家纷纷回归，加上无选择的开放，什么性质的书都出版，使人们的头脑有些混乱，出现了一种多元化文化。

李怀宇 在俄罗斯作家里面，有没有给你印象深刻的人物？

高 莽 有。比如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她命运多舛，生活坎坷，但从来未停止过创作。1948年，我翻译过一篇批判她的报告，批得一塌糊涂。她早期有些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心理，对爱的幻想和破灭的感受。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她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被枪毙了。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诗人，“白银时代”的一个首领。多少年后，为她平了反，说她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反苏联的话。阿赫玛托娃的第二、第三个丈夫也是或被关押，或被长期监禁，她儿子也被关进监狱。三四十年代她写了《安魂曲》，在苏联表面强大、繁荣、光荣、幸福的情况下，她胆敢写出关于苏联监狱的作品，这是需要远见和才气的。那时，她写下了诗句却不敢留底稿，读给人听后便烧掉。所以，她有些作品是别人的记忆，后来给她整理的。1948年，我是从负面认识她，觉得她就是一个该批、该骂、该唾弃的堕落颓废的女诗人。1954年苏联召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时，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那时候没遇到她，我想如果遇到了她，我恐怕还会抱着苏联党中央决议的精神来看待她。

“文革”以后，很多外国图书开放了，我读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原作，发现她是那么出色的一位诗人。所以，我老觉得良心上对她有愧。我开始翻译她的诗，越译越多，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译过李清照的词，翻译得很好。她

不懂中文，她根据汉学家逐字的翻译来安排文字。她还翻译过《离骚》。《离骚》是汉学家费德林逐字逐句译成俄文的，然后请阿赫玛托娃艺术加工，将译文润色，这是非常难得的。多少年后，我有机会来到她的墓前，献上鲜花，倾诉了自己的遗憾。我还为她画了一幅大的肖像，题名为《白夜》。

费德林

俄罗斯东方语文学家。1943年以《屈原的生平与创作》一文获莫斯科东方学院语文学博士学位。在中国生活多年，结识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众多精英人物。2000年10月逝世于保加利亚。

文学翻译和创作之外，高莽还从事绘画。1949年，高莽创作的讽刺漫画受到批判，华君武曾对他说：“我扼杀了一个漫画家。”他则说：“你救了一条人命。”而后，高莽致力于肖像绘画，作品为多家美术机构收藏。

李怀宇 你是怎么迷恋上绘画的？

高 莽 我从小就爱画画。记得小时候我看小人书，把小人书上的人物画出来，再一个个剪下来，摆成一排，调换地位地玩。后来跟俄国老师学画，先后跟过三位老师，一位是学校的老师，挺有名气，但对我们影响不大，因为他不大醉心于教课，他醉心于自己的创作。一位老师教我基础的知识，怎么做画布，怎么调油彩，主要教我临摹。他本身是一位临摹画家，哈尔滨有的宾馆、大电影院挂的一些俄罗斯名画都是他临画的。还一位是比较有名的画家，对我影响最大。他教我写生，如何创作等。这位老师是我主动找上门的，他看了我的作品，就把我安排在大班里。几个学生聚集在一间屋子里，一个学生做模特，坐在不高的台上，大家就画他，老师在旁边指导。画完了以后，这个学生模特可以在我们中选任何一幅作品归他所有，作为对他的报酬。

李怀宇 你曾经画过漫画，还出了事？

高 莽 我画过漫画，那已是快六十年前的事了，华君武、蔡若虹还批过我。1949年，我为哈尔滨市青年团《学习报》画了七幅反浪费的漫画，刊出四幅。开始大家都反映挺好的，后来不知哪位同志说，那些漫画是丑化人民，画的作者思想立场有问题，开始追究责任，把我给拉出来了。

新中国成立了，《文艺报》根据那封信开了研讨会，委托华君武、蔡若虹

撰文批判我。《文艺报》从第一版到第八版都是批我的，还有我的检讨、报社的检讨、读者的来信，并附了我的四幅漫画。所幸那时候是刚解放，批得还不厉害……即使如此，对我的打击也是挺大的。那时我还在东北，还没到北京来，领导看到中央的报纸在批我，便让我检讨，我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受的教育是教会学校，生长在敌伪，反正什么都不好。从那以后我学乖了，再也不画漫画了，若讽刺就讽刺帝国主义。我跟华君武关系一直很好，他跟我说：“我扼杀了一个漫画家。”我说：“你救了一条人命。”

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后来我有几次机会和丁玲、蔡若虹一起出国，我老想问问他们为什么批我，但都没好意思问。最后有一次我去看望蔡若虹老先生，他说不记得批判我的事了。2000年华君武写了一篇《老友高莽》，检讨自己对我批评有些过头，最后说：“可见批人容易，批己难。”

李怀宇 受了这次教训之后，画风有没有变化？

高 莽 受了批判之后，我再也不画漫画了，再也不进行讽刺了。我只画美化人的作品，歌颂性的作品。记得我母亲说过：“画男人要画年轻一些，画女人要漂亮一些。”她的话非常灵验。凡是按她的标准画的肖像，都会得到好评。但有两位大学者对我说：“按你母亲的要求作画，不会有好的作品。”他们的话很有分量，美化现实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文革”期间，我们下放到农村，除了马恩列毛的作品，其他什么书都不让看。偶然一个机会我得到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回忆录，我发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人情、亲情、爱情，这些感触促使我通读了马恩著作，并画了他们两家人，后来扩展到他们的战友们，他们的事业。我当时想画五十幅，因为身体不太好，我估计只能活五十岁，结果画了五十七幅，看起来还能多活两年。我在干校躲在蚊帐里画，回来后接着画，一共画了七年，画完了以后给美术出版社的人看，他们说好，就给我出版了。后来我较多地画了作家肖像，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几十年来，回头一看，都没想到自己画了那么多肖像，仅中国的作家，有他们签名的，我就画了二百多位，俄罗斯作家也有一百多幅。

李怀宇 你原来在学校接受的是俄罗斯的绘画教育，后来对中国绘画又有新的认识，这对你的绘画有什么影响？

高 莽 我十几岁开始学画油画，画了四十多年。后来我妻子对油画颇

料突然过敏起来，我就抛弃了油画，开始画国画。我妻子最初认为绘画不是我的正业，不应当占用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她对我绘画的理解是因为碰到一件事，使她改变了看法。有一次，她带一个艺术团去美国访问，那时候中美还没建交，她作为团的工作人员，要编一本演出说明书。她编了以后，我觉得太死板，就给她加了几个小插图。最初她还不肯用，说领导没有这方面的指示。后来他们领导看了，还挺满意。到了美国，美国接待人员问她，这个画画的人来了没有，想跟作者认识一下。我妻子没想到这小小配图居然能引起西方文艺界的重视。后来艺术团去香港访问，香港重新印刷这本说明书，我的小小配图就不是配图了，印成一个整版。这时我的妻子对我才刮目相看，觉得我的画还是有一定水平的。

为了妻子，我放弃油画改画国画，这时我才慢慢了解国画的深奥。中国的笔墨纸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画国画必须要有很深的文化根基。有一位外国画家朋友来了，想试试用毛笔作画，不行，一抹就是一片黑。中国画超越了焦点透视、阴暗等，没有足够的中国文化修养，是画不好国画的。我在这方面有很多欠缺，还在努力学习。



汤一介

1927年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等。

乐黛云

1931年生于贵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著有《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之桥》等。



汤一介 乐黛云

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

我的“左倾幼稚病”特别严重，什么都以革命为上，所以那时候觉得我嫁到你们家里来了，我说：我最重要的是要和你们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到了你们家，一定不会被资产阶级腐蚀的。他父亲脾气挺好的，什么话也没说，他妈妈也是什么话没说，他们脾气好得不得了，而且是特别仁厚的人。一般人都觉得这个媳妇怎么这么野，他们没有，他妈妈一直对我都很好。

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幢古朴的房子里，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每天安静地读书写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夫妇俩与北京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他们见证了这所大学在潮起潮落间的变迁，更亲身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汤一介理性，乐黛云感性，张弛之间形成有趣的组合。两人的谈话风格迥然不同，乐黛云健谈，但在访谈中主动让丈夫多讲一点，只在适当的时候补充。汤一介刚刚度过了八十岁寿诞，他说：“我一生走过来也不大容易，很多运动。八十岁时我讲了三件：第一件，我做一个哲学家的基础不够，中外基础都不够。我虽然考虑了一些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做完。第二件，做中国哲学一定要对西方哲学有非常好的了解，才能做好，因为这样才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特别是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第三件，我现在做《儒藏》，对我也是一个考验，因为我原来是做哲学的，不是做古籍整理

的，所以我现在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地来做。”

回忆北京大学当年的学风，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沈从文一代的风采恍如隔世，再结合当下的学风，汤一介有感而发：“他们的基础比我们后来的好得多。像我父亲这一代，小时候读私塾，背了四书五经的，然后又到国外去待了五年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西方当时的学术思想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方面基础比我们好得多。我们没有原来背四书五经的国学基础，因为我们是新式学堂出来的，又没有机会到国外待个五六年。他们这两个基础都比我们好，所以做出成绩来。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再下一代都没有机会，现在出去留学的人可以在国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他们国学基础不好。你研究外国的东西研究得再好，也不会比外国人自己研究得更好，可是研究中国的东西，基础又不够，大师还是出不来。”

夫妇俩都多次到海外进行学术交流，也十分关注海外学者。汤一介说起从杨联陞到余英时、林毓生、张灏、杜维明等学者，交往的故事中，依稀是老北大的做派。

乐黛云介绍现在夫妇俩的生活习惯：上午工作，然后一起散步，下午接待各种各样的人。现在，她还在北外招了三个研究生，汤一介则致力《儒藏》的工作。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为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7年，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乐黛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48年北平围城，乐黛云接受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任务，到沈从文家劝说其留下来；汤一介对国民党深恶痛绝，不愿南下，汤用彤一家最后都留下来了。

李怀宇 你是比乐黛云老师先一年进了北京大学？

汤一介 实际上我是先了两年进北大，因为1946年先进北大先修班，1947年进了北大哲学系。我当时在学习的同时也参加学生运动，“沈崇事件”发生在我读先修班的时候，是1946年年底。先修班有个国文课，两个班合并上课，沈崇是跟我一个班上课。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

李怀宇 “沈崇事件”在当时是怎么回事？

汤一介 她是北大的学生，“沈崇事件”应该说是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的导火线。她被美国兵强奸了，因为她是我们北大四院的学生，我们就非常气愤，动员起来向美国抗议，当然是地下党组织的，没有问题。我们开始游行，慢慢地各个学校都参加了。那些美国兵是驻扎在东单广场那一带，我们就集中在东单广场，要求美国兵撤出中国。本来没有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就是从那时开始了。我们四院的学生就把美国的国歌变成了反对美国的歌曲。那是1946年12月月底。1947年元旦的时候，胡适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他要到南京去，说“沈崇事件”已经决定由法律来解决。这封信正好是我看到了，因为我父亲当然不会给我看这封信，我偷看以后，赶紧找了一个会拍照的同学拍下来，所以这封信就保存下来了（笑）。

李怀宇 西南联大解散以后，北京大学回到北平，学风上跟抗战前的传统有没有断？

汤一介 从北京大学的阵容来讲，复员以后，就是新聘了一些学者进来，老北大的底子没有变，而且北大扩大了，工学院进来了，农学院也进来了，原来北大只有文理法医，后来变成六大学院，这是傅斯年先生好大喜功（大笑），把北大弄得很大很大。北大假如保持那个状态的话，当然现在在世界上是一个学科相当齐全的大学。当时他们本来想把钱学森请来做工学院的院长，由胡适联系请他来，但是他遇到阻碍，没有马上回来，后来院系调整把工学院弄走了。

李怀宇 在1947年的时候，学界左倾的思想严重吗？

汤一介 应该讲，从联大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八年抗战看起来还是相当长的，从联大教授队伍来看，就有些分化。因为抗战是跟“建国”联系起来的，国民党提的也是“建国”，所以也有一部分教授参加了国民党，另外一部分教授参加了共产党或者民盟。参加国民党的有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他们都是当时联大的当权派，还有一些人，像闻一多、吴晗参加了民盟，当然大部分学者也不是倾向于哪一派，像我父亲就是也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也不愿意参加共产党，就是学者。梁漱溟从重庆来找我父亲，他们从小就是同学了，劝他参加民盟，我父亲说：“不行，我是学者，不参加党派。”（笑）那时

候也有一大批学者是不参加党派的。1947年打内战了，分化当然更多。这当然也影响到学风了，因为国民党是非常腐败的，像我们这些学生很多都是反对国民党的，或者参加地下组织，或者同情共产党，像我的同班同学有的1948年就到解放区去了，有的一解放之后就参加南下工作团，最后剩下我们三个人毕业，其他人都走了。但是教授研究学问的思路，基本上还是原来北大的传统。

李怀宇 那还是体现蔡元培先生讲的“兼容并包”，左中右都可以容纳。

汤一介 对。而且学术比较自由，当时胡适可以讲，贺麟也可以讲。贺麟是训导长，是国民党党员，但他还是很爱护学生，学生被抓了，他常常要到中南海李宗仁的行辕找他，把学生救出来。

李怀宇 汤先生读到大二的时候，乐老师从贵州一路飞奔到北大来的？

乐黛云 （笑）我考取了好几个大学，可是我就是想读北大。我父亲不愿意我来，他以为将来的局面是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嘛，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回家方便一点。当时北平是快要围城的时候，我母亲还是比较支持我。

李怀宇 那时候是对北大向往呢，还是对解放区向往？

乐黛云 我就是对革命向往（汤一介大笑），觉得国民党太糟，因为过去受国民党很多气。比如我们家自己住的房子，每年要去交税，那些官僚凶得不得了。我父亲是教员，脾气不好，特别不愿意跟这些官僚打交道。我记得我是高一吧，让我去交这些税，特别受那些官僚的气，所以对他们特别反感。后来我父亲说：“你就当是到动物园一样，动物园那些猴子、狮子对你吼，你不能对它们吼。”（大笑）所以那时候觉得革他们命是太痛快的事情了！

李怀宇 你从贵州来北平还经过很多周折？

乐黛云 对，很不容易，那时候没有飞机，铁路也没有通，家里也穷，我搭那种运盐的“黄鱼”车，从贵阳到柳州，在柳州坐火车过来的。我们到了武汉，北大就有一个新生接待处，接待我们的人叫程贤策，从武汉到上海，再从上海坐船到天津，北大开车去接我们。程贤策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人，一路教我们唱延安《解放区的天》那些歌，也没有人管。所以一到北平前门车站，我们看到城墙，就唱起延安的歌，一路唱到学校，觉得特别高兴，像解放了（笑）。

李怀宇 1948年的时候，战局已经变化了？

汤一介 1948年年初，毛主席就讲：战争已经转折了。但是我觉得尽管在这种形势下，北大的学风还是保存着，至少我自己感觉到，我们非常自由，学什么都可以。我选的课非常杂，这让我一生受益很大。

李怀宇 在北大哲学系时，你还听了许多其他系老师的课？

汤一介 除了哲学系的课以外，可以选中文系的课，当时中文系杨振声开一门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用英文从荷马史诗一直讲到莎士比亚，我们就一段一段地读。一定要学外国文学，而且是读外文本，这使得我对外文和外国文学有一点了解。我还选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他在清华，但是在北大开一门课。我觉得这个建筑史非常有意思，我当然对建筑艺术知道得非常少，我是偶然看到了一本营造学社出版的杂志，讲的中国建筑很有艺术特色，就想听听这个课。当时大一国文正好是废名教，我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陶渊明，我想是他最得意的时候（笑），他也讲他自己的《桥》里的一段，作为一个散文的范例。那时候在北大是非常自由的，愿意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而且这些教授基本上都开基础课，都是一流的教授。我觉得北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做学问的地方，即使在那个情况底下，如果你愿意好好学，也是可以学好的。

杨振声

1890—1956，教育家、作家，字今甫，山东蓬莱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在其领导下，青岛大学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李怀宇 在北平围城的时候，胡适请许多学者南下，乐老师是不是做了好几位教授的思想工作？

乐黛云 也没有好几个。反正那时候我算是民主青年同盟的，那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可是那时候外围组织很管用，因为真正的地下党员并不多。那时候给我们几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校对，像毛主席的文章；另外一个任务是去调查东交民巷到国会街有哪些古迹，是绝对不能炮击的。我画了一个图，标起来，交上去，交给谁我不知道。还有一个任务，因为那时候沈从文跟我的关系很好，当时我进北大是考英文系的，据说沈从文看了我的那篇作文，让我到中文系读，我的大一国文是他教的。所以专门派我到沈从文家里去，跟他讲：不要走，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危险。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

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保证他以后绝对没有问题（笑）。其实问题多了。还跟他讲：你的好朋友丁玲就是在解放区，她来了一定会关照你的。结果后来恰恰这个出问题。他那时候住在中老胡同，我印象中他的夫人特别漂亮，对他也特别好。

李怀宇 沈从文怎么说？

乐黛云 他笑一笑，说：“好吧，我再想一想。”也没有说可以还是不可以。最后决定不走，应该不是我的工作，他自己想清楚了（笑）。没想到后来丁玲对他那样冷酷无情，他还保过丁玲，但是丁玲也是怕人家提这一段事情，因为搞不清楚她与特务什么关系。

汤一介 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可以走的。

李怀宇 你的父亲当时是什么态度？

汤一介 1948年年底快围城的时候，地下党来找我，问我父亲愿不愿意去解放区？如果愿意去，他们可以保护我父亲去解放区……当时胡适不是给我们飞机票嘛，我们全家都可以走，我父亲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要走，因为我记得他让我母亲去准备了两口箱子，装了东西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里面。当然，我是不会走的，因为我当时已经对国民党非常反感了。我母亲就觉得我的哥哥、我的妹妹都在抗日战争中的昆明死掉了，如果他们走了，把我留在这儿，就等于丢了三个孩子了，这样恐怕不行，就说：“我们不走吧。”我父亲本来就动摇了，他也不一定想走，就留下来了。我估计他不想走，但是他跟胡适、傅斯年的关系都非常好，因为他到北大来，是胡适找他来的，他跟傅斯年通信很多，主要是谈聘任教授的事。所以胡适、傅斯年动员，他也是动动摇摇（笑）。后来他生病，就是因为批判胡适，胡适当然对他影响很大。

李怀宇 当时你和胡适接触多吗？

汤一介 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只听过他的演讲。我们住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房子里，傅斯年也住在里面，胡适住在我们旁边东厂胡同1号的房子，两个门都通着，他有时候过来找我父亲，当然他们谈什么我是不参与的。

李怀宇 北平围城的时候，胡适在当时学界的口碑到底怎么样？

汤一介 从左派学生看，当然觉得他帮国民党说话，而且批评学生运动，他有一篇文章是批评学生运动的，所以当时大家对他不是很满意。但是当时他有些主张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他觉得国民党不应该在北京大学，党不应该在学校里！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眼光的，学校就是学校。

乐黛云 我们当时对胡适的印象相当好，1948年暑假以后我入学，“反饥饿”已经过去了，当时搞学生运动就是“争温饱”，比较温和一点。我们从远处来，都没有钱，到了冬天，吃饭也成问题，穿衣服连棉袄都没有，后来我们一两百人就在校内游行，游到胡适办公的地方。胡适亲自出来接见我们，他说：大家都很辛苦，我一定帮你们想办法。后来给我们每人一件棉袄，那件棉袄我穿了四年，最低的伙食费也给我们包下来了。所以当时我们对他的印象还很不错，他很和气，穿个黑颜色的大棉袍，对人很温和的，好像很有亲和力的感觉。我父亲当年考北大英文系，笔试考过了，面试是胡适亲自给他面试的，他说：你的英文口音太重了，念的英文不像英文，你补习两年再来考。所以，我父亲一直在北大旁听。我觉得胡适对学生还是挺严格的。

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汤一介和乐黛云积极参与，从相识而相爱。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一毕业就和汤一介结婚，请了还没有离校的同班同学参加他们的新式婚礼。在婚礼上，乐黛云发表了一番充满革命豪情的讲话。第二天，汤用彤宴请亲朋，汤一介和乐黛云并没有参加，他们觉得这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第一步。

李怀宇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乐黛云 我跟他没有一起上过课，可是那时候政治活动还是比较多，当时共青团有一个文学院总支，他是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后来第二年我们到了共青团的团委会，又升了一级，那是管全校的了。

汤一介 那时候就变成我做宣传部部长，她做群众工作部部长。

李怀宇 谈恋爱是在什么时候？

乐黛云 那就是在总支的时候（大笑）。

汤一介 我觉得关系更密切的时候可能跟抗美援朝有关系。当时朝鲜那

边打起来，因为我们都是团干部了，团中央号召团员干部参军，我们就带头组织了好几个同学给团中央书记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要参军打美国佬。我们是爱国主义思想非常强的青年。这时候关系就更接近了。她是做北大抗美援朝的小报编辑，每天要出小报，我是组织学生队伍到街头去宣传。她可能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离她的办公室并不远，我常常跑到编小报的办公室去看她。她是很忙很忙，没多少时间理我（大笑）。

乐黛云 你这说得不太准确。我觉得更早一点，就是1950年的五六月间，派我代表北京市的学生到捷克去开世界学生大会。当然我们原来相处就比较好，去之前就促进了我们关系的发展。我过两天要走了，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他家里的很多唱片，就在我们总支办公室放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也很喜欢，他也很喜欢。听了一夜，听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红楼靠街的一面，听见手推车卖东西的声音，才知道天亮了。我们什么都没说，反正是听了一夜的音乐，也没有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已经有以心相许的感觉（汤一介大笑）。后来到了捷克，团的领导要我们留下，去上莫斯科大学，我的俄文还可以，可是他们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留。当然一方面我是怕在那个地方老是搞政治，另外觉得有那么一个人在那儿等我，我怎么能不回去呢？

汤一介 我也怕你不回来（大笑）！

乐黛云 所以比抗美援朝要早一点。不是因为政治性的抗美援朝，这里面有很多个人的东西，个人的爱好，爱好文学，喜欢诗。

汤一介 而且俄国的小说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读这些东西还是很多，对苏联的小说也很有兴趣，像《日日夜夜》。

乐黛云 对捷克的作家也很感兴趣。

汤一介 对，《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对我影响最大了，是她介绍我看的。写得非常感人的一本书。

乐黛云 主人公最动人的话就是：“人们，我爱你们，可是你们一定要警惕啊！”

李怀宇 后来结婚的时候乐老师毕业了没有？

乐黛云 毕业没多久我就结婚了（大笑）。

汤一介 是1952年，当时我已经毕业一年了。

乐黛云 当时的想法就是所有的同学都来参加我的婚礼，大家毕业后还没走散。

汤一介 她希望她班上的同学都能参加她的婚礼。我们是9月13日结婚的，这个日子并不好，因为林彪是9月13日掉下去的（笑）。

李怀宇 婚礼是在哪儿举行的？

汤一介 在我们家的院子里。

乐黛云 在院子里，大家吃点糖，吃点水果。

汤一介 她在会上发表的讲话，应该说是非常糟糕的（笑）。

乐黛云 那时候很革命嘛。我的“左倾幼稚病”特别严重，什么都以革命为上，所以那时候觉得我嫁到你们家里来了，我说：我最重要的是要和你们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到了你们家，一定不会被资产阶级腐蚀的。他父亲脾气挺好的，什么话也没说，他妈妈也是什么话没说，他们脾气好得不得了，而且是特别仁厚的人。一般人都觉得这个媳妇怎么这么野，他们没有，他妈妈一直对我都很好。但是第二天他们家觉得长子结婚应该请亲朋，就在一个比较高级的餐馆请了两桌客，可是我们俩就是不去（笑）。

汤一介 因为参加我的婚礼都没有亲朋，所以这一次就请亲朋去。

乐黛云 当时我们觉得不去，就是划清界限的第一步，如果去了就是投降。后来对这件事情我一直非常后悔，很不应该，很伤老人的心。他们很看重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一点不体谅他们的感情，这是很不对的。太傻了！

汤一介 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员，1956年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乐黛云 1952年毕业后留校。1957年“反右”运动中，乐黛云被划为“右派”，汤一介坚信乐黛云不是“右派”，受到严重警告。

李怀宇 你父亲汤用彤先生后来生病就是因为批判胡适运动？

汤一介 他脑溢血主要是因为《人民日报》开批判胡适的会，那是1954年夏秋吧，找他去，而且要他发言。我倒没有参加，是听张岱年先生讲，他当时很激动。我估计他心情一定很矛盾，他又非批判胡适不可，他心里还是

有想法，脑溢血了。他喝了酒，把酒杯给打倒了，送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神志不清了，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处在昏迷状态。但是学校和政府对他还是不错的，当时马寅初是校长，对他很关心。马寅初去找卫生部部长，希望帮他治病，所以当时找了苏联专家，帮着在协和医院给他治病。治了一个多月后，他就苏醒了，之后就半身不遂了，这对他也有好处，就是1954年以后的活动，他全没有参加了（大笑）。因为他是政协委员，又是人大代表，这些会他都不出席了，学校的活动他也不参加了，就挂一个副校长的名字，待在家里。

我记得他病的过程中，除了到医院，只出外三次：一次是熊十力从上海到北京来，因为他跟熊十力关系很好，去到民族饭店看过一次熊十力。另外一次是陈毅在政协礼堂开新闻招待会，请他去，他跟陈毅谈了一段话，那是我陪他。第三次是1963年他身体好一点，到天安门可以看放烟花，我和孩子陪他去，刚一上天安门就碰见总理，总理一下就认出他：“你怎么跑来了？”我父亲说：“我现在好一点，来看看。”总理说：“主席在这儿，我带你去看主席吧。”毛主席问他：“你身体怎么样？”我父亲说：“好一点。”主席说：“你身体不好，就写短文吧，不要写长文。”我们说：“好好好。”就完了。1964年年初，他的身体又坏了，就住在医院里，然后就去世了。所以基本上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对他有好处。

李怀宇 当时北大哲学系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

汤一介 对，解放以后，党认为搞哲学的都是搞唯心主义的，把全国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了，我们当时有二十多个教授，有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周辅成、贺麟，都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者”吧（笑）。开始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请了胡绳、艾思奇来讲课，还请苏联专家来讲课，这些教授跟我们的学生一起听他们的课。

李怀宇 乐老师留校后在北大中文系的工作怎么样？

乐黛云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很喜欢现代文学，我的老师就是王瑶，我是他的助教。我当时去找他：“我要跟你学现代文学。”他很反对：“为什么要学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是很不好学的，你说哪个作家有点缺点有点毛病，他马上就跳起来跟你争论，所以很难写现代文学史。”他那时候正在写现代文学史。

李怀宇 当时为什么王瑶先生自己选择研究现代文学史？

乐黛云 这就很有意思。他原来是研究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做得不错，写了好几本书。他对我说：“你最好是学古典的，古代的人不会从棺材里爬起来，跟你说你评论他评得很不对。”（笑）我后来就反问他：“你怎么放下中古文学来做现代文学？”他也没说话，笑一下。我就跟他学现代文学，也没有再深谈这个问题了。

汤一介 我觉得是分配给他的，要他做。因为我记得后来周一良讲他自己，周一良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非常有成绩，大家都说他将来可以成为“陈寅恪第二”。可是一来就让他搞世界历史去了，因为他的外文非常好，等于把他原来的基础丢掉。所以都是分配任务，并不是他的专长。在这一点上，没有爱惜这一批知识分子，没照顾特长，而且都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需要改造的，都是需要批判的，这使中国的学术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断层。从冯友兰开始，要不是80年代以后他搞了一点东西，他后面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朱光潜早年的东西比他晚年的好得多了。曹禹这些作家越来越不行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可是我们觉悟都是非常晚的。我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觉悟了，不能再那么干了，再干就越干越糟了。

李怀宇 你读哲学系的时候是想成为哲学家，后来成为哲学工作者了？

汤一介 当时冯友兰自己也是这么说，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你看他的《三松堂自序》就是这样讲：只能成为哲学工作者。因为我们只能解释马恩列斯包括毛的思想，或者用他们的思想来解释历史的问题和现实的问题，我们不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思想。冯友兰很痛苦就是，他老想有一点独特的思想，为这还挨批判。不仅我没有成为哲学家，几乎解放以后就再没有出哲学家了。金岳霖先生思想也左了，他认为逻辑也有阶级性，这么一推，数学也有阶段性了，后来他也没有大的成果出来……

李怀宇 1957年“反右”的时候，乐老师被打成“右派”了？

乐黛云 打成“右派”是挺怪的事。当时在中文系留下来的年轻人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因为刊物上都要大名人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发表机会很少，我们就说自己办一个刊物。我那时候还是中文系教员的党支部书记，所以很多人觉得党支部书记来办刊物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八个人办一个刊物，那时

候是1957年5月，办不起来，没有钱了，要去募捐。我第一个去找王瑶，王瑶这个人是特别敏感的，而且非常聪明，他说：“你不要出刊物了，一出就会变成一个反对党的刊物。”我说：“怎么会？我们这儿都是党员哪！”那时候“反右”还没有起来，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里。一直到11月，“深挖细找”把我们这个集团挖出来，其实这个刊物也没有成型，就开了两次会，讨论的文章中有一篇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的毕业论文——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他的意思并不是对毛泽东讲话有什么意见。我那时候是写一篇提倡浪漫主义的文章。后来我们变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因为我是“头”呀，就变成“极右派”了，“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李怀宇 汤先生有没有受到处分？

汤一介 我受到严重警告。

乐黛云 划不清界限。他打电话给中文系党总支说：“乐黛云绝对不是‘右派’！”他就是搞不通，我原来挺左，怎么会变成‘右派’了呢？后来我下放了，他多次写信，称我是“乐黛云同志”，让人家看见了，就告上来了，他还是那么写，后来说他划不清界限，又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1973年，著名的“梁效”写作班子成立，汤一介受邀加入，在其中搞资料工作，后来也写了一些文章。回顾这段历史，汤一介说：“我觉得我错了，我是认账的。”

李怀宇 “梁效”是怎么回事？

汤一介 1973年，“梁效”就是“两校”：北大和清华。其中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吴小如和我……

乐黛云 反正有点名气、有点才气的都给弄进去了。

汤一介 都是学问不错的人才找去的。怎么起来的呢？就是清华先编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行，他们不懂孔孟之道，你们去找北京大学的人来做吧。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很高兴，

是毛主席的命令。再加上我有些个人考虑，“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是“黑帮”，挨了一两年批判。1973年正好在“反右倾”回潮，从学校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学校管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就觉得过去我们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选”是不行的，可以学点逻辑，又和一些教员编了一个《认识论》提纲。“反右倾”回潮就说我是“右倾”回潮：你怎么要离开毛泽东思想来写一些东西？大字报就出来，正好那时候毛主席说你们去编那个东西，我就正好躲过“反右倾”回潮这个关了，否则肯定又是挨批判了。我就很高兴地参加了“梁效”。

乐黛云 那时候还有一些人想参加呢，想向里挤。

李怀宇 在里面做什么？

汤一介 我们开始就编“林彪与孔孟之道”，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我在这个资料上多出些力，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写批判文章的。当然后来我也参与写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文件发了之后，全国就掀起批判林彪与孔孟的高潮。我和周一良都负责编，常常要我们去讲解这个材料……编完之后就要我们编“林彪与孔孟之道”之二，但是这材料编好了之后没有公开。而且让我们到林彪住的地方去，林彪的藏书很多，有七万多册，让我们去看他的藏书里面有什么问题（笑）。我做了比较多资料。

正好那时候长沙马王堆出土，江青就找我们，她说：这批东西要做注解，要印大字本，因为毛主席要看。所以后来我们又做了一段时间马王堆材料的注解，主要是给毛主席看的，同时写一些批判文章。当时是两部分人，一部分主要是写批判文章，一部分主要搞资料，我主要搞资料，但是也写了些文章。

我觉得我错了，我是认账的。我今天还是认账的，并不是说我没有错。但是这里头的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跟毛主席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自己觉悟不高，没有看清楚这里头的问题。而且又长期受党的教育，觉得毛主席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一死，我头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今后我听谁的？得了一个结论：今后只能听自己的，不能听别人的。听别人的，你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说也说不清楚。

李怀宇 胡适先生当年说在哈佛有两个读书的种子，一个是周一良，一个是杨联陞，后来一个回国，一个留在美国。季羡林先生在《站在胡适之先

生墓前》中说：“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学术上也有表现，但是格于形势，颇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汤一介 周一良的外文基础非常好，因为他父亲是个大资本家，家庭的英文日文教师培养他的英文和日文，他是哈佛的博士，糟蹋了这样一个人才。

李怀宇 汤先生在“梁效”的时候，乐老师在哪里？

乐黛云 我在中文系，下放回来以后他们不让我再向学生“放毒”，不能教书，让我在资料室，我就替那些讲诗、讲古文的老师做注释。他们有些人古典文学的基础不是太好，我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也不是太好，倒是有两年的时间重新打下古文的基础，要翻各种书，不能注解错了。后来“四清”又下乡去了一段。他在“梁效”的时候，我带着工农兵学员到处走，到《河北日报》、《北京日报》去实习，到草棚大学，都是胡搞，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实验室，还带学生到井冈山去写革命故事。从1971年起，我一共带了三届工农兵学员。

李怀宇 在“文化大革命”里，有没有产生怀疑的思想？

汤一介 不能说没有。

乐黛云 可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拥护“文化大革命”，他是“黑帮”，我也是“右派”，可是我们觉得毛主席的话很对。毛主席说那些高层干部：你们做那么多坏事，老百姓烧你们一下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觉得毛主席是要下决心改革社会上的问题。

汤一介 他们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平等嘛。

乐黛云 官吏的最高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当时我们觉得这样很好啊！

汤一介 当时的思想可以说是非常混乱……过去的专制社会中最坏的一方面，都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表现出来。它是一面“破四旧”，一面把原来旧的最坏的保存下来。我们常常只是看到它“破四旧”的一面，没有看到它把旧的坏的东西发挥了这一面。“文化大革命”一面把我们的传统打断了，一面又把传统的坏的东西发挥了，某些东西一直延续到现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经过一年多的检查，恢复了教学和研究。1981年，乐黛云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访问学者，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1983年，汤一介第一次出国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海外学者交流中国哲学研究。近三十年来，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在哲学和比较文学领域成就斐然。

李怀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你怎么恢复哲学的学术研究？

汤一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梁效”受过一段批判，把我们集中起来做检查，搞了一年多，到1978年才把我们解放了。解放出来以后，开始让我们做资料工作，我们就编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做注解。当然做注解也有好处，要弄清楚那些话怎么讲。一直做到1980年，我自己觉得过去哲学教学的教条主义必须打破，我们一直是学习苏联的教科书的体系。怎么打破呢？我就觉得可以从研究哲学的范畴开始，打破原来把哲学看作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框框，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篇《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还有很多搞中国哲学的朋友就一起来跟我做这个工作。这时候正好要在杭州开一个中国哲学讨论会，我就把这篇文章带过去，找了一部分人来讨论，大家都觉得很好。文章发表以后，产生了不小影响，接着张岱年先生他们都写了文章。从这开始，就要破除过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一直到1983年在西安开一个范畴讨论会，可以说是对过去哲学教学和研究的教条主义有所冲击和突破。

正好是1983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去了，而且是第一次出国，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到那儿我才接触到像杜维明这一批现代新儒家。那时候正好要开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始设立了一个中国哲学的讨论组，邀请我去参加。我接触了现代新儒家，我觉得新儒家的路子可能不太对，特别牟宗三他们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是错误的，不大可能从我们传统的儒家哲学里发展出民主政治来。所以我在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有一个演讲，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我是从真、善、美这三个角度来讨论问题，认为也许我们可以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哲学的真、善、美问题。这个演

讲当时大家都觉得不错。

回来以后，我就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和《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我把中西作了比较，把孔子和康德作比较，老子和黑格尔作比较，庄子和谢林作比较，说中西哲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哲学家都想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而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是要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境界。

后来我考虑的问题就是受余英时启发，余英时提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一个不同，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我们是内在超越。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不错，西方的外在超越是容易建立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国哲学讲心性之学，是靠个人的修养。我就想，西方的外在超越有一个好处，可以建立一个外在的标准。我就设想建立一套把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放在一起的哲学体系。我把问题提出来，但是我没有完成它，我没法做，因为有很多限制，对外国哲学了解得还很差，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在80年代末我就思考中国哲学中“和谐”的观念，到90年代我就提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体系，现在我编《儒藏》，我都是一步一步在思考问题，但是我都没有把这些问题彻底做好。因为要花很大的力气，中国哲学的知识要比我现在好得多才能做，现在时间已经没有了。

李怀宇 乐老师是1981年到美国去做学术访问？

乐黛云 我当时去做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当时不让我们俩一起出国，扣一个人做“人质”，怕两个人一起出去就不回来了。

汤一介 其实我们要留在国外有好几次机会。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做一个真正研究中国的学者，必须在中国。像杨联陞先生在国外，如果在国内可能就糟蹋掉了，但是国内的环境如果不是那么糟的话，他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乐黛云 他很难过，跟他聊天，他眼泪汪汪的。

汤一介 他说，他是跟着“老毛子”，为外国人在工作。

乐黛云 他老是围着人家的研究计划转，人家需要什么，他研究什么，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

汤一介 不过他出了一本书评，专门找外国人研究中国而错误的东西，他纠正它。他还是有国家的观念、民族的观念。

李怀宇 乐老师怎么开始关注比较文学？

乐黛云 我是1978年开始教留学生班，是欧美的学生，我给他们讲现代文学史，不能光讲鲁迅、《金光大道》，总得讲讲老舍、徐志摩吧，讲了一些当时不能讲的作家。后来我看到鲁迅、茅盾、郭沫若都很受尼采的影响，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们一向是骂尼采的，就研究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写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几个大师都受到尼采的影响，特别是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后来哈佛燕京来面试的学者看到这篇文章，觉得写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是一个新的领域。那时候我的英语并不好，结结巴巴的，不过还是去了。

李怀宇 在哈佛感受那种学术气氛对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影响大吗？

乐黛云 影响非常大。我一去就扎到哈佛的比较文学系，最早的比较文学就是在哈佛办起来的。我非常辛苦地学比较文学，又觉得很快乐。

汤一介 有一个非常偶然的現象，我现在看我父亲在哈佛大学研究院的成绩单，他第一门选的课就是比较文学。

李怀宇 从晚清开始，中国的学术很自然地要受外来思想的影响。

乐黛云 从林纾开始，林纾是一个不懂外语的人，他翻译了三百多本小说，而这些小说就给中国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除了我们的传统小说以外，还有这样的小说，那是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中国文化不经过外国的碰撞的话，不可能真正发展，就像佛教对中国传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样。比较文学现在的定义就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

汤一介 我们的哲学是在西方哲学影响下才成为独立的学科的。因为我们原来没有哲学，我们有经、史、子、集，哲学是包含在这些里面，分离成为独立学科是受西方的影响。黛云现在做的是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我现在做的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李怀宇 当年在老北大的时候，东西方的不同学术都在那里讨论研究。

汤一介 不仅是西方的不同流派可以进来，中国的不同流派也可以进来。什么学术都可以在这里讲，才是真正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空气。政治上可以有指导思想，但是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如果有指导思想就没有办法发展学术了。



陈乐民

1930 年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欧洲学会会长。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文明的进程》（与周弘合著）、《陈乐民集》、《学海岸边》（与资中筠合著）以及《徜徉集》三种：《在中西之间》、《过眼小辑》、《书巢漫笔》，编有《莱布尼茨读本》，译有《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等。

资中筠

1930 年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著有《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资中筠集》、《斗室中的天下》、《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著），译有巴尔扎克的小说《公务员》、《农民》以及薇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等。



陈乐民 资中筠

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

清晨先见到资中筠，原来陈乐民一早又上医院了。资中筠娓娓地回忆了清华园愉快的生活后，陈乐民才回来，略显疲倦，所以说得不多。陈乐民患有尿毒症，完全要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每个星期有三天要在医院里，他开玩笑说：“我的有效生命还剩下一半，星期一、三、五基本上干不了任何事情。”

墙上挂着陈乐民的书法，气韵清雅。空闲时，他会写书法，画国画，生病后手扎了针，对握笔有些影响。当年他在书画上练过“童子功”，后来忙于“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不大专注于书画丹青了。在维也纳时的顶头上司李一氓对他教益良多：“氓公兼通中西学问，雅好诗词，写得一手熔篆隶于一炉的‘李体字’，又是古文物收藏鉴赏家。我生性喜爱文墨，与这样的领导相处，追随左右，那种徜徉文事的氛围，自然如鱼得水，大大抵消了日常工作的枯燥乏味。”

房中还摆着资中筠的钢琴。她在高中毕业时开过一个独奏音乐会。进入清华园后，学校的音乐团体就来找她，大学生活是宿舍、图书馆、音乐室三点。有趣的是，在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工作的那几年，由于严守组织纪律，她很少沉浸在音乐世界里。半个世纪后旧地重游，目睹维也纳人古典音乐的普及程度，她有感而发：“从历史纵向而言，人家虽历经战乱，但没有经历过文化断裂。我国现在把‘高雅’、‘古典’与‘通俗’截然分开，并把前者与‘贵族’相联系，而所谓‘贵族’，其实就是昂贵的价格，为少数钱包鼓胀的人所享用，并不等同于文化意义上的‘贵族’。西方精致的文化开始也在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沙龙中传播，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日益普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精致高雅的文化也就渗入百姓中。”

陈乐民和资中筠都钟爱读书。从他们的回忆中，我发现，早年两人各有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资中筠感慨：“那时候泡图书馆太方便了，而且管理员态度好得不得了，很在行，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一下子就能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都对图书馆有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离图书馆太远，去不了，而且进去之后，手续太麻烦了。”

两人如今生活简单，早饭之后各自工作，下午写文章或看书。他们有一个喝下午茶的习惯，4点多钟喝红茶，吃点心。

1947年，资中筠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英语专业，1951年毕业。1949年，陈乐民考入燕京大学，两三个月后在校医普查身体时查出患有“肺结核”，回家休学，后入读中法大学一年，1950年转考清华大学二年级法语专业，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到1953年毕业，他像走马灯一样上了四个大学：燕大、中法、清华、北大。

李怀宇 你的父亲资耀华是金融家，著有《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

资中筠 我父亲原来是公费留日的，1900年出生，十七岁出去，在日本

差不多待了十年，上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回国后，发表了一些在当时比较新的“如何办银行”的文章，被陈光甫看中了，陈光甫正在创办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私营银行，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找到我父亲，正好很谈得来，先让他做调研部主任，做各种调查。他们那个时候各种调查是非常细的，一块钱就可以立户，定位是为普通市民服务的。陈光甫是英美派，大概觉得日本留学的资历还不够，就把他派到美国著名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念了两年硕士班，但是叫他不要念学位，因为念学位就要为了学位而上许多不一定需要的课程，然后到美国银行去跟班学习，再到英国去考察。回来以后，陈光甫就让他到天津去开分行，所以我们全家从此就在天津。我小时候在天津上过学校叫耀华学校，刚巧跟我父亲的名字一样，只是巧合。这个学校非常好。

陈光甫

1881—1976，银行家，原名辉祖，字光甫，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一直活跃于政界、金融界，对时局有很大影响。1954年后定居台湾。

李怀宇 小时候英文念得好吗？

资中筠 念得不好。抗战的时候，我们在英租界，开头还没有感觉到日本的影响。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势力就进来了，学校里逼着非得念日文，基本上不念英文了。但是大家都对日文反抗，不愿意念，上课的时候就捣乱，总之我们念了五年日文，现在我只记得字母（笑）。那时候是这样，谁要是把日文念好了，大家都看不起他。日文没有学好，英文底子也没有打好。

抗战胜利的时候，正好是我从高一到高二的那年暑假，还有两年要考大学了，我们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就拼命补，高二高三在课外我也请老师补英文。我的数学特别好，国文底子也还好，就是英文差。那时候我们考大学也是特别难的，特别是国立名牌大学。第一年我没有考上清华大学，所以上了燕京大学。那时候考大学是错开的，可以考好多学校。我脑子里就想着上清华，当时是西南联大三校联合招生。复员后的1946年、1947年这两年特别难考，因为原来只在内地招生，这时是全国招生，而规模没有扩大。国立大学是不用学费的，燕京大学的学费比较高，当然也有奖学金。

李怀宇 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以后，怎么去考了清华大学？

资中筠 上了燕京大学以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小，而且比较晚熟，不大善于交际，比较孤僻一点。我还是不甘心，第二年还是下决心要上清华，就去考转学，就是上了一年级以后，可以考清华的二年级。但是有一点，你要考清华的转学，就必须从燕京退学，才能拿到学历证明去报考，不能给自己留后路，不能脚踏两只船。后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退学了。那时候我在燕京已经成绩非常好，下学期可以得奖学金，免学费了。但是我不管，我去退学，学校教务处的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一再警告我：这样你就回不来了。我就不知道哪里来那么一股劲，非要退不可了。但是退了以后，我没有把握，万一真的考不上，我就什么学校也没有了。考完清华以后，我舅舅在上海，我又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结果那一年我三个学校都考上了，我就赶快回去上清华了。

那一年暑假，我家在天津，可是我没有回家，住在北平的一个亲戚家，每天跑北平图书馆，那时候北图在文津街，借书特别方便。我中午买一个烧饼，一整天就在里面读书，一个暑假就在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那些东西。那个暑假特别享受！

李怀宇 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哪些老师？

资中筠 我去的时候，系主任是陈福田，他是夏威夷的华侨，在清华不算是名教授。我上课上得比较多的，一个是温德，这个美国人在中国教了三四十年的书，最后是一百零三岁在北大去世的，他有好几代学生，从季羨林到我都是他的学生。我跟他上的是莎士比亚、英诗、散文。另外一个上得比较多的老师是钱锺书，他1950年从英国回来，我正好是三年级，他开西洋文学史，讲得非常好。后来他是我的毕业论文的导师。杨绛教我们英国小说，我们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Young lady*”（笑），她是苏州人，讲话细声细气。他们夫妇其实只在清华教了一年多的课，正好是我赶上了。

那时候的先生上课都非常有意思。首先他们不用讲义，开口就讲，在黑板上写几个关键的字。我们就拼命记笔记，谁的笔记记得好的话，考试的时候就好一点。老师告诉你一些参考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借来看，但是他的那种讲法就有一种吸引力让你借这些书看。而且到图书馆借书也非常方便，

只要老师提到的书，都是有好多本的。我之所以非要上清华不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华的图书馆特棒。我在清华的时候就天天泡图书馆。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还有教世界通史的雷海宗。

李怀宇 人家说他是“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

资中筠 应该是这样的。那时候老实讲，都是名教授，我当时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并没有这种特殊的感觉。不像现在的学生，一看那个教授特有名，就跟着那个教授。我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上课就上课。雷海宗一上来，就脑子里有很多年代，在黑板上写西方历史多少年，相当于中国历史多少年，他老是这么讲，具体内容我忘了，但是记住了世界史上的年代相当于中国史上的什么时候。他真是学问如海，原来是开中国通史的，我听的是世界通史，那时候就拼命记笔记，可惜我那些笔记现在全丢了。我是善于记笔记的，考试的时候同学都向我借笔记。

李怀宇 同学之中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人？

资中筠 1949年以后，走了一批同学，去参加南下工作团，我们班上原来有三十几个同学，走了一半，班就小了，大家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班上女同学多于男同学，同班的冯钟璞（即宗璞）跟我特别要好，我们到现在也是最要好的朋友。

还有比我高一班的英若诚，他英文好得不得了，因为他从小就上美国学校，英文本身已经用不着再上课了。他喜欢戏剧，那些必修课，他选了就跑了，只到考试的时候去应付一下。那时候学校特别的松，所以他所有的时间都在选戏剧课，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那时候外文系里专门有开戏剧课的，他一直都是到处晃悠，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听戏剧课。他后来的夫人吴世良跟他同班，跟我们一起住在女生宿舍，他一天到晚来找她，所以我们印象深刻（笑）。

李怀宇 你在清华大学的时候，认识陈乐民先生吗？

资中筠 没有。他也读清华，可是他进清华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因为他比我低两班。我是1951年毕业，他是1953年毕业，还算北大毕业的。他是法文专业，我是英文专业。我们很晚以后才认识。

李怀宇 陈先生上了四个大学，哪个大学给你印象深一点？

陈乐民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清华大学,虽然我没能在这所大学毕业,当时院系调整把文学院调到北大去了,我正在外面工作,回来时,清华文学院已经并到北大。从时间来讲,我是在清华的时间长一些,另外还是赶上一点清华在学术比较繁荣的时候。

李怀宇 有没有听说同一辈的人在四年间读了四个大学的?

陈乐民 哎呀,读了两个大学的倒有,读四个大学的没听说(笑)。

资中筠 不过,我觉得赶上抗日战争的时期,到处读来读去的人很多。

陈乐民 我这个不是战争影响,是解放战争以后了。

李怀宇 资老师说在清华的时候不知道你,你知道她吗?

陈乐民 我也不知道,她比我高两班。我上燕京大学的时候身体不太好,耽误了一年。

李怀宇 清华大学的学术气氛对你影响很深?

陈乐民 当时教我的老师在清华还不算突出的学者,但是清华的学术气氛很好,只要你进到清华园去,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地方是学术大师云集的地方。如果不是院系调整,你就会感觉清华园这个地方是那么的和谐,大师云集。但是我进去以后,赶上的时间就越来越短。比如说,我进去没有多久,就赶上知识分子学习改造教育,你看杨绛写的《洗澡》,就是那个背景。这些老先生上台去做检讨,把自己骂一通,但是仍然可以感觉到这是清华,别的地方不可能有这么一批老教授。

李怀宇 现在来看,院系调整对当时中国高校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资中筠 非常大,而且每一个大学的传统都给打断了,重要的是把文科打断了。它是大力地发展工科,比如把清华的文科并到北大,各个大学的文科都并到北大,并不是说北大文科就壮大起来了,而是整个萎缩了。

陈乐民 不仅把清华大学的文科打掉了,同时把清华大学文科对理科和工科的影响也给打掉了。过去清华大学理工科的老先生都有文科的基础,以后把文科一弄掉,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工科大学。

资中筠 当时的理念是连理科都不要了,跟工科分开,学苏联的那种,而且高度实用主义。

李怀宇 对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陈乐民 我那时候临时调出去工作，等毕业的时候我回到清华，清华大学说：你已经不在清华了，你到了北大了。我的同学已经把我的铺盖拿到北大。我到北大去，没有怎么上课，就毕业了，我也没有毕业考试，但是给了我文凭。

1951年，资中筠毕业后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1953年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这一年，陈乐民毕业，也分配到这里。1955年，陈乐民被派到维也纳工作，一年后，资中筠也被派去。不久两人相爱，1957年7月结婚。

李怀宇 毕业后工作没多久，“三反”“五反”时资老师家就受到了冲击？

资中筠 那时候政务院底下有文教委员会，我跟宗璞一起分配到对外文化联络局，跟专业对口，但是报到的时候被宗教事务局留下了，他们说需要外文人才，就把我们两人给留下了。我们不高兴，当然也没有办法，那时候得服从分配。后来我不太安心工作吧，还被批评了。“三反”“五反”了，我就开始挨整了。原来我已经入团了，并且要求进步，希望将来能够入党，因为我们这些人叫做“历史清白”，解放以前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我父亲被认为是“进步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的政协筹委会。忽然一个“三反”“五反”，他们都有问题了，都停职反省了，而且天津报纸头版头条登出来，说他是大奸商。然后我们单位就开始动员我划清界限，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老检讨，老是跟家庭划清界限，老得改造，没完没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跟家里就比较疏远了。当然后来运动过去以后，对我父亲做了结论，叫“完全守法户”，不存在违法的事情。我们全家就从天津调到北京来了。私营银行没有了，我父亲的职务就变成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一直到他去世。从此，他就不怎么说话了。

李怀宇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资中筠 1953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他那一年毕业分配过来。但是我那时候对他没印象。我们开始熟起来是都被派到维也纳。他1955年去，我1956年去。

李怀宇 当时在维也纳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资中筠 没事的时候就出刊物，每个礼拜都得开书记处的会议，我们做翻译，公文来往得翻译成中文，给领导看。工作语言是法文，也是整个机构的共同语言。我们不懂德文，但是奥地利的报纸是德文的，所以还有一个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每天把新闻从奥地利报纸摘成法文，我们再给领导念。世界和平理事会会有各种各样的会，每次开会之前要准备好多好多材料，整天就干这个。现在回过头看，都是配合苏联的外交，凡是苏联要跟美国谈判，就要制造舆论，召开和平理事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其实那些决议都是支持苏联的观点。

李一氓

1903—1990，生于四川彭州。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和长征。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晚年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推动全国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颇有建树。作品有《存在集》、《存在集续编》等。

维也纳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奥地利那时候属于英、美、苏、法四国共同占领，所以有苏占区，有西方国家的占领区，光是维也纳就分成几块。那时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访问西方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书记处在维也纳的苏占区，有各国的人，我记得总书记永远是法国人，因为法国共产党是第一大党。中国的书记是李一氓，当然底下就需要有翻译兼秘书，陈乐民先调去了。1956年我临时出国开会，完全不知道要长期留下来。我们到瑞典去开会，

那时候去的西方国家只能是瑞典，因为瑞典是中立的，而且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多国家都不承认。我随代表团去那儿开会，忽然就通知我不要回国了，到维也纳去吧。我记得后来还托人把衣服带来。我还记得到维也纳去，就是陈乐民来机场接我的。他非得来接我不可，他是工作人员，管这些事嘛。我就在那儿住了三年。

那个地方圈子很小的，中国人只有几个。没有建交，所以没有使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李一氓和他夫人，陈乐民和我，再加上一个厨师。李一氓是四川人，他是美食家，专门从四川调了一个厨师，所以我们那几年吃饭吃得特别好。

李怀宇 后来变成两家子加上一个厨师了。

资中筠 这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不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的纪律得两个人出去，不能一个人出去，怕被绑架或自己跑了，所以

在这种纪律之下，我只能跟陈乐民同行。我不能说要出去买东西，让李一氓夫人陪我去吧。他们是大领导，我们是普通工作人员，就只能在一块了。

李怀宇 第一次见资老师的印象还记得吗？

陈乐民 第一次见她，我们在工作，我是在联络部一科，她是在三科吧。

资中筠 不记得了，反正不在一个科。

陈乐民 毫无印象，我们是同事关系。我们好像没有怎么……就自然而然地恋爱了（大笑）。

李怀宇 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了？

资中筠 1956年碰上一个共患难的事情，就是“匈牙利事件”。这一年，匈牙利发生一个大游行，反对苏联。毛主席为什么要“反右”，跟“匈牙利事件”的刺激有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有一股自由化的浪潮，反对原来的思想禁锢，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匈牙利和波兰开始群众游行。

那时候正好是李一氓回国了，决定不再调他回来，但是新的领导没有来，结果剩下我们俩，加上一个厨师。那时候是没有使馆的，我们很难及时直接地接到国内的指示，要得到指示，得从维也纳到捷克的使馆，当然很近了，坐火车去，陈乐民去跑的。当时很年轻，一点经验都没有，忽然一下没领导了，碰上“匈牙利事件”。那时候不是苏占区了，整个奥地利统一以后，奥地利政府可以对它所有的区域都实行主权了。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认为是共产党领导的左派组织，所以奥地利政府就把书记处封了。那时候我们特别紧张，又没领导，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想，我们的关系是经过这个事情密切起来的，有点共患难的感觉。也许看小说看多了，我们还想着，说不定就会被抓去坐牢了，帝国主义把你关起来了（笑）。后来把整个世界和平理事会赶走了，赶到了芬兰，因为那时候的苏联对芬兰影响较大。而那时候领导还没有来，就我们跑那儿去了，空了三个月没有领导。“匈牙利事件”之后，我就觉得关系更进一步了，因为共患难了。

陈乐民 那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是一种神圣感。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二十多岁，住宅又被封了，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那一年真是一种缘分，有一点觉得……

资中筠 担负了很重要的历史使命的感觉！（陈乐民大笑）我们两个年轻人都不是党员，忽然在敌对势力的圈子当中，觉得自己要站稳立场。

陈乐民 我们的这种做法还被我们上面的一位领导批评了，说我们没有经过组织的同意。

资中筠 我们自己请奥地利的同志吃了一顿饭，那时候我们没有权力请人家吃饭。

陈乐民 我们还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擅自同外边接触了，而我们这么年轻，根本不够条件、不够资格这么做。后来也没有把我们怎么样。

资中筠 那时候还算宽容了。

李怀宇 什么时候结的婚？

资中筠 1957年7月结婚，那时候国内正在“反右”，我们暂时回来了一下，莫名其妙地参加了几次会。本来没有想着在那个时候结婚，后来领导动员我们：你们干脆结了婚出去，方便一点。后来就结婚出去了。那时候结婚无所谓的，就去登记了一下，我们那时候住集体宿舍，就让我们占一间屋子。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什么仪式都没有。我记得那时候布票都是分配的，结婚以后可以去多领几丈布，做被子，还挺人道主义的（笑）。同事们凑钱送一个暖壶、一个脸盆，挺实用的。

李怀宇 婚后又去了维也纳两年？

资中筠 后来又回到维也纳了，因为苏联跟奥地利交涉以后，又可以到维也纳办公了。待到1959年回来，我们认为是临时回来，所以很多东西也没有搬回来。忽然又说不能去了，因为跟苏联吵架吵得太厉害了。1959年中苏开始出现分歧，吵得一塌糊涂。我们留下很多很好的书，都没带回来。

李怀宇 维也纳是音乐之都。

资中筠 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们在那儿受到的禁锢特别厉害。只能在苏占区走，其他西方国家占领区我们根本不能去。但是，幸亏歌剧院是在苏占区，所以我们去过歌剧院。他们每年有音乐节，全世界最有名的歌剧院、管弦乐队到那儿演出，世界和平理事会前几个月就给大家登记买票。我们跟大伙去歌剧院看《茶花女》，还有其他的音乐会。后来觉得非常可惜，在那儿待了那么长时间，就是没有享受它的风光，连电影也没有去看，就在那

个小圈子里生活。

李怀宇 小圈子里有什么生活？

资中筠 挺有意思，各国共产党派来的人员，有一个工作班子，出刊物。法国、英国、西班牙、奥地利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组织郊游，像我们国内的单位似的。放假特别多，各种节都过，比如说我们国庆也放假，十月革命节也放假，所有奥地利的传统节日他们放假，我们也得放假，左派右派的假都放，各国的国庆都放。工作语言是法文，你要不会说法文，就没有资格在那儿。我的第二外语是法文，在那儿又加紧提高了一点。

陈乐民 我们那个时候受禁锢非常自觉。

资中筠 还有，我们没有领导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在维也纳，我们连电影都不看，没有批准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就不去看（大笑）。只有领导在的时候带我们去看才去。

陈乐民 那时候我们写东西，根本没有个人的东西。

资中筠 而且底稿自己都不留，现在写东西要查就很麻烦。

陈乐民 我们写回去的报告底稿都在“和大”档案里，署名“陈资”，一人档案，连自己都没有资格看了。

1959年，陈乐民和资中筠受命从维也纳回国。陈乐民回忆：“我是很‘幸运’的：从到维也纳起，我亲证了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齟齬不断，又到矛盾冲突迅速激化，直到尖锐对立、关系破裂的全过程。”“文革”爆发后，全家下放河南干校，两年后，中美关系发生变化，需要外事人才，夫妻被调回来工作。

李怀宇 从维也纳回来以后做什么？

资中筠 回来以后还是到“和大”工作。1959年到1966年之间，还是不断地开会。中苏有了分歧之后，内容就是跟苏联吵架。我们那时候劳动强度很大，所以后来我就大病一场。我那时候做同声翻译，现在的同声翻译第一报酬高得不得了，第二是必须一个钟头换一个人，我们做同声翻译是一个人钉到底的，连续八到十小时是家常便饭，有时二十四小时熬通宵。到了风

光那么优美的地方，不会想去看看风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等到安排代表团参观的时候，比如去划船，我就睡着了，在飞机上也睡觉，所以我现在特别能在飞机上睡觉。到1964年，我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陈乐民 我回国后就主动申请下放劳动锻炼。那时我们思想上有一个包袱，就是被认为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没有经历过与工农相结合。但是又以“工作需要”，总派我们到国外，不让我们下放。我们在维也纳的物质生活当然比国内优越，常常于心不安。1958年听说国内“大跃进”热火朝天，觉得没有躬逢其盛十分遗憾。到1959年，又听说国内开始物资匮乏，什么都要定量配给，觉得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更加坐不住了，于是和资中筠以及一位调去不久的同事，一同申请回国，与国内同胞“同甘共苦”。不过后来回国不再去倒不是由于我们申请，是由于和苏联吵翻了，我们撤出。

所以，我一回国就坚决要求下放。当时的思想就是如此，是诚心诚意的。资中筠因为正好怀孕了，所以不能下去。我下放在获嘉县，真正体验了浮夸、公共食堂、农村的赤贫和挨饿的滋味。那时每人每天口粮只有六小两（一斤十六两）毛粮（未去壳的麦粒），你可以想象吗？我在劳动时曾经因饿得腿软翻进水沟里。一年后调回北京，全身浮肿。但当时根本不会想一想大家挨饿的原因是什么……

资中筠 我虽然在北京，后来也浮肿了。同事中因营养不良得病的不少。

李怀宇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冲击了？

资中筠 “文革”不久，就到干校去了。像我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就有一些年轻人贴大字报，把我作为一个典型，说领导的干部路线有问题，重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因为我出国比较多。

陈乐民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们两人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她在国内，我是随代表团出国去日内瓦开会。一般开会回来，总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去接，那一次我们回来之后，没有人来接，我在车上的时候就问怎么回事。他们就讲：你到了机关就知道了。我一到机关，首先看到的是顶天立地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致出国人员书。副标题是：做保皇派还是做革命派，何去何从？我在国外工作，当时脑子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保皇派”，什么是“革命派”，觉得天下是要变了，接着就是“走资派”啊什么的。

资中筠 我已经挨了不少大字报了。

李怀宇 在国外的时候知道她挨批的消息吗？

陈乐民 不知道。

资中筠 不通消息的。我的处境在“文革”时候跟他还不太一样。“文革”的重点是“当权派”，我们还好不在学校，在中央机关，连小科长都不是，所以还在“群众”中，没有被揪斗。我们在“造反派”和军代表眼里都是非劳动人民出身，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但是我出身问题更大，总比他突出一点。在“文革”之前，也被认为领导重用得多一点，我一年要出国八次，不但代表本单位的，而且被别的单位借调。比如说，五一、十一毛主席、周总理在天安门接见外宾，我总会上天安门，当时我自己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同事看在眼里，可能会觉得什么。所以运动一来，就觉得领导怎么对这个人这么重用，一开始就成为“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被打入另册。

李怀宇 下放的时候一起下放吗？

资中筠 我先下放到京郊，他还在单位。后来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整个机关下放，我们全家连小孩子一起都到河南干校去了。

李怀宇 还好一家子在一起。

资中筠 一家子在一起，起先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大通铺。后来我们主动要求住在老乡家里。

陈乐民 不，在住到老乡家里之前，还给我们一间房。有一段稍微好一点，成了家的能够分到一间房子。再一段就是军代表提倡我们下去跟老百姓住在一起。

资中筠 后来自己建房子，在干校就有建筑队，先从做泥胚砖起。

李怀宇 下放多久又回来了？

资中筠 下放两年，我们算比较短的，因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就需要上调。因为中央预料中美关系打破僵局之后，外事活动就会多起来了。那时候等于是中国完全闭关锁国，根本就跟外头没有太大来往。要是没有这个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那时真的已经有了长期做农民的打算，所以学劳动活还是很认真，怕一旦完全靠劳动吃

饭自己养不活自己。

陈乐民 周总理有一个指示：外文干部外文不能丢掉。大家忽然又学习了，就《北京周报》还让你看，别的东西不让你看了。

资中筠 我那时连这都不想看。不但有读书无用论，而且觉得读书有害。

李怀宇 中美关系好转以后，你们主要做什么？

资中筠 从干校回来，“和大”没有了，那个地方变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了，我们就算是友协的干部了，当时我调在“美大处”——美国和加拿大，他调在“欧洲处”，在那儿主要做接待工作。

陈乐民 那时候中国很穷，却不惜工本，请来的人吃住都是中国出钱，而且大多是左派。所以来的这些人只会说好话，不会说坏话。我们主要是做外事接待工作。再有一种工作就是由中国主持的所谓国际会议。当时是联合第三世界和国际毛派，反帝、反修。我们的工作是在中外文之间翻译发言稿。

改革开放以后，陈乐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作研究员，曾任所长、欧洲学会会长，资中筠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作研究员，曾任所长、《美国研究》主编。夫妻二人多次到海外讲学访问，在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上成就斐然。

李怀宇 陈先生的欧洲研究是怎么开始的？

陈乐民 我年轻的时候，维也纳时期就是在欧洲了，自然而然就对欧洲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后来我做实际工作的时候就是跟欧洲打交道，兴趣是从这儿来的，好像好歹也是一二十年做跟欧洲接触的工作，应该深入研究。

资中筠 社会科学院属于国际这一片的就有八个所。

陈乐民 社会科学院开始是没有这些所，后来据说是领导觉得社会科学院应该成立一些研究国外问题的所。既然开放了，我们可以做点国外问题的研究。我们两个相差两年去了社会科学院，我是1983年去。因为大学学了法文，所以到了社会科学院好像是专门让我去研究法国的东西，其实研究的是整个欧洲。

资中筠 我是1985年去的，我调过来跟他还不一样。我有一次出国，在飞机上，正好碰到了李慎之，很谈得来，就被他给挖去了。我一到那儿就当副所长，1988年当所长。在1989年以后的形势下，我觉得我不适应当所长。1991年年底我就坚决辞职不当所长了，1992年出去做了一年访问学者。

陈乐民 我去了三十多个国家，说实在话，走马观花。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理解力增强了，这些零零星星的东西成了我反刍的材料，这些是和书本上看到的東西不太一样的。

李怀宇 “行万里路”非常重要。

资中筠 我觉得非常可惜，就是我们“行万里路”，如果像现在的年轻人老早就会得到很多很多东西，并且会去看、记、写很多东西。当时连自己发表一些东西都是属于犯纪律的，工作以外做一些笔记好像不是该做的事情。所以是很可惜的，虽然有这样的经历。

李怀宇 你对美国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资中筠 我在友协的时候就在“美大处”了，接触的都是美国人，那时候不是正式研究美国，但是对美国的情况慢慢地就比较了解。分配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时候，是被分配研究美国，那时候美国越来越是重点了。也不是我自己选择非要研究美国不可，但是自然而然地就变成非得研究美国了。

李怀宇 现在来看，欧洲和美国走过的道路，对我们似乎有启发和借鉴的价值。

陈乐民 我对欧洲感兴趣，不是从这个角度。我不是想中国从欧洲得到启发，特别是政策。我有兴趣的是，应该让我们的青年人了解、理解欧洲也包括美国，西方的文明是怎么样从古到今，这个道路和我们历史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不同。了解欧洲文明是为了把它当作参照，更好地了解自己。所以说“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我完全是书呆子，想做这件事情。中国的包袱，欧洲没有，欧洲人背的包袱，我们没有。我从没有想给政府做思想库。我在欧洲所当所长时，是无为而治：你写的东西出来了，某个政府机关觉得有参考价值，那你就去参考，我不去适应你，不用你出题。我那时候当所长，不赞成“命题作文”，还有这点自由。那个时期，我觉得很舒服。

李怀宇 从当年到维也纳开始，后来不断有机会到欧洲访问，对你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乐民 应该说是不自觉的影响。那时候我没有自己的主见，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你让我上哪就上哪，而且做得非常尽心，非常出色。后来自己知道想干什么了，那是到了中年以后了，对我来讲甚至于是五十岁以后。

李怀宇 到美国访问对资老师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资中筠 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那一次还是走马观花。后来再去，我们可以挑地方，想访问哪些地方哪些人，那一次是真正去了解情况。回来以后，人家问我，你最羡慕美国人什么？我说，一个是生存空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窄极了，只有一间房子，跟另外一家人住一套。不仅仅是这种生存空间，是觉得他们自由得多吧。还有一个就是图书馆，我特别喜欢图书馆，发现他们的图书馆实在太棒了，你到什么地方，气氛也好，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整个就不一样。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那儿待了一年，那当然了解得就更加深了。隔了近十年后又去美国访问了一年。

我觉得我的思想是一点一点地解放的。假如当时思想解放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我那一年的收获会更大一点。我现在又觉得那一年有点可惜，在那儿就是一心钻图书馆和档案馆，就没有留出一点时间来，到处去看一看，了解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另外，我当时还是比较守纪律的，那时候他在加拿大，从美国到加拿大是非常方便的，我就不敢去。

陈乐民 我在加拿大，她在美国，要是坐一个小轿车的话，很快就过去。我们就通个电话，严守不到第三国的纪律。

资中筠 从改革开放起，思想开始解放，到80年代末，思想又大解放一次，所以我就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在那之后，我觉得我的思想又多解放了一点。

李怀宇 陈先生觉得欧洲研究与美国研究之间互相有影响吗？

陈乐民 有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历史性的。美国是欧洲文明发展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产生出来的东西。美国和欧洲之间有延续性，现在美国的学者包括他们的政治家，仍然承认他们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只不过欧洲的文明传到美国之后，根据美国新的情况，有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觉得美国跟欧洲文明是一条线的，有区别，但不能割裂。后来不少研究美国的人，特别是现在，就变成实用主义了，觉得美国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其实是不行的。

李怀宇 现在有一种思潮就是：特别想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他们几百年走过的道路，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就把它走完。

陈乐民 很难搬过来。

资中筠 我觉得现在有两种思潮。你说的是一种，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强调中国的特色，而排斥西方文明的普世性的东西。有一种就是说人家已经走完那么多年了，我们还远着呢，所以我们这些都可以先不用实行，特别是民主、改革这些东西。另外，就是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以我觉得是两种，照搬的是搬过来一些皮毛，排斥的也是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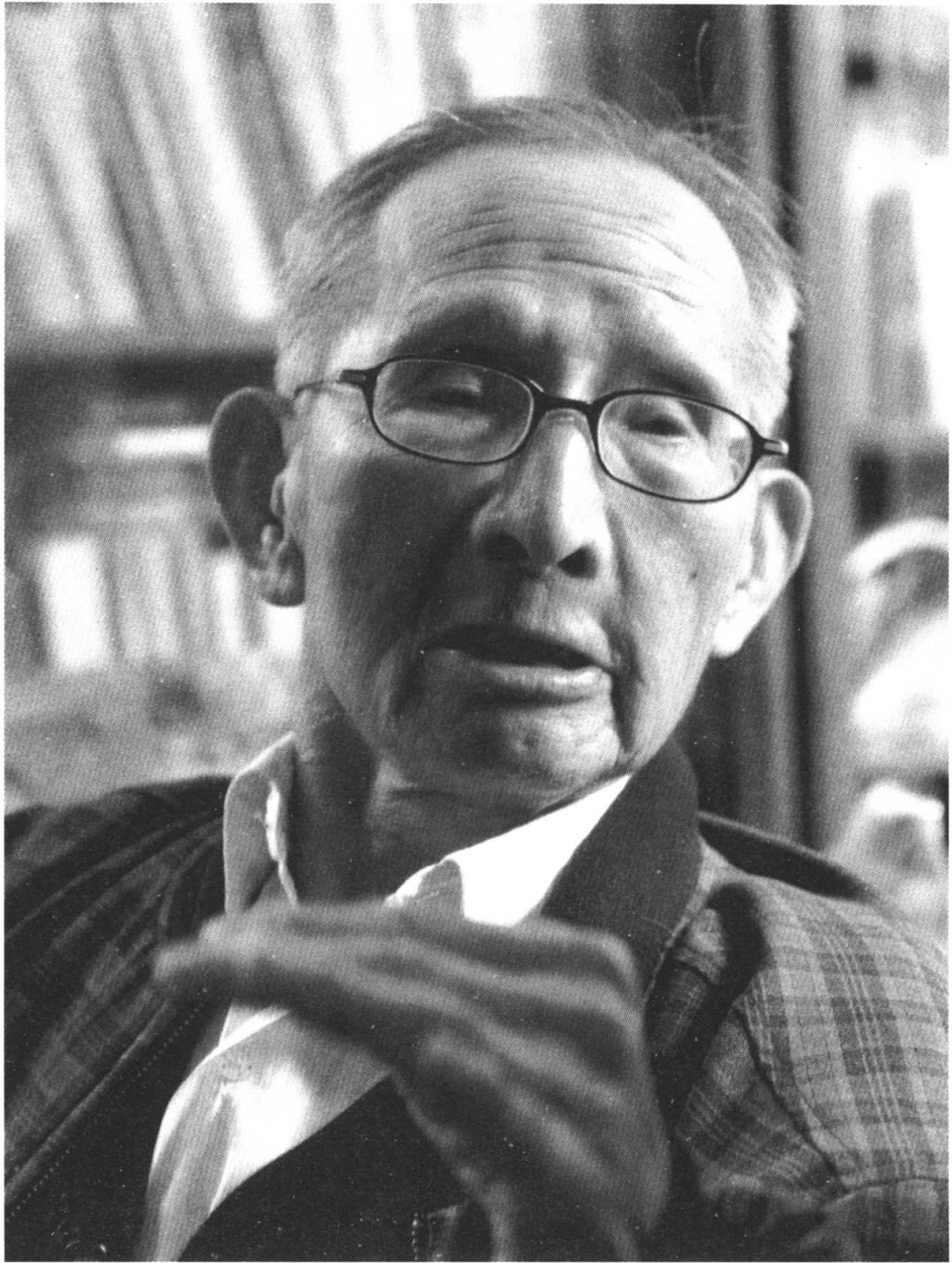


贾植芳

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

文学理论家、作家、翻译家。曾赴日本留学，一生进过四次监狱。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后历任震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现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

著有《人生赋》、《狱里狱外》、《老人老事》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等专著，译有《契诃夫手记》等。



贾植芳

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

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我因为住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

初到上海，应陈子善之约到季风书园会面，意外地找到贾植芳的著作《早春三年日记》。这是贾植芳1982年1月至1984年12日的日记，是他平反后回到复旦大学初期的记录：读书，教书，交游，坦荡的生活，质朴的思想。

在1982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贾植芳写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六十七年前的今天，我头一天来到这个世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路程。我今年六十七岁了，已在远离家乡的江南大城市生活了近四十年，吃过新旧社会的各一次政治官司——旧社会一年半，新社会十一年，外加‘劳改’十三年，即是说有二十五年半，我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但我却都是历史的胜利者，整我那些人都早进入历史垃圾箱了，我还是我，一个大字写的‘人’！”

意外地发现，多年后才渐渐热起来的黄仁宇、夏志清、周策纵、白先勇、李欧梵的著作，贾植芳在那时候就读了，而且多数是读外文原版，还让学生

试着翻译。而贾植芳读书之杂，交游之广，见地之深，远远超出原来的想象，使早先看他的作品和别人写他的文章所产生的形象更为立体了。

幸亏读了这本日记，见贾植芳时才有了更多新鲜的话题。早春的一个下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的带领下，我们来到贾植芳的家中。贾植芳先生坐在书堆里，如同往常一样，他把采访当作朋友聊天。在这位长者面前，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如叙家常一般，而他闲散的笑谈中，常常有出人意表的妙句。可惜这位长者的山西口音，借助他的侄女桂馥和吴中杰先生的翻译，我只能听懂大半。

在谈话间，韩国和日本的几位女留学生穿着本国服饰前来给贾先生拜年，从春节起，几乎天天有熟识和不认识的学生前来拜年。女留学生也饶有兴趣地听着谈话，当听到白先勇和李欧梵曾在她们坐着的地方和贾先生谈天时，不禁发出惊叹。等到谈话结束，她们才彬彬有礼地用自己民族的方式向贾先生行礼，贾先生也回以深深一躬。

晚上，吴中杰先生做东，请贾先生一家和我们在复旦校园共进晚餐。点菜时，吴先生专门点了一只甲鱼，说那是贾先生最爱吃的。倒上花雕酒，贾先生举杯：“以前我喝的是白酒，现在身体不如从前，只能喝一点儿黄酒。”又笑着告诉我：“我有一句格言：饭店多去，医院少去，火葬场慢去。”

饭桌上闲谈，贾先生说：“我一生都没有上过班，宁愿饿着也不干，自由主义惯了。在大学自由，可以不上班。”又说他在上海办过出版社，办过杂志，编过副刊，写书赚了点钱，就把大家请来吃好的。

桂馥对我们说，贾先生不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想读书看报，常常忘了吃早餐。贾先生说，他最大的乐趣是逛书店。饭后，他带我们到复旦校园里的一家小书店逛逛，那里的书可以打很低的折扣。我找到了好几本一直没找到的旧书，更意外地找到一本贾先生的《老人老事》。

1935年，十九岁的青年学生贾植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不久后的一天凌晨，贾植芳被捕，罪名是“参与动乱”、“反对政府”、“共

党嫌疑”，关在北平公安局的看守所两个多月。贾植芳在洋行当买办的伯父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烟，将他保了出来。不久，伯父花钱为贾植芳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文凭，送他赴日留学。出国前，伯父约法三章：一、要学习实业；二、不能搞政治；三、不能娶日本女人。1936年4月1日，贾植芳进入东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五个月后考入日本大学经济系，后转入社会学系。在日本，贾植芳阅读了大量外国作品，与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结交，饮酒，谈天，听音乐，看电影。

李怀宇 你在日本留学时日文学得好不好？

贾植芳 还可以。普通的日语能讲，日本书能看懂。

李怀宇 那时认识郁达夫和郭沫若，大家很熟吗？

贾植芳 郁达夫不太熟。郭沫若在日本没有学校，是在那儿住着，在东京帝国大学对面，我也陪郭沫若喝酒。郭沫若穿的西服的袖子都短到这里（用双手比划），是老的衣服，很潦倒的。他老婆安娜给他五毛钱车钱。安娜是医院的护士，大概活到一百岁才死的。后来到中国来了。

李怀宇 回国后你和郭沫若交往多不多？

贾植芳 后来郭沫若当了政务院的副总理。我们在日本的时候认识李春潮，50年代又在北京碰到他，我们住在高教招待所，李春潮约我一起到郭沫若家里喝茶。

我雇了个三轮车去，拉车的告诉我，那个地方以前是清朝的王府。一敲门，出来个解放军，他说：“你等一下，我汇报一下。”郭沫若见了我，很亲热：“老贾，我们多少年没见了，你还记得吧，那年我们在东京帝国大学对面喝酒。”我们有一个同学雷石榆，是广东人，他在日本多少年一分钱没花过，日本小姑娘喜欢文艺的，跟雷石榆住一块儿，养活他。我羡慕他！后来雷石榆跟这个女的不在一块儿，又跟另外一个女的在一块儿了，一分钱没花过，那个女的管他吃饭、睡觉，给他买东西。那个女的要跟他结婚，他说他要离开东京，回国后就跟你结婚。后来那个女的发现，雷石榆没有离开东京，而是跟另外一个女的同居了。那个女的跳楼自杀，被日本警察发现了，到雷石

榆家一看，他家里有多少小姑娘照片。日本报上登了《黄色支那人》，把他驱逐出境。解放后雷石榆在天津师范大学教书，雷石榆的老婆是跳舞的，在台湾。本来我是想叫雷石榆一起到郭沫若家里喝茶的，但是李春潮不让叫，说郭沫若现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们负不起责任。

李怀宇 怕雷石榆影响郭沫若的声誉。

贾植芳 不不不，怕雷石榆影响郭沫若的生命。郭沫若多客气啊！他家里很大，我在他家里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塑像。走的时候，郭沫若送到门口，说：“我到上海，一定到复旦大学来看你。”

李怀宇 后来真的来看了吗？

贾植芳 到了1955年，郭沫若写了文章，要坚决镇压胡风分子。毛泽东讲，他们的罪行应该受到严厉的惩处，郭沫若说：坚决镇压！……解放以后李春潮来上海，告诉我：“郭沫若老婆安娜来了。”李春潮对我老婆任敏说，安娜在中国人生地不熟，怕她寂寞，让任敏没事去看看她。任敏到上海大厦去看过她一回。

李怀宇 你在1983年4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萧斌如来，她说，又要开郭沫若讨论会，说外面把郭贬得太低了，要提高一下。其实，这种贬低正是“群众眼睛雪亮”的缘故。

贾植芳 这些事情将来大家都会知道的。

贾植芳生于山西襄汾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闲居乡间的地主，伯父是洋买办，曾任亚细亚火油公司总经理。贾植芳排行第二，长兄贾芝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贾芝的妻子李星华是李大钊的长女。贾植芳的妻子任敏是山西汾阳的大家闺秀，两人相爱后风雨同舟，1955年5月15日贾植芳被捕时，夫妻匆匆一别，不想竟是十二年生死两茫茫。2002年11月20日，任敏病故，贾植芳含泪写下挽联：“缘识故都奔走黄河寻觅铁窗相濡困病榻不忍思风雨白头六十年再相逢非此岸，读梓东海育苗西漠农桑北地煮字刊南港莫提起艰难携手春寒路家中妇天地间。”

李怀宇 你出身不错，却热衷于社会进步活动。

贾植芳 我一生都不本分。我家里也不是穷人，我伯父是英国买办，父亲是地主。成分不好。

李怀宇 你哥哥贾芝也是有名的学者。

贾植芳 我哥哥胆小，规规矩矩，听党的话，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都没事。他编过两本书，《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的传说》，官也不大，是局级干部。那年我到北京开会，买不到软卧，碰到一个马司长，终于买上了。马司长骑着自行车，我说：“老马，你的官也不小，骑着自行车，实在太不像话，买个汽车。”他说：“北京部级干部就三千多，像我这么大的官比苍蝇还多，出了北京城就高了，就是中央首长。清朝的县官七品官，见了皇上就跪在最后，出了北京就长高。”

李怀宇 你的嫂子李星华是李大钊的女儿，她到延安是你送去的。1940年，她能从沦陷的北平出来，是周作人帮的忙？

贾植芳 周作人在北平是汉奸。北平的汉奸政府有一个规定，出北平要有人保，周作人保了李星华。李星华要去延安，周作人说：“可以，我保你。”李星华说：“周先生，我到延安去，你有什么口信要带到延安？”周作人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人叫毛泽东，见了面替我问好。”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曾经到北京八道湾拜访过周作人。后来，李星华没有传口信给毛泽东讲周作人向他问好，那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声讨周作人当汉奸卖国贼。

李怀宇 1943年，你跟你太太认识没有多久就同居了。

贾植芳 我在西安，她在西安上大学，她的同学是我村里的人，她看过《七月》、《希望》，知道我。跟我受了一生的罪。当时同居，同居之后没法生活，国民党的工兵团要招考一个日文翻译，我就坐泥船到黄河边上。在华山旁边，国民党的团长许开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毕业的，让我翻译了日本的工程兵

《七月》

旬刊，胡风主编，1937年9月在上海创刊，后移至武汉、重庆出版。所载大多是反映抗日战争的诗歌与特写，并发表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1941年停刊。常在《七月》发表诗歌的鲁藜、绿原等人被称为“七月诗派”。

《希望》

1937年创刊于上海，第三期印出后即遭查禁。1945年胡风在重庆创办同名月刊，1946年10月停刊，以创作、理论和文化评论并重，常触及时政，尖锐泼辣。

教材，出版时是用团长的名字。后来这个部队认为我来历可疑，决定了处置的办法：就地活埋。团部一个文书听到这个消息，跑来告诉我，我们夫妻就设法逃出这个部队了。

李怀宇 当年你太太看到胡风脾气不太好，胡风就跟她说：“你认为做知识分子的老婆容易吗？”

贾植芳 她跟我，苦一点，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职业，但是自由。抗战胜利，我们到上海，两个人身上才有八分钱，去胡风家里，雇了个三轮车去，说好车钱是三毛钱。到胡风家，胡风夫妇迎出来，梅志让我们洗脸，我说：“还差两毛两分车钱没付清。”梅志给了车夫。我们就住在他们家里，胡风在那个时候跟任敏说了这句话。

李怀宇 80年代你和太太到中山大学住招待所，他们说要出示结婚证，结果你们才发现，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还没有结婚证。

贾植芳 那时候没有结婚证，宾馆的服务员说：“没有结婚证不能住宾馆。公安局的人来查，我们没有办法。”后来，中山大学的吴宏聪教授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

贾植芳一生进过四次监狱。第一次是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入狱；第二次是1945年在徐州入日伪监狱；第三次是1947年和任敏一同被关押在上海中统局本部；第四次是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任敏也第二次为丈夫连坐，入狱十六个月。后来，贾植芳将自己的经历集成《狱里狱外》等书，回首往事，贾植芳自述：“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生活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李怀宇 中国20世纪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像你一样待过四次监狱？

贾植芳 比较少。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我因为住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

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

李怀宇 第一次进监狱时你还是学生，怕不怕？

贾植芳 不怕。那时候就十九岁，大年夜关进去，好饭是吃不到的，一个老犯人跟我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第二次开饭了，我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后来他们真的给我重新送饭来了，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

李怀宇 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

贾植芳 不怕。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

李怀宇 第三次进监狱后，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你拒绝了。

贾植芳 “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30年代我们处分过他，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年，像刘邦的大将韩信一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李怀宇 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

贾植芳 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可以给看守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的就给他两毛钱。人民政府不能买也不能送……

李怀宇 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

贾植芳 没有看书。“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我说：“这些人都是同事。”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学生。”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他们问我：“你呢？”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6年，关了我十一年，要到法院去，在一个小房间，四两米饭、一个咸菜、一个豆腐干、一个鸡蛋汤。吃完了，问我：吃饱了吗？我说，没吃饱。他给我又拿一份，我心里想：要吃饱，不要当饿死鬼……后来吃完了八两饭。他们对我说，你歇一下。后来到法院，审判长说：“开庭了，把老反革命分子贾植芳押上来。”在法院里判刑，戴着手铐，送到复旦大学保卫科，当劳改犯，1978年后就缓和，1979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当资料员，1980年才正式平反，由鬼变成人了。

李怀宇 你觉得胡风是什么样的人？

贾植芳 正直。他写“三十万言”，就是没写自己。后来胡风没想到人家会认为他反动，他自以为革命，革命成功了变成反革命……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掌权了，不受奖，还受惩。

李怀宇 胡风写的文章怎么样？

贾植芳 他写的有现实意义。“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很有意思。胡风后来精神分裂了……

李怀宇 你觉得周扬是什么样的人？

贾植芳 周扬也可怜。他是代理人，毛泽东指示，周扬是执行人。后来周扬、田汉、夏衍通通关进监狱，关了十年，我当时幸灾乐祸。很有意思，1955年把我们抓进去，1966年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出来了，左联的“四条汉子”进去了，1976年把“四人帮”抓进去（笑）。风水轮流转。周扬我不熟。“文革”结束后，他到处给人道歉……

李怀宇 你如何理解周扬在80年代的忏悔？

贾植芳 忏悔是应该的，应该认罪，应该道歉。周扬平反以后也去看胡风。他到哪里都给人家道歉，也可怜，这就是“精神奴役创伤”。

李怀宇 你在1983年2月8日的日记里讲，你到北京，“由李辉陪同去看了舒芜，他变得我已完全不认识了，见了面得问贵姓”。那次见面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贾植芳 舒芜把我们卖掉，我们去看他怎么样，他老婆在“文革”中被学生活活打死。他说：“老贾，多年不见，请你吃个便饭。”后来老朋友

牛汉打电话说：“那小子把咱们卖了，他花钱，咱们吃。”吃完饭，我们到琉璃厂逛书店，大家一句话不讲，舒芜看太沉闷了，就跟我讲：“老贾，我本名叫方管，管是管理的管，竹字头，而你过去写成草字头。”我说：“我写得对，你小子草菅人命。”后来在书店买到一本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写上：“某年某月某日，与植芳兄、牛汉兄、绿原兄在前门饭店午饭，饭后步行至此，购得此书为念。”

牛汉

“七月诗派”重要成员之一，原名史成汉，山西定襄人，1923年生。4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1946年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两年。1955年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二十余年后得以平反。

贾植芳 1950 年在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1951 年受聘为专职教授，一年后兼任中文系系主任。1952 年高校院系调整，贾植芳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任现代文学教研主任。贾植芳没有教授的架子，夫妇都好客。据他的许多学生回忆，1955 年前，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到贾家登门请教过，借过书，吃过饭。当年深受教益的施昌东、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后来都成了名学者。1978 年 9 月，贾植芳结束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1980 年重归教授岗位。贾家又是高朋满座，李辉、陈思和等人是他的高足。在 80 年代初，贾植芳就非常注意海外学者，白先勇、李欧梵等人曾多次到贾家拜访。

李怀宇 1955 年前，很多学生到你家里来，80 年代以后又有很多学生到家里来，聊天探讨学问，这种风气真让人神往。

贾植芳 我不是把教授当成一个职业，而是交朋友。这些人现在是小人物，将来是大人物。也有受我影响倒霉的，54、55 届很多人后来都受到我的牵连，以前常来这里的人都戴上帽子，是“影响分子”，还抓进去，像章培恒、施昌东。解放前，我交的朋友比较杂。但是干部解放前来往，解放后不来往，因为干部跟你谈话要汇报。80 年代以后过个太平日子，过个小康生活（笑）。

李怀宇 这些学生在这里聊天会不会比上课还好？

贾植芳 大家聊天，很多学问就可以聊出来，上课有个限制。知识不一

定是书上的，书上写的基本上是，但不完全是他自己的。

李怀宇 80年代初期，你已经在读黄仁宇、周策纵、夏志清、白先勇、李欧梵这些人的著作了？

贾植芳 他们的东西我都读过。夏志清我认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把我的名字写错了，把“贾植芳”写成“贾冀沅”，台湾翻译成那样，现在好像没有了。他来复旦大学访问，开始一个个介绍，夏志清没有反应过来，他后来问有名片吗，我们没有名片，手写了名字，他一看“贾植芳”，马上就说：“你是胡风分子吧？了不起的人物。”吴中杰还当面跟他说：“夏先生，你的书里把贾先生的名字写错了。”他反应过来之后，就很热情了。

李怀宇 白先勇小时候在上海住过，他来拜访你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贾植芳 白先勇来家里，就坐在这个地方，和我聊天，他不抽香烟，吃瓜子，我抽香烟。他说：“贾先生，我讲的话有点不礼貌。”我说：“没什么关系，我们朋友见面，随便聊天。”他说：“茅盾写的《子夜》里资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他写外滩的一个大饭店，大买办、交际花都坐在那里，写得不像，我小时候在那里住过。他写的资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我自己就是资产阶级。”我们就随便聊天。

李怀宇 李欧梵对上海比较了解，写过《上海摩登》，好像还来复旦大学进修过？

贾植芳 李欧梵在这里进修过，他是芝加哥大学的，每回来上海都给我带两条万宝路。他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他们一起读书，他们当学生时还办过一份《现代文学》杂志。

李怀宇 这些人当时在内地还很少有人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他们的？

贾植芳 他们来学校访问，学校让我去接待，到学校一个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见客。上头有规定，凡是外宾送来的东西一概上交，外国朋友送来的酒、香烟，外事处的人告诉我要上交。我说：“老外送个电视机我交给你，我又抽烟又喝酒，老外送烟我要抽，酒我要喝。”我马上打开一包烟抽，对他们说：“抽了犯错误你找我。”后来就不再在外事处的地方接待外宾了，凡是外国朋友都让他们来家里见。李欧梵是高级访问学者，要交学费，一个学期

三千美金，后来到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老外来访问，我要赔钱，因为他要回国，我要请他吃饭，我请老外吃饭，又不像中国人随便吃点。

李怀宇 当时看海外学者的著作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贾植芳 英文也看，中文也看。英文版的《东方专制主义》是李欧梵寄过来送给我的，这个书我让外语学院一个人翻译，我写个序，结果没能出版。

李怀宇 你还让学生翻译海外学者的著作？

贾植芳 我带的研究生每个人都要翻译一本书。这些外文著作对中国学术有帮助。教材是新的，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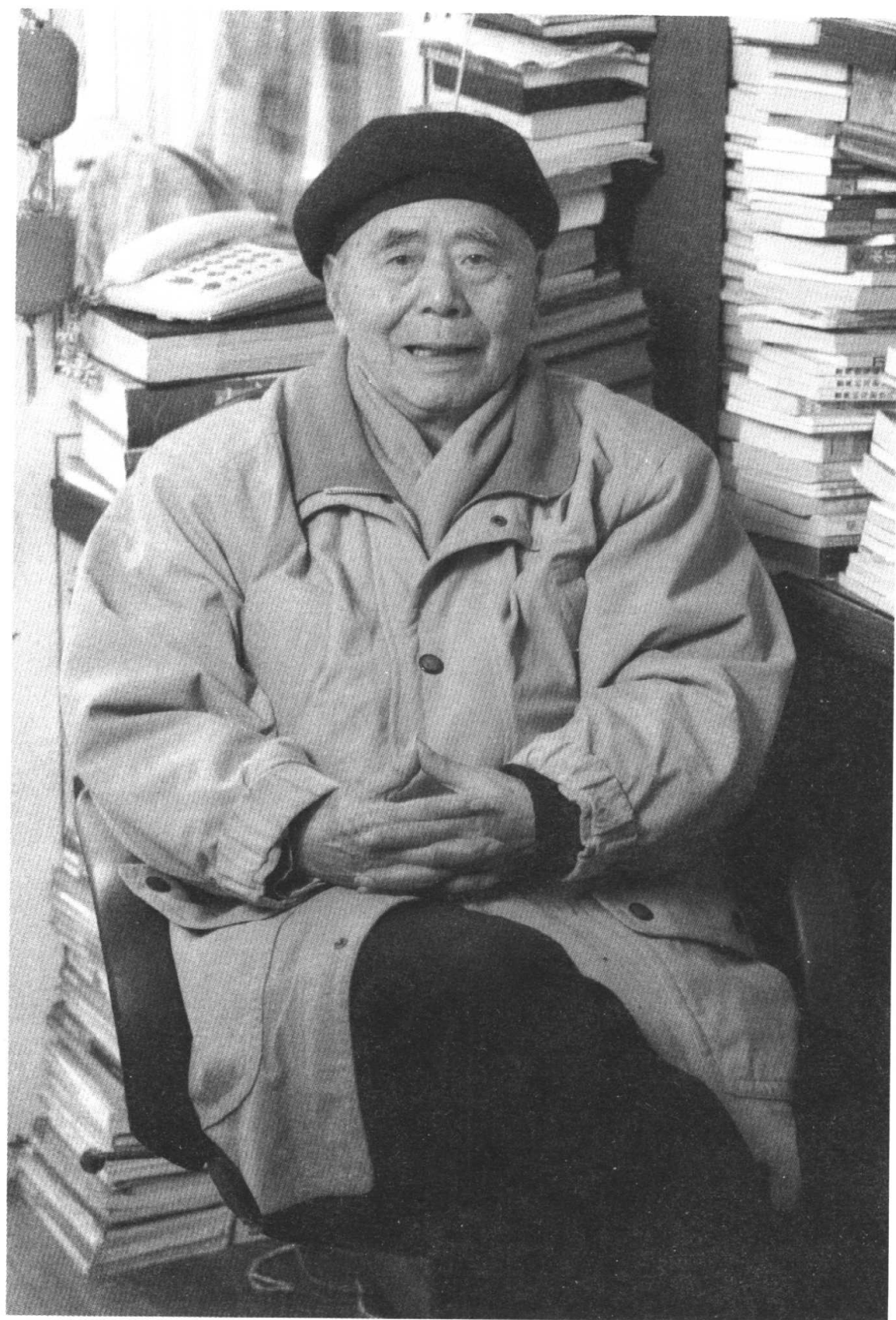
钱谷融

1919年生，江苏武进人。

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等。

彭辉 摄



钱谷融

漫谈中教出高徒

现代文学我是不大看的。原来我说让我教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行，就现代文学我不教，学校却要我教现代文学。我是最不喜欢现代文学的，那时候就偏偏要我教现代文学。我们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差多了，也比外国现代文学差。现代文学就鲁迅、周作人、曹禺算还不错了，现在读来还是周氏兄弟最好。

看过钱谷融的学生写在他家客厅上课的情景，不禁神往。早春的一个下午，终于走进钱谷融的客厅，顿觉一室春气。茶几上摆满了学生送来的鲜花，书架之外，厅中四处也都堆放着书，墙上是王元化为老友八十寿诞写的字幅：“收百世阙文，采千载遗韵。”

钱谷融先生忙着给我们斟茶递水果，叮嘱我们聊天时别忘了吃东西，好几次起身为我们续热水，可以想象当年他在这里为研究生上课的情景。他的谈话，多是言不及义，让我联想起远在北京的“散仙”杨宪益。算起来，两人相差几岁，当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杨是身穿长袍的外文系教授，钱是爱泡茶馆的国文系学生。和杨宪益爱饮酒写诗品画不同，钱谷融自称“不会做诗，不会写字，不会画画”。他是朋友圈中知名的美食家，云南作家汤世杰曾形容：“钱先生吃鱼头儒雅得仿佛是研究、解剖某艺术对象，鱼头转眼被分解成

了许多零件。一双竹筷在他手里犹如手术刀，挑、剔、拣、拔，干净利落，准确无误，整个过程如同一段炉火纯青的艺术表演，而他依然谈笑风生，满脸孩童般率真的微笑。”对当年受批之后照样好吃的传闻，钱先生笑答：“批，当然是恭听了；玩，还是照样玩。学校开完会，我们一家坐一部三轮车，到外面去吃馆子。”

谈话中，钱先生不止一次说：“我这个人既无能，又懒惰，凡事完全凭兴趣。”对自己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校园的经历，他的解释是：“我只要有饭吃，什么都行，随遇而安。只要学校不解聘，我就一直待下去。毕业后在交通大学待了几年，别人都觉得奇怪，后来是因为交通大学没有国文专业了，我才到华东师大，一待就待到2000年八十一岁退休。”他那几篇全国闻名的文章，都是被动地应约而写的。他有一本书，名为《散淡人生》。

现在，钱先生的生活习惯是：早上到华东师大旁边的长风公园走走，然后在家里喝茶，看书；下午，得意门生殷国明会来陪他下象棋。以前，钱先生喜欢游山玩水。“但是太太现在这样不大好出去。”钱先生说，“她原来在华东师大教外语，最近身体不大好，脑供血不足。”他们的一双儿女现都在美国，儿子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硕士毕业后教钢琴，女儿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后搞电脑。

谈到日近黄昏，我问：“您是不是特别喜欢《世说新语》？”钱先生随口应道：“常常看看，没事翻翻。”于是漫无边际地聊起当今许多模仿《世说新语》的新书和犹有魏晋风度的人物。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先读私塾，后进学堂，儿时敬慕高卧隆中的诸葛亮，喜爱闲云野鹤的散淡襟怀，和小朋友玩耍时称自己是“山野散人”。1938年，钱谷融考入内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具有魏晋风度的老师伍叔悦对他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大学里，钱谷融喜欢泡在茶馆里看书。毕业后，钱谷融教了一年中学，此后一直在大学教书，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学校。

李怀宇 你的大学老师伍叔饒先生现在大家了解得不多。

钱谷融 伍叔饒先生跟罗家伦、傅斯年是同班同学，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毕业。伍先生跟鲁迅在中山大学同事过的，听说后来伍先生到日本教过关于鲁迅作品的课程。顾颉刚是伍先生的同班同学，顾先生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伍先生是自由散漫的。他后来到香港崇基学院任教，以后到日本，60年代在日本或是香港去世的。

李怀宇 伍先生欣赏魏晋风度？

钱谷融 他很潇洒。我们在中央大学，课程里有国文教学法，伍先生是看不起的，我们都看不起，他教我们这门课程，就教《文心雕龙》，不讲教学法。我也向来看不起教学法的，没什么意思。他跟朱家骅是连襟，两个人后来都跟自己的太太离婚了。朱家骅是他的老师辈，在北大做过教务长。

李怀宇 伍先生喜欢上馆子，还爱带上你？

钱谷融 他都拉我作陪。那时候他离婚了，一个人住在单身宿舍里，吃饭他不吃包饭。伍先生喜欢带我下馆子，喜欢到乡下去，蚕豆刚刚上市时，就在乡下的小酒馆里喝酒吃蚕豆。那时中央大学的周边风景好，我俩常常一起散步。

李怀宇 你读大学时常常泡茶馆？

钱谷融 重庆有很多茶馆，里面都有躺椅，有个盖碗，冲茶时很远很远处冲下来（用手比划）。一天到晚我都在茶馆里带着本书看，看小说、看诗。我初中以前看中国小说，高中以后看外国小说，大学以后看英美的原文。

李怀宇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也不大上课。看他写那时候的西南联大，好像教师同学都有共识似的：好的大学就是自由自在的，爱讲什么，爱写什么，都随便你。

钱谷融 当时中央大学很自由。四十几个系，名教授也很多，教育制度都是自由的，西南联大也是自由，那个时候的确是非常向往英美的那一套。自由主义的好处就是让人的才能充分发展。郭沫若、林语堂到我们学校去演讲，我都没去听。我对名人没有兴趣，老舍来是我去介绍他的，因为伍叔饒先生请他，叫我去主持介绍老舍。以前的大学都是自由散漫，完全自由主义的。

李怀宇 那时候要不要读“三民主义”？

钱谷融 要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自己教“三民主义”，我不大听，考试时大家都作弊，抄袭。他也没办法，他来监考我们还照样抄。

李怀宇 罗家伦讲别的课好吗？

钱谷融 因为罗家伦跟伍叔傥先生是北大同班同学，伍先生请他为我们国文系十几个人讲过一次课，讲文学的观念。这个人的样子不大好看，当时对他有四句话的评语：“一身猪狗熊，两眼势利钱，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他的身体又像猪，又像狗，又像熊；两只眼睛只看到势、利、钱，三个诀窍是吹牛、拍马、骗人；他姓罗，罗的繁体“羅”是一个“四”加一个“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缺少个“耻”，说他无耻。其实他并不是这样“不堪”，这个校长他完全可以做。他也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胡适的学生。

李怀宇 你们读书的时候，胡适的思想对你们影响大不大？

钱谷融 在国民党时期，胡适是被称为“当今圣人”的。他的门生遍天下，他在北大多少年，后来他的学生都居了要津，声望地位是很高的。到1955年以后，就把他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李怀宇 你在中央大学见过杨宪益？那时候他刚和戴乃迭一起回国。

钱谷融 那时候我二年级，他刚刚回国。杨宪益穿长袍，我们中央大学外语系的教授都穿长袍，中文系的教授穿西装（笑）。戴乃迭那时候二十来岁，很漂亮的。后来我在香港看到戴乃迭，老了，又高，满头银发，老态龙钟了。

李怀宇 后来你毕业了也在重庆教书？

钱谷融 在重庆市立中学教书，1943年到交通大学去教书。交通大学后来没有国文专业了，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我一直在这里教书。我很懒，只要不赶我走，我就一直待下去。我一辈子都在学校里面，做完学生做老师，别的事情做不来。

李怀宇 你一直都在大学里生活，觉得这几十年大学教师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钱谷融 抗战以前，大学教授的生活是非常好的，一个月三百多块大洋。解放时，那时候我当讲师的工资是一百八十多块，家里一天花六块钱，可以

天天吃鸡了，菜就非常好。1958年以后就变了，当时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来我们弄到没有办法，到国际饭店吃饭要排队，家里没有好吃的，只能到那里吃顿好的，我们坐在楼梯台阶上，一级级地等。菜买不到了，到外面去吃饭要有就餐券，用就餐券才能进饭店，用二两就餐券就行了。我们一家四个人就去吃馆子，如果老是不吃，很多人就得了浮肿病。

1957年，钱谷融在学校各方面的动员和敦促下，勉力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文章公开前，钱谷融在学校讲台上有一段著名的讲词：“请允许我讲个故事。有位先生原来有妻室，是父母的包办婚姻，虽然妻子很贤惠，但感情这种东西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清楚。他在社交中认识了某位女士，一来二往，两人就情投意合，就是说情已他移。这难以多责怪，因为他们确实有共同语言，真正享受到了爱的甜蜜。然而，他却很苦恼，他尽管非常爱她，却不敢挽着那位女士的手臂走进社交场合，而是违心地带着他的老婆，还要在脸上堆着笑，显得恩爱。更叫他疑虑重重的是，不少人尽可以在私下赞同他的恋爱观，可是如果一到公开场合，准会侧目以待，甚至慷慨陈词。所以他只能苦恋着——诸位，我就是那位先生，那位女士就是我的《论‘文学是人学’》！”没过多久，钱谷融受到批判，而批得最凶的是他的学生戴厚英。

李怀宇 1957年之前，你感受到的大学风气是什么样的？

钱谷融 还是比较自由的，就是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我都是自由主义得不能改啦。上课不严谨，总支书记来听我的课，听听也没有察觉出什么问题。我讲课从来不带讲稿，随便讲。

李怀宇 1957年写《论“文学是人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钱谷融 1957年学校号召教师写论文，本来我自己是不会主动写的。那时候是全国批，后来还把批判文章结集成书。那天开会的时候，陈伯海在最后为我辩护了几句，后来把他当成白专道路的学生，分配到农场去。

李怀宇 那时候为什么提出“文学是人学”这一概念？

钱谷融 苏联的文艺理论对人道主义是推崇的，我当时受这个理论影响很大。在这篇文章里，我把高尔基曾经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作为开头。我等到前年才查到这句话最早是泰纳讲的——傅雷把他的名字译为“丹纳”，著有《艺术哲学》——泰纳是法国人，这句话是他在用英文写的《英国文学史》中讲的，这本书我家里有，但我过去没看到。我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上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觉得很对。《文汇报》当时马上就发表消息，说这是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有人替我高兴，有人担心是在钓鱼。

李怀宇 《论“文学是人学”》公开前还有一个关于“情人”的新鲜比喻。

钱谷融 那是我的开场白，“钱谷融的情人”，把这篇文章当做自己的情人。我一直这样认为，我的文学思想一直是这样的思想。所以那天讲时，我晓得人家会反对的。那时报告会的主席是施蛰存，我一讲，施蛰存也觉得很新鲜。

李怀宇 人道主义是把人当作人，极权主义是把人当作数。文学归根到底还是要“以人为本”。

钱谷融 当年一提人就觉得是人性论。当时都讲文学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把文学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我是强烈反对文学作为工具的。

李怀宇 后来有周扬说不要再批判你的文章了这一说。

钱谷融 这是我在大字报里看到的。周扬显然是同意我的观点，他来上海时对我说：听说你正在受批判，不要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李怀宇 周扬这个人太复杂了，胡风也同样复杂。

钱谷融 人都是一样的，得意的时候就霸气。后来周扬真诚悔过，掉眼泪。当年他当然是有恃无恐，他都听毛泽东的话。不过一个棋子。

李怀宇 听说胡风这个人也很霸气。

钱谷融 胡风是比周扬这个人霸气多了，周扬这个人还是可亲近的。胡风的文章我就不喜欢。贾植芳先生对他看得比较透，贾先生是胡风分子里边最通情达理的人。

李怀宇 当时人家批你的文章时，心里怎么想？

钱谷融 当然有点紧张。批我的人他也不得不批。一批完我就一家人坐

着三轮车出去吃饭，一到外面就阳光灿烂。

李怀宇 你的学生戴厚英在那时批判你了。

钱谷融 戴厚英是主攻手，她没有毕业就调到上海作协，当时就是要几个“小钢炮”。她是著名的“小钢炮”，凶得很，人家批判还会客气地说钱先生或钱谷融同志，她就叫“钱谷融”，我当时也一惊，她是我学生噢！

李怀宇 戴厚英后来变化很大，跟时代有很大关系。

钱谷融 那个时代真是……要不然后来戴厚英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她也是一个孝女，家里成分不大好，所以她在里面要表现得特别左。

李怀宇 后来她也到家里来看你？

钱谷融 来过。有一次开会，她也在会上对我表示歉意。她的《人啊，人！》的后记也提到。她的作品有一点真性情，文学作品一定要有真性情。

李怀宇 她是你的学生，听课时给你印象如何？

钱谷融 上课没有什么印象，批判时有印象。

李怀宇 学生批老师在历史上的例子多不多？

钱谷融 有过，章太炎对他的老师俞樾写过《谢本师》。周作人是章太炎的学生，后来也学章太炎，也写《谢本师》。不过他们没有那种批法。

李怀宇 那时候你受批后曾经几次胃出血？

钱谷融 胃出血有好几次，胃跟精神状态有关系，特别是下乡，吃稀饭，又吃不饱。胃要侍候好。那一二十年，要批我，马上就可以批了。我到1979年才改善一点。

李怀宇 你受批之后还能上课吗？

钱谷融 要上课的，上课他们听听也没有什么问题。华东师大中文系很多人都划成“右派”了，本来我也要划成“右派”的，可是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都划成“右派”，我再划成“右派”，就没有什么人上课了，所以没划了。这只是我的猜测。

李怀宇 施蛰存先生当时的处境如何？

钱谷融 他跟我们一起在牛棚。鲁迅骂了他以后他就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李怀宇 你跟施蛰存先生交往多不多？

戴厚英

1938—1996，安徽颍上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等。1996年8月25日在上海寓所不幸遇害。

沪江大学

1906年创办的上海教会学校。1921年开始招收女生，开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1928年，聘用首位华人校长刘湛恩。1951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撤校。

钱谷融 我们的交往有五十多年了，我很欣赏施先生的为人。他比我大十四岁，但跟我像同辈一样，一点没有前辈的架子。施先生一直没有加入国民党，政治上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鲁迅骂过他，他本来跟鲁迅交往也是不错的。他就是因为年少气盛，那时候他才二十八岁，后来我对他说：“你当时跟鲁迅争论也是年纪太轻了。”徐中玉跟施蛰存一起从沪江大学来，一直做副系主任、主任。

我跟他相反，他是能干而又勤奋，我是无能而又懒惰。

李怀宇 徐中玉先生从中文系系主任退下来的时候想让你做系主任？

钱谷融 他来跟我谈过几次，我做不来的。

李怀宇 贾植芳先生的日记里记过一则故事，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白尘讲：系主任不是人当的。

钱谷融 太麻烦了。

1959年，钱谷融响应号召写了《〈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教研组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会议，还请了校外的同行来参加。会上几乎是一致认为钱谷融的文章美化了周朴园和繁漪，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

李怀宇 你在重庆读大学时，曹禺也在重庆？

钱谷融 伍叔傥先生告诉我，他请曹禺来讲课，我就去听，那时候喜欢曹禺。曹禺演戏我也去看，当时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他就演莫扎特，莫扎特的爱人就是张瑞芳演的。

李怀宇 曹禺写《雷雨》时才二十三岁。

钱谷融 曹禺最重要的作品都在1949年以前完成了。

李怀宇 吴祖光晚年跟曹禺讲过一句话，说他后来写不出好作品，是因为——

钱谷融 太听话了！曹禺太软弱了。人是好人。

李怀宇 后来你跟曹禺交往多不多？

钱谷融 我到 he 家里去看过他。那时他讲话常常中断，思维中断了，接不下去。他心理压力太大了，人又软弱，经不起风浪。太可惜了。

李怀宇 你后来写《〈雷雨〉人物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钱谷融 1959年写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吴仞之，是个导演，话剧界的前辈，他导这个戏。我在市里开会回来，听到电视里正在演《雷雨》，演员讲的话，口气、声调都不对，觉得都不是这个味道，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希望有人会来批评这个戏，结果等了很久没有人写，我就自己写。后来看到曹禺时，我就跟他讲起这个事情，说实在看不下去，他说：“你还可以关电视，我是老早就有人打电话来，某月某日演出《雷雨》，卫星转播，一定要我看，我又不好不看。”他又叹着气说：“这些老先生为什么都那么左啊。”这句话不单是讲吴仞之，恐怕也包括他自己。他有反思，那个时代不得不左。解放初，曹禺自己改《雷雨》，改得一塌糊涂。

李怀宇 你觉得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如何？

钱谷融 在曹禺以前，可能就是洪深、田汉了。他们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多幕剧，曹禺是开创了一个时代，戏剧水平大大地提高。可是，他在1949年以后就只写了一个《明朗的天》。

现代文学研究界曾有“北王南钱”一说，“北王”是北大教授王瑶，“南钱”是华东师大教授钱谷融。钱谷融1979年开始招研究生时，还是讲师。1980年，钱谷融直接从讲师升为教授。80年代以来，钱谷融培养了一批知名的学者，王晓明、许子东、殷国明等都出自其门下，吴中杰曾对钱谷融说：“真是名师出高徒啊！”钱谷融却说：“应该倒过来说，是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

李怀宇 你当了三十八年讲师，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钱谷融 （笑）不会有的。我1942年大学毕业，1943年到交通大学，给我教员的名义，不是讲师，有研究费，跟讲师一样。所以从1943年到1980年一直当讲师，没做副教授，一下子就做教授。

李怀宇 从讲师一下子提到正教授是怎么一回事？

钱谷融 我也只是听说，外地有人向我们学校提意见，后来学校就把我从讲师提到正教授。

李怀宇 1979年你到河南讲学时，被误认为是教授，你当面解释：“对不起，我是讲师，不是教授。”

钱谷融 他们介绍时说：“欢迎钱谷融教授讲话。”那么我说：“我不是教授。”

李怀宇 你教了很多名徒。

钱谷融 学生很多都是不错的。我的确是无能而又懒惰，他们都很能干的。王晓明比较扎实；许子东很早就出《郁达夫新论》，他现在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活络”；殷国明现在是最常来的，来下象棋。

李怀宇 现代文学界有“北王南钱”之说，是怎么来的呢？

钱谷融 大概是我们都教现代文学，他的学生跟我的学生都比较有出息吧（笑）。

李怀宇 你怎么看王瑶的现代文学史研究？

钱谷融 王瑶的人蛮好的。他是清华的，后来到北大，原来是搞中古文学的，还写过著作，后来也要他搞现代文学，当时为了提副教授，赶紧写《中国新文学史稿》。

现代文学我是不大看的。原来我说让我教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行，就现代文学我不教，学校却要我教现代文学。我是最不喜欢现代文学的，那时候就偏偏要我教现代文学。我们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差多了，也比外国现代文学差。现代文学就鲁迅、周作人、曹禺算还不错了，现在读来还是周氏兄弟最好。

李怀宇 你曾经调侃说：“带研究生是来料加工，主要是由于来料好，所以才能出成品。”

钱谷融 来料很重要，天赋很重要。所以遗传还是很重要，我们后来老讲不要相信遗传。

李怀宇 听说你对学生的论文是要求非常严的？

钱谷融 我是比较看重论文的。招研究生我要看他们写作文，作文最能

看出一个人的才情、天赋，有没有培养前途，其他知识性的东西我是不重视的，因为知识不晓得，你查一查书就晓得了。

李怀宇 用作文来收研究生的方法现在比较少。

钱谷融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靠的办法。全国很少这样。

李怀宇 你带研究生的方法也很特别，不喜欢正正经经地上课考试。

钱谷融 我也没有正经地读过书，大学就是在茶馆里看看小说。那时候我们还是英美的自由主义的传统，解放以后才有苏联传过来的那些。1957年以后我还是穿西装的，华东师大中文系教师穿西装的恐怕就是我了。

李怀宇 听说你们家客厅的门除了出门和晚上睡觉，从来不锁，学生随时都可以推门而入，上课就是师生在一起聊天？

钱谷融 以前门常开，现在不是了，现在我好久不带学生了。我带学生都是在家里，我们中国古代，孔子也是这样子，英国牛津大学也是这样子，聊天、喝咖啡、抽烟。我总是聊天，从来没有正经讲起什么问题，有时候他们的话可能比我还多，讲话互相启发，原来没想到的，他一讲，就受启发了。当然，教师准备一套去讲，如果真的很精彩，那学生听了也很有味道的。不然的话，就没多大意思了。



徐中玉

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

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市作协主席。

主编《大学语文》教材，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方法》、《美国印象》、《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激流中的探索》等，编有《古代文艺创作论集》。

彭辉 摄



徐中玉

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

施蛰存说青年人的文章词汇太贫乏，可以看看《庄子》和《文选》，这两本书文采不错，看看是有益处的。鲁迅觉得施蛰存鼓励青年去读古书，是要引导青年走到复古的道路上。这一点鲁迅有点过分了，实际上鲁迅也读了很多古书。鲁迅和他有点不同，就斗来斗去，来了几个回合。施先生当时年轻一点，成名也很早，讲话不是很客气。鲁迅就骂他是“洋场恶少”，施先生在解放之后为这四个字吃了很多苦头。

2006年2月14日采访徐中玉先生之后，我才突然想起，第二天便是他九十一岁的生日。回想当日情景，很难将这位学者与九十一岁高龄联系起来。

在四处堆放书刊的徐家聊了半天后，想不出该如何形容这种气息。后来读了徐中玉的研究生南帆的回忆文章，备感亲切：“油漆剥落的地板，几架子书，一张不大的老式书桌，一摞一摞的学术杂志，徐先生的书房一直如此简朴。几个研究生坐在沙发上，每人捧一杯热茶，上课就开始了。徐先生的课多半是引导我们围绕某一部著作进行充分的讨论，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互相争辩。徐先生从来不限制学生的思想。”徐中玉现在不带研究生了，但是欠了很多文债，每天都要读书看报写文章。“忙惯了，现在还是喜欢忙一点。”他笑道，“而且不断地思考问题，可以减缓衰老。”

徐中玉谈起到他们这一代从五四走过来的学人，微笑中不忘提到苦难。他曾自述不幸带来苦恼，苦恼带来思考：“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果然物美、

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确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古人之中，他最推崇苏东坡，历尽苦难而豁达大度，他以为是知识分子的典型，曾著《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徐中玉谈起自己的生活习惯：“我晚上到11点半以后睡觉，中午从来睡不着，早上6点钟就起床。我从50年代就开始吃安眠药，没有什么副作用，每天都吃规定的一粒，现在不吃不行，吃了还是有效。”大概是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他又说：“我是上海健康老人，我的秘诀就是走路，每天要走一个多钟头，连续走了二十多年。我走路走得很快，从家里到长风公园，不停地走，在公园碰到钱谷融先生，就一道走。走路有什么稀奇呢？贵在坚持。”

徐中玉在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当了两年小学教师，1934年凭服务证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七七事变后随校内迁，转入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读完大学，后入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两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读书期间，老师叶石荪启发了徐中玉从古代文论渐及现代的研究计划，他运用卡片搜集资料并不断分类整理。从大学三年级起，徐中玉形成做卡片的习惯，受难中也不间断：“二十年间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一千万字。”历次抄家中，这些珍贵的材料有意识地散放在家中，得以幸存。

李怀宇 你在山东大学读了三年，那时学校里很多名师对你影响很深？

徐中玉 我在无锡省立中学读的是师范科，我们师范科的学生家庭比较困难，不用学费，吃饭不用钱。普通科是家庭比较阔裕的学生，荣毅仁就在我们学校读普通科，跟我同一年级。大学时我先到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原来是青岛大学，我是闻名而去读的。当时校长杨振声是京派作家的领袖，中文系系主任闻一多、外语系系主任梁实秋、教员沈从文等刚离去。“九一八”事变以后，山东大学学生愤起强行南下，要求国民党抗击日本侵略，事后教育部严令山东大学开除为首的进步学生。学校不得不开除几个，那时候大学还

是比较自由的，学生群起罢课反对，杨、闻、梁、沈等名师就走了。我去读书的时候，老舍、洪深、台静农、游国恩、叶石荪、罗玉君等在那里教书，师资阵容仍很突出。

李怀宇 老舍先生给你们上课的风度如何？

徐中玉 老舍先生上课很随便。我听过老舍两门课：欧洲通史、小说作法。老舍到英国是教中文，他在英国住久了，有实际体会，教欧洲历史给指定必要的教材后，就多讲他自己的所见和感受。讲小说，更具体生动，讲他的好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如早期小说中太多无甚意义的笑料。后来我到重庆，他也到重庆。我发表过一些文章，老舍先生介绍我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先生的家属在北京，他孤身一个人，在抗战时兢兢业业做了很多工作，他比较中间，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关系，跟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他忠心耿耿写了许多歌颂作品。“反右”后，我唯恐连累他，未再写信。“文革”初，他备遭残酷批斗，自尽，太冤了，是文学界一大损失。

在“反右”与“文革”中，我的相熟师友中遭劫的不少。黄药眠、钟敬文夫妇、陶大镛、李长之、姚雪垠、叶石荪、颜实甫、程千帆、詹安泰，难以尽举。老舍先生特惨！事实证明没有哪一位真有罪。

李怀宇 你在山东大学时就有做卡片的习惯了，是受叶石荪先生的影响？

徐中玉 我做卡片是受叶石荪先生的影响，他的英文、古典文学非常好。叶石荪是从清华大学来的，他到法国读心理学，到美国读文学。他在清华教了五年之后，休假一年，就到山东大学来了，后来七七事变，他回到四川大学去当教育系系主任。“反右”时打成右派，“文革”当中被打得半死。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做卡片，近年就不大做了。这些卡片现在还保存得很好。在“反右”后二十年困苦间，我一直制作卡片，新读数百种书，选抄卡片数万张，逾百万字，使我平衡了心态，增加了自信。

李怀宇 后来几次抄家的时候，你这些资料卡片都保存得很好？

徐中玉 他们不要这东西，觉得一堆纸片有什么好的，反而保存下来了。现在看起来，当时养成这种习惯非常好，因为一些东西看了以后，自己记一记，给它一个标题，分类放好。当时看的书有可能很深刻，你一时体会不到，把资料整理出来，经过手、思考过的记得住。现在看起来遗漏很多，但是当

时来讲，记住了，比较熟悉。做学问，要掌握原始原著的东西，抄下之后比较严谨。有些书只有图书馆里有，就是自己有的，临时再翻也难。平时做的时候，上面加一个标题，各个专题集中起来，用的时候时间就省了许多。同一个专题某个问题，假如你对这个问题有一两百张卡片了，写起文章来就很容易了。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人家很难超过你，因为人家没有做这个积累，不知道这东西在哪里，有时候一本书在哪里你怎么记得住啊？一些小问题做过卡片了，自己写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找出来。苏东坡当年就抄写过多种书，是古贤认真学习的一种好办法，对研究学问、写作，有莫大帮助。现在有电脑储存、寻找，虽方便多了，但动脑筋，具体分辨，有所创新，还得靠自己。照搬罗列资料，也没有大用。

李怀宇 当时你的老师中还有《楚辞》专家游国恩、《诗经》专家台静农、留法女博士罗玉君这些人，他们上课是什么样的？

徐中玉 游国恩教过我《楚辞》研究与名著选读两门课。他讲课很清楚，有条理。解放后他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山大当时不设“副教授”，他是最高级的讲师。

台静农教《诗经》，比传统的老先生讲的有新的意思。他字伯简，和鲁迅友谊甚深，早期所写的安徽乡土小说得鲁迅器重。鲁迅逝世后，我们请他在山东大学举办的追悼会上沉痛发言。抗战胜利，他以后到台湾大学当中文系系主任，台湾不少学者、作家都是他的学生。因为同鲁迅关系密切，他后来在台湾只被称为大书法家。我两次托人带去问候信，未得回复。后见台湾学者编他的年谱，在山大任教时几句话中，提到我是他的学生。

罗玉君是巴黎大学的博士，我听过她讲外国文学的课。她在“文革”前已退休，“文革”中仍批她贩进许多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生活方式，在里弄中批斗、抄家。她的爱人是国内有名的天文学家李珣，因倾向国民党的青年党首领李璜是他哥哥，听说全家都受株连。那是十足的乱世，普通人连起码的安全都没有。

李怀宇 抗战爆发后，你辗转到了不少地方，在中央大学和中山大学都当过学生组织的主席，还请过许多文化名人到学校演讲？

徐中玉 我在青岛读了三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不停地搬，学生越

来越少，最后到了重庆。抗日战争时，重庆的文化人最多。在重庆时我们先后请了老舍、胡风、陈纪滢、郭沫若来演讲。老舍是我的老师，胡风主编《七月》，我认为他是鲁迅的继承者之一，讲题都是鼓励、重视文学工作为抗战服务。陈纪滢是《大公报》文艺版的主编，他去过新疆，对那里复杂的情况知道不少，是请他来作介绍的。陈纪滢后来到台湾。这些事多少年后都成了批判我的材料（笑）。最后请了郭沫若，他来时很轰动，附近重庆大学的同学都来，最大的饭厅里外全挤满了人。郭沫若介绍抗战形势，坚持要抗战到底。后来大家对他印象不大好，说他是“风派”，毛泽东怎么说，他马上就可以放弃掉原来的观点。当时校长是罗家伦，没有干涉过我们的邀请。罗家伦是五四时的学生领袖，原任清华大学校长，后来中央大学当校长，对两校都有不小贡献，这已是近来比较客观持平的看法。

李怀宇 抗战时你们在大学里面的读书风气怎么样？

徐中玉 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应届毕业男同学两百多人，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密集的双层木板床挤排在一起，走路都困难，重庆天气又极热，蚊子很多，臭虫也不少，睡不好。图书馆很小，只好到竹席砌成的矮平房里去看书，稍走一段路也可到邻居重庆大学原建的大图书馆去夜读，重庆大学的同学很谅解。那时，中央大学教授名家多数单身西来，每位也只住一小间简陋的矮平房，比学生好不了多少。师生生活条件虽差，学习还是很紧张认真的。

李怀宇 抗战胜利后，你回到母校山东大学教书，后来因为参加“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解聘了？

徐中玉 1946年，我接受母校的聘请到山东大学教书。当时革命同学在全国范围掀起“反内战、反饥饿”高潮，我只是出于义愤，在所编的《每周文学》与《文学周刊》上发表王统照、骆宾基、钟敬文等师友的文章，以及在一些讲话中支持这个运动。青岛警备司令一个密报到了教育部，说我有“奸匪嫌疑”（笑）。那么，教育部就密令解聘我。

1947年，徐中玉到上海一所中学任代课老师，第二年受聘到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徐中玉和施蛰存一起调入华东师

范大学中文系。1957年，徐中玉应领导和报刊“热情”邀请，公开发表了几篇文章，很快被划为“右派”，主要罪状为主张“教授治校”、“学术至上”。定案后赶出中文系，降到图书馆库房整理卡片。1961年回系继续任教，1966年，与许杰、施蛰存一起被投入“监改”。从“右派”到“摘帽右派”而“老右派”，整整二十年。

李怀宇 在那个年代，你为什么在文章中提出“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观点？

徐中玉 我们以前的学校都是这样的。以前清华大学“教授会”的制度很好，西南联大也有。我写文章的时候，首先肯定当时的大势是好的，但是感觉到有一些问题，一个大学里经常开会，以前大学里没什么会的，也没什么政治学习。我们以前在大学里上午上课，下午就上图书馆，不像后来有那么多政治学习，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心里面多少有一点反感。当时对那些批判的东西心里有一点怀疑，但是说反对共产党，绝对没有！

李怀宇 后来你当了“右派”是怎么回事？

徐中玉 我是1950年参加民盟，介绍我入民盟的是章伯钧。后来批判我的时候对我说：“你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写文章，你参加民盟是章伯钧介绍的。”我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时候，蒋经国在赣南，他要拉拢中山大学的教授，最重要的教授是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法学院院长、经济系系主任，王亚南和郭大力合译出版了《资本论》。国民党政府几次要王亚南出任要职，他坚决推辞，决不做官。他的寓所一直自称“野马轩”。我们都是王亚南周围的人，陆侃如、钟敬文、洪深当时也在中山大学，当时我还在当讲师，也认识蒋经国，他请我们吃饭。蒋经国礼拜天来看看老百姓，到每一个县，盖一个很好的学校，办了一个儿童新村。他自己办中华正气出版社、《正气日报》等。当时中山大学是南方最重要的学校，他就找一些人来支持他的工作。后来批判我的时候说这是大问题，好在这些问题我在参加民盟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了。

王亚南

1901—1969，经济学家，湖北黄冈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先后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起与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1938年出版。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厦门大学校长。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我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时候，蒋经国在赣南，他要拉拢中山大学的教授，最重要的教授是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法学院院长、经济系系主任，王亚南和郭大力合译出版了《资本论》。国民党政府几次要王亚南出任要职，他坚决推辞，决不做官。他的寓所一直自称“野马轩”。我们都是王亚南周围的人，陆侃如、钟敬文、洪深当时也在中山大学，当时我还在当讲师，也认识蒋经国，他请我们吃饭。蒋经国礼拜天来看看老百姓，到每一个县，盖一个很好的学校，办了一个儿童新村。他自己办中华正气出版社、《正气日报》等。当时中山大学是南方最重要的学校，他就找一些人来支持他的工作。后来批判我的时候说这是大问题，好在这些问题我在参加民盟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了。

李怀宇 蒋经国当时在江西的名声好不好？

徐中玉 名声很好的。他在马路上走，是不带人的。他在江西管十几个县，行政上都是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学校培养的人当县长，文化事业交给同他一块从苏联回来的几个同学。王亚南的人品很好，但是因为他认识蒋经国，在“文革”期间吃了很多苦。

李怀宇 你们跟蒋经国见面是什么样的情形？

徐中玉 他到我们学校来，请我们吃饭，谈谈。他办的报纸、杂志、出版社，需要我们写东西。后来支持过那里的报刊，因感觉他毕竟有多种复杂关系，保持距离，只是写点学术研究论文去。当时是抗战后期，蒋经国把苏联那一套弄过来，说是新赣南出现了新气象。后来蒋经国在台湾也搞得好，开放言论自由、讲民主，一直到现在台湾还是讲他好。

李怀宇 施蛰存先生和你同事数十年，你们相知是从何时开始的？

徐中玉 我在中学时读过他的小说《上元灯》，我经过云南时，去看中山大学的老师胡小石，施先生在云南大学当教授，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回到上海以后，重新跟他见面，后来我们都到沪江大学教书，中文系六个老师，朱东润、施蛰存、余上沅、朱维之、靳以。系主任是朱维之，靳以代表政府接收沪江大学，他是巴金的好朋友。现在他们五个人都去世了。

李怀宇 施蛰存先生后来吃了很多苦头，不少人以为他和鲁迅当年的论战是源头，那是怎么回事？

徐中玉 施蛰存说青年人的文章词汇太贫乏，可以看看《庄子》和《文选》，这两本书文采不错，看看是有益处的。鲁迅觉得施蛰存鼓励青年去读古书，是要引导青年走到复古的道路上。这一点鲁迅有点过分了，实际上鲁迅也读了很多古书。鲁迅和他有点不同，就斗来斗去，来了几个回合。施先生当时年轻一点，成名也很早，讲话不是很客气。鲁迅就骂他是“洋场恶少”，施先生在解放之后为这四个字吃了很多苦头。鲁迅骂过许多人，像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今天看来也骂错了。鲁迅后来有几篇文章受了瞿秋白这些人的影响，也有很多很左的东西，比如他说，人中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瘦子，一种是胖子，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当时觉得不是共产党就是国民党，施蛰存自己很超脱，人家说他是第三种人，第三种人既不是共产党也

不是国民党。胡适后来也说：我曾经讲过“全盘西化”，因为要强调反封建，那么就把封建的东西一切都反掉，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在一段时期里面需要彻底地反封建。现在看法又不一样了，现在“以人为本”实际上跟资产阶级进步的想法是差不多的，不要去纠缠这些东西。

李怀宇 你自己受批那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徐中玉 先是不能教书，后来摘帽子的时候，有人说我一点问题也没有，怎么成了“右派”？后来我才知道，《文艺报》来上海向我组稿的人也被打成“右派”了。我的一些老朋友都成了“右派”，黄药眠、陶大镛、南京大学的程千帆都当了“右派”。我被撤销了教授职务，工资降了几级，到图书馆整理卡片。我是民盟市委委员，几个民主党派的头头都到下面去劳动了。后来上面要组织编《辞海》，没有人，就说可以让当了“右派”的人去编嘛，我就借调去编《辞海》，去了两年，后来学校要我回来恢复教书。当时我爱人也在此地教书，影响到每个小孩子读书，后来幸亏都读了大学，但是考上的大学都不是他们想去的大学。在当时，我们家还算幸运的呢，但愿再也不要再有这种千古所无的悲剧浩劫了。

李怀宇 那时候心理压力大吗？

徐中玉 他们想孤立我，我根本就瞧不起他们。我的性格是不大在乎的。

1978年至1984年，徐中玉担任了两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系里出现了富有活力的新气象。徐中玉做出一项规定，凡是在创作上已经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鉴于中国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大一国文”整整中断三十年，徐中玉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联合发起倡议，1980年在上海召开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组成由徐中玉任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徐中玉主编的五类《大学语文》教材至今发行量累计超过三千万册。

李怀宇 你在任华东师大中文系系主任时，出现了一个华东师大作家群。

徐中玉 现在上海的孙颔、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那批出了很多人才。系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研究、创作，主要是靠他们自己认真学习。文

化环境宽松些了，得以独立、自由发展，分配时充分考虑到了他们各自的发展前途。这批人并不是到了学校我们给他们多大的帮助，而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写，这些人本来有点根底，上山下乡没有读到大学，后来有机会到这里读大学，就把那种经历写出来。又如现在清华大学的格非，本科是在这里读的，他教书教得蛮好，写小说也写得蛮好，他到清华大学去，需要我证明，我就说他教书教得好。

李怀宇 你主编《大学语文》是怎么回事？

徐中玉 原来我们《大学语文》是有的，但是苏联是取消《大学语文》的，苏联的办法分科分得很细，综合大学都拆散了。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语文》都取消掉了。“四人帮”倒台以后，南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和我商量，我们两个学校恢复《大学语文》。当时教材也没有，教师也没有，那么我们成立《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编教材。有一段时间，有五种《大学语文》教材要求我来编，后来很多学校也盗印这些教材，盗印的不算，到现在起码印了三千万册吧。

李怀宇 匡亚明先生的风度如何？

徐中玉 匡亚明在“文革”期间吃尽苦头，在监督劳动中推过大车。老党员的国学如此深厚，十分难得。我的老朋友程千帆“反右”的时候也打成“右派”，他因为学问很好，性格倔强，一直没有摘帽子，多年被迫放牛。匡亚明赏识他，特地请他到南京大学任教，果然培养出许多英才。

李怀宇 你和程千帆教授之间的交往是怎么样的？

徐中玉 我们很熟。他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他的夫人沈祖棻是著名的女词人，有些人对她的词评价很高，她自己不但能写词，而且写鉴赏词的文章也好。他们原来在武汉大学工作，1977年，他们夫妇来上海，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我在南京路的一家饭店请他们吃饭，第二天他们搭了船回武汉去。他们坐了武汉大学的车子回学校，在离寓所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大树，车子撞到树上，沈祖棻当场被撞成重伤逝世，程千帆轻伤幸无大恙。实在太意外了。



何满子

1919年生，浙江富阳人。

曾作记者、编辑、书店总编辑、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

早年从事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音乐、戏剧研究，后致力于古代小说、文化思想史研究，也从事杂文写作，曾获首届鲁迅杂文奖。

著有《论〈儒林外史〉》、《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古代小说艺术漫话》、《中国酒文化》、《画虎十年》、《如果我是我》等。



何满子

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

胡风的文章我老早就看，他的文章当然写得好，他的一些意见我也很同意的，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在桂林的时候我是见过胡风的，但是没有来往，通过一两次信。当时他是“诗坛领袖”，他说我的新诗不是诗，是分行的散文，我就从此不写诗了。后来他写信邀请我去谈谈，我心想我又不写诗了，就不去了。

何满子先生的书房名为“一统楼”，取意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安静的“一统楼”临近繁华的上海徐家汇，这里不仅是读书写作的地方，还是客厅、饭厅、课室。房中挂着聂绀弩、赵朴初的字，陈从周的画，一件件说起来有亲朋同乡之缘。

由聂绀弩的字说到他的旧体诗，不免感慨。何满子曾写诗赠聂绀弩：“先生越老越风流，千首诗轻万户侯。不独文章惊海内，更奇修炼出人头。”回忆起来，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就认识了。“‘文革’结束后我们才重新见面。他吃的苦比我们多。他后来不写杂文，写旧体诗，其实诗也是杂文。”何满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号“江湖散人”，笑道：“聂绀弩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

这位“江湖散人”，曾经阐明处世的信条：“要我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这

是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从我进入人生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三条，也可说是‘三不主义’吧，我始终遵行着：一是不做官，神气一点叫做不羨权势；二是不随人俯仰，高攀一点叫做坚持独立思考；三是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这条大概没有什么好名目可攀附，只是图个尽量少受约束。”

拥有安定的晚年，在“一统楼”中教书和写作是何满子的乐事。早些年给研究生上课就在这个书房里，一直到七十多岁时才不带研究生。何满子感慨多年的运动把文化切断了：“我们这一代后来没有机会念什么书。文化一代一代传下来，名师才能传高徒，不然越教越坏。”曾经，他每天要写一篇文章，近年慢慢减少写作。

何满子晚年写得最多的是杂文，文风犀利，自称“常青筋暴露，偏激浮躁，极欠蕴藉”。然而，跟他漫谈了半天，却感觉“人如其文”，这是一位忠厚可爱的老头儿。谈话中，他烟不离手，笑道：“医生叫我不抽烟，我还是抽。我原来喝酒很厉害，现在戒酒了。住了一个月医院，医生说，你再喝酒的话，就不要来了。”我笑着提起：“吴中杰的文章中说，你跟章培恒喝过三次酒，都被打败了。”他忙道：“不是被打败了。我不能喝黄酒，我喝白酒，他是喝黄酒的，黄酒没有味道……”

何满子原名孙承勋，祖父孙蓉第当过南昌直隶州州判，大外祖父是前清道员，为杭州巨富，人称“陆半城”，是两浙师范学堂创办人之一。何满子童年多在外祖父家居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何满子随胞姐孙晓梅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何满子到达延安，几个月后离开，辗转各地从事文化工作。

李怀宇 你小时候家学深厚，一直有很好的读书环境。

何满子 我小时候多数住在大外祖父家里，在杭州长大，一直到抗战，正好十八岁。我只念了一年初中、一年高中，其余都是在家里读书。我从小喜欢读书，七八岁开始读小说，我妈妈念《西游记》给我听。那时候家里有钱，教我外文的老师，一个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一个教数理化，一个教外国地理、历史、文学。我的老师因为火灾摔断了腿，

生活已经无趣，能教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教中国传统四书五经的是一个举人，我通读过二十四史，十五岁之前，“前四史”已读完了。

李怀宇 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何满子 我外祖父去世，我就有几年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每天都去。历史、外国文学读得多。我外祖父家在抗战中败掉了，房子全部让日本人炸光了。

李怀宇 你姐姐孙晓梅是烈士，她是如何参加抗战的？

何满子 我姐姐跟洗星海的老婆钱韵玲是同事，钱韵玲是钱亦石的女儿，两人同在一个杭州的小学教书。抗战时我姐姐到新四军去，二十九岁牺牲了。

李怀宇 1938年你到了延安，怎么去的？

何满子 抗战一爆发我就到上海浦东参加钱亦石领导的战地服务团，日本人打到上海，我就跟着逃到

钱亦石

1889—1938，湖北咸宁人。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1924年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苏联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1938年在上海病逝。

武汉，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里，后来到《大汉晚报》工作，武汉危急，我在沙千里介绍下，到延安去了。到延安要一个有资格人士介绍，我认识沙千里，沙千里介绍我去了延安。我十五六岁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向往，1938年9月到延安。

李怀宇 那时候看到的延安是什么样的景象？

何满子 觉得很新鲜，满街都是歌声，唱着抗战歌曲。我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讲课的主要是何干之、李凡夫等人。张闻天经常来讲课，他讲哲学，讲得好。毛泽东也来作报告。他们来讲课都是露天的。陕北公学原来是基督教教堂，有大会堂，不大用，中共中央开会都在那里。年底时，总校搬到分校里去了，成仿吾是校长。

李怀宇 后来为什么会离开延安了？

何满子 我不能适应，书太少了，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翻译的版本。有莫斯科出的几本中文的列宁著作，还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年5月，我就离开了。

李怀宇 离开之后曾被国民党抓起来？

何满子 到西安时，反共已经开始了。我被抓起来，送到青年招待所，

那不是一般招待所，后来改成了青年劳改营。幸亏我碰到一个老师，他是洛阳《阵中日报》的主编，我是作者，他认识我，帮我出来了。后来我到了成都《黄埔日报》，当副刊编辑。

李怀宇 在那时候认识你太太吴仲华？

何满子 她当时还在念书。

李怀宇 听说当时很多人追她。

何满子 给我骗了（大笑）。

李怀宇 她家里也是书香世家？

何满子 她的祖父很有名的，叫吴光耀，搞金石文字，国家图书馆有一个他的专柜，他写过一本《慈禧三大功德记》，歌颂慈禧的。

李怀宇 怎么认识你太太的？

何满子 当时我在当编辑，通过作者的关系认识她。后来我出了事情，国民党要抓我。

李怀宇 出了什么事情？

何满子 我的作者都是左倾人士。正好那时皖南事变，听说黄源死了，我就写了一篇《悼黄源》，因为我认识他。国民党就觉得：怎么国民党的报纸悼念共产党？要逮捕我，有人通知我，当时好在换一个地方就完事了，我赶快走了。我姐姐孙晓梅在新四军，我准备到那里去，经过衡阳，打仗，过不去，我就在衡阳定下来了，在《通俗日报》当编辑部主任。这些事情都巧得不得了！我一到衡阳马上丢了钱，五百块钱丢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简直要上吊了似的，一出来碰到陕北公学的同学程嘉哲，他是衡阳人，把我接到家里去，由他的哥哥介绍到《通俗日报》。在衡阳时我常常到图书馆，当时长沙大火以后，所有的图书都搬到衡阳的一个中学，正好我碰到一个熟人，几乎天天去。抗战时很多经历是很奇怪的。在衡阳、桂林这两三年里，我专门搞音乐，读书记笔记。在衡阳、桂林、长沙这一带来来往往，混到1944年，我回到成都，我们结婚了。

李怀宇 先是住她家里去了？

何满子 住在她家里，后来才结婚。结婚之后找不到事情，我就到空军通讯学校的印刷科工作，混饭吃。又出了事情（笑）。毛泽东到四川跟蒋介石

谈判，《新民报》发表了她的《沁园春·雪》，好多人和他的词，我给这首词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唱就完了，没想到印刷厂印了几百张，拿到书店去卖，有些人传，一下子卖光了。这就引起人家注意，当时虽然说是国共合作，上面哪里是这么想的？我赶紧想办法调走，避了一下。曾敏之当时在重庆办过一个《小报》，他曾经写过一条消息。我老是闯祸。

李怀宇 你一直对音乐很感兴趣？

何满子 钱韵玲的缘故。她是冼星海的老婆，我跟冼星海接触之后经常谈音乐，我到延安，他们夫妻也到延安去了。有一两个月在一起，冼星海去世的时候，我写过悼歌，我写的词，谱的曲。以后还写了一个冼星海的电影剧本，1955年胡风事件时被没收了。

李怀宇 你跟马思聪也熟，跟广东人很有缘？

何满子 马思聪家里很有钱，抗战快胜利时他到贵阳去当艺术馆馆长。马思聪在广东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好朋友叶帆带我去看他，他说我很懂音乐。其实我哪里懂？马思聪是拉小提琴的，我写了提琴曲小品，请他看看。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跟马思聪通信，我写了冼星海的剧本请他看，因为他们在巴黎时认识，马思聪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指出我的剧本里巴黎哪些街道写错了。

马思聪

1912—1987，小提琴家、作曲家，广东海丰人。曾两度赴法学习。抗战爆发后，多年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演出。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966年赴美，后长期旅居美国。主要作品有《第一回旋曲》、《第一交响曲》、《内蒙组曲》、《祖国大合唱》等。

李怀宇 抗战胜利之后，你在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闯了一次祸？

何满子 （笑）天津《益世报》的采访主任孟秋江是有名的记者，想请我去天津《益世报》，我说天津我不去，他就让我在南京当特派员。后来天津《益世报》并入南京《益世晚报》，我当采访部主任。我在晚报上面写了一部小说《西国水神梦》：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混在一起，一天一段，写了一个月。这是游戏文章：有一个老先生，抗战时跑到山里面去，一下雨，这五本书混在一起了，其中的人物就互相来往，里面写到唐僧追王熙凤，讽刺当时天主教南京区的大主教于斌，他是“政治和尚”，正是《益世报》的老板，就把我开除了。我第一天离开，第二天就去了《大刚报》（笑）。《大刚报》原来是在衡阳办的，后来去了南京，这是陈

立夫的报纸，我管你什么报纸，有饭吃就行了。后来《大刚报》停办了，我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就到了上海，后来就一直一直在上海了。

在上海安定下来后，何满子夫妇有了颇为理想的工作，妻子吴仲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何满子则在朋友贾植芳的力荐下，到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贾植芳多次请何满子去见见胡风，何是“江湖散人”，没有去。1955年，胡风事件爆发，自以为和胡风没有一点关系的何满子却被捕了。

李怀宇 什么时候跟贾植芳认识的？

何满子 解放的前一年，我们认识是梅林介绍的，梅林曾是抗战文协的秘书，老舍是文协总务处主任，梅林是老舍的大管家。贾植芳在苏州，我在上海一个书店当总编，他翻译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我出版了这本书。我们俩喜欢喝酒，常在一起。到了1951年贾植芳在震旦大学当中文系系主任，我也到震旦大学教书。我不同意院系调整，当时思想改造，我是反对的。大学是通才教育，清华大学原来是很好的大学，变成工科大学。院系调整时把我派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我不去。

李怀宇 贾植芳让你去看胡风，那时候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他呢？

何满子 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胡风的文章我老早就看，他的文章当然写得好，他的一些意见我也很同意的，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在桂林的时候我是见过胡风的，但是没有来往，通过一两次信。当时他是“诗坛领袖”，他说我的新诗不是诗，是分行的散文，我就从此不写诗了。后来他写信邀请我去谈谈，我心想我又不写诗了，就不去了。

李怀宇 当时你有一个外号叫“江湖散人”。

何满子 这个外号是梅林取的（大笑）。他要我参加文协我不参加，任何协会我都不参加，我连工会都不参加。除了机关单位里面要吃饭，要拿工资，其他的我都不参加。到现在我也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也不是任何协会的会员。

李怀宇 1955年5月，胡风事件发生了。

何满子 1955年5月13日是星期五，很不吉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我5月17日就被关起来了。我以前觉得我跟胡风没有一点关系，《七月》和《希望》上面我没有写过一个字。上海的贾植芳、耿庸、张中晓，我都是认识的，往来也不是很多，老贾是我的同事，其他人不大联系。所以我大吃一惊：舒芜怎么这样干？！星期五《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东西，星期天，王戎通知我：你要写个检查。我说：我凭什么写个检查？他说：不是我要你写的，是吴强让你写的。吴强就是写《红日》的那个人，他是市委文艺处处长。

我回来以后，那时候我们几家人才有一个电话，16日下午，人家告诉我一个姓吴的打电话找我，我就知道是吴强。我打回电话过去，吴强不在，我说他要向我讨教什么事情，他自己骑车方便，让他来找我。

第二天，5月17日早晨，一家人刚刚起床，我那天没有课，有人敲门进来，我说：“你找谁啊？”“你是何满子吗？”我说：“是啊。”“你被逮捕了。”我说：“凭什么？”他就拿出逮捕证来，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签署的。带我上了车子，兜来兜去到了一个地方，我一进去，听到耿庸的声音，他要抽烟。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李怀宇 在里面关了多长时间？

何满子 从5月17日到第二年9月28日，我说，你们给我结论。没有，说是给我宽大。走遍了全国去查，对我一点毛病也找不出来，他们说：为了你花掉几万块钱，也好。

李怀宇 “二流堂”专案组在查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何满子 （大笑）他们对我说：“花了那么多钱，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你是好的。”

1956年，何满子获得自由，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在社长李俊民的领导下，出版社汇聚了金性尧、鯤西等一批文化人。何满子后来在《李俊民的人品》一文中回忆：“俊老是经学和小学宿耆黄侃的弟

子，又编过报刊和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新旧文化都懂行，在他领导下做事，人人都顺遂愉快。俊老要求把出版社办成大学和研究单位的规模，常常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应该是可以胜任的。”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同仁的得意之作是出版了陈寅恪的著作。

李怀宇 得到自由以后还能教书吗？

何满子 不让我教书了，第一线不行了，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是1956年冬天成立的，社长李俊民是个好人。

李怀宇 那时候很多同事都是有学问的读书人，鯤西说很怀念那段日子。

何满子 金性尧、鯤西，好多读书人。

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是那时候出的吗？

何满子 李俊民原来是写小说的，鲁迅都肯定他。他很不满意郭沫若。

李怀宇 郭沫若曾说：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何满子 他的意思是新的一批学者瞧不起老的一批学者。李俊民就想办法把陈寅恪的书拿到我们这里来出，通过蒋天枢。

李怀宇 陈寅恪晚年最信任的弟子。

何满子 蒋天枢对陈寅恪讲，这个出版社是可信的。陈寅恪那时候眼睛已经瞎了。

李怀宇 陈先生说过：“盖棺有日，出版无期。”那时候国内没有其他出版社出陈寅恪的书。

何满子 就只有这个出版社敢出了。

李怀宇 那时候你们理解陈寅恪的价值何在吗？

何满子 陈寅恪本来就很有名，清华四导师之一嘛。那时候全国只有三个出版社出古典的书，另外两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

李怀宇 这套书都有哪些同事编辑？

何满子 鯤西、我，还有另外几个同事合编的。

李怀宇 那时候觉得陈寅恪的东西怎么样？

何满子 当然好了，大师！

李怀宇 那时候印了多少？在学术界有什么反响？

何满子 印了上万册。实在说，在以前当然有影响的，但是没有这样广泛，后来才有“陈寅恪热”。

好景不长，何满子在1957年当上“右派”，一家人发配到宁夏。1964年调回上海，“文革”爆发后，何满子被遣送回乡，一待十二年。1978年年底，何满子回到上海，已近花甲之年。有一次经过淮海路四明里时，何满子突然想起去看一看赵景深教授，赵景深在楼梯口端详他一下，脱口而出道：“何满子，你还活着！”从这时起，何满子写下大量文章，著作等身。

李怀宇 “反右”的时候你又出事了？

何满子 1957年我又被定为“右派”，罪名是：给胡风集团翻案。

李怀宇 那时候有没有写文章？

何满子 没有写文章，也没有发表意见，任何意见都不讲。搞知识分子总是要搞的。

李怀宇 1958年离开上海发配到宁夏了，你和太太、两个女儿都去了。

何满子 我在拉车，我爱人原来是上海广播电台的编辑，到离城十几里的小学去教书，两个孩子还在读书，都一起去宁夏。我待到1961年回上海来医病了，我关在劳改场里休克过去了，医好了又不得不回去，一直到1964年才调回上海。上海文教书记石西民亲自督办的，他人很好，他在《新华日报》当编辑部主任的时候，我写稿子，是他的作者。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编《群众》，我又是《群众》的作者。我在宁夏后来没有办法了，这边不要我了，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我就写信给石西民，我说：中国不要我，我就要跑了，我带地图一张，准备从蒙古出境，假设给哨兵打死了，你有责任（笑）。石西民写信来，叫我赶快回来。本来李俊民让我回古典文学出版社，上面不让，让我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那里面都是“牛鬼蛇神”，“右派分子”

徐铸成他们都在那里。

李怀宇 1966年你又出事了。

何满子 这个事情很滑稽。当时发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要大家读的。我的书红卫兵一抄家全抄走了，包括马恩全集都抄走，我说：“马恩全集怎么可以抄走呢？”他们说：“这上面有你的笔记，有很多反动言论。”我就发牢骚了：“马恩全集都不许看，只能看看ABC吗？”有人马上就报告了，说我讲“毛泽东的书是ABC”。当时我们集体宿舍有三个人，那个报告的人指出了，红卫兵就说：“谁讲的？”这个事情不得了，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我说：“他胡扯，他要我介绍女朋友我没有介绍，他生气，他报复。”（大笑）另外一个人说：“他讲不讲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见。”这样就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遣送回原籍，一回就是十二年。

李怀宇 在家乡主要做什么？

何满子 我也不会务农，还不是灌灌水、管管山林，轻微劳动。

李怀宇 家人能在一起吗？

何满子 他们比我早一年被精简，只好回去了。

李怀宇 还好一家人在一起，而且避开了上海这十二年的风云。

何满子 不幸中之大幸。乡下人老实，他也不管你什么皇亲国戚，中国老百姓还是好的。

李怀宇 在乡下没什么书读，你的大女婿王土然给你找到了《资治通鉴》和《苏轼全集》。

何满子 这两套书消磨了一年多，翻来覆去地看。在这之前什么书都没得看，可以看的书，什么《金光大道》，我不看的。王土然那时候还没跟我女儿结婚。

李怀宇 王土然知道你喜欢书，投未来丈人所好，高！（何满子大笑）

何满子 我这十二年只到上海来两三次。一次是机器坏了，来上海修机器，农民很相信你的，知道你是知识分子。一次是我有病到上海来开刀。最后一次是1978年年底，毛泽东死了，来上海看看情况，讲好了，马上让我回来，是李俊民让我回来的。

李怀宇 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满子 这几年也在上海上上课，在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挂一个兼职教授的名字，带带研究生。

李怀宇 主要教什么课？

何满子 古代小说。我教古代小说是很奇怪的事情，在院系调整的时候，知识分子改造，有两个老先生，一个是周而复的老丈人，他不干了，就没有人教古典文学了。文学院院长过来跟我商量：课不能不教啊，明清小说戏曲离不开的。我就搞明清小说戏曲，写了几本关于古典文学的书。李俊民知道我，这样就到古典文学出版社了。

李怀宇 写得最多的时期还是1978年年底回到上海以后。

何满子 是啊，我的生命从六十岁开始（大笑）。我是1919年生的，到1979年正好六十岁，之后才写很多书（起身到书架前介绍自己的著作）。我们这辈人的经历，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写一百万字的小说。你们幸福啊！你看，我十八岁就抗战，到处跑。解放以后以为好了，从1955年起一直到1978年，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方平

1921年生，江苏苏州人。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国际莎协执行理事，2001年被香港翻译学会授予荣誉会士。

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二十余种，主编《新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十日谈》、《抒情十四行诗集》、《呼啸山庄》等，著有《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三个从家庭出走的妇女》、《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等。



方平

搞翻译要像裁人一样一心一意

第一个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是梁实秋，他译了三十多年。当时有一笔基金，由胡适来主持，胡适请两个人翻译，梁实秋和闻一多。闻一多翻译诗体的，因为闻一多是诗人，后来闻一多没有翻译。梁实秋在大陆译了一些，最后在台湾译完。翻译莎士比亚的人一定要长命！

采访方平先生后，我特地到上海戏剧学院校园看那座莎士比亚雕像，雕像是方平用稿酬捐赠的。和我畅谈过的这个老头平易得像家里的祖父，他写的莎士比亚论文，浅浅的语言，深深的道理，让我感觉莎士比亚也是一个平常人，一个值得交的朋友。

采访方平之前，我为《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所迷，在邵洵美女儿邵绡红（小红）的笔下，邵洵美的一生有许多可叹之处。而更惊讶的是，方平与邵家有解不开的缘，先和姐姐小玉相爱，小玉病故后，再和妹妹小珠结婚。为什么方平每一次出现在别人写的文章里总让人震撼呢？记得第一次留意方平的名字，并不是因为他的翻译，也不是因为他的评论，而是因为出现在黄永玉回忆沈从文的《这些忧郁的碎屑》的结尾。黄永玉说，“文化大革命”的紧锣密鼓期间，方平兄从上海来信慰藉，顺便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黄永玉

的回信打了一个不合逻辑且经不起推敲的比方，让方平有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看了那个比方，顿觉黄永玉是一个天才，而“方平兄”也非凡品。

在方家雅致的客厅里，气氛轻松得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先从《这些忧郁的碎屑》说起，方平说，他认识黄永玉和王世襄，都是老朋友曹辛之介绍的。黄永玉送了他好多画，还邀请他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无数山楼”玩。回忆写信慰藉黄永玉之时，方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是靠边的群众，要编《法汉辞典》，就把我借出去了，后来就编《英汉大辞典》，跟革命不大相干。”

谈起《我的爸爸邵洵美》，方平说，邵绉红现在北京，常通电话。方平原名陆吉平，他和小珠有女儿陆玉澄、儿子陆宇清，两个名字合起来就是“玉宇澄清”：“因为生他们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怕他们还没有长大我已经过世了，很希望他们姐弟俩能互相照顾，所以我考虑他们的名字是‘玉宇澄清’。”陆玉澄定居美国。陆宇清在上海，是知名摄影师，一家与方平合住。正谈间，小孙女放学回家，一点儿都不见生，在我们面前又跳芭蕾舞，又拿出她画的画给我们看。客厅有一架钢琴，是方平买来送给小孙女的。方平说，他很喜欢京剧，也喜欢西洋音乐：“我的耳朵是音乐的耳朵。”

这个如叙家常的下午，话题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邵洵美，一个是莎士比亚。方平笑道：“翻译莎士比亚一辈人很沾光的，我现在有很多莎士比亚版本。”起身带我们到书房看他收藏的莎士比亚版本：英文原版的、台湾版的、拍成电影版的。在他的书房里，朋友莎士比亚就在身边。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邵洵美是一个独特的人物，按他自己的说法：

“你认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许多文化人回忆，在30年代的上海，邵洵美创办的时代图书公司和杂志曾影响一代人，而他和项美丽的跨国情缘更是许多人的谈资。方平是邵洵美的女婿，据《我的爸爸邵洵美》介绍，方平先和邵洵美的大女儿小玉相爱，正当谈婚论嫁之时，小玉于1956年9月2日因哮喘病发作去世。几年后，小玉的妹妹小珠由贾植芳的夫人任敏

作伐，与方平结合，方平终于实现了“娶一个洵美先生的女儿为妻”的愿望。

李怀宇 你原来写诗，1948年出过诗集《随风而去》？

方平 后来倒退了，就向翻译方面发展，也写一点散文，主要是赏析文章，我对比较文学感兴趣。我在上海成长，祖上是苏州。我喜欢英语，小学已经开始学英语，只读到高中毕业，没有读大学。在1949年之前，我在南京、厦门的银行当会计，解放后上海出现了许多私营出版社，介绍苏联文学、外国文学，我就离开银行，参加私营出版社“文化工作室”，后来公私大合营，合并到新文艺出版社。

李怀宇 是什么样的机缘认识邵洵美的？

方平 新文艺出版社离邵洵美的家很近，我常去看看他，就认识了。他人很好，谈笑风生。后来我跟他的大女儿小玉谈恋爱了，小玉聪明伶俐，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我们感情很好。她身体不好，后来过世了。她气喘，这是遗传，她的妈妈也有气喘病，但是家里人都没有她这么严重。

李怀宇 《我的爸爸邵洵美》里说，你们已经谈婚论嫁，准备在1956年10月1日结婚。

方平 那时候我们感情已经很深了。她过世之后，我很悲痛，有二十年还没忘掉她。我自己从来不写古体诗的，也写了几首古体诗来悼念她。要到二十年以后才淡忘。

李怀宇 那时候，邵洵美有没有跟你谈起他以前的事情？

方平 我是从来不问他的。也许他不愿意谈。据说他过去生活是非常豪华的，他出去坐什么颜色的车子，他穿的衣服也是要跟它配套的（笑）。这是他的好朋友跟我说的。邵洵美有时谈起项美丽，说：她学英文是我教她的。邵洵美教过项美丽写论文。

李怀宇 邵洵美和项美丽的感情外面渲染得很厉害，但是《我的爸爸邵洵美》里面谈得不多。

方平 书里是避而不谈。项美丽倒是写过 *my Chinese husband*，我没有看到。

李怀宇 你起初跟邵洵美接触主要是因为翻译的事情？

方 平 因为有共同语言，他后来也搞翻译了。他过去不大翻译，后来他没有收入，经济方面比较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约他翻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在我们年轻的翻译工作者心目中是高不可攀的，你写信给他们说想翻译什么，他们是不大理睬的，好像高高在上。他们主动找邵洵美，对他很尊敬。他也很高兴，很认真。他翻译完了拿来让我看看，翻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是非常难的，其中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一般人不可能翻译的。邵美洵的翻译功力我是很佩服的，他的翻译的确很好，很有才气！这给我感触很多，一般的纨绔子弟不是这样，他也是很风流，是很会玩的，但是他拿得出这样的作品。要是他不是生在富贵人家，而是生在一般的中等家庭，要为自己生活奋斗，他会在文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作出更大的贡献。

李怀宇 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形势下主动约邵洵美翻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呢？

方 平 这个事情我估计是夏衍帮忙的。邵洵美跟我提道：“作家对他的first publisher是非常感激的。”夏衍的第一本书是他出版的。盛佩玉写的回忆文章中提道，夏衍来家里看他，对他经济很照顾。

好像小红还提到夏衍跟周扬去看邵洵美。邵洵美没有跟我讲过周扬。后来邵洵美被关在牢里，1962年，有一次北京要开高校文科教材交流会，我们

周煦良

1905—1984，安徽至德人。先后入读于上海大同学院、光华大学，1932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历任暨南大学、华东师大等校教授。译作有《福尔赛世家》、《刀锋》等。

上海的周煦良去开会，会议可能是周扬主持的。在会议休息的时候，周扬问周煦良：现在上海的邵洵美怎么样？周煦良就说他已经被关押了。周扬就说：要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不必了。那么，周煦良回来以后就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汇报，马上就把邵洵美放出来了。

李怀宇 邵洵美从监狱出来以后有没有谈起被关起来的缘故？

方 平 邵洵美从监狱出来，我去看他，他就说，他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没有钱，希望哥哥能接济他。那么，邵洵美就给项美丽写了一封信，他说项美丽欠过他的钱，希望项美丽能寄点钱好接济香港的弟弟，我想是用英文写

的。这封信托叶灵凤带出去寄给项美丽，叶灵凤把这封信交给海关了。这样邵洵美就被抓起来了，审问也没有什么证据，他大概被关了两三年，关在提篮桥监狱，跟贾植芳关在一起。

李怀宇 贾植芳的回忆文章中有一篇《我的难友邵洵美》，谈到跟邵洵美关在一起的情形，邵洵美托他两件事：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访问，邵洵美是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萧伯纳不吃荤，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和邵洵美等人，由邵洵美付账，但是上海的报纸所有报道都没有邵洵美的名字，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希望贾植芳写文章纠正记载的失误。一件是鲁迅在文章中说邵洵美是“捐班”，花钱雇人代写文章，这是天大的误会，邵洵美的文章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请贾植芳代为说明一下。邵洵美从监狱出来以后，生活是什么样的？

方平 可能石西民也关照他。他一出来，我们新文艺出版社就要我代表出版社去看他，请他翻译书，答应每个月都送去两百块，作为预支的稿费。他那时候关了两三年，身体不好。邵洵美跟我说，他在要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给他打了很多补针，要放出来，人如果瘦得不得了，他们也没有面子。根本没有什么罪名可以交代，就不能让他太瘦，就每天给他打了好多针。出来以后，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

李怀宇 以前你看过邵洵美的诗吗？

方平 看过，他的诗当然是唯美的，有感而发。抗战胜利之后，老百姓很失望，邵洵美反映了人民的呼声。

李怀宇 邵洵美最投机的诗人是徐志摩。

方平 他们是好朋友。他不大跟我提到过去的情况，我也不大问。但是偶尔提到徐志摩，我感觉他的声音有点悲伤。我自己感觉邵洵美跟徐志摩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徐志摩死得太早了，要是徐志摩多活几年，会引导邵洵美在诗歌上继续发展，让他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可惜了。

李怀宇 邵洵美画过一幅画，题了：“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你见过陆小曼吗？

方平 没有，我们出版社曾经有人去看过她，回来说：哎呀，陆小曼

老了，跟当年的风韵不一般了。

李怀宇 没想到邵洵美晚景会如此寥落。

方平 邵洵美要不是这么富贵就好了，他有才华，感情也很丰富。

李怀宇 后来你和太太结婚是贾植芳的太太任敏从中牵线的。

方平 我太太就是小珠，邵洵美的另一个女儿。小珠在上海卫生出版社当校对，贾植芳的夫人任敏是她的同事，贾植芳跟我是有来往的，我也到贾植芳家中吃过饭，后来贾植芳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案子关进去了。后来任敏出来了，在卫生出版社，她鼓励小珠跟我往来。

李怀宇 以前你跟小珠熟吗？

方平 以前没有什么来往。我们结婚的时候很紧张，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李怀宇 你跟小珠生了几个孩子？

方平 一男一女。我儿子在上海，搞摄影，女儿在美国定居。

李怀宇 小珠是在1982年病逝的？

方平 是的，我那时候在昆明讲学，我出去的时候她身体还是好的。我出去大概半个月吧，后来电报来了，说她病了。我赶紧回来，回来两三天她就去世了。

1958年，方平和王科一合译的薄伽丘《十日谈》出版。王科一才华横溢，英年早逝，据《我的爸爸邵洵美》记载：“此人中等身材，略胖，相貌一般，却大有不拘小节的魏晋名士风度。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撞见他，他正在和我爸爸谈得起劲，一只脚脱去了鞋袜，踏在凳边，一边在搔脚趾丫里的痒痒。爸爸十分赞赏他，说他是不可多得之才。”多年后，方平曾在文章中追思：王科一是一位勤勉奋发、热爱自己的专业而且已经作出了成绩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不幸于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终年四十有四，是正当壮年有为之期。

李怀宇 那时候王科一也经常跟你一起到邵洵美家里？

方平 他也是从私营出版社公私合营过来的，是同事。

李怀宇 《我的爸爸邵洵美》中说，有一次，邵洵美请你和秦鹤皋、李青崖、吴劳、王科一到他家里吃饭，盛佩玉亲自下厨做了西餐，那是一次难得的欢聚。

方平 当时出了一桩大事，一个就像《钦差大臣》里写的那种人，冒充中共要员到东到西骗吃骗住，可能还捞了一笔钱，一直到西安时被逮住了，老舍就写了剧本《西望长安》，相当于《钦差大臣》。那么，当时侦探案作品就很受欢迎，上海请邵洵美翻译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侦探案》，很受欢迎，印数很多。邵洵美拿了一笔钱，就请客。他夫人烧的菜很好。

李怀宇 王科一和你合作翻译《十日谈》，他后来的遭遇很少有人再提起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方平 他工作很认真，但是也很会享受，要吃好的，什么都要好。他和他太太起初的关系还好，后来关系变坏了，他太太不大理他。他的精力很旺盛，欲望也是很旺盛的，就去找一个交际花，他有钱，每次两百块他花得起的。后来这个交际花出事了，她跟很多男的有性关系，就被逮捕了。逮捕之后，她就交代了跟她有关系的男人，王科一也在里面。公安也没有追问他，本来也没有事。“文化大革命”了，总要抓出几个人来，王科一也靠边了。1968年，他工作是很认真的，但是从私生活上要批判他总是可以的，就要他在晚上写悔过书，第二天在他的公寓大门口贴上“我是坏分子”、“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那天晚上，他不能不写。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是一样，写出来也没有什么的。但是“坏分子”他写不下去，觉得很丢脸，好像贴在自己的公寓门口抬不起头来。他的太太虽然跟他是住在一套公寓里，但是已经分居，一个人一间房子。他太太也对他冷言冷语，他就更生气了。底下的人晚上听见他的脚步声在走来走去，最后他就开煤气自杀了。他过不了这个关。

方平多年致力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主编的诗体译本《新莎士比亚全集》，共收他的翻译戏剧二十一种，合译三种，叙事诗一种，他还著有莎剧论文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莎剧论文《安东尼奥的下场》。

布朗宁夫人

1806—1861，英国诗人。出身于富裕家庭，十五岁时从马上摔下，长期卧病在床，得以博览群书，醉心于诗歌创作。1838年，以诗集《天使及其他诗歌》成名。1846年和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私奔，迁居意大利。

李怀宇 我听陆灏说，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谈道：搞翻译就像蓑人一样，侍候老太太和宝玉时都是一心一意的。无论是合译薄伽丘的《十日谈》，翻译布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还是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你都是一心一意地投入工作。

方平 我是一心一意对待我的工作，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因为我爱翻译，一般翻译得不好，我也不大高兴翻译。像翻译莎士比亚，总是要把全部的精神都扑上去。

李怀宇 在你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名家翻译莎士比亚了。

方平 有曹禺、梁实秋、朱生豪、孙大雨、吴兴华、卞之琳等人。曹禺在解放前翻译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为了四川的剧团演出。一般我们的翻译都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曹禺是第一个拿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戏剧来翻译的，作为舞台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用来演出的，不是专门作为文学作品出版的，他是剧团的编剧，就是为了演出。为了演出而翻译，首先要朗朗上口。朱生豪几乎把生命都贡献到翻译莎士比亚上，很年轻就去世了，这是很遗憾的。第一个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是梁实秋，他译了三十多年。当时有一笔基金，由胡适来主持，胡适请两个人翻译，梁实秋和闻一多。闻一多翻译诗体的，因为闻一多是诗人，后来闻一多没有翻译。梁实秋在大陆译了一些，最后在台湾译完。翻译莎士比亚的人一定要长命！（大笑）

孙大雨和卞之琳也译过诗体版。孙大雨是第一个用诗体来翻译，但是后来孙大雨已经老了，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卞之琳翻译《哈姆雷特》是用诗体，很精彩。我们这个《新莎士比亚全集》是一个诗体版，我们根据莎士比亚原来诗体的格律，翻译了一个新的全集。朱生豪的译本已经没有版权了，现在有几个出版社就用这个版本，有些出版人把他的译本夸得不得了。我对朱生豪很敬仰，但是我们的工作应该比前人更进一步。朱生豪把意思讲明白了，他的出发点也是这样的。

李怀宇 你原来写诗的经历对翻译诗体的莎士比亚有没有影响？

方平 原来我的诗没有写好，后来放弃了，但是对用诗体来翻译莎士

比亚是有帮助的，对语言的感觉有影响。莎士比亚的诗写得很好。

李怀宇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占了您翻译生涯最多的精力？

方平 翻译莎士比亚要你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到这里来。以后还要继续花精力，有一种寄托。我翻译莎士比亚是最花精力的，但是最受欢迎的是两本书。一本是《十日谈》，1958年出的，这个很怪，1958年是政治形势一浪高一浪，这个书被一些人看作“黄色小说”，居然顺利出版了，很多人喜欢。贾植芳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对我说：我的夫人给你做媒，我很喜欢《十日谈》，想请你送一本。我当然很快就送去了。曹辛之、黄永玉等朋友也喜欢这本书。另一本是布朗宁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诗集》，我的许多读者朋友很喜欢这本书，有个法国的朋友专门打电话来，说翻译得很优美。

李怀宇 为什么说“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

方平 “文革”结束之后，可能是1980年吧，第一个在北京公演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威尼斯商人》，广告牌很大：“指导：曹禺；翻译：方平。”那是中国青年话剧团演出的，很受欢迎，但是在《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位机关干部的信，指责这个戏“违反公德，有伤风化”，主要是戏里男女主人公当众搂抱接吻。后来又刊出一封来信，指责这个戏的台词“俗不可耐，不堪入耳”，举例是最后一幕的台词：“天哪，我们还没有当丈夫，先就当上王八了。”我是完全根据莎士比亚的原著来翻译的。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就是《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他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

李怀宇 你觉得莎士比亚是什么样的朋友？

方平 好像每个人都向莎士比亚敞开心，而他能够把每个人心里想的话都说出来。你原来想表达而没有办法的，他替你表达了。他了解每个人，他对人了解得非常深刻。



草婴

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浙江镇海人。

翻译家，50年代主要翻译肖洛霍夫作品，包括《顿河故事》、《新垦地》、《一个人的遭遇》，此外还译有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从1960年起，用数十年的心血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

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得“高尔基文学奖”。



草婴

一个人的翻译 一个人的遭遇

从1978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四百多万字，这个工作中国以前没有人做。当时苏联也很重视我做的这件事情，他们研究中国的专家说了一句话：“全世界只有草婴一个人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完。”

上海初春的清晨有点冷，穿过岳阳路那座洋房的宽阔院子，可以看见草地上的薄冰。登上洋房的二楼，木地板上清脆的脚步声通知了主人，书房门打开，迎面扑来一股暖气。草婴先生递来热茶，暖和身子后，宾主欢谈，更确切一点说，是听草婴先生讲故事。

我猜想，其中一些故事曾经过朗读的练习，才讲得如此流畅。当年草婴在翻译《一个人的遭遇》时，曾请一位电影艺术家来朗读译稿，听到与口语节奏稍有不顺之处便作修改，以求译文朗朗上口。在中学时，草婴是班长，他的同学任溶溶曾说他开会发言总是条理清晰，有当领导的天赋。

现在，草婴每天在家看书看报，天气好了出门散步，偶尔写点短文章。谈起翻译习惯，他笑道：“我用手翻译的，到现在还不会用电脑。”我提到杨宪益翻译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他说：“杨宪益风格很高。”随即找出一份报纸，上面有一篇写杨宪益的文章。谈到翻译界欣赏的同行，草婴饱含深情。在草

婴给翻译家高莽的一封信中，他谈到知识分子的良知：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要经常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不能只听媒体的介绍，也就是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在翻译工作中，草婴钟情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因为两人都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而在生活里，草婴坦言，自己受父亲和姜椿芳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医生，从小给我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对病人家庭都很关心，很爱护。我从小就感觉到中国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那时有一个想法，想改变贫穷农民的生活，立志想到大学学农科。后来真的学了农科，在上海南通农学院学习，没学多久因为生病休学在家。从此就没再念下去，后来就做翻译了。”当问到他父亲当年有没有想让他子承父业当医生时，他笑道：“父亲很希望我或者学医科，或者学工科，用工业或农业来救国。但是我后来没有照他的话走下去。”

草婴告诉我们，他的儿子盛元良现在美国当工程师，女儿盛姗姗则在美国画画，如今已是知名的画家。边说边取出一本盛姗姗的画册，扉页“生命的色彩”由张五常题字。

1937年12月，十四岁的草婴随家从宁波避难上海。草婴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开始对俄罗斯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在随一位俄侨教师学俄语后，草婴认识了姜椿芳，在俄语学习上得到极大帮助，自称“姜椿芳是我一生的楷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草婴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

李怀宇 你在中学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兴趣去学俄文？

草 婴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以后，我看到中国处在很危急的关头，另

外看到国民党非常腐败，整个中国好像看不到希望。当年苏联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的影响，鲁迅先生都写过文章介绍苏联。因此我很关心苏联究竟怎么产生的，这个社会究竟怎么样，要了解这个社会，就要直接看俄文的书报。

李怀宇 你学俄文困难吗？

草 婴 当时的中学还不像现在功课这么紧，我们还是有时间一方面念中学，一方面课余自己学俄文。我们中学是英国人办的，英文基本上是英国老师教的。俄文我是在课外学的，1938年3月1日开始，当时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学校来学俄文，我只好请俄国人教，他们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因此靠学费，外国人当时在上海开支总要比中国人开支大一点，一个钟头一个银元。我父亲每个月给我五块钱，我就拿出四块钱来付学费。后来就认识了姜椿芳，他是地下党的领导人。

姜椿芳

1912—1987，出版家、翻译家，江苏常州人。1932年入党，长期在哈尔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首创者之一。

李怀宇 姜椿芳对你的影响很大？

草 婴 他对我的影响、帮助都很大。1939年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十六岁，他二十七岁，已经在东北地下工作了几年。东北的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当年在东北开展地下工作，一度就住在他的家里，后来在日本统治底下，他家里待不下去了，杨靖宇就离开他家。姜椿芳1938年从哈尔滨调到上海工作，领导地下党的活动。当时他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知道我这个中学生学俄文很用功，他就约了一个时间，请我到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家里见面。他问我：学俄文学得怎么样？我说很困难，因为当年没有一本俄汉字典，没有一本俄文文法书，这个俄国老师是个家庭妇女，也不会教书。他考虑了一下，说，我们过两三个礼拜见面一次，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帮的就帮你解决。我一面继续跟俄国人学俄文，一面得到姜椿芳的细心帮助，得益不少。

李怀宇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塔斯社搞翻译，在那里俄文进步很快？

草 婴 我1941年开始课余翻译，在1941年到1945年苏德战争中，我是课余翻译。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这以后我就到上海塔斯社成为专业的翻译工作者，一直到解放。在塔斯社这几年，我一方面搞翻译工作，另一方面对提高自己的俄文水平有很

大的帮助。解放后，有很多苏联的朋友到中国来，就问我：“你是在莫斯科学的俄文还是在列宁格勒学的？”俄罗斯最大的大学不是列宁格勒就是莫斯科，我说：“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是在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跟他们开玩笑（大笑）。

50年代，草婴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他译了一些苏联小说，主要是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第一部和第二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还译过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文革”开始，肖洛霍夫被污蔑为苏修文艺鼻祖，草婴因翻译其作品，被斥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 and 吹鼓手。此后，草婴曾两次处于生死边缘。

李怀宇 在50年代初，你的翻译工作是怎么样的？

草 婴 解放后，姜椿芳到北京负责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本来要我也到北京去参加他的工作，翻译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我也愿意去，因为他领导的，1952年去了，去了之后身体不争气，又吐血了。我这个人死了很多次，没有死掉，也是一个奇迹。姜椿芳劝我把身体养好，否则没有办法工作，我就很狼狈地回到上海来，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翻译文艺作品。1954年，上海作家协会成立，我参加筹备工作，当年以巴金为首，有一百多个会员。其中专业会员总共不到十个人，专职搞翻译的有傅雷、满涛和我。我们几个人不用上班，也没有工资，就靠翻译稿费生活。我们学习、运动都在作家协会。

李怀宇 你1955年翻译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草 婴 这部小说跟斯大林的去世有关。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去世，他在的时候很严格地控制文艺界各方面的活动，有些作家写了东西之后没有办法出版。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作家爱伦堡写了小说《解冻》，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把当时苏联比较宽松的环境说是“解冻”。从这篇小说开始，苏联文学就叫“解冻文学”。其他苏联作家也写了类似的作

品，其中就有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部小说主要内容是关心群众疾苦，反对官僚主义。这篇小说发表后我很快就翻译出来，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当年胡耀邦同志当团中央总书记，他看到这部作品，很重视，号召全国青年学习书中主人公娜斯嘉的精神。

李怀宇 在翻译工作中，你跟同在上海的傅雷、满涛两位先生交往多吗？

草 婴 我和姜椿芳经常联系，他当时跟傅雷也有交往。傅雷法文很好，解放前也是进步的，当时姜椿芳要我到傅雷家里取稿件，傅雷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很快地记录下来，然后翻译成中文，通过我给姜椿芳交给地下党。因为这个，1957年“反右”的时候，要给傅雷戴帽子，要我写文章批判他，我一个字也不写，我认为傅雷不是一个对国家没有好处的人，绝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做人有一个原则：人活着，不能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

1955年反“胡风集团”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胡风的材料，其中有一封满涛写给胡风的信，大意是说：现在我们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组织原则办事。《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说：请同志们看，“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有他们的组织原则。这样满涛就成了批斗的对象。我当时也比较了解满涛从事的翻译工作，知道满涛是个老实人，爱好做学问，人不坏的，书生气比较厉害，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上海有关的报刊要我写文章揭发批判满涛，我一个字没写。

李怀宇 在那个年代，你翻译了很多肖洛霍夫的作品，为什么那么看重他的作品？

草 婴 50年代苏联作家作品很多，我最重视的作家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作品思想性比较强，他主要是信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写作上是现实主义的，而且非常成功。在当年的苏联，他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在苏联和中国都是有争议的。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最成功的作家，他写作很多技巧都是向托尔斯泰学习，比如，他的小说里有很多心理描写，这是托尔斯泰作品最大的特色。这可以联系到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托尔斯泰。1966年，我受到冲击，主要是因为翻译肖洛霍夫，江青点了名，说肖洛霍夫是苏修文艺鼻祖，我就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进一步就成为“苏修特务”。我是“文革”中最早批斗的对象，后来就隔离、劳动、

受伤，十年来就苦苦熬过来。

李怀宇 第一次是1969年胃出血。

草 婴 我本来就有胃病，十二指肠溃疡，因为靠边去劳动，在农场割稻子，身体实在很虚弱，体重不到一百斤，结果大出血。所谓“大出血”，是上面吐血，下面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在医院里抢救，如果抢救不及时，我这条命1969年就没了。

李怀宇 第二次是1975年扛水泥包，脊梁骨压断了。

草 婴 这一次最惨了。当时我们属于半靠边状态，劳动还是要劳动，“知识分子臭老九”这顶帽子在头上压着的，当时要你劳动就劳动，要批斗你就批斗你。1975年1月28日，我们在上海出版系统的建筑工地上，水泥包运到工地，要我们这些“臭老九”去背水泥，其他一些同志身体都比我好，我重的劳动没干过。那天，天已经昏暗了，卡车到了，叫我们去扛，我站在卡车边等车上的人把水泥包放到我背上。我背了几包后，上面两个人也是没有经验，我还没有站稳，他们一包水泥就下来，正好打在我的背上，我当时听到“咯哒”一声，脊梁骨断了，人就昏过去了。对面就是瑞金医院，X光一检查，说我第十二节胸椎骨折。这地方骨折挺麻烦，不能上绑架，不能上石膏，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在木板上一动不能动，自然愈合。当时我自己已经失去知觉了，医生跟我家属说了，如果错位就麻烦了，轻则下肢瘫痪，重则生命难保。我家里人要求住院，医院不收“牛鬼蛇神”，就在家临时搁了一块木板，我就仰天躺着，保持一个姿势，吃喝拉撒都是我家里人照顾，不能动一动。躺了近半年，本来医生说，可以动一动，但稍微动一动，就感到天翻地覆。后来慢慢练习，第一步能在床上稍微转动转动。过了一定时期，可以坐起来，好了一点，在床上可以吃东西。再过一段时期，可以下来在房间里走动，大概过了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从家里大门走出去，是1976年1月8日。

李怀宇 你把时间都记得这么清楚。

草 婴 我时间观念比较强。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因为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去世的那一天。第一次上街，听到这个消息，打击很大。我自己慢慢锻炼身体，过了几个月，有了姜椿芳的消息。“文革”时他被关到北京秦

城监狱里，关了六年零八个月，到1975年下半年才放出来，说他是“苏修特务”。我们这些人，原来搞俄文的，“文革”中都被打成“苏修特务”。出来以后，他身体非常虚弱，自己在北京休养了一个时期，后来到了青岛，他儿子在青岛工作。他从青岛写了一封信给我，问：“上海是不是有地方让我休养一个时期？”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我自己也搬过几次家，怎么有条件呢？上海当时也没有地方可以租房子。那么我想尽可能地为他办到，我写信告诉他，你来好了，就到我们家里挤一挤吧。他就从青岛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在1976年9月9日下午5点钟，坐船从青岛到达上海，要我到码头去接他。

那天早晨，工宣队宣布：今天有重大消息发布，任何人不得请假，不得离开单位。我紧张了，下午姜椿芳要到了，工宣队又禁止任何人离开，我不去接他，他肯定找不到我的住处。后来我灵机一动，悄悄地溜，没有跟任何人说一句，也不让任何人注意。坐公共汽车去虹口轮船码头，在半路上，4点钟全国广播：伟大领袖去世！喔，原来这么回事。到了虹口码头，我站在那边等，轮船准时到达，我看见姜椿芳在他夫人和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从船上走下来，远远地望过去，看到他十分虚弱，人也苍老了很多。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见面，姜椿芳一声不响，由我陪他去坐公共汽车，姜椿芳性格的特点，说话很少，说话很慢，走了几步之后，他只悄悄说了一句：“看样子要天下大乱了。”

我陪他到我家里，他好不容易到上海来，我们稍稍为他准备了一些酒菜欢迎他。后来一想，这不得了，如果被邻居、居委会看见了：“你们怎么在大吃大喝庆祝啊？伟大领袖去世你们高兴吗？”那还得了！那不成了“现行反革命”吗？连忙把窗帘一拉，悄悄地吃了一顿饭。在家里住下来，姜椿芳有一个特点，因为他长期做地下工作，说话非常谨慎小心，他到我的地方后，首先不谈大的事情。我尽量想了解他在监狱里的生活情况，他就告诉我，他很担心在监狱里会丧失说话的能力，他就用各种办法来锻炼自己：数数目字，从一二三四一直数到一万，数英文的ABCDEFGH，数俄文字母等，不断让嘴巴做运动，不会丧失说话的能力。他在我家住着，也不出去，也不通知其他的朋友。“四人帮”是10月6日被抓起来，外面公

布是10月11日，我10月9日就知道消息了，北京来的朋友告诉了我，我告诉了姜椿芳，大家很兴奋。

从那以后，姜椿芳就跟我说了一些其他内容的话了。他说他在监狱里就考虑一个问题：中国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全民文化水平太低，容易被人愚弄。因此他就考虑怎么提高中国的全民文化水平，他认为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搞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一部知识性的百科全书，说不过去。所以他立志出监狱之后，积极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中国长时期以来受到愚民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闭关锁国，使中国广大的老百姓不了解世界的事情。因此他认为要大力要培养翻译人才，使中国人更多地了解国外的情况，他要把全国的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扩大队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朋友，得到他们的支持。他前后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回到北京，他又和有关方面积极商量，开展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到1980年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卷“天文卷”，接着出“外国文学卷”。后来中央正式发聘书，聘请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这个工作，他从1978年开始，一直干到1987年去世。在他去世前的时候，他已经看了四十几卷大百科全书的校样，当时他青光眼已经很严重了，又是高度近视，只能用放大镜在灯光底下看校样。

“文革”结束后，草婴花了二十年时间把四百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成中文。他自述：“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由于草婴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成就，1987年他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高尔基文学奖”。

李怀宇 你翻译托尔斯泰小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草 婴 “文革”结束以后，我的身体好一点，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来找我谈话，要办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上考虑让我去当总编辑。我当时觉

得很突然，说我考虑考虑，过几天就回复他们说，我一辈子就做翻译工作，其他的行政领导工作基本上没有经验，是不是还是能够让我继续做翻译工作，而不去参加行政领导工作。其实我内心是想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市里面也就不勉强我去当总编辑了。“文革”前我翻译过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也出过单行本《高加索故事》。从1978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四百多万字，这个工作中国以前没有人做。当时苏联也很重视我做的这件事情，他们研究中国的专家说了一句话：“全世界只有草婴一个人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完。”

李怀宇 何以如此着迷地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

草 婴 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善于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有人分析，一些作家的心理描写像照片一样，而托尔斯泰描写人的心理就像电影一样，连续不断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安娜和丈夫分开之后，想念儿子，带了玩具去看望儿子，正当儿子醒来跟妈妈亲热的时候，突然听到老头子卡列宁回来了，她很紧张，匆忙从儿子的房间出来，出来时却把玩具带走了。这一段时间的内心活动都写出来了。另外一个例子，安娜坐马车去自杀前，看到两边的景象，一路上都在不断地回忆，这种内心活动也只有托尔斯泰能够写得这么细，这么活，让我们像在看电影一样，非常生动，非常真实，非常感人。这是托尔斯泰艺术的高峰，也是我翻译托尔斯泰的原因。

李怀宇 高莽写到你们在黄山夜谈时，你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要看上十遍二十遍。

草 婴 我翻译托尔斯泰前前后后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要看好多遍，因为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的翻译。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其他的外交翻译、时事翻译、科技翻译是技术性的翻译，将来都可以用计算机来做，但是文学翻译一万年以后，还要用人来做，一万年以后还不能请机器人来写小说。艺术与技术主要区别在这里，技术是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灵魂的，艺术有思想、有灵魂、有感情。这就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的区别。文学家的形象思维是跟科学家的逻辑思维不一样的，因此从事文学翻译也要有形象思维，就是头脑里有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好的文学作品都能使读者产生很鲜明的形象。比如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人物有五百五十多个，这部作

品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一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出现了,这就是形象思维。文学翻译家要把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通过翻译介绍给读者,他介绍得好,就是成功了,他介绍得不好,就是失败了。

李怀宇 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

草 婴 他的三部长篇都是杰作,我个人最喜欢《安娜·卡列尼娜》,把一个处于历史转变阶段的妇女痛苦的矛盾的内心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同时对主人公倾注了大量的爱心。所谓人道主义,就是要培养人对人的感情,人对其他人有爱心,在中国,特别需要培养这方面的感情。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阴影到现在都摆脱不了?人道主义是很重要的。托尔斯泰的一生都在探索一条道路,思考如何解救大量苦难的人。

李怀宇 你在1985年、1987年两度应邀去苏联,1985年那次去过托尔斯泰的故居,当地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草 婴 1985年去了两个星期。那次我去过托尔斯泰的故居,他的庄园非常大,三百八十公顷,合五千七百亩土地,有住宅,有小河,有草地,环境非常优美。这是他的外祖父传给他的遗产。他的外祖父对文学艺术也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每天早晨在庄园里散步,他爱好音乐,就在庄园里搞了一块地方,都是一个个矮树桩,这就是农奴演出的地方。每天早晨农奴在演出音乐,他外祖父就在旁边一边散步一边听音乐。我在他的客厅看到两架大的三角钢琴。文学家对音乐艺术都要有很好的修养。

李怀宇 1987年,你获得“高尔基文学奖”,那次所见所闻又有什么变化呢?

草 婴 1987年去了莫斯科。苏联在变化中,我跟其他的翻译用俄语交谈。一个日本的女翻译家去过好多次苏联,我问她:“你这次来,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很大的不同。以前来,苏联满街都是斯大林的像、标语口号,现在没有了。”我们在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开会,协会前面有一块大的草地,草地上有一棵很大的古树。我们看见几个老太太整天坐在树底下,什么道理呢?后来一了解,原来当时的莫斯科市政府要在这块地盖新房子,要把这棵树砍掉,当地居民不答应,就请老太太们轮流去看守。这说明什么呢?以前苏联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力的,官方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到1987年,老

百姓有自己的发言权了。

另外一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是，莫斯科有一个很大的美术馆叫特烈基雅美术馆，那是世界上闻名的美术馆，我提出想去参观一下。他们说，现在不能去，这个美术馆老的房子不够大，建了一个新馆，老馆已经关闭了。新馆盖好了，请一些专家到里面去验收，验收的结果是温度、湿度、光线的设备不合格，要大大地返工加工。这里面反映什么问题呢？说明那时候苏联已经开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专家的意见了。



鯤西

1916年生，福建长乐人。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长期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

著有《三月书窗》、《推窗集》、《清华园感旧录》、《深宫里的温莎娘们》、《吴伟业》、《听音小札》等。



鯤西

一去不回唯少年

很多人讲钱锺书的《围城》里影射西南联大具体的某个教授，像吴宓，我不这么看，《围城》是从很多人身上提取特点，这是高明的文学手法，固定影射一个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现在很多人对他很崇拜，但是不能真正晓得他的学问在什么地方，比如《谈艺录》里面，关于清诗部分是很精彩的，很多人搞不懂。很多人就喜欢崇拜，不一定读他的书，就像喜欢捧陈寅恪的人不一定读陈寅恪的书。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上海南京路附近一所古朴的楼房里，老式的电梯，木质的地板，一进门就顿感有一种老上海的味道。鯤西先生就住在其中的一套房子里，客厅、书房、卧室三位一体的大房间里摆着一架钢琴，桌上摆着一套简单的音响设备，这就是产生《听音小札》的地方。

谈起音乐，鯤西先生说的都是家常话。他说，现在主要听DVD，以前也到现场听音乐，这几年不大去了。对同道中人辛丰年，他很赞赏。“辛丰年和我吃饭时，就我们两个谈，你听了什么版本，我听了什么版本。”他笑道，“辛丰年比我专业，他是科学研究，我是业余欣赏，是门外汉。”那次饭局，是扬之水（赵丽雅）介绍的，而写《听音小札》，也得益于扬之水促成。鯤西先生说：“她的文章就像六朝人写的书札一样。”

沉浸在音乐中，鯤西先生从六十多岁时开始慢慢地写些文章，登在《读

书》、《万象》、《文汇读书周报》上，渐渐引来知己。有人惊叹：这个新人是谁？他的文章，不沾近五十年文坛流行的习气，依然保留着五四时代的气息，让人猜想是一个“很老的新人”。他说：“我写了很多忆旧的文章，但是，我的文章并不是怀旧的。”

听音乐之外，读书也是一大乐事。他有一本书名为《三月书窗》，得于唐代韩致尧的诗句：“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少年时在清华园和西南联大读书的好时光至今难忘，老来读书而写书评，尤见其时的影响。他说：“叶公超的书评对我影响很大，当年叶先生写叶芝编《牛津现代英诗选》的一篇长评，谈英诗如数家珍，功力不凡。”现在，他随时关注外文的书评，他的弟弟在美国，常给他寄些《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书评。谈到兴起，他从书架上取出美国企鹅丛书，感叹其版本考究，价格便宜。

鯤西先生年逾九十，不见老态，他说最大的锻炼是常常散步。平日爱好广泛：读杂书，听音乐，也听京戏，更看足球，又夸法国电影非常好。

临行时，我问：“为什么用笔名‘鯤西’？”他笑答：“我很佩服英国作家德·昆西。”

鯤西原名王勉，生于福建长乐的书香门第。祖父王又点为知名诗人，三个儿子都留过洋。王勉的父亲王沅留学法国，读数学，回国以后进入外交界；一个叔父留学英国，念工程，娶了英国太太；另一个叔父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海军陆战队，与国民党福建省省主席陈仪是同学。十几岁时，王勉来到上海，后入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园的生活影响了他的一生。

李怀宇 在入读清华大学之前，你在上海读书的情形是怎么样的？

鯤西 我中学在上海，爱好新文学，启蒙书是三本，我舅父从北京带来冰心的《寄小读者》，另一本是《侠隐记》，就是《三剑客》，还有一本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我年轻时代温习五四时代的文学，自己借了《新青年》来看。很奇怪，在年轻时，我读胡适的文章，也读鲁迅的文章，而且两个都喜欢。我觉得胡适的白话文章写得好，他的全部文章我都看。鲁迅在上海《自

由谈》写的文章用许多笔名，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一看就觉得这一定是鲁迅写的。这两个人观点不相容，但我都爱读。

李怀宇 当时感觉清华大学的学风如何？

鯤西 清华大学学风好，师资好，老师都是经过清华学堂毕业，然后留美。清华的物理人才那时候是全国第一，文科也不错，法科也很好。它跟北大不同，北大比较松散，清华是紧和松结合得好，不读书也不行。从出人才可以看出来，北大在五四时代是非常好的，有个天才在里头可以出来，如果不是天才的话就平均了。以前考留英和留美庚款，考取的人当中比如说三十个人，清华占一大半，交大占一小半，北大的人较少。我不是说北大没有人才，北大的中文系人才就很多。清华那时候学生的进取心比较强。我喜欢读杂书，兴趣很广泛。我常常问现在的大学生：你晓得不晓得哪些人是学校里最好的？我们那时候就晓得：那个人是精英。这很奇怪。

李怀宇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吴景超是“清华三才子”之一，另外两位是罗隆基和闻一多。

鯤西 吴先生在清华学堂时中国的古书读得很多。我曾经在清华园的图书馆看见他在翻《汉书》，我觉得很奇怪。吴先生后来从政去了，教了一年就走了，到南京行政院工作，那时候翁文灏当行政院秘书长，就把吴先生拉去了。

李怀宇 有一个说法是，李约瑟在1938年提出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不发达的“李约瑟难题”，吴景超在1935年就提出来了？

鯤西 这个说法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也提出过，冯友兰有一篇用英文写的论文，就是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李怀宇 潘光旦先生上课是什么样的？

鯤西 我听过潘先生的社会思想史，他上课时根据Sorokin（索罗金）的一个课本来讲。他教书没什么特别，主要是做关于中国优生等方面的研究。潘先生英文好得不得了。孙中山的遗嘱，我们那时候要背的，这份《总理遗嘱》的文字是汪精卫写的，翻译成英文有好几个版本，潘先生的版本是最好的。他跟美国人接触比较多。他在班上也跟我们讲：他在美国读书时，一个字美国学生答不出来，他答得出来。

李怀宇 在你所见的清华园学友当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物？

鯤 西 我在清华园可以说是最普通的一个学生，但我认识的都是精英。正因为我是迟来者，同级级友往来不多，相反我的许多好朋友也是我钦佩的清华园的精英大多是比我高一级（九级），和十一级、十二级。这三级是清华后期人才辈出的班级。印象很深的有九级历史系和其他系的人物，其中有物理学系林家尧、历史系丁则良、徐高阮等。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他给杨振宁找的一个家庭教师就是丁则良，是清华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推荐的，丁则良那时候还只读一年级，但是他的旧学根底很好。但我从来没有听杨振宁提过这个老师，因为丁则良在“反右”的时候自杀了。杨

振宁讲过有老师，但是没有讲是某某人，我想他不会忘记吧。丁则良也是我的同乡，从英国留学回来。

李怀宇 你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钟开莱是清华园的数学天才，你们的私交如何？

钟开莱

华裔数学家、概率学家。1917年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4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系主任。

鯤 西 钟开莱 1936 年以第一名考取清华大学，

很有意思的是哲学系冯契考取第二名，他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也是当代有名的哲学家。上课时，物理学家吴有训教授就说钟开莱：“这是我们今年的状元。”第二年，钟开莱由物理系转入数学系。钟开莱的英文非常好，我很佩服，问他：“你的英文为什么好？”他说：“我在中学的时候，数学当然没有问题，但我哥哥笑我：‘你的英文不好。’我就下苦功读一本日本人 Saito 编的英语文法大全，这本书举例很丰富，英文的介词怎么用很重要，我把这本书读透了，英文就好了。”英文一定要早期学好，早期学得不好，后期就比较难。现在我的老朋友在世的就只有他和北京大学的王永兴教授。我们这一圈子人中就只有我们三个人了。

1937 年抗战爆发，鯤西随清华大学一路南迁。1938 年，鯤西结业，由蒙自到昆明，为了寻找工作在昆明小作逗留便转道去重庆，在农本局任职一年后回到昆明。此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鯤西一面工作，一面在西南联大居住听课，与众多师友如切如磋。他认为：“战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可是说到联大，人们总爱说它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而绝少提及其他学科的成就，这是不公平的。联大若有成绩，是文、法、理工并重，它可供后人借鉴的是它的优良的校风，它激励学生向学的精神。”

李怀宇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你跟着学校一路奔波，那种经历对你们的学业影响大吗？

鲧西 那时候逃亡还不能算坎坷，政府对学生还是有津贴的，我们也没有荒废学业。我那一年本来不预备回来，暑假在学校过，正好有一个亲戚到北平办事，看见打仗了，把我带回来，所以我空手回来，什么东西都没带，书的损失很大。我们先到了长沙，后来到了蒙自，在蒙自我已经毕业，后来才到昆明。一路下来，除了空袭警报之外，没什么可怕的。我跟吴宓先生很熟，跑警报的时候我跟他一块跑。他没有什么架子，吴先生日记里还提到我。闻一多讲唐诗讲得很好，他在蒙自时经常不下楼，人家就叫他“何不下楼楼主”。我旁听叶公超的课是在蒙自，他讲英国文学，谈笑风生，他是一个适合在沙龙里谈天的人，他讲的东西根据的材料不是最多，但是讲得很好。在昆明时组成西南联大，中国学术界顶尖的人物都在那里。那时候学生爱泡茶馆，我有一次跟钟开莱泡茶馆，是什么茶叶不晓得，打桥牌，吃点心。昆明人抽鸦片，抽鸦片的人要吃甜品，所以昆明的甜品特别好。昆明人喝咖啡，是受法国人的影响。

李怀宇 你在昆明的时候，已经工作了，怎么跟西南联大的关系还很密切？

鲧西 我在联大进进出出认得的人都是同学。我在外面工作，有时候也住在联大的宿舍里。我曾经跟**陈体强**住在同一个宿舍，我那时候不是联大职员，他是助教。我无意中看到他写的一段英文，觉得很好。陈体强是我的同乡，他在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以后留校，在钱端升的指导下做课题。做完课题后他到重庆进入国民党的外交部，因为他家也是外交世家，一年以后就升为科长。

陈体强

1917—1983，法学家，福建闽侯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48年获牛津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曾任教清华大学。所著《关于承认的国际法》被列为当代国际法必读书之一。

第二年考取留英，念国际法。解放后他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有一天晚上，我无意当中在上海的马路上碰到他，他是代表清华来上海招生的。第二天我带他到一个朋友家里，我就问他在英国的毕业论文是什么？他说是《关于承认的国际法》。后来我才晓得，他在英国写的这一篇论文被英国认为是经典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理科的学生在外国成就高，多得很，像钱学森他们，在法科就很少，像萧公权，他是清华学堂老一派的留学人物，他写的论文被英国的一位名政治学家引证过。所以有一说：“前有萧公权，后有陈体强。”后来他的遭遇也不好，死得早。

李怀宇 那时候还有没有在西南联大里听课？

鯤 西 我也去联大听课，没有人阻止你。

李怀宇 听谁的课？

鯤 西 刘文典，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抽鸦片的。他讲李义山，他上一节课，大概就讲二十分钟，其他都讲废话，骂人（笑）。骂教授、助教，他骂人是没有伤害的。他最佩服就是陈寅恪先生。刘先生是安徽人，跟胡适是同乡，关系不错。刘先生很好玩，有一天晚上，我跟王永兴两个人，忽然想去看看他，谈《红楼梦》，他也随便得很，我们不是他的本系学生。他那时候房子也很小，他躺在烟榻上抽鸦片，我们两人坐在他旁边。这种情形很特别，后来是不大会有的。

李怀宇 沈从文曾经写信推荐你找工作，写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写得最生动的是他的学生汪曾祺。那时候沈从文给你的印象如何？

鯤 西 沈从文是随和的人。他住在呈贡，去他家要坐车去，吃饭吃得很简单，但是盛菜的盘子是乾隆时代的瓷器（笑）。我在昆明时狂热地崇拜意大利指挥托斯卡尼尼，我看了一场托斯卡尼尼的音乐纪录片，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云南日报》副刊。沈先生看了很欣赏，主动写一封信，推荐我到《大公报》做事情，后来没有成功。沈先生是一个小说家，在北平时受到胡适的欣赏，但是在大学就会受到人家的歧视。学府的竞争很剧烈，互相妒忌，这是歌德曾经讲过的。在学府里面爬上去很困难，除非你是念科学的，论文写出来就行了。

李怀宇 你曾写过，那时跟冯至先生的交往很深，后来好像慢慢变淡了，

有一种感伤的味道。

鲲西 我在昆明跟冯至先生很熟，往来最多。我经常到他家里，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谈歌德，谈绘画，得益很大。那时候他的《十四行集》也刚刚出版，我写了一篇书评在广播电台播出来。他写得最好的是《伍子胥》和《十四行集》。解放以后，冯先生比较保守，他跟学生都很疏远，后来他开始写《杜甫传》，我很直率地写信告诉他，我不大同意他这种写法，他没有回信，以后就没有接触过了。他写过一本《东欧杂记》，改了三次，因为中国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时好时坏，变了两三次，他就根据变的情况改文章（笑）。最后他临终时，还说要写很多。我依然怀念冯先生，因为他在文学和艺术这些方面对我启发很大，我惋惜的是他晚期的过分拘谨。

李怀宇 同辈之中往来较多的有哪些人？

鲲西 那时同学之间的感情很深，抗战胜利之后都有往来，有些人留学回国以后也跟我联系。像穆旦，交情还不错，穆旦从美国回来以后到上海还来看过我。穆旦很随和，他的诗当然写得不错，翻译很好，像《普希金抒情诗选》。他很可惜，死得太早了。我对他很欣赏。他们这一班的人都跟我很熟，王佐良、穆旦、许国璋、李赋宁，都是外语系的。李赋宁是吴宓先生的同乡，也是他得意的学生，他是最近才去世的。王佐良的英文不错，我听朋友讲，钱锺书说过一句话：外文系高班的一些人的英文还不如王佐良。钱先生这个评语是对的。王佐良还没有毕业，就用英文写穆旦，在英国一份文学杂志上发表，后来他涉及的面很广。许国璋因为跟徐高阮很好，我跟他在上海经常往来。

李怀宇 你跟钱锺书的几个学生交情很好，好像跟钱先生交往就不多。

鲲西 那时候钱锺书在学校讲课时，我刚好在重庆做事，没上过他的课，后来回到昆明时才听一些朋友告诉我他上课的情况。他上课讲文艺复兴、现代英国小说、英国诗歌，他底下的学生也是最好的学生，像王佐良、许国璋。他上课引经据典，很多学生都不晓得。钱锺书我只见过一次，在上海复兴路，抗战胜利以后我到上海，徐高阮带我去。徐高阮说，钱先生请我们去吃点心，我们去了，谈了三个钟头，无非品评臧否人物，陈梦家也在被骂之列。其实陈梦家早年以新诗人闻名，晚年致力古文字和历史研究，成绩是有

目共睹的。

李怀宇 有一种说法是，钱锺书早年曾口出狂言：“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鯤 西 很多人讲钱锺书的《围城》里影射西南联大具体的某个教授，像吴宓，我不这么看，《围城》是从很多人身上提取特点，这是高明的文学手法，固定影射一个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现在很多人对他很崇拜，但是不能真正晓得他的学问在什么地方，比如《谈艺录》里面，关于清诗部分是很精彩的，很多人搞不懂。很多人就喜欢崇拜，不一定读他的书，就像喜欢捧陈寅恪的人不一定读陈寅恪的书，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钱先生的文章，在《读书》杂志上登出来，就有一个东北的大学生写信来骂我，他认为我没有资格讲（大笑）！其实80年代钱先生的《旧文四篇》及后来《七缀集》都是我发稿的，有时有疑问将校样寄去，退回时都改正，并附“谢谢”二字。

李怀宇 西南联大的学风跟三个大学在战前的学风相比，有没有变化？

鯤 西 联大的学风很好，那时候没有学生运动，左右派的斗争是有的，但不是很剧烈，没有影响到学生的学业。相反，北平的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学校的校风改变了，荒废学业的人多了。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很清苦，一个饭台子吃饭，当中有一大锅菜，很多学生营养不良。我那时候做事情了，很多学生要到外面找兼差，当家庭教师，可以补贴生活。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出了很多人才，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后来出洋了，受了进一步的教育。抗战胜利以后，出洋很方便，不需要太多的钱，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以后对国家贡献很大。

李怀宇 后来有人问一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为什么短短几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那么多人才？”回答是：“自由。”

鯤 西 那时候很散漫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学生运动，不受干扰。可能也有，但是没有影响到学校正常的读书。西南联大的科学仪器也很简单，但是传授知识，培养了学生。后来学生出国了，出国深造很重要。因为抗战胜利时，用官汇去买外汇很便宜。到朋友那里借一条金子，去买外汇，就够钱

到外国读书了，所以大批人出去留学就是这个道理。后来回来了很多人，解放后国内很多的工程都是靠这些人做的。也有很多人受到不公平待遇。

抗战胜利后，鲲西回到上海，任职多家文化机构，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时与胡道静、何满子、金性尧等人同事。1957年“反右”，鲲西被判为“右派”，1959年，因“历史问题”送劳动教养，1979年得以平反，回到上海。此时，鲲西已年过花甲，重新提笔，在《读书》、《万象》、《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李怀宇 抗战期间，你在昆明做什么工作？

鲲西 我先在昆明广播电台做过，昆明广播电台是国民党刚刚成立的电台，设备很新，我就每天听外国广播，再编成新闻。我对二战的情况很熟，有很深的“二战情结”。我在新闻中接触二战，比如原子弹下来，我是最早在广播上听到的人，但不是看见。

李怀宇 听古典音乐是在昆明开始的？

鲲西 那时候可能很苦闷，听音乐是一种寄托。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有两个半小时的唱片音乐会，后来这个节目是我来排。我听音乐是很专心地听。有两个朋友很有意思，一个是徐高阮，一个是钟开莱，他们笑我：“这个人像神经病一样。”但是他们离开我以后都听音乐了（笑）。因为从他们给我写的信中看来，他们够水平了。钟开莱写信来说：现在听贝多芬的四重奏。能听贝多芬的四重奏就不是一般的水平了。徐高阮到上海第一次去听音乐，在日记里记下来了。这可以说是无形当中给他们的影响，这一点我很高兴。

李怀宇 抗战胜利后，你的经历也不是很顺坦。

鲲西 抗战胜利之后，吴景超先生介绍我到重庆救济总署工作，1946年就迁到上海。解放了就到海燕书店，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成立，我在那里当王元化的秘书。后来胡风案子发生了，我跟胡风的观点不是一路，但是跟他们都保持很好的友谊。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假如有吃饭，我也关进去了。上面说你在胡风的影响下，不可能没有关系，于是给我一个处分：停职反省。停职反省是白拿钱，不做事情，那也很好。胡风问题结

束了，就成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任社长的是李俊民先生，有学问，有观点，对人敦厚。整个编辑部的班子很好：胡道静、何满子、金性尧、钱伯城、刘哲民、朱金城。那时候我们讲，这个班子开一个中国文学系没有问题。那是很快乐的时期！可惜这个时期很短，马上就“反右”了。

李怀宇 后来判你劳动教养是因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

鯤 西 抗战时，我在美国的宣传机关做事情，这个机关的名称是很难听的——“战略作战处”，它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实际上是针对日本的，我做的工作就是把日本的英语广播记下来，拿去分析，待遇很好。这么一个罪就足够了。“反右”时定我为“右派”，1959年说“右派”有“历史问题”的话要劳动教养，从1959年到1979年，我就在浙江和安徽交界的乡下。我的两个女儿都不能读书。幸亏现在我的外孙、外孙女很有出息，考入名牌大学，学习成绩优异。

李怀宇 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鯤 西 这十九年是劳动教养，劳动教养跟劳改没有什么差别，但可以抽香烟，可以喝酒，可以跑到农民家里把衣服卖掉，换东西吃。我的名气小，名气大的话就要死掉了。我幸亏“文化大革命”没有在社会上，在社会上可能会被打死，因为凡是劳改劳教的地方都不允许进行“文化大革命”，像关在保险箱里面。好多人不是就在社会上被活活打死了吗？我的很多朋友同学都是精英，就死掉了！我是用这十九年的代价换一条命。

李怀宇 你和何满子、金性尧、钱伯城这些同事，经过二十来年的风雨，又坐在一起了。

鯤 西 我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满子、周劭、金性尧、钱伯城他们都在。我跟何满子、周劭、钱伯城经常联系，金性尧身体不大好。现在我们这批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李怀宇 近二十多年，才是你写作的好时光，这有点像张中行这样的老先生。

鯤 西 我写的东西都没有政治性。1979年以前，我写的文章很少，因为那时候观点不同，叫我用左派观点，我是不写文章的。人们或许以为我写

怀旧的文章居多，其实不然，怀旧并不只是留恋往昔，它是一种包含文化与历史的回顾，由此可以展示一个人的思想。我认为我写的《纪德的书，已是明日黄花？》一文，可以说从一方面代表了我的思想演变以及我所追求的理想。我已是将要离去的老人，但我不认为我的心已老，写有关纪德这本书的人有多位，但我认为我所着重强调的是：一位批评家所指出的天才的一个可能定义是，对大部分人漠视的事物有特别关注的心灵。这就是我认为纪德值得后人尊崇的地方。人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冷漠，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决然看不到未来的时候还是这样关心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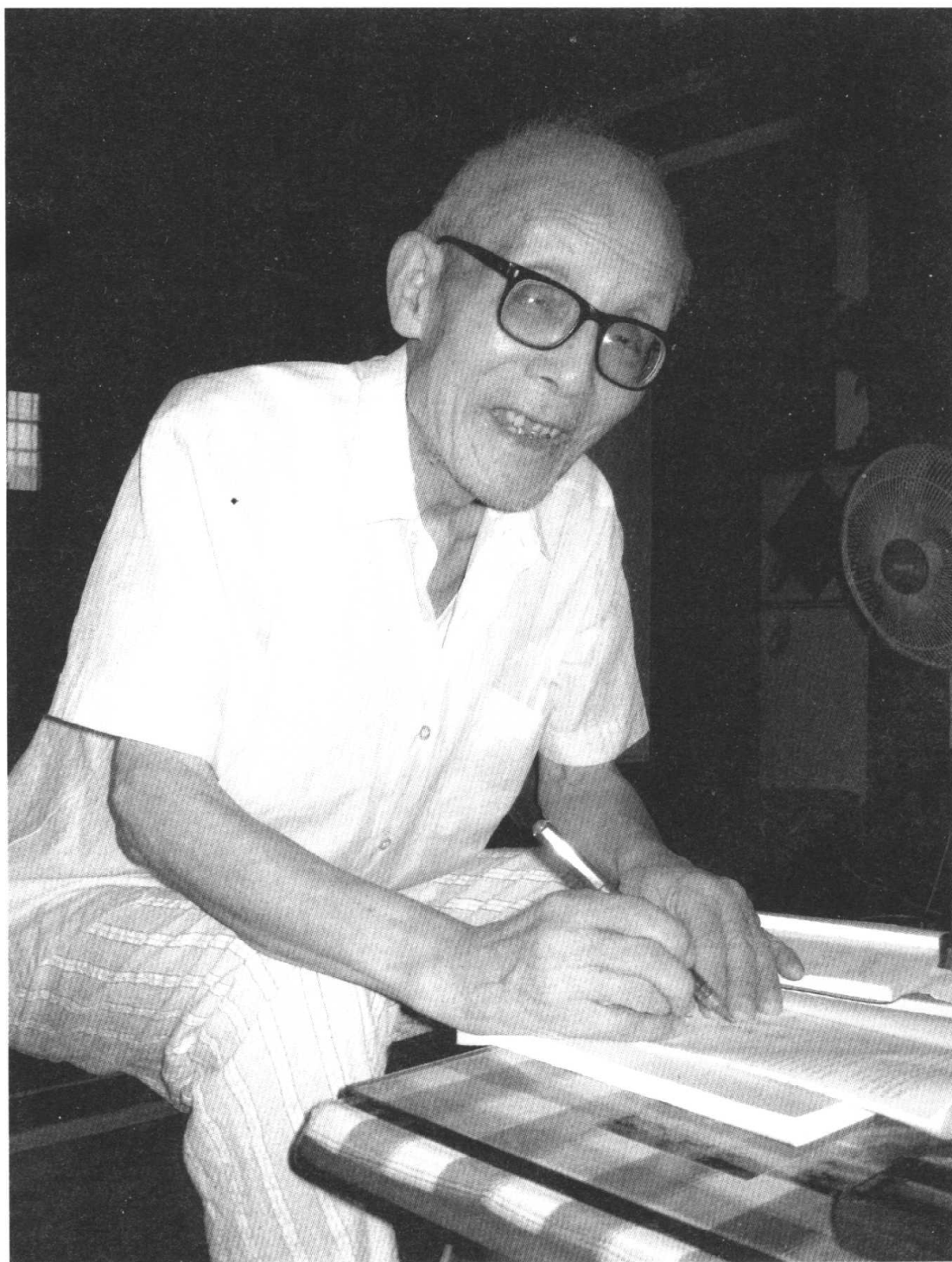
辛丰年

1923年生，江苏南通人。

1945年开始在军中从事文化工作，1976年退休。

80年代以来，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音乐随笔，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

李怀宇 摄



辛丰年

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

从南京到南通的汽车竟然坐了这么久。车内破旧，窗外暴雨，幸亏手上有一本辛丰年的《处处有音乐》。读着读着，快到辛丰年家时，天晴了。

喝上辛丰年先生亲手沏的茶，一路劳顿消了一半。聊了一会，辛丰年微笑着说：“你采访肬西的文章，有广州的朋友剪下来寄给我了。”紧张心理随即消了一半。这一个下午的聊天，甚是投机。

我带来了采访贾植芳的文章，谈起舒芜与贾植芳各自回忆劫后再见时细节出入的问题。“恐怕是贾先生误记了。舒芜是被‘左’得出奇的文学官僚强迫才这样做的。舒芜的包袱太重了，十字架一直没有甩开。”辛丰年兴致盎然，“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制造冤案而且后来还不忏悔的人。我几次见到贾先生，提到过去这些事情，他能够看得比较宽容。”

贾植芳是辛丰年的儿子严锋的博士生导师。有一次，辛丰年在贾家吃饭，贾植芳谈起妻子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

眼泪横流，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这个细节出自严锋的《辛丰年其人》——我见过最漂亮的儿子吹捧老爸的文章。辛丰年却告诉我：“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

辛丰年求知欲和好奇心极强，对我在北京、上海、香港采访过的老先生，他毫无隔膜，虽然身在南通，心灵却与这些文化老人高处相逢。这种境界源于好读书的习惯。对书人的品评，他自有见解：金克木可爱，《孔乙己外传》就是他的自传；喜欢赵元任文章的风格，赵太太杨步伟的自传很好，过去很喜欢李敖的书，自从他来大陆胡说八道以后，就不喜欢他了；钱穆在一些不懂的领域也乱发议论，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谈音乐。

虽然自称现在把音乐戒掉了，辛丰年在闲谈中也不离本行：“我特别想听到张爱玲的声音、鲁迅的声音。今年才有幸听了一下胡适的声音，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崇拜胡适，但很喜欢胡适。沈从文的声音我听到了，听不大懂，湖南口音。现在就是听不到金克木的声音。”又叮嘱我：“你以后随身带一个录音机，见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或者年纪不大但很难见到的人，录下来，将来就是很重要的史料。最好是动的影像，静止的已经不能满足。这样，声音笑貌能让后人知道。”

如今，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感慨：“南通过去小得有意思，张謇时代的南通很有味道。现在弄得乱糟糟的，毫无意思。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我好多年没有兴趣、没有时间出去看了。”第二天，在辛丰年的忘年交严晓星带领下游览南通，所见与辛丰年所言大有出入：这是一个让人心醉的江滨小城。

辛丰年原名严格，父亲严春阳为孙传芳部下，曾任淞沪戒严司令兼警察厅厅长，“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幼时曾在上海生活，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遽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

李怀宇 你在南通读到初二时就停学了？

辛丰年 我上到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就抗战，学校就停了。那是新式中学，而且是商业中学，毕业了可以到银行当练习生，我们家里让我去上这个学校，也没有远大理想，为了以后就业方便。我也不喜欢上伪学校。我当时有一种想法：上学还不如自学，自学很自由，自己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我也不到外地上学了，也没有机会上大后方。当时觉得自学还是一个好办法，当然自学的结果就是不学无术（笑）。

李怀宇 自学时读些什么书？

辛丰年 主要利用开明书店出版的自学讲义，可以补习到高中的程度。但有些也就不用讲义，就是自己乱读书，杂览。另外就是自学英语，主要的想法是：为了多看书就要掌握英语，不懂英语的话，许多没有翻译过来的书就看不了。当时学英语是很困难的。

李怀宇 此前在学校时英语学得怎么样？

辛丰年 老师教得不好。这门课本来不感兴趣，后来才想到非学不可，要自学。学了几十年才能勉强看一些不太深奥的书，这也很可怜。后来参加工作了，也没有时间花在自学上了。但是我在部队里对工作不感兴趣，曾经要求：让我去上学吧，去学俄语。不允许。我就自学，自学的程度比英语差，但是也能够结结巴巴地看一些东西。这都是很遗憾的，如果过去能够把外语学好，多学几门，那么我也许可以多读一些书。后来，我看到金克木的书，他的几门外语都是自学的。他读书读通了，我很佩服他，我见了朋友就推荐金克木。

李怀宇 抗战时要不要逃难？

辛丰年 我小时候从四岁到十岁在上海住过六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做过很不好的官，他是孙传芳的部下。1938年，我逃难到上海又住了一年。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就又回到沦陷区，这时我主要就是自学了。还学了古琴，也是一知半解的。

李怀宇 你在学校里对音乐感兴趣吗？

辛丰年 那时候我对音乐课是很烦的。每周有一课音乐，除了老师教我们唱一些歌以外，就是用商务印书馆的课本教大家学五线谱。学得很枯燥，

也很慢。每周上一课，结果上了一年我们也不能读五线谱。当时我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觉得五线谱讨厌极了，对音乐毫无兴趣。后来我对音乐感兴趣以后，几个星期就把过去没学的东西都学了，而且学得还更多，还能应用。

李怀宇 什么时候看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

辛丰年 那是在沦陷区了，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看了《月光曲》的故事，我就开始迷上音乐了。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个也很有趣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大笑）。当然这也是一种享受。同时，也就没有把精力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上，音乐是没有用处的。我只是一个乐迷，要专业才能到学校里当个教师，或者当一个演奏家，那就有用了。唯一的用处是写文章拿到一点稿费（笑），这也是很惭愧的。

李怀宇 很多人就是看了你的《乐迷闲话》才慢慢喜欢上音乐的。

辛丰年 我懂的都很有限，除非他们自己再去认真地听，认真地学，否则也不可能得到很多。音乐这东西，你要认真才能学得很深，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当成一种娱乐，这是很糟糕的。所以我现在对这种时尚也很失望。过去我就希望将来古典音乐能够越来越普及，社会上人的情趣都提高了，这是很让人愉快的。现在完全怀疑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现在高雅音乐也变成商业了，谈音乐的书也不过就是一种商品了。

过去我喜欢音乐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将来我们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能听到好的音乐，公共场所、公园里都在播放贝多芬的音乐，这多好啊！现在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噪音了。想不到，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

李怀宇 原来在上海听过现场演奏的音乐吗？

辛丰年 很少。解放前，我住在上海那几年，被关在家里，不出去的。后来喜欢音乐，我不住在上海，住在南通了。难得有机会才到上海去，那是孤岛时代，音乐主要是给洋人、高等华人听，很贵，我就听过很少几次，那时候对古典音乐也是太无知了。解放以后，我听现场演奏也很少。特别在那时候，到中国来演奏的交响乐团很少。上海的本地交响乐队水平比较差，听了不舒服。这方面很遗憾，只能吃“罐头作品”（笑）。

1945年8月，辛丰年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在军中，辛丰年主要从事文化工作。1949年参加渡江，后随部队到达福建，从此在福建军中工作。1971年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回老家监督劳动。1976年平反，辛丰年主动要求退休，开始在家带孩子、读书、听音乐。

李怀宇 在抗战时，你对共产党是如何了解的？

辛丰年 也是逐步了解。就是看那些所谓进步的书：《西行漫记》、《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很向往。有对比嘛，在敌伪的统治下，当然向往共产党。另外也受文艺书的影响，比如说，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就影响了我参加工作。还有曹禺的《日出》，就是同情被压迫者，就想到这些人怎么样才能得到解放呢？

李怀宇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公子少爷，把自己划到剥削阶级里面去了？

辛丰年 我自己当然是属于剥削阶级了，从小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这些都是叫人觉得惭愧得不得了！这是一些因素，再加上朋友的影响，结交了一些追求进步、爱好文学的朋友。

李怀宇 什么时候跟章品镇先生认识？

辛丰年 1943年。1945年我就跟着他到解放区去，新四军就在苏中，我们参加的部队就是新四军。

李怀宇 你有拿过枪吗？

辛丰年 没有，当时我的眼睛已经是高度近视了，一千三百度。当时需要小知识分子，他们让我去做小知识分子的事情：宣传、文化。我不算老革命，1945年参加革命不算老了。

章品镇

1921年生，江苏南通人。早年曾先后就学于通州师范、上海外国语专门学校、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国学功底深厚。1940年在家乡组织青年抗日协会，同时开始从事文艺工作。1953年起任《江苏文艺》主编、《钟山》主编等职。

日本投降后，过了大半年的和平时期，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然后就是自卫战、解放战争，我们就到处跑，渡江也参加了。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去解放福建，一直打到厦门。本来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要解放台湾，所以就停在福建，一直到“文革”。从1949年到1971年都在福建，先是在厦门，后来在福州。

李怀宇 你在部队里做什么？

辛丰年 我在部队也是有一个过程。一开始我就当个助理员，助理员就是所谓干事，最后当了个小官——副科长。没有什么意思，幸亏没有当大的官，大的官在“文革”当中打击会大一点。大官要管的事情多，就肯定要犯错误。

李怀宇 为什么会在1971年离开福建呢？

辛丰年 “文革”来了，我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被打倒了，被审查了。断定我有问题，就把我开除，到苏北农村里去改造了几年。

李怀宇 严锋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他九岁那年，你和他一起翻译过《夏伯阳》。

辛丰年 那是开玩笑。那时候我在部队里自学了俄语，只学了一点皮毛，勉强能看一点比较通俗的俄文书，就带了几本俄文的书到乡下去劳动。苏联电影剧本中有一个《夏伯阳》，有空的时候我就把里面的故事讲给严锋听，他很感兴趣，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就翻译了一段。那个文章也不深奥，是电影文学剧本，比较通俗，当然也有文学性。我讲，他记，记了没多少，也没有兴趣再弄下去，不是真正的翻译。

李怀宇 在那时候能听音乐吗？

辛丰年 在部队时也迷音乐，但是后来不能公开地听，这是“封资修”中的“修”。在60年代有一阵比较开放，进口好多唱片，我去买了好多，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很贵，不过当时我已经有工资了，所以买得起，也不能公开地听。上班不能听，下了班回到宿舍里，周围都是同事，也不能大听。后来“文革”当中还算这个账，那时候我已经把这些唱片都处理了，可是人家还拿这个当作一个罪名。不过我还是尽量地打埋伏，有几张唱片舍不得扔掉，放在行李里，带到乡下去。唱机也带去了，但是到了乡下，也没有可能放。所以听音乐也是很艰苦的。

后来就平反，本来还可以转业，转为地方干部。但是因为当时我爱人已经去世了，留下两个小孩，太小了，我要带着小孩去转业，做事情不方便，而且我对做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就要求不转业，提前退休。那时候还差一两年才能退休。1976年我五十三岁，本来要到五十五岁才能退休。那么他

们说：好吧，就让你退了。

李怀宇 你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挑着扁担去买书？

辛丰年 到新华书店去买马恩全集，那时候还是真心想补看马恩全集。最主要还不是看理论，是想看马与恩通信。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对历史感兴趣了，我想看马与恩通信当中反映出来的斗争的历史是怎么样的。

李怀宇 看完之后有没有收获？

辛丰年 没什么收获，理论太深奥，特别是马克思的文章很难懂，恩格斯的不难懂，恩格斯的理论性也是很强的。但是从通信中知道他们一些交往的情况，也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退休后的辛丰年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开始把心得写成文章。1987年，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由三联书店出版，在乐迷中影响深远。此后，辛丰年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刊物撰写音乐随笔，驰誉书林乐界，结集出版《如是我闻》、《请赴音乐的盛宴》、《乐迷闲话》、《乐滴》等。

李怀宇 什么样的机缘为三联书店写了《乐迷闲话》？

辛丰年 朋友介绍的。董秀玉亲自责编，我还受宠若惊，她这个责编很负责、很认真的，她批评我：你这部书前面写得很流畅，后面就弱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加工了。我后来有一部书就是沈昌文责编的。

李怀宇 那些关于音乐的资料从哪里来？

辛丰年 这个资料就等于“文抄公”了。也不是照抄，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盗版书店——光华书店，不用买版权就能够影印外国书，大量地影印了音乐书和乐谱，后面印上“内部交流”，怕外国人追究版权。这个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就是要看这些书。中国这方面的书太少了，我就尽量地买光华书店影印的书，也请朋友到浙江图书馆借英文原版的书。凡是有机会买到英文原版书我都会买，国内的书当然是有什么都买。再加上乐谱，我的音乐知识就丰富了。我是经过这些东西来掌握资料，但有些还是要经过自己消化。原来我的书在前面都写上，本书资料取自哪里。我非常感谢那个短暂的盗版

的春天，只恨那时候买的不够多（笑）。

后来要买这些书就买不起了，我又采取了一些办法，就是托人到图书馆借书，特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资料，借来复印，这个成本就高了。另外有一些在外国打工的朋友，帮我在国外买一些旧书，这个我也是很感谢的，在国内都买不到。朋友以前寄来一本最新的《莫扎特传》，最近还寄来了一本英文的《贝多芬传》，这些都是好厚一本，看起来真叫人高兴哪！我不怕资料多，只怕资料少。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够接触的音乐资料太少了，因为我们出版的中文资料很有限。我做的工作假如可以算是音乐普及工作的话，就是从资料里“批发”出来，然后自己消化消化，尽量地“零卖”出去。自己必须有一些体会，否则的话也写不好的。恐怕和真正搞音乐的相比，那就差远了。国内专业的人，他们又不肯搞这个工作，他们很忙，总是抽不出时间。外国的音乐大师，常常写一些普及性、启蒙性的书。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乐迷很难的。

李怀宇 音乐唱片在哪里买？

辛丰年 在上海有得买，在南通也有得买，盗版片到处都有。这是80年代之后。在80年代以前，唱片还没有出来，只有录音，磁带要买也蛮贵。那时候主要是听收音机，用录音机把它录音下来，放来听。当时这样也觉得很不错。

李怀宇 你在80年代初期也听过韩国短波台播放的古典音乐？

辛丰年 从收音机里听的，那个收音机是日本造的，当时来讲，效果是很好的。调频的，录下来跟磁带的效果差不多。后来就是买唱片，设备说起来也可笑，直到现在我也享受不了那种最高级的设备，就是次高级的也享受不了。我对这些设备隔膜得很。有些人说顶级设备的效果怎么样好，我就始终没有机会去听，我也不去追求这些。因为我们很早听的都是很差的唱片，那些老唱片现在不能入耳，录音的效果是很差的，当年就是靠那个东西得到了享受，而且现在我想起那些老唱片，都很留恋。但是人家还是愿意听那些老唱片，老唱片有当时的氛围，当时的风格。现在有些人欣赏音乐，也欣赏一些由老唱片翻过去的音乐。当时的唱片很贵的，有些我也买不起，始终是跟不上时代（笑）。因为是乐迷嘛，也就满足了。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现在的音乐爱好者听现场的演奏，或者到外国听音乐会，最差的也有很

高级的音响，我这些都没有。我就是听听唱片，而且差不多都是盗版的。这能听出什么好东西出来呢？这就很可笑。

李怀宇 各种乐器你都能玩吗？

辛丰年 也是很皮毛的。后来退休以后凑了钱买了这架英雄牌钢琴，当时不但贵，还买不到，走后门才买到。当时下定决心要自学钢琴，自学的结果就是学了几年能够“乱弹琴”。自己要弹一曲，就不难了，其中包括《月光曲》，它有三个乐章，第三个乐章太难，我不能弹，前两个乐章不难。我练了几年，很苦的，因为我那时候已六十多岁，弹起来很费劲。我也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弹，弹起来还引起邻居的不满（笑）。辛辛苦苦地自得其乐，后来就没有时间弹了。现在不弹，也就生了。

李怀宇 你听音乐的时候不做别的任何事情？

辛丰年 绝对不做别的任何事情。我看别人一边做什么事情，一边听音乐，我是很反对的。我自己听音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坐在那里，甚至是站在那里听。我就觉得很舒服。如果有朋友来，也是爱好音乐的，我就请他听。假如发现他在听的时候不太有兴趣听，我就不听了。时髦的音乐我不听，外国的流行音乐也不听，兴趣不大，也没有时间听，听古典音乐还来不及呢。

听音乐之外，辛丰年最大的爱好是看书。“从前他什么书都看，六十岁以后，基本上只看历史方面的书。也许将来他会写一部有关历史的书。”（严锋：《辛丰年其人》）辛丰年为了看书，甚至把音乐都戒掉了。

李怀宇 现在还听音乐吗？

辛丰年 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现在

不是太平世界，不是我们享受音乐的时候。

李怀宇 抗战的时候也听音乐啊。

辛丰年 那时候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抱着这个东西去欣赏好的音乐，现在我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希望，虽然我并不说是绝望了。现在我就多看书，因为看书可以对一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得到一些粗浅的解答吧。但是听音乐就得不到什么解答了。这也是很可怜的。

有时候看书看得很累了，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拿出来听一下。看书可以浏览、快读，音乐不能快读。有些作品很长很大，比如要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至少要有一小时，这一小时就少看几本书，只好不听，就在脑子里想一想，过过瘾。

李怀宇 现在主要读什么书呢？

辛丰年 我现在主要读历史方面的书。文艺方面的书只是过去看过，没好好看，新的文艺书，不管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很少看。除非有一些很畅销的书。当然有一些新书看了有兴趣的，我还是愿意再看。要重看的老书很多，比如《鲁迅全集》看过好几遍，我现在还想从头到尾好好再看一遍。特别是看了《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之后，就更想把《鲁迅全集》再看一遍。当然，我也不像过去一样把鲁迅看成一个神。

李怀宇 有些人现在还是把鲁迅当成是神一样。

辛丰年 他绝对不是神，鲁迅给很多人利用了。当然我过去读过的书也不是很多，有些我现在能够找到的，就找来读一下，但是有些就算了。有些过去体会不深，现在就想再看，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我过去看过好多遍，包括中文的、英文的，俄文我学得很浅，不能读这样的书。我还想重读《罪与罚》的比较好的英译本。另外，前几年，我特意请在美国的朋友到旧书店买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中国也有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但是不一定有人家的英译本好，因为欧洲的语言相近嘛。英国的译本是很认真的，值得相信。

李怀宇 历史方面的书主要读什么？

辛丰年 二十四史里面全读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最重要的。还有一些近代、现代人写的中国史，我主要读吕思勉，因为他比较可靠。我把他写的书全部买来，一部部地

读，不过读起来很费劲，因为年纪大了，记不住。过去要上班，没有太多时间读书，现在要补课，已经晚了。好的回忆录也读，像特克尔的《美国梦寻》，还有一些口述历史。

李怀宇 唐德刚做的口述历史看不看？

辛丰年 也看，像他的《李宗仁回忆录》我就不是很满意，这当然要怪李宗仁自己讲得不是太令人满意了。我自己也在其中辨别一些到底可信不可信。

李怀宇 唐德刚自己说，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

辛丰年 但也有些使人信服，当然不能全信，其中有一些回忆的错误，还有本人的局限。比如有一本《亦云回忆》，曹聚仁很推崇这本书，但是没有详细介绍，作者沈亦云回忆他丈夫和她一生的事情，她的丈夫黄郛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我对蒋介石是深恶痛绝的（大笑）。《亦云回忆》是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在香港有得买，于是我托人从香港买来。写得真好！有好多书要看，所以时间太紧了。

李怀宇 钱锺书也曾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力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辛丰年 他这话我非常相信。我自己现在要回忆，好多事情都搞错了。当然我不会去想象，写回忆录的人常会想象，这一点就要防备了。

李怀宇 我倒是相信回忆的细节可能有出入，但感情是真的。

辛丰年 不过，历史当中细节是很重要的。细节常常比概括的回忆还要重要，一两个重要的细节就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如果在细节上搞错了，而造成人家的误信，就不好了。好的回忆录是宝贵的。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时代久远就湮没了，你要抢救一些。

黄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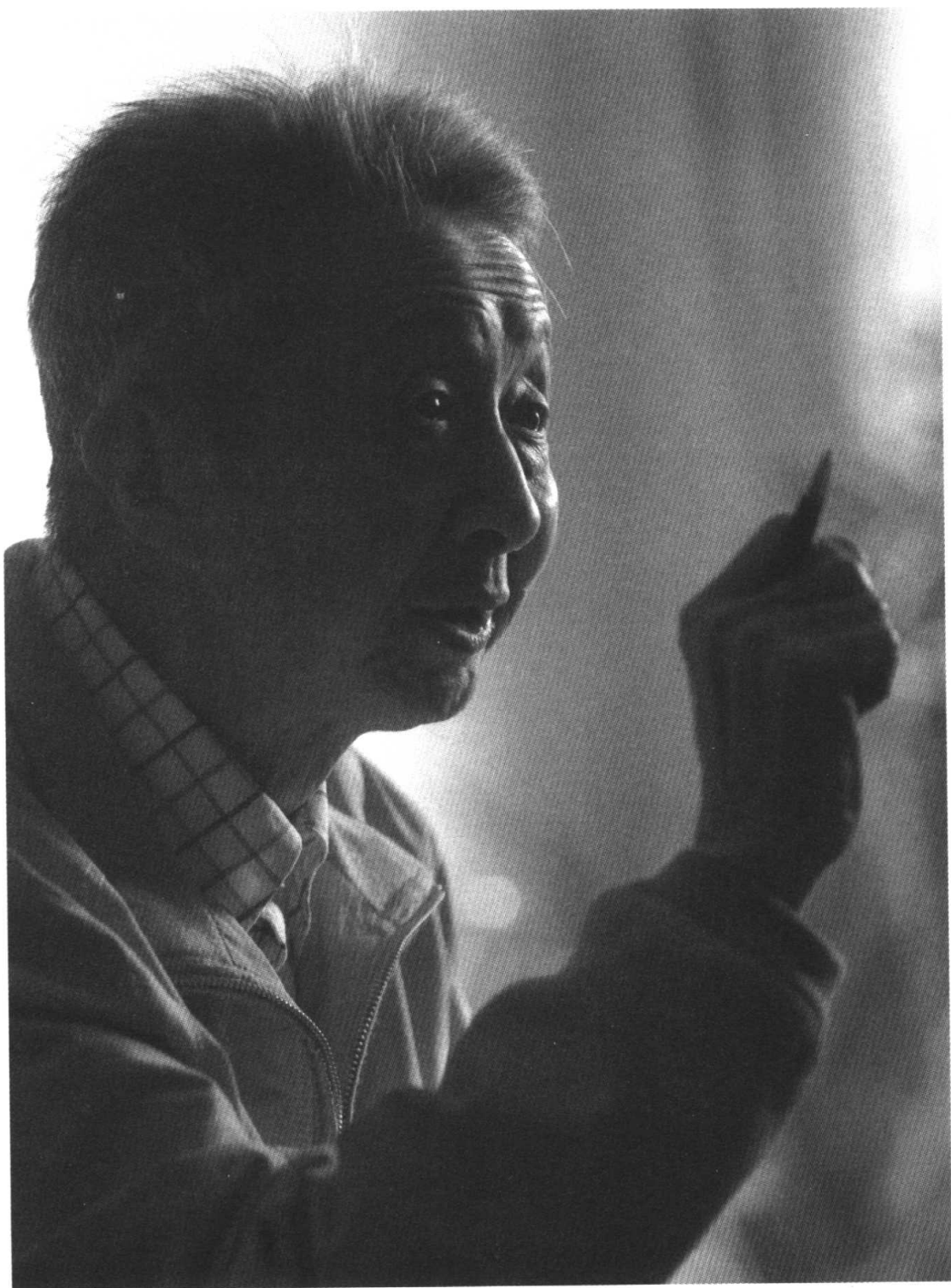
1880—1936，浙江杭县人，原名绍麟，字膺白。1905年赴日学习军事，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协助陈其美在上海起事。1926年冬应蒋介石之邀南下，参加北伐。1928年任外交部长，不久被削职为民达六年。1933年平津岌岌可危，奉命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任职三年多。



流沙河

1931年生，四川金堂人。

诗人，散文家，著有《窗》、《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隔海说诗》、《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Y先生语录》、《流沙河近作》等，编著有《台湾诗人十二家》等。



流沙河

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

解放了，我们头脑里装的东西全部是革命货色，革命货色的第一条就是藐视知识文化。知识文化没有任何意思，更需要的是革命思想，知识文化本身不足以产生革命思想，中国要依靠的是革命思想，知识文化不是站在时代尖端。革命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所以我离开了四川大学，进了报社。

2006年11月11日下午，成都香柏树下音乐吧座无虚席，大家在听流沙河先生讲《庄子闲吹》。流沙河笑眯眯地说：“所谓闲吹，川语谓之闲扯，就是不讲章法，想到哪里谈到哪里。”这半天的闲吹里，笑声连连。日近黄昏时，主持人说：“今天沙河先生在这里闲吹庄子，与大家同度他七十五岁生日……”在座者肃然起立，在掌声和生日歌中，尽欢而散。

两天后，我如约来到流沙河先生家中，又是半天的闲吹。刚坐下来，无意间看到我送的书上有“李欧梵”的名字，勾起了流沙河的回忆。“二十年前，我和李欧梵一起在上海参加国际汉学家会议。朝鲜的三个代表坐在一起，规规矩矩的，不分散。发言的时候，三个人一起上去，发言的人站在中间，两边各待一个人。后来，其中有一个要去上厕所，三个人一起去。”流沙河边说边模仿他们的动作，“这是他们党给他们规定的纪律，害怕他们叛逃。李欧梵看得目瞪口呆。”

流沙河声情并茂地操着成都话，宾主有一搭没一搭地对答，如摆龙门阵。

同座的冉云飞介绍，每个星期二上午，流沙河会和老友们到大慈寺喝茶，星期天则在流沙河家聚会。流沙河说，老友相聚，无非是交换读书心得，谈论社会百态，互相激发。

其余的时间，流沙河一般在家里读书写作，自称“愿做职业读书人”。他的桌子上，常是几本书摆在一起，齐头并进地读，所写的多是读书笔记。他说：“我现在写的读书笔记都不是要留给谁的，只是读得有趣味，便写出来，写的过程也有一种趣味。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都留不下去，只能作为小点心。”

流沙河的书法自成一格，常为朋友写字。访谈的前天，他写了一幅黄炎培的教子铭：“事繁勿慌，事闲勿荒；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宾主在欣赏中笑道：“黄万里就是这样教出来的。”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1931年在成都出生。四岁时，流沙河回到老家金堂。1937年抗战爆发，流沙河称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都是“抗日教育”。1947年，十六岁的流沙河离开老家到成都读高中。

李怀宇 少年时代在老家生活了十二年，现在印象还深吧？

流沙河 我在老家生活了两个十二年，第一个十二年是我的少年时代，第二个十二年是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8年。可是现在我再回到老家去，街上的人已经不大认识了。我在“文革”的时候，全镇连小孩子都认识我，因为我是大“右派”。我现在回去只有一些老大爷认识我。现在回去就感伤，从前我住的地方已经拆了，我不认识人家了，别人也很少有认识我的。这时候我就想起一首英文诗的一句：Gone with the wind.

李怀宇 抗战八年在家乡时，日本的飞机有没有轰炸过？

流沙河 没有。但是日本飞机每一次来轰炸，都要经过我们大院的上空，从大院飞过五分钟以后，就听到成都炸弹爆炸的声音了。他们是精神战，必须打赢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才是中枢。小小一个县，引不起震动。

李怀宇 你在家乡读书受抗日的影 响大吧？

流沙河 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抗日教育。我进小学的时候是1938年，抗战

已经爆发，我背一个书包，那时候的书包都是自己家做的，大家都非常穷。我的书包上面就有四个字“抗战到底”，是我父亲写的字，我母亲剪下来再缝上去的。当时的老师都要跟学生讲：这样下去我们中国就要亡了！所有同学要爱自己的国家。如果亡了，我们就叫“亡国奴”，就是奴隶了。

李怀宇 你那时读的是什么样的书？

流沙河 读的书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订的教科书。小学教科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国文”绝大部分是文言文，“国语”是语体文，就是我们说的白话文。小学生的国语课本有岳飞的故事，还有岳飞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后来才知道，小学教材编写的参与者有顾颉刚。小学毕业班的国语最后一课就是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胡适译的。小学课本里有胡适的诗：“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栽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我读小学高年级，就已经有王维的《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一个小学生都背得，终生不忘。还有一点，我当小学生的时候，比现在的小学生贫穷不止百倍，但是快乐不止百倍。为什么快乐呢？当时小学生没有什么功课回到家还要复习的，回到家就是让你尽情地玩。所以贫穷是贫穷，回忆起来还是非常地幸福。

李怀宇 在乡下的时候了解抗战的形势吗？

流沙河 当然了解，我看报纸，唱抗战歌曲。对一个小学生来说，很多抗战的知识都是从报纸上来的。我的家中订了一份成都的报纸，叫《新新新闻》，后来我进了初中以后，学了几个英文单词，就说“new new newspaper”（大笑）。并不是所有人家的亲戚都有文化。我的另外一个哥哥订的是《新华日报》，在成都也有发行。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还有电灯，我们家乡在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就修了水电站，非常廉价的电，供应到城市里面。当时的电除了照明以外，没有工业需要，因为我们家乡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只有电灯。当时电灯的牌子叫“亚普尔”，就是“apple”，像一个苹果。我在电灯底下看报纸，印象最深的是襄阳失守、宜昌失守，已经打到三峡门口了。抗战八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我所能唱的歌几乎全是抗战的歌。

抗战期间，流沙河在家乡目睹了美国空军种种行为，印象深刻。几十年后，七十多岁的流沙河曾在公开演讲中回忆当年见闻，他说：“我要告诉大家：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李怀宇 什么时候看到美国军队？

流沙河 我还在当小学生的时候，就非常熟悉美国军队。抗战以后，山西有一个学院叫铭贤学院，迁到我们家乡来了，就在我们县城。那个学校有美国教师、美国职员，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来资助办铭贤学院。那个学校是今天山西工学院和山西农学院的前身。后来那里又修了飞机场，在修飞机场前，美国人的飞机就已经到了，先修一条跑道，然后飞机就来了。

李怀宇 在你的记忆里，当年在你家乡的这些美国兵是什么样的？

流沙河 飞机场跟我们镇上相距只有七公里，因此这些美军星期天经常到镇上来。他们就来看我们的寺庙，还看城隍庙各种东西。没有发生过一次

污辱中国人的事情。我们镇里不是归国民政府管，全是归袍哥。什么叫袍哥？要了解，袍哥是主持正义的。只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发生污辱中国人的事情，袍哥就不答应。

那些美国兵天真得很！是天真少年，到我们那里快活得很，什么事情都看，什么事情都拍下来。他们没有见过中国内地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对中国人也

很友好，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清清楚楚：你是在帮我们打日本。不叫他们美国兵，叫 mister：“有三个 mister，还有一个女 mister 呢。”（笑）印象非常之好。到了 80 年代，他们都老了，居然还回到我们那里来，还拿出当初拍的照片。居然有当年的人说：“哎呀，这个就是我！”这些都说明美国兵非常之善良。他们念旧……我知道的美国兵打死中国人的事情只有一次，这是 1944 年的事情，日本飞机来轰炸了，发了警报，当时发警报有规定，凡是夜晚必须灯火管制。那么，日本飞机还没有到，美国飞机就发现在机场旁边一华里外的一个镇上有非常亮的灯火，美国兵用机枪朝灯火的地方打死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姓赵，是银匠，他在化银，灯光非常亮。如果目标暴露，日本飞

袍哥

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盛行于四川的民间帮会组织，在其他地区被称为哥老会。袍哥会发源于晚清，辛亥革命后影响扩大，走向公开，与青帮、洪门并称，对四川社会各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机就要轰炸机场的弹药库。

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乡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骂过美国兵。他们到我们镇上买任何东西，都是多给钱，他们也不讲价钱，也没有我们这种货币，是拿美元。他们只有多给钱，没有少给钱，没有任何中国商人说美国兵买东西亏了他。但是在东北，苏联红军买东西不给钱的事情层出不穷。

在成都读高中时，流沙河在成都《西方日报》、《新民晚报》、《青年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等。1949年，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几个月后离校，热情投身他向往的革命工作，在反俞平伯、反胡风运动中都曾写过批判文章。1957年发表组诗《草木篇》，被划为“右派”。1966年，流沙河被迫回家乡劳动，历时十二年。

李怀宇 你是1949年考取了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

流沙河 当初我成绩非常好，如果读下去，我可能做着水稻专家袁隆平做的事情。

李怀宇 但是在四川大学读了多久？

流沙河 几个月。

李怀宇 为什么不读？

流沙河 那几个月都没有好好读，我在写东西（笑），所以班上没有任何一个同学认识我。但是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是第一名。大概几个月中我只上了三堂课，我在写诗，写杂文。解放了，我们头脑里装的东西全部是革命货色，革命货色的第一条就是藐视知识文化。知识文化没有任何意思，更需要的是革命思想，知识文化本身不足以产生革命思想，中国要依靠的是革命思想，知识文化不是站在时代尖端。革命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所以我离开了四川大学，进了报社。后来四川大学发现很多同学学业没有完成就去参加革命工作了，他们就说，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需要文化知识嘛，上面就传达文件、发通知把这些学生都招回来。我的报社人事科就来找我，说你回去读大学可以享受调干待遇。那时候有津贴，什么东西都发，连香烟都发。我还是不干。那时候我心高气傲，觉得我有革命思想，

革命思想高于一切，我怎么能够走回旧社会的角色，就不去了。

从一滴水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知识是不受重视的，不是人家不重视，我就不重视。我就要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赵树理同志一样，深入生活，创作革命文学，这个才叫天经地义。我这一辈子就很可怜，后来80年代四川大学有活动，要我回去，我说我不回去。他们说，他们查到我的名字，给我补一个毕业证书，我说：“我才读了三堂课，不好意思。”我高中也没有毕业，因此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我的学历就只有初中水平（大笑）。

李怀宇 后来反俞平伯、反胡风的时候你都很积极？

流沙河 我写过两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批判俞平伯也写过两篇。有些文章就受到领导层极大的重视。我告诉你，姚文元这种现象早就有了，在姚文元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已经有姚文元这种现象了，那个时候姚文元还没学着写东西呢。

李怀宇 还记得你的那些文章是怎么写的吗？

流沙河 当初已经有很多革命前辈写批判俞平伯的文章、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这些后生就学习他们的“战斗思想”和“战斗方法”，他们对我们好生培养，姚文元也是这样培养的。后来我当了“右派”，姚文元就专门有一篇文章全面揭发批判我的：为什么流沙河是一个阶级敌人？

李怀宇 你在50年代初期还写过歌颂毛泽东的诗？

流沙河 那当然了。还歌颂整个党，歌颂整个社会，还出了集子。

李怀宇 后来怎么创办了《星星》诗刊？

流沙河 1956年创办的，1957年1月正式出刊。1956年9月就已经成立《星星》编辑部，办公室也有了。我是里面的一个编辑，也是编委会的成员，共有五个成员。

李怀宇 你发表的《草木篇》是你成为“右派”的罪证？

流沙河 有一部分“右派”跟这个事情有牵连，但真正原因是上面制造的，是毛泽东制造的。毛泽东指示在“鸣放”过程中，要把《草木篇》这个毒草给大家鉴别，印出来发给所有的中学，说这是“奇文共欣赏”。这样我就成了“右派”。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写得还可以嘛，就更加地受批了（笑）。80年代有朋友告诉我，当时跟《草木篇》大毒草有关系的人有两万五千人之多，

但是我没有看过任何公开的文字。因为《草木篇》的字很少，印出来就节约成本了。用这样的办法来抓“右派”，就符合毛泽东支持的“多快好省”，这就是“节约闹革命”，是很划得来的。

李怀宇 当了“右派”以后干什么？

流沙河 当时每个单位必须留一两个“反面教员”，我是“反面教员”，最初的两年把我留在编辑部，修改稿子、订正文字。他们给我的稿子都是乱七八糟的，让我整理文字，我只负责错别字。后来就打发到凤凰山农场去劳动了三年多的时间。回来后就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种菜，那是三年饥荒，有些人来偷，还要每天晚上守着……

李怀宇 1966年就回到家乡去了？

流沙河 我的家乡是城镇，还不是乡下，我这一生没有下过一次乡，我都没有真正吃过苦。在城镇，仍然是粮食供应，当了农民就没有这个了，了解到中国的下层就知道如此之不公平。从一个农民的角度来看：一个“阶级敌人”都过得比我们好，你还说我们是翻身做了国家主人？怎么会相信这种话呢！

李怀宇 在家乡那十二年主要做什么？

流沙河 拉锯六年，钉木箱六年。因为我做的劳动是计件工资，每个月拿的工资是上面算出来给的，所以所有我锯的木头都记了账。一年只有病重和正月初一不做，从来没有星期天，拼命地做，按面积全部算起来，我这六年所锯的木板按平方尺算，一尺宽排起来，有三十华里。

1978年，流沙河从家乡回到成都。1982年，流沙河写《台湾诗人十二家》专栏，后又写《隔海说诗》，在中国大陆较早介绍台湾诗人，尤其欣赏余光中。在一次讲座上，有人问流沙河：“余光远是你大哥？”流沙河点头说是。又问：“余光中该是你二哥吧？”流沙河赶快声明不是。余光中的《蟋蟀吟》与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隔海酬唱，成就一段佳话。

李怀宇 第一次看台湾新诗是香港的刘济昆寄给你的？

流沙河 刘济昆原来跟我都不认识，他是四川大学的学生，他家是印度

尼西亚华侨，他十二岁就在印度尼西亚发表诗歌歌颂毛主席。1965年印尼排华，他就只好回来，他不了解这边，就到贵阳读高中，然后考取四川大学，一进四川大学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是四川大学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到了70年代，他母亲在美国给周恩来写信，说她儿子最热爱祖国，从十二岁就歌颂毛主席，现在关在监狱里面。放出来以后，他就到香港了，当打工仔。最有意思的事是他说的：你们大陆来的所有文化名人都要经过我这一关，因为我是在海关过行李的，过行李要有名字。他特别关心成都这边的事情，我在这边重新发表文章，他马上就知道了，就写信给我：无论你写什么，给我寄来。在那边登，这样可以赚点钱，他给我划高的稿费。

李怀宇 通过刘济昆，你认识了余光中？

流沙河 他在信中告诉我：外面有个诗人叫余光中，写的诗最好。因为他看我写的诗全都很浅，完全是宣传腔，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说“文化大革命”如何坏，“四人帮”如何坏，中国的改革政策如何伟大。我的《流沙河诗集》1982年出来以后，赶快寄给刘济昆，托刘济昆交给余光中。不巧余光中回台湾了，一年后才回到香港中文大学，见到我的那本诗集，余光中还提了意见，说中间哪首诗好，那么，没有提到的诗就是不好了（笑）。他是用表扬的形式来提意见。

李怀宇 后来余光中写了《蟋蟀吟》，你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我们在中学课本读到的。

流沙河 余光中的一本诗集上有《蟋蟀吟》，但是我没有看见，等我看见了，我的这首《就是那一只蟋蟀》已经写了。他在信上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我觉得他这一句留下一个诗的眼口。我的这首诗是在香港《文汇报》首发的。

李怀宇 和余光中通信后，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

流沙河 非常晚，到了1996年11月才见面。但是，我本人已经十七年不写诗了，在1989年就不写诗了。

李怀宇 为什么不写诗呢？

流沙河 我写得最多的诗都是歌颂的，很多都是针对“文革”如何坏，“左”的年代如何坏，因此也是歌颂，是不是？歌颂需要热情，后来我就没热情了。

80年代末，流沙河身体不佳，心情郁闷，萌发了重读《庄子》的念头。多年钻研《庄子》后，流沙河身心舒畅，出版了《庄子现代版》。

李怀宇 什么时候开始读《庄子》？

流沙河 开始读是在初中。我的一个国文老师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的名字叫王纯良，他教我们国文的时候，觉得教材太浅，就教我们《逍遥游》前面三段，规定必须背诵，而且规定我们必须手抄，这样就终生不忘。后来我当了“右派”以后，就开始读王先谦的本子，《庄子》三十三篇只选了二十二篇。王先谦的本子好处是加了简单的注释，便于普及，不是供研究的。这是1958年，那时候我以为《庄子》就是这二十二篇了。但是后来我看别人的一些文章，《庄子》的一些文章怎么没有读过呢？

李怀宇 后来在“文革”当中能读吗？

流沙河 “文革”的时候，任何书都没有了。“文革”当中，我一天那样强的劳动，我要吃饭，我要挣够钱，不然就要饿死。根本就没有心情，没有时间，也没有客观可能读书，什么书都没有了。

李怀宇 什么时候把《庄子》读全了呢？

流沙河 1989年以后。80年代后期，我的各种病症已经相当重了。胃病，人特别瘦，身体极差……后来有人跟我说：“当时我看你快要死了。”怎么办呢？突然我觉得灰心，觉得应该好好地读《庄子》，于是就关门读《庄子》了。一边读，一边钻研，就不是阅读了。其他人说的：“流沙河本来快要死了，是庄子救了他。”这个话是我前妻说的。正因为是庄子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面对现实，如果不换一个角度，心中非常怨恨，非常愤懑，胃病更加严重，神经更加衰弱。所以我说，《庄子》是给历朝历代的失意文人一点安慰。

李怀宇 后来怎么萌发写《庄子现代版》的念头？

流沙河 我突然想起，我迄今为止所写的东西，一本都留不下来。可能有一篇东西会以一种形式流传下来，就是将来的人写历史，写到某一个注释，有一句就说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我说，就是这个也不是作为作品，是作为资料让人家证实哪年哪月哪个“右派”做的事。我做的事情就像长江水过了，我认为留得下的东西就是：我本身没有这个本事，我是一

个小人物，可是我牵到一个伟大作家的裤脚，我只有一尺高，牵着他的裤脚，可以混进文化圈子，这个巨人就是庄子。我没有入场券，我可以牵着巨人的裤脚混进去。除此以外，我留不下什么东西了。长远的将来，还会有很多人读《庄子》，而《庄子》原文又是那样难，那么我在这里加了工，便于将来的人接受，这样就算牵了庄子的裤脚。

（本书部分篇章编辑时有所删节）

后 记

这些文章从2005年8月开始采写，随后在《南方都市报》副刊“大家访谈”栏目近乎每周刊登一篇。庆幸有这个大气的平台，方能自由驰骋，在此感谢同仁们的鼓励和交流。

我心中充满幸福感，所受之教无以言表，感谢所有接受我访问的前辈。篇幅所限，本书所选的只是我所访人物的一部分。他日如机缘巧合，再成书公诸同好。

我时时感念师友们热情引见和时相讨论。感谢广州的袁伟时先生、杨小彦先生、谭庭浩先生、刘小磊兄，北京的李辉先生、陈四益先生、陈履生先生、郑勇先生、詹那达先生、韩雨亭兄、李晓阳兄、萧三郎兄、陈远兄，上海的吴中杰先生、陈子善先生、陆灏先生、严锋先生，香港的潘耀明先生、杨锦麟先生、马家辉先生、梁文道先生，南京的董宁文先生、雷淑容女士，成都的冉云飞先生，南通的严晓星兄。本书的许多思想火花，从愉快的聊天中得来。

感谢郭廷冰先生、彭辉先生、林津鹭先生、卢申先生、刘忠先生、王敏小姐、程永强先生的精彩摄影。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诚出版。同时，对阅读本书的朋友，说声谢谢。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44CK6K6/6Zeu5Y6G5Y+y77ya5Lij5Y2B5L2N5Lit5Zu955+l6K+G5Lq655qE56yR5aOw5rOq5b2x44CLXzExODkwODQ0LnppcA==",
  "filename_decoded": "\u300a\u8bbf\u95ee\u5386\u53f2\uff1a\u4e09\u5341\u4f4d\u4e2d\u56fd\u77e5\u8bc6\u4eba\u7684\u7b11\u58f0\u6cea\u5f71\u300b_11890844.zip",
  "filesize": 34812402,
  "md5": "bec3df5afebc071ddf69f7779d0e327d",
  "header_md5": "8d567f18e745f8754cde84289f18ccfc",
  "sha1": "42132317d75bd3b80ca82d8bebccecc7d68ea6205",
  "sha256": "d338fca450ee7b13198582c2ccc578e40ed62138aadf951aacc376a20b0e88af",
  "crc32": 76898068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9233581,
  "pdg_dir_name": "\u00ed\u2562\u2556\u251c\u256c\u2569\u2514\u00b7\u2569\u2556\u00fa\u2551\u255a\u00b2\u2569\u00ab\u256c\u2557\u2553\u2568\u2563\u00b7\u2553\u00ac\u2569\u2562\u255a\u2566\u2561\u2500\u2568\u00aa\u2554\u2219\u2514\u00df\u2559\u2591\u00ed\u2556_11890844",
  "pdg_main_pages_found": 421,
  "pdg_main_pages_max": 421,
  "total_pages": 430,
  "total_pixels": 233677824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